14位国内顶尖人文学者揭示中国大学文科真相

陈鸣悦/著

大学文科是什么？

哲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哪所大学的最好？它们都是研究什么的？什么样的人适合学？学了有什么用？毕业后的就业前景又如何？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我觉得真是要讲选专业，第一，要考虑兴趣，第二，可能还是要考虑将来的发展前景，取决于你各方面的权衡。

——秦 晖 清华大学教授

要尊重和坚持自己的独立选择，不要跟着同学圈子中的小文化跑。哪个地方你干活不觉得累，越干越来劲儿，这个地方就是最能发挥你的潜能，最能干出成绩的地方。

——刘 东 清华大学教授

在本科阶段，选好的专业不如选好的大学。考进好学校，四年的大学生活就会很愉快、很充实，学点真东西；进不了好学校，这四年就像受刑一样，苦哈哈地受煎熬，就为了混一个就业的资格。

——张 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状元与非状元，进入大学后是看不出差别的。高考排在最前面的，入学后的成绩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关键是有没有学习兴趣，兴趣培养出来了，自己能够刻苦钻研，他就会走在前头。

——朱善利 北京大学教授

你要跟着你内心的信念走，一方面要果断地剔除一些东西，做出自己的选择；一方面是一旦做了这个选择后，就要按着这个路子走，不反悔，不后退。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上架建议◎ 教育·励志·访谈

ISBN 978-7-203-07106-8

9 787203 071068 >

定价：28.00元

大学文科是什么

14位国内顶尖人文学者揭示中国大学文科真相

陈鸣悦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文科是什么：14位国内顶尖人文学者揭示中国大学文科真相/陈鸣悦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1

ISBN 978-7-203-07106-8

Ⅰ.①大… Ⅱ.①陈… Ⅲ.①高等学校—文科（教育）—专业—简介—中国②毕业生—高中—升学参考资料 Ⅳ.①G647.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2567号

大学文科是什么：14位国内顶尖人文学者揭示中国大学文科真相

著　　者：陈鸣悦
责任编辑：蔡咏卉
特约编辑：谷文彩

出 版 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kcb.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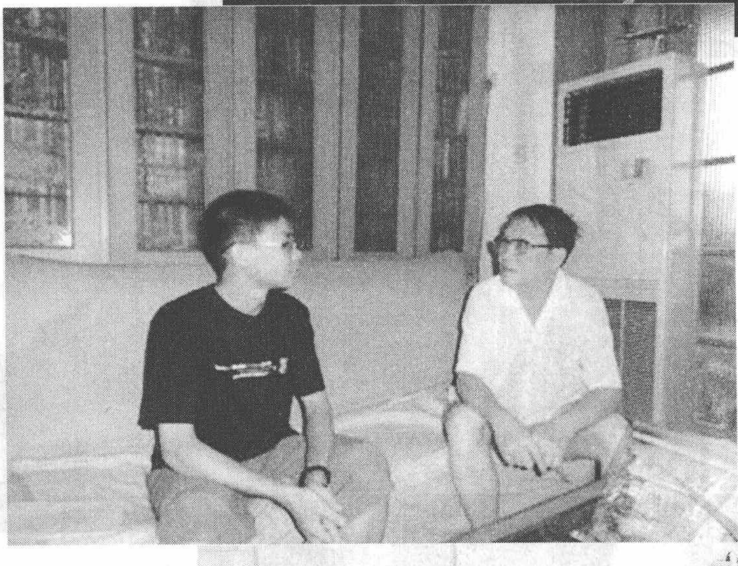
经 销 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55 mm×965 mm　1/16
印　　张：19
字　　数：238千字
印　　数：1—8000册
版　　次：2011年1月　第1版
印　　次：2011年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7106-8
定　　价：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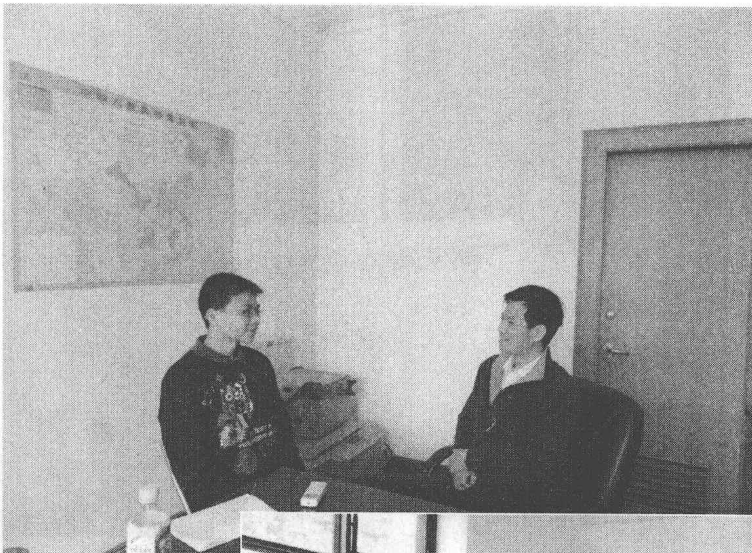
▶杨东平访谈



◀秦晖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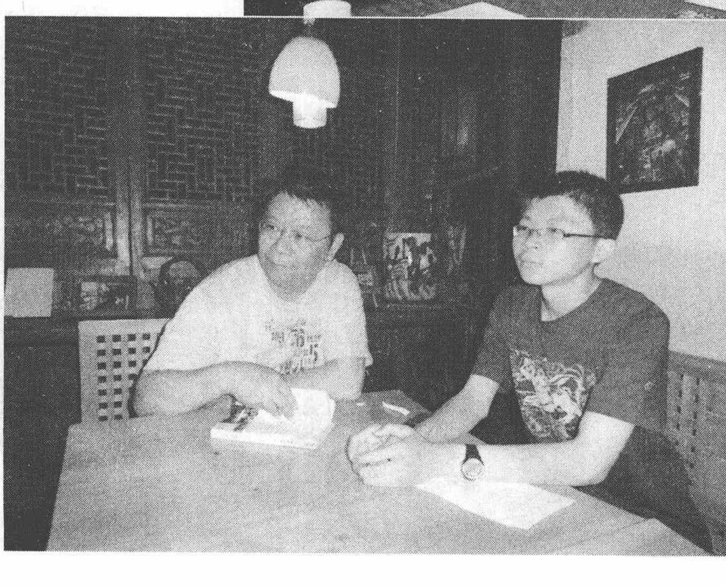
▶谢小庆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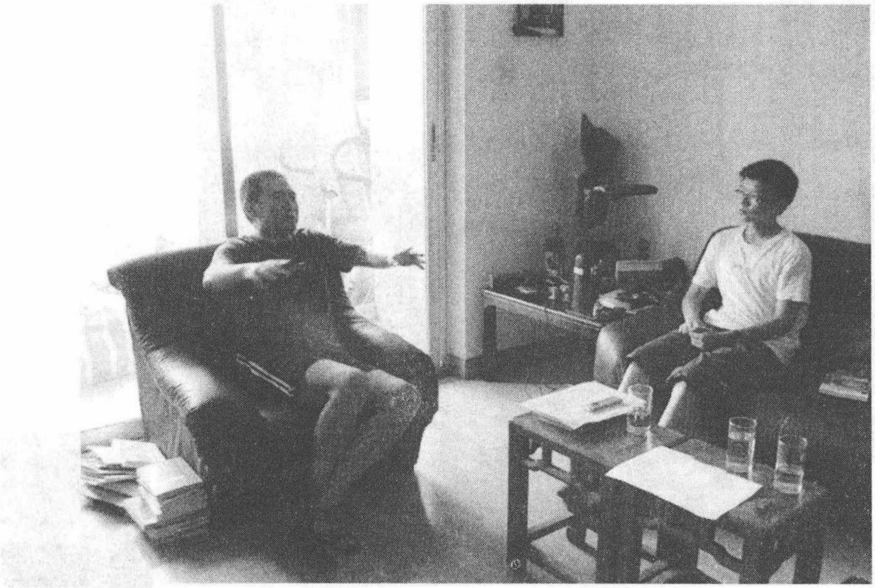
◀ 吴国盛访谈



▶ 刘东访谈



◀ 牛大勇访谈



▲ 郑也夫访谈

▼ 张鸣访谈





◀朱善利访谈



◀李曙光访谈



◀车宏生访谈



▲ 展江访谈

▼ 崔卫平访谈



探究文科底蕴，清晰选择未来

陈鸣悦

进入高中以后，学校在每个假期都安排有社会实践活动。在第一个寒假（2009 年 1 月），我参观了一家印刷厂的生产全流程，并对该厂厂长进行了访谈，了解民营企业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的生存发展之道。在这次访谈之后，爸爸妈妈建议我不如利用这个机会做一个专题性的系列访谈。因为我一直喜欢体育，我的家人中又有人曾是北京棋院的职业棋手，第一个设想是对北京市的棋坛宿将进行系列访谈，体会一下当体育记者的滋味。但是我觉得这一系列的访谈虽然很有意思，却解决不了我目前所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爸爸曾经对我说，高考报什么大学和报什么专业，由我自己来决定，他们不准备替我拿主意。可是我对于这个问题，完全心中无数，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联想到班上的同学，除个别人对于高考志愿有自己的志向外，大部分同学对此都是一头雾水。于是我提议，能否就如何报考志愿的问题拜访一些专家学者，听取一些指导性的意见。爸爸妈妈十分支持我的想法，并就应当访谈一些什么样的专家学者给出了建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郑也夫教授成为这一系列访谈的首个对象。2009 年暑假期间，我到郑也夫教授府上拜访。郑教授已年逾六十，依然容光焕发，谈锋甚健。他的“伶牙俐齿”令我印象深刻，每个问题他都能说得滔滔不绝并且条理清晰，这让原来不善与人交流的我敬佩不已。在访谈中，郑教授指出，“学科的划分不是

天经地义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可能涉及多个学科，我们不应该受学科的约束。他说，“现在社会学研究的，都是相对来说还比较不成熟和比较新鲜的问题”；已经成熟的问题，很多已经从社会学分立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他认为，“学习社会学首先是学习一种思考方式、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社会学是一门帮助我们解释周围的事情的学问”，“是一门视野比较宽阔的学科”。关于什么样的高中生适合学社会学，他谈道：“对于社会问题，有的同学经常可以成为同学聊天中的‘侃爷’，消息灵通，分析有条理，这个同学就适合学社会学。”郑教授告诉我，现在社会学的前沿课题是教育社会学和医疗社会学，他自己目前所从事的课题则是生物社会学。

同样是在2009年的暑假，我在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的办公室对谢小庆教授进行了访谈。谢小庆教授为了把问题回答得更准确，使我对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不时在办公室的几个书架中为我查找一些有关的资料书，并让我带回家去认真阅读，这令我十分感动。在访谈中，谢教授主要从心理测量学的角度为我解答了职业规划和专业选择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在谈到成功与幸福时，谢教授提到“成功的道路不只是一条”，“在当今这个复杂的世界，人的兴趣是会变的”，“不论你在何时何地进行选择，首先都要了解自己和了解社会，才能找到二者之间最合适的搭配，找到你自己的成功之路”。当谈到能力与高考成绩的关系时，谢教授说：“能力不同于知识、技能。……能力是人的相对稳定的、需要较长时间才会发生变化的心理特点，而知识技能水平则是比较容易改变的。……现在的高考成绩只能表明一个人的知识掌握程度，还不能表明一个人的能力水平。”一个人的能力水平可以通过心理测量的方法来了解，然后根据这个人的能力特征，来选择相应的职业组合。最后，谢教授建议“用排除法报高考志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9年“十一”长假期间，我们全家与包括杨东平教授在内的十几位“驴友”一起去河南郑州、洛阳、三门峡一带旅游。中秋

节的晚上，在汝城市宾馆的客房里，我完成了对杨东平教授的访谈。杨教授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民办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是当前研究中国教育改革问题的一位权威学者。杨教授态度亲切和蔼，说话不紧不慢，但是在从容中又透着一种庄严。此时我已经升入高二，分科时分到文科实验班，因此我请他着重谈谈“文科教育在大学中的位置”。杨教授指出：“在工业革命以前，文科教育是大学的主体，学科的分化主要是在工业革命以后。”中国“轻视文法科的心理，始于民国二十年。那时政府曾公布《确定教育实施趋向办法》，在这办法中，明确规定‘大学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为原则’。”1949 年以后，“根据当时‘全盘苏化’、‘一面倒’的路线，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以苏联模式为楷模，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以工程技术、专门教育为主，‘重理轻文’的格局”。杨教授说：“大学教育本质上具有一种人文性，大学教育的真正目标是要培养有教养的人，培养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培养一个工程师、律师、医生。”“教育的最高理想还是每个人能发现自我，实现自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谈到我的系列访谈计划时，杨教授说：“你准备采访文科各学科的十几位专家学者，请他们分别介绍各自学科的性质、特点、入门路径与毕业出路等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不仅有助于你自己在高考时选择专业，如果能够结集成书，公开发表，对于其他准备报考文科的高中毕业生也会有所帮助。”

在杨东平教授的支持和鼓励下，我觉得应当加紧访谈的节奏，不仅在寒假和暑假期间，也要见缝插针地利用周末时间进行访谈。在高二第二学期及前后两个假期，我一共访谈了 11 位专家教授。

2010 年 1 月 28 日，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的寓所对他进行了访谈。张鸣教授原来是该系的系主任，他的被免职，曾经是媒体的一个关注热点。他现在一方面教书，一方面同时为多家报纸写评论文章，是一位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也是一位成功和开明的父亲，他的女儿曾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位高材

生，高考成绩在北京市名列前茅。按她的成绩是可以上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但她选择了中文，对此她的父亲则给予了坚决的支持。张教授待人十分随和，非常耐心地回答了我的各种问题。他对当前中国的政治学与政治学教育很不满意："总体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整个学科处于严重萎缩的状态，如果没有一个大的转型，就看不到光明的前景。"但是他同时又指出："如果你有决心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以学术为志业'，政治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正因为中国政治学还是一张白纸，所以比其他学科更有机会作出学术上的较大贡献。"在这次访谈中，张鸣教授除了给我介绍政治学的相关内容之外，还对高中生有很多的建议。其中，他强调了读书的重要性，"要把读书作为自己的兴奋点，读书时能够忘掉一切，读书有收获时会有发自内心的愉悦。一定要多看书，读书无禁区、无界限，没有什么不能看的，也没有什么不该看的。一定要变成一个'万金油'，先打好一个宽泛的基础，这样以后才能深入下去，不断往前走。"

2 月 13 日，我在车宏生教授寓所对他进行了访谈。车宏生教授虽然卸任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院长职务，但是教学和研究工作仍然非常繁忙。他在我去之前就认真研究了我事先传去的问题单，还就其中的一个问题专门打电话咨询了别的专家。他对于一个高中生的访谈能够如此重视，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做学问的人应当具有的格调与涵养。在访谈中，车教授首先介绍了心理学的性质。他说："心理学是一个最典型的文理交叉学科。"随后，车教授介绍了心理学在中国与世界范围内发展的历史，并回答了我关于大学中的心理学的一些问题。车教授告诉我，现在中国的心理学本科毕业生，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的占到三分之二，应用心理学专业尚有待发展。对于一些想报考心理学专业的高中生，车教授谈道："心理学需要文理兼备，不能偏科；数学统计、科学实验，这些都很重要；另一方面，心理学不像其他理科，它的研究对象——人是复杂

的，文史哲方面的底蕴对于学心理学也是非常重要的。既要有科学的素养，要学会推理、证明；又要有人文的素养，广博的知识，发散的思维。文理比较平衡的学生，适合学心理学。”

3月7日，我完成了对朱善利教授的访谈。与以往的访谈不同，这次访谈是在我自己的家里。朱善利教授非常热情，他说：“你学习很忙，不用到我这儿来了，我到你们家跑一趟很方便的。”这使我倍感荣幸。朱教授原来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常务副院长，我重点向他了解经济学、管理学及其相互关系。朱教授告诉我：“经济系、物理系、数学系都是搞基础理论研究的，侧重于理论方法的训练；管理学院、医学院、法学院等等，是进行专业教育的，还包括一些职业训练。”“从大的分类来说，以前只有经济学门类，后来增加了管理学门类。”朱教授说：“现在经济学和管理学方面的本科生，应当占到本科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强，现在每年招生人数在160万人以上。经济类、管理类的学生，文理不好分，像我们光华管理学院，既有文也有理，是文理兼收的。”在谈到经济学学生所要学习的课程时，朱教授强调，“一个数学，一个统计学，是经济学学生必须打好基础的课程”。他还建议高中生“今后不论搞哪个学科都需要打好数学基础”。

4月30日，我在北大主校园外的承泽园，拜访了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科学技术哲学教研室主任吴国盛教授。他在“五一”节假期中，特地跑到单位来接受我的访谈，我很感激。吴教授对现在中学政治课中的哲学内容，评价非常低。他说：“现在高中教的东西，根本算不上是哲学，与哲学基本没有关系。我在给大学生开课的时候说，我的任务是要将他们学过的所谓‘哲学’进行清洗，然后重新再来。”吴教授指出：“哲学是万学之主，是一切学科的基础。说得细一点，当某一门学科的基础理论需要变革的时候，就需要向哲学求助。”“再说法律领域，要立法的时候，立法的依据是什么，这就牵扯了很多法哲学的

问题。所以说哲学是一个非常基础性的东西，讨论非常根本性的问题。它在思想领域中是一个核心学科，一个永远离不了的学科。而且这个学科与其他学科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它不是提供知识性的东西，它提供对于人类基础问题的永无止境的批判，它总是对各学科的基础部分提出怀疑，提出批判。”在谈到什么样的人适合学哲学时，吴教授认为：“学哲学，首先需要兴趣。你如果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些哲学问题的思考中去，觉得有无穷的乐趣，是一种至上的天职，你就是学哲学的材料。当然，要真正领略哲学的乐趣，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熏陶。”

5 月 2 日，我在清华园立斋拜访了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刘东教授。刘东教授热情洋溢，谈古论今，令听者心旷神怡，如饮甘泉。刘教授说：“清华国学院倒是按照书院的模板办的，但它只存在了 4 年。可关闭清华国学院的主事人，他们当时不可能想到，国学院总共只收了 71 个学生，而且只有一年学制，结果呢，不说这四大导师是中国上个世纪最大的学者，就是在 71 个学生中，也出现了 40 多位很有成就的学者，其命中率之高，就连哈佛、耶鲁也比不了。为什么他们才教了一年，就把学生教成这样了呢？就因为用了最符合中国的文化教育方法来教。为什么跟了梁启超就不一样了？他让学生如坐春风之中，他是倾囊以授，他与你不是竞争关系，而是父子关系，而且，你在这儿学了多少东西不重要，你慢慢学会了这种生活的态度、治学的态度，作为此后毕生的操守。在这个意义上，你这辈子都是梁启超的学生，不知不觉也就成了一个大师。”谈到高考，刘教授说：“应试教育体制虽不是最好的体制，却也不是最坏的体制，……所以，同学们不要太过从感情上抗拒，先竭尽全力闯过高考这一关。……权且把这一关，当做一个智力游戏，给它对付过去。敲门砖用过了，得到了在高等学校中的发展自由，就要用足这种自由，只有带着这样一种心态，你才能成功。”他告诫我，要学好外文，也不要丢掉中国文化根基。并随时关注周

边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保持旺盛的求知欲。

刘东教授问了我的学习情况后说："要确立上北大、清华的决心和信心，不妨经常给自己来一点儿心理暗示。"他带我在清华和北大里转了转，并在清华大学的食堂里吃了晚饭。我还在北大博雅塔前留影，照片上的我表情严肃，略带紧张，大概是意识到要想成为这里的一员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自己任重而道远吧。

6 月 15 日，在蓝旗营万圣书园的咖啡厅，我与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牛大勇教授见了面。牛大勇教授看上去是一个很谦逊、很沉静的人，一点也没有大牌教授的架子，但说出话来非常有底气，言辞中有一种不怒自威的说服力。牛教授指出："吸取前人的智慧，在前人开创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问题，这样的一门学科就是史学。""热爱历史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这在毛泽东时代也没有变。建国时期的那批元老，他们不仅自己喜欢历史，也喜欢把子女往历史系送。""史学的地位，从民间和官方来说都是持久不断地发展延续的，史学是永不衰竭的一个学科。现在有这么多历史的通俗读物与电视节目，三国啊、孔子啊、百家讲坛啊、《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啊。现代史、当代史的著作，都在社会上持续运作，只要学术环境一宽松，马上就会热起来的。"针对我所问的本科应当选什么专业的问题，牛教授说："在本科阶段，我通常建议选基础学科去学，最好是在文、史、哲、数、理、化这几个学科中选择，这样将来发展的余地比较大。"牛教授语重心长地说："选择专业，实际上是在选择自己未来的一种生活方式。你将来想怎样生活？你要先想好这个，再选专业。我们选择了历史专业，就意味着我们选择读书、思考和写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哪一种生活方式更适合你，你应当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就想明白。"牛教授这一番话，令我思考了很多以前从没有想过的问题。

7 月 7 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办公室，我主要就新闻传播学对展江教授进行了访谈。展江教授原来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现在同时在北京、武汉、广州的多所大学担任博士生导师，经常在全国飞来飞去，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受了我的采访。展教授介绍说，新闻传播学这个学科，“在本科层次，一般设四个专业：①新闻学（传统的，以平面为主，以报纸为主），②广播电视新闻学，③编辑出版，为出版社培养人的，④广告。少数学校还增加了一些与艺术沾边的，广播电视编导、主持人等；少数学校还有传播学专业。”“前两年统计，这个专业全国在校本科生人数有13万多，现在估计还要多一点，大概是15万。”在我问到什么素质的人适合学新闻传播学时，展教授说：“思路敏捷、反应快、文笔快、节奏快。”他进而指出：“学新闻的人心里没有权威，他是反权威的，蔑视权贵，什么都看不上，这是比较好的理念。现在有好多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敢挑战现有秩序，这是不行的。中国的媒体……需要一批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7月10日，我到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教授的办公室，对他做了访谈。在我的这个系列访谈中，李曙光教授与吴国盛教授是最年轻的两位，是“60后”学者中的佼佼者。李教授非常健谈，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既风趣幽默，又富含信息量。李教授说：“法律专业比较适合男性，它要求沉静与理性。”“做一个职业法律人，需要一个理性的头脑，一种理性的思维。要求你特别冷静，特别有条理，特别善于逻辑的推演；还要求大脑有很大的空间，有很高的容纳度，能装下海量的背景知识。”“我一直对我的学生说，学法律你要比一般的人聪明得多才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你才能学法律的那些‘术’的东西——说话的技巧，论辩的技巧，发现问题的技巧，分析问题的技巧，解决问题的技巧。”李教授介绍了中国法律教育体系的现状，特别是学科设置状况。而其中，中国政法大学是二级学科最全的。李教授的话里透着一种自豪感，因为他本人就是“法经济学”学科的开创者，而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拥有如此齐全的学科门类，也与他这个研究生院常务工

作的主持者不无关系。我虽然还没有最后决定高考志愿，但是听了李教授的一席话，颇有蠢蠢欲动的感觉。

7 月 11 日，我到北大、清华在蓝旗营的教师宿舍拜访了秦晖教授与金雁教授伉俪。秦晖教授任职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历史系，金雁教授任职于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史学研究所，他们两位都是当今中国思想界的标杆性人物。我的访谈是从当年他们是如何选择专业谈起的，然后我请他们对于应当如何读大学文科，提供一些指导性的意见。

秦晖教授告诉我，对于“知识青年”这一代人来说，起初是没有个人选择专业这一说的，当时头脑中只有“革命理想”。“你们这一代与我们这一代最大的不同是：你们是考虑选什么专业，我们当时是只要有一个专业就行。”“我觉得真是要讲选专业，第一，要考虑兴趣，第二，可能还是要考虑将来的发展前景，取决于你各方面的权衡。所谓的兴趣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纯粹的喜爱，没有其他的考虑的，就像一个人喜欢打扑克，他是没有理由的，就是喜欢，控制不住；还有一种是从志向而来的，对于国家、社会要解决的问题是有用的，作为一个有志向的人，你就不能不去关心。”

金雁教授说：“我们那个年代，只要是有学可上就很不错了，基本上没有挑选余地。实际上我觉得学什么专业都不重要，选了史学，我也就是把它作为一种入门的基础。如果你让我选哲学，我也会喜欢的；你让我选宗教，我也会喜欢的。”金雁教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在大学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是一个最大的前提。如果你的志向是将来要走向政坛，那么你需要的是一种经世之学；如果你的志向是探索真相与真理，就是要从精神上有所追求，那么你有可能一辈子都是一个悲剧人物。不同追求、不同志向的人，对于人生道路的设计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作出了上面所说的选择，我认为在大文科里选什么具体专业并不重要。”“大文科的背景根本没有专业的界限。现在学科分类这么细，你只要进入一个学科，对

于另一个学科就是一个白丁。必须跳出这种状态，才有可能培养出大师级的人物。”

9月18日，我在顺义区崔卫平教授的寓所，就大学艺术门类的有关问题对她进行了采访。崔卫平教授与青年人，具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力。我曾在网上看过她与女儿的对话，母女两代人没有任何“代沟”，推心置腹地进行思想沟通，实在难得。崔教授告诉我：“不像物理学、化学，或者说哲学、医学，在大学里是一个系别的学科，一个知识的体系。它首先是一个艺术的操作，不是一个研究的学问，应该说是一个艺术实践，所以我们只说艺术门类。艺术门类是很具体的，比如说，电影、戏剧、戏曲、美术、舞蹈、音乐。”“学艺术的学生，首先是要掌握这门艺术实践，而不是把主要的时间用于研究有关这门艺术的学问。”“如果说，你既没有从小练习也没有经过一两年的专门训练，没掌握任何一门技能，你就直接报考艺术门类，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艺术是需要提前积累的，一点基础都没有的人，我认为要搞艺术是不可能的。”

至此，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与14位著名专家学者面对面的系列访谈就全部结束了。但是，有些访谈中的画面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专家学者们的谆谆教诲和告诫，将令我受用终身。

通过这次系列访谈，我对于中国大学中的文科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这里所说的大学文科，既包括高考中属于文科招生的专业，也包括文理兼收的专业。譬如说，经济学与管理学都是文理兼收的，心理学虽然大部分是理科招生，但是有些师范大学的心理专业也面向文科招生。在整个学科分类体系中，处于最上层的是学科门类，但是有若干学科门类下面只有一个一级学科，如哲学门类下面只有哲学一级学科，历史学门类下面只有历史学一级学科，所以只要着重分析一级学科就可以了。属于文科的共有19个一级学科，我把它们分为三类：应用类、基础类（社会科学）、基础类（人文学科）。应用类包括：应用经济学、法学、民族学、教育学、体育

学、新闻传播学、工商管理学、农林经济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基础类（社会科学）包括：理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基础类（人文学科）包括哲学、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艺术学、历史学。在我所采访的专家学者中，多数主张大学本科阶段主修基础类学科，将来能有更广泛的适应性；而且不要受到专业的限制，应当具有一种学习“大文科”的心态。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各位专家学者，他们不仅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的访谈，而且认真校改和审定了每一篇访谈稿。我要感谢亲爱的爸爸妈妈，他们是我进行此次系列访谈的指导教师，细致地教会我掌握各个环节的方法和技巧。我要感谢班主任刘秀茨老师，她通过与我本人及与我家长的谈话，提醒我要认识和克服性格弱点，并支持我进行这次系列访谈。我也要感谢学兄吴敖祺，为本书写了一篇内容丰富的附录。

陈鸣悦

2010 年 10 月 1 日

目　　录

第二辑　为己之学——基础类文科

第三辑　经世之学——应用类文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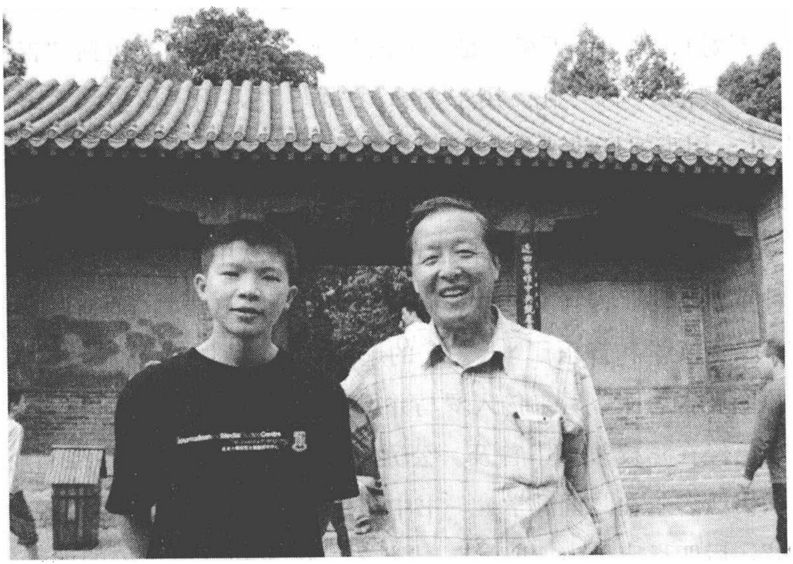
博雅之学

大文科

文科教育在当代大学中的位置
——杨东平教授访谈录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教育和文化学者。系中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副会长，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曾任CCTV《实话实说》、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总策划。关注中国教育改革、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传统文化继承和改造、教育公平等问题并参与实际行动。



访问者：陈鸣悦，昌平二中高二学生

被访者：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

访谈时间：2009 年 10 月 3 日

访谈地点：河南省登封市嵩阳书院、汝城市宾馆

陈：杨伯伯，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文科在大学发展史上处于怎样的位置？

杨：不论中外，古代的学术教育都是综合性的，文理不分家。中国周代就有“六艺”，西方教育的源头则有“七艺”。

“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学习书写（六书）和算数（九数）是“小艺”，学习礼仪制度（五礼）、音乐诗歌（六乐）、射箭（五射）、驾车（五御）是“大艺”。所谓“五礼”，包括“吉”礼，用于祭祀；“凶”礼，用于丧葬；“军”礼，用于田猎和军事；“宾”礼，用于朝见或诸侯之间的往来；“嘉”礼，用于宴会和庆贺。这些都是贵族子弟必须掌握的技艺。

“七艺”的全称是“七种自由艺术”，是西欧中世纪早期学校中的七种主要学科，即：文法学、修辞学、辩证法（逻辑学）、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七艺”的起源可追溯到古代希腊，追溯到柏拉图和智者派，后来传入罗马并得到发展。到公元4世纪，上述课程已经在学校教育中普及。公元6、7世纪的西班牙塞维利亚主教圣伊西多尔在《词源学》一书中，把“七艺”的前三科定名为“三学”，后四科定名为“四学”。“七艺”作为基督教学校的课程，至此即告定型。

数学、天文、地理（包含在几何里）、文学、哲学、历史、体育、音乐……在过去的贵族教育中是高度融合的，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分化。其目标是要培养“高贵的人”，即所谓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在当时的学科框架中，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文科、理科的划分，是一个整体的知识。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诞生于中世纪的欧洲。最早的四所大学，

是1088年创立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1160年创立的法国巴黎大学，1167年创立的英国牛津大学，1209年创立的剑桥大学。大学生们首先在文学院学习“七艺”，然后再分别进入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学习。当时大学的主要目标是培养神学家，其次是培养律师与医生。神学与法学现在都属于文科，所以也可以说，大学始于文科教育。后来，从神学中发育了哲学，又从哲学中逐渐发育了现代意义上的文理多学科，现在许多学科的博士仍然称为哲学博士。

在工业革命以前，文科教育是大学的主体，学科的分化主要是在工业革命以后。1809年创办柏林大学的威廉·冯·洪堡提出“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等办学思想，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滥觞。柏林大学开始注重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将科学研究发展成为大学的基本职能。科学家和实验室进入柏林大学后，许多新的理论与学科创立了起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柏林大学可以说是世界学术的中心，产生过29位化学、医学、物理和文学等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这种教研合一的研究型大学模式，逐渐在欧美国家以及日本推行开来。

自然科学崛起后，大学教育从人文主义的一统天下变成了人文与科学的二重奏。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此起彼伏，互相校正，但是人文主义的源流一直是非常强大的，当然具体内容会有改变。古代的博雅教育，工业革命以后成为“绅士教育”，现在通常叫自由教育、通才教育、通识教育，它所追求的都是要培养有教养的人、完善的人，培养完整的知识和完整的人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教育本质上具有一种人文性，大学教育的真正目标是要培养有教养的人，培养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培养一个工程师、律师、医生。

20世纪以来，伴随着政治民主、经济增长、科技革命、人口激增、知识爆炸等进程，大学的功能和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德国大学的模式漂洋过海，与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相结合，

由“赠地学院”生长出的为地方和社区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打破了学院和社会的藩篱。大学不容置疑地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成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和经济发展的“加速器”，成为社会服务的“超市”和“加油站”。布鲁贝克高度评价了这一变化：上大学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人们向它探求的不仅是知识，不仅是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重大判断和决策，而且是对人类命运的信念，是关于如何区分善恶、真理和谬误之类的问题。“在以往的时代，这些问题的答案看管人是牧师和各王朝的国王、皇帝、朝臣、官吏和部长。但今天，所有这些人都必须让位给全体学者”。因为“在认识事物、认识真理与谬误方面，现代世界中还没有什么社团比大学学者社团犯的错误更少”。通过吸收知识和运用知识来拯救自己已经日益成为“现代人的宗教”，大学同时也成为“社会的良心”，成为现代社会“世俗的教会”。显然，大学要发挥这样的作用，主要还是要靠文科教育来平衡和校正科技教育、专业教育的不足。

陈：现代大学进入中国以后，文科教育的命运是怎样的呢？

杨：程朱道学兴起之后，中国宋、明、清几代的教育，可以说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文科教育——“四书”、“五经”、“八股文”的教育。晚清政府引入西方的高等教育制度的时候，主要是着眼于船坚炮利、富国强兵。晚清的高等教育是从培养实用人才的外语学堂、武备学堂发展而来，政府优先发展培养专才的高等教育而非普及基础教育；在高等教育中优先发展具有实用价值的船舶、铁路、军事等工程技术学科。从“救亡图存”的实际功利出发，中国的高等教育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价值和浓厚的技术主义背景。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的传统大学初步完成了由旧入新的转换，确立了学术自由、思想独立之类西方教育文化的基本

价值，形成了颇具规模和影响力的现代知识分子集团。然而，即便是在五四以后，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具体实施也并没有真正解决。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冯友兰回忆说："当时教授会经常讨论而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目的问题。"即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通才，还是专业人才；是培养"人"，还是制造"专家"。后折中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为主，三、四年级以专业为主。1933 年起实行"大一共同科目"，文、理、法三院不分院系，一直有学生反对，给学校写信，要求早一些接受专门训练。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蒋廷黻回忆，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学家希望学生在第一年就接受专门课程，而教文学和社会学科的同事则希望晚一些开始专门课程，后折中。

国民党主政后，自由主义的文化价值和教育精神渐为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所挤压，抗日战争的爆发加剧了这种紧张。由于抗战救亡的紧迫压力，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控制，提倡"实用科学"，限制文科和理科的发展，在公费待遇上也很不公平，遭到文科知识分子的强烈批评，"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之争成为公共话题。清华大学教授池世英当时撰文指出："这种轻视文法科的心理，始于民国二十年。那时政府曾公布《确定教育实施趋向办法》，在这办法中，明白规定'大学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为原则'。""在民国二十二年及二十三年的招生办法中，明白规定各大学文法等学院或学系等，招收新生或转学生时，其平均数不得超过理、农、工、医等学院或学系等所招学生的平均数"，以增加理工等科学生，发展工商业和使中国科学化。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认为："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当时他已敏锐地意识到，对于中国的工业化而言，需要的不仅是技术人才，还有组织人才，

所谓“工业建设的领袖”，其“重要性至少不在技术人才之下”；“真正的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严格的自然科学认识倒是比较次要”。应当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在办学实践中探索并坚持了“通才教育”的理念。

陈：1949 年以后，您所说的在大学教育中的国家功利主义价值和技术主义、工具主义倾向是否更加严重了？

杨：是的。根据当时“全盘苏化”、“一面倒”的路线，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以苏联模式为楷模，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以工程技术、专门教育为主，“重理轻文”的格局。

1952 年的院系调整是一道分水岭，建立起中国高等教育的“苏联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对教育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教育计划与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紧密相连；教育的重心是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工程和科学技术教育；削减综合性大学，以发展专门学院为主；实行“专才教育”模式，按产业部门、行业甚至按产品设立口径狭窄的学院、系科和专业。工程技术类的专门教育获得迅速发展，并在教育系统中取得了至尊地位。出现了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重工程技术教育和科学教育、轻文科教育，重专业教育、轻普通教育等明显的价值偏斜。

1949 年，在校大学生中文科类学生共占 33.1%，其中文史、财经、政治各科的学生比重分别是 10.2%、16.2%、6.3%；至 1953 年，在第一次院系调整后，已分别下降为 6.7%、6.4%和 1.8%（共占 14.9%）。到 1957 年，第二次院系调整后，又进一步下降为 4.4%、2.7%和 1.9%（共占 9%）。1962 年这一比例最低，仅为 6.8%，这在世界高等教育中是绝无仅有的。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由 1949 年的 23.9%降至 1952 年的 10.9%。一大批历史悠久的优秀的综合性大学如清华大学、浙江大

学等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地位，被改为工科院校。

五六十年代对文科教育的削弱和贬损，不仅由于对经济重要性的片面强调，也出于对它"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否定。通过学科和课程改造，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学科被停止或取消，一大批人文社会学科的教育学者备受批判冲击。法学也是受到重创的，著名的法学教授都被调离大学，有的去电车上卖票，有的去当图书管理员，最好的有改成教俄文了。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反对学生学文科，哪怕他本人就是一个文学家、文字工作者。当时对于文科有两个普遍的说法：一是"文科无用论"，学自然科学才是有用的；二是"文科危险论"，文科思想复杂，容易在政治上犯错误。长期以来文理分科、缺乏人文内涵的科技教育，导致社会的价值感、道德感的普遍降低，许多专业人员知识结构片面褊狭，"只有技术，没有文化"，缺乏社会理想和人文关怀，对本专业以外更为重要的社会、伦理、环境生态、文化教育等问题缺乏应有的知识和重视。我国在人口、资源、环境生态、教育、社会文明、道德风尚等方面暴露出的许多问题，以及技术主义、短期行为的盛行，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这种高度专门化、缺乏人文内涵的褊狭的高等教育。

陈：改革开放以后，轻视人文教育和大学文科的情况，是否有根本性的改变？

杨：有变化，但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到 1980 年，我国大学生中文科学生的比重恢复至 8.9%。然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7 年的统计，在全世界 1000 万以上人口的 50 个国家中，文科学生占在校大学生比重高于 50%的有 3 个国家，介于 26%—50%的有 26 个国家，介于 20%—30%的有 6 个国家；介于 18%—20%的有 4 个国家。中国的情况，竟然比这一比

例最低的国家还低 10%。经近 30 年的发展，目前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中，文科约占 1/3 左右，理工科约占 2/3。

“文革”结束后，毛泽东以“抓阶级斗争”方式所施加的意识形态压力减弱了，但是国家独重科技的导向，重理轻文的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每当强调综合国力竞争的时候，就特别强调科技、军事。80 年代中期，当时叫新技术革命，“三论”等等，把科学技术放在很高的位置。进入新世纪，是一轮新的国际竞争，以通讯技术、网络技术等为主。可以看到，我们对计算机与英语的重视程度以及它们在学校生活中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的学科，被称为新的“通行证”。而人格养成、社会服务、团队合作等这些教育最基本的功能则无足轻重。包括现在渗透到小学、幼儿园的“奥数热”、“英语热”，背后就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认为这是“真本事”，其他都是虚的、没用的。

陈：对于现在业已形成的这样一种大学分科的局面，您是怎么看的？

杨：大学的学科划分，关系到怎样把知识体系分类。一般是这样分类的：数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然后是自然科学，然后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我们国家通常是把数学与自然科学放在一块，有些国家把数学与自然科学分开，数学是高于自然科学的。中国在 1949 年以后，基本上是按照苏联院校的模式，建立的所谓“专才教育”模式，把学科专业门类分得非常细。现在的学科目录还是 80 年代初确定的，近些年一直在修改，新的目录还没有出来。有些学科的归属问题一直有争论，比如说，教育管理是属于教育学科还是管理学科，心理学是放在自然学科还是放在人文学科，还有一个就是地理。现在高考的时候，地理属于文综考试的内容，但是很多大学的地理学科招收理科考生。这都是现行的过于强调专业教育模式的困境。希望通过最近的学科目录调整把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厘清，

实际是很难的，特别是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的背景下。我们国家把学科分类的问题搞得过于僵硬。在中学生考大学时，将他们分成文、理两类是特别不合理的，把那么丰富多彩的学科就分为两类，是有问题的。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提出的高考制度改革方案中，我们建议实行分层次、多轨道的学科知识水平统一考试。分层次，就是把高校划分为研究型大学、地方性院校、高职院校三个层次。多轨道，就是学科考试科目可分为多种组合，例如普通文科、普通理科、工程技术类、生物医学类、艺术和体育类等等。每科考试内容区分不同难度，例如语文1、语文2、语文3，数学1、数学2、数学3等，考生可根据自己的学科兴趣与能力选择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考试。举例来说，对于普通文科，研究型大学考语文1、英语1、历史1、数学2，地方性院校考语文1、英语2、历史2、数学3，高职院校考语文2、英语3。这一改革增大了考试的选择性，避免了一张试卷考所有考生的粗陋，有利于考生扬其所长，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考试科目。也有利于提高高校和学科招收人才的“精准性”。还可以改善对高中教育的引导，学生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制定学习策略，而不是在同一个跑道、同一个标准下竞争。现在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高考都采用类似的模式。

陈： 这种新的考试模式对于高中阶段的教学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杨： 可以推动高中阶段的教学多元化，增加选修课的比重。为什么多轨制的考试更适合学生呢？一个学生到高三的时候，就已经会有一些自己的兴趣倾向了，像荷兰高中开8门、10门课，你可以挑自己平时成绩最好的两门来考试，当你选择了这两门的时候，你的兴趣倾向也就体现出来了。譬如你的历史成绩特别好，你选择考历史，这就是你的兴趣倾向。

陈：当前中国大学文科教育的现状是什么样的？

杨：中国的文科教育，如果从构成来看，最大的还是师范类，财经、政法、语言类，这是文科的主体。像历史和哲学，数量就会比较少。绝大多数都是应用型的，并不是为了培养“高贵的人”，而是培养中小学教师、对外汉语教学教师等。中国的文科教育，其人文性的流失是很严重的。学生选择专业，实际上是选择一个职业。而传统性的文科教育，被认为是职业竞争性不强的，不是热门的选择。即使是北京大学的文史哲专业，现在都招不到最好的学生，“高考状元”都不会报这些系，而在50年代，北大的中文系是很多青年学生的首选。

我看一些学者写的书，在70年代的印度，更多的年轻人甘愿冒失业的危险，去学哲学、语言之类的传统文科。他们认为，经过这样的学习，才是有教养的，不把求职与谋利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直接目标，不知现在如何。在西方国家，人的兴趣是多种多样的，总有一群人是发自内心地愿意学习这类学科。教育的最高理想还是每个人能发现自我，实现自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陈：现在文科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怎样？

杨：文科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见仁见智。我们可以看到，在各行各业，有人文素养，有良好的口头表达能力和语言文字能力的人，是非常稀少的，每个单位少有的几个笔杆子都是很受重用的。很多大学生，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他没有写作能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好的文科教育提供的是最基本的生活能力、生存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四年制的文理学院，提供通识教育，或叫博雅教育，这种学校在美国的知名度也是很高的，都是百年老校。它们是本科学院，没有研究生，但它们的声望是非常之高的，其毕业生都是研究型大学的首选。我觉得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很有说服力的——广博的人文教育或

文科教育，或者说博雅教育、通才教育，对于一个人的发展意义其实是非常重大的，他的基础素质和今后的职业发展能力是非常好的。只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把文科教育降为一种粗陋的、比较容易混的、没有社会形象和没有魅力的教育。实际上人文教育应该是最有色彩的，最能调动和丰富一个人的内在能力、精神生活，提升一个人的品质和各种基础素质的。但我们的文科教育还不能担负起这种功能。

有些高校正在进行改革的尝试，如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南京大学的匡亚明学院、甘阳在中山大学搞的博雅学院，都是尝试用这种理念，培养具有完整知识、博雅素养、良好人格的人。当然他们只是小范围的试点。此外还有其他的试点，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国学院。许多大学都在开始尝试按照通才教育的模式来培养学生，开始不分学科，不分专业，两年后才开始分。

陈：大学本科教育中，文科所占的比重有多大?

杨：从大学生人数来说，文科大概占三分之一强，这个比例高中老师都知道。另一个概念，是在大学学制中文科教育所占的比重。理科专业中，文科的课程大约占 20%。但在这 20%中水分还是很大的，其中有一多半是政治理论课和英语，这两块就占了大头，还有体育、军训。这是中国与西方通识教育最大的区别。如果只看比例的话，与西方国家好像也差不多；但我们的这部分课程主体是政治理论课，是所有的学生都必须上的公共必修课。目前的课程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

大学本科四年，真正学习只有三年。到大四就基本没课了，自己找地方实习、找工作等等。

陈：中国文科教育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杨： 眼下的发展趋势，我自己觉得，应用性学科发展比较快，尤其是管理学、法学，还有新闻及大众传播。这些学科发展速度太快，大规模扩招，供求关系出现了严重失衡。以法学为例，1999年各大学的法学院系是160多所，2008年增加为634所，在校本科生达30万人，成为就业最为困难的学科。新闻传播学院也是如此。包括民办教育、独立学院等，发展最快的都是应用文科，因为设置成本低、门槛低。从这一点并不能证明中国文科发展了，水平更高了；只不过是招生规模、数量比过去要大很多。教育的“大跃进”导致了教育质量的明显下降。

陈： 未来我们文科教育发展的目标是什么？

杨： 我们在制定教育改革方案的时候，并没有把文科发展目标作为一个主题，因为研究型大学与地方性院校，管理类学科与文史哲等传统文科，情况是很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言。高等教育要提高质量，更加重视社会需求，对于大多数院校来说是对的，大学需要给学生提供有用的教育。但是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就应该超越这个目标，应该追求一种优秀的教育。

对于当前的文科教育，我很难作出一个整体的评价，因为学科差别太大，像公共管理和经济管理，应当说培养了很多有用之才。我对教育学熟悉一些，它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转型过程中，它的学科知识、新的研究范式等等都在更新重建的过程中。像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文、史、哲等学科，大致也是如此。但一个共性的问题是生源的质量不容乐观。听社会学的孙立平教授说，他的对策就是少带甚至干脆不带研究生了。

日益严重的应试教育，把中学生毁得很厉害，生源的内在品质比前几年下降了很多。钱理群教授90年代一直在中学生中普及鲁迅，在南师附中和北师大附中开鲁迅的选修课，坚持了多年，但现在放弃了。他说，前些年开课的时候，不但有学生愿意听，而且能

与他交流对话，有兴趣来探讨一些问题，现在基本没有了。学生没有兴趣来听，也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问题。这是在北京、南京最优秀学校里的高中生，中学生整体的变化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大学教育质量也与中学教育的成效密切相关。许纪霖教授说，他给新生上课说，"第一件事就是杀毒、把你们的脑袋格式化，把中学教给你的所有关于历史的东西都扔掉，重新学习。"

陈：我妈妈告诉我，好几位在大学里担任文科博导的叔叔伯伯最近都对她说："你儿子还不赶紧送出国，高中三年尤其是高三这一年，几乎就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杨：就目前情况而言，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在高中阶段就把孩子送出国或者为出国做准备，正在成为一个趋势。现在很多重点高中正在办与国外接轨的课程班，大概用一两年的时间做培训，直接参加美国的 SAT 考试，以及学习美国大学的先修课程（AP 课程），既可以作为申请大学的成绩，到大学之后也可以抵大学学分。绕过中国高考，这成为一个新的趋势。前两年香港的大学到北京招生，媒体采访我，问我怎么看。我说，中国内地的高分学生到香港任何一所大学上学，都比上清华、北大更有价值。尽管他们高校的学术水平、研究水平离清华、北大还有很大距离，但人家的本科教育完全是国际化的，使用全世界通用的教育模式、课程和教材，实行的是现代大学的制度，整体的制度环境与我们完全不一样，这不是两所学校之间的竞争，而是两种大学制度的差异。

陈：您的意思是说，内地的高等教育，从整体上落后于香港？

杨：不仅仅是高等教育，而是整个教育体系；不仅仅是落后于香港，而是落后于世界一般标准。最落后的还是中、小学教育。利用我们的高考制度从这么多的考生中筛选出来的尖子生，特别是名牌大学的学生，素质总体是很好的；但是，除了这一小批尖子生，大多数人的状况其实是很悲惨的，他们的身心健康、知识结构、做

人的能力、基本的教养等，都是非常欠缺的。即使是尖子生，他也走不远，等他到海外留学，就会发现研究能力、创造能力的欠缺。最典型的是数学，中国自 1986 年开始参加高中生国际奥林匹克学科竞赛，到最近这几年，团体冠军、个人冠军的金牌几乎全包，像乒乓球一样。但是 80 年代与中国学生同台竞赛的外国选手，有人现在都已经成为数学大家了，中国当年的这些数学天才却大多消失了。因为不少人并不是发自内心地对数学有兴趣，而是凭这个敲门砖，进入一个好大学。我也遇到过当年的奥数冠军现在在培训学校做奥数教师的例子。

陈：现在文科的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是怎样的一个关系？

杨：文科的研究生教育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涉及整个研究生教育的制度改革。

第一个是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怎样设定。我们现在的学位制度是 1981 年制定的，那时研究生的总体规模非常之小，而且当时参考了苏联的学位制度，硕士生是按照苏联的副博士的标准来设定的，学术型的培养目标，学制三年，在全世界是最长的。80 年代培养出来的文科硕士水平是相当不错的。从今天看来，用这一要求来培养硕士，已经完全不切实际了。在全世界都是把硕士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学位，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是通过硕士，攻读博士，进行学术性的研究，而大多数人在接受一些专门训练之后进入职业生涯。国外硕士生的培养目标大多数是应用型的学位，而且大多数是成人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的，比如中小学老师，用晚上或周末进修一年硕士课程。

由于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不明确，我国硕士研究生的学制经常反复，从三年改为两年或两年半，现在有些学校又恢复到三年，我们学校今年开始恢复到两年半。最近国家正在调整硕士学位，加大“专业硕士”即应用型硕士学位的比重。

第二个是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博士阶段毫无疑问应该是研究型的、学术性的，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博士学位目前是全世界学习时间最短、最容易获得的，尤其是文科，大多三年毕业。国外的文科博士要比理科博士难得多，总要五六年、七八年才能拿到。在日本读文科博士非常之难，不少人终身都拿不到的，在名片上写“博士候选人”，人家照样会觉得很了不起，很尊重你。现在一些外国学生，特别是韩国留学生，热衷来中国读博士，三年一定能拿到。本来文科的博士应该是培养大知识分子的，有批判性思维，对本学科有真正的深入研究，我们现在离这个目标实在太远了，多数人还是以文凭为主要目标，其中不少人是官员和候补官员。2007年，国务院学位办委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开展博士质量调查，百分之七八十的导师、学生都认为培养质量下降。

现在大学处在两种价值的冲突之中，一方面说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另一方面要照顾就业，不能不让他拿到文凭、拿到学位。尤其是本科生，补考，再补考，千方百计让你过关，基本没有淘汰率，本科生、博士生都没有。这与大学追求卓越的价值是非常冲突的，老师有时也无所适从。

陈：我听说国外的大学是“进门容易出门难”，“宽进窄出”，都有一个不小的淘汰率。

杨：你估计一下美国大学的淘汰率是多少？

陈：有30%？

杨：差不多，是40%。中国的大学现在不敢提“淘汰率”这个词，怕影响生源。你要求太严格的话，不好毕业，我就不报你那儿了。选课也是这样，现在的学生是很功利的，他要打听清楚，这门课去年有没有不及格的，及格率多少，老师严不严。但是很多学校已经都意识到这一问题，完全没有淘汰率就不可能有质量，用一些比较温和的方式来早期分流，比如到大二的时候，对有些同学就可

以进行一些分流，转到专科等。另外，每年学校总还是有一些淘汰率的，主要是自然减员，如病退、病休、犯罪、自杀等，大概有5%左右的淘汰率。

陈： 像我这样准备报考文科的高中生，现在应该做一些什么准备？

杨： 对于现在的高中生来说，提出更多的要求可能不太切合实际，学生能支配的时间与精力都非常有限。但是从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来说，希望能够更多地拓展知识面，除了应付考试之外，要对社会、生活、人文、历史、文化等等有广泛的兴趣、广泛的涉猎、更多的阅读，从各个方面来丰富自己。从这点上来讲，文科学习比理工科学习更艰难。在国外，无论是读本科生，还是读研究生，文科学生的学习压力更大。这点是中国人不太理解的，因为中国人觉得文科特别好混。

西方大学的文科教育，建立在大量阅读和深入讨论的基础上。一周一堆书，英文的，你必须看完、写出读书报告、参与讨论。讨论课由助教组织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就知道你有没有看教师指定的这些书；对于有关的问题，是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这些讨论课的参考书中，就包括《资本论》这样大部头的书。我们这里可能要花几年的时间读一本马克思的小册子，在他们那里《资本论》就作为每周一堆书中的一本，而且你还必须要看，还要能参与讨论，这就是他们的文科教育的要求。与我们的一本教材讲一个学期，最后闭卷考试，完全不是一个模式。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布置与我们都不一样，开架阅览，旁边有好多空间，放好多椅子，就是供小组讨论用的。他们整个的教育概念与我们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到香港去上学还是有好处的，可以更多地充实自己、丰富自己。文科教育本来就是使人更加丰富，更加广博，更加强有力，对世界、人生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有一

种批判性或创造性的思维，等等。

我现在评价一个大学生、研究生是否是好学生，很简单，就问问他，这学期你看了几本书。很少有学生一学期能看几本书的，尽管你每门课都给他提供了一个参考书的名单。对于我们来说，是要求一个学期看几本书，但在西方国家是要求一周看几本书，差了一两个数量级，但学生还是做不到。他不看，你也不能把他怎么样。最后交一篇论文，就算是过关了。这样下去，中国的文科教育是没有希望的。

陈：大学的文科教育主要学知识，还是学方法、学做人？

杨：我觉得一个好的文科教育，一个建立在自学、研究、讨论基础上的课程，就能够达到通过知识的学习，方法的训练，来陶冶一个人的人格和情操。这应该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当然，首先要有对这个学科发自内心的兴趣。真正有兴趣的话，就解决了一多半的问题。

有效的学习，就是要选择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学科，不然会很痛苦。前几年有调查，北京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学生，不喜欢自己的学科，他当时高考的时候是很盲目的，接受家长与老师的安排，以后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对学生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浪费，他不可能好好学习，就会逃课、混日子。现在很多学校逐渐创设了一些机制，在大一以后，还有机会来重新调整自己的专业，对此要具体了解，不同的学校对于转换专业的规定是不一样的。

另外，大学的学习更多的是自学，如果像高中一样，就满足于上课、背诵、考试，是不行的，会辜负了自己，辜负了四年的光阴。学习的概念非常广泛，不仅仅意味着课堂教学，也不仅仅意味着课外阅读。尤其是像在北京这样的环境当中，各种学术会议、讲座、公益活动等等非常之多，可以更加积极地参加这些课余活动，在这当中了解社会，提高自己。

陈：在您看来，一个人在高中阶段有没有可能真正确立今后一生的专业方向？

杨：一小部分人能，如著名数学家杨乐、张广厚，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已经对数学表现出很强烈的兴趣了，从而确定了一生的方向。有些孩子到了临近高中毕业的时候，也会集中精力来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从而由自己来选择确定一个高考志愿。这两种高中生都属于主动性、自觉性很强的。但大多数学生不是这样，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还是由父母起主要的作用。有的人是在上大学后，甚至是大学毕业后，才会有职业倾向。很多人的职业倾向要经过若干次的转移才会形成。总之，有两种人，一种是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职业倾向，另一种人一直要到三四十岁才会确定自己的职业倾向。这两种情况都存在。

我来问问你，如果给你一周的时间，不上课、不考试，你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陈：我的兴趣还是比较广泛的。如果像您刚才说的，给我一周的自由时间，我想自驾游、看球赛、看历史书，等等。

我妈妈最近对我说：你既然喜欢体育，积极参加各种体育活动，有丰富的体育知识，热衷于各项体育赛事，不妨考虑将来当个体育记者，现在大学文科有体育新闻这个专业。您怎么看我妈妈的这个建议？

杨：体育记者是个很值得尊重的职业，也是很有趣味的职业。因为我对你的情况还不是十分了解，所以不好对你作某种具体的建议。你首先应当问问自己，你的性格适合于这个职业吗？这个职业的挑战性与新颖性，能够非常满足你的内心渴求吗？

过去小学生写作文，多数人都会说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科学家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但为什么科学家有这么高的地位与声望？是因为他们从事的工作富于挑战性，面向的永

远是人类的新课题、新方法、新领域。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把人分成几类：一类是做纵向深入性的研究工作；一类是做横向交往性的社会活动，愿意做组织的领袖啊、管理者啊；还有一类是从事慈善与宗教性活动，以及艺术活动等等。你要从能力和兴趣两个方面，不断加深对于自己的了解。如果你具有足够的素质，也有研究各类事物和各种问题的好奇心，那么研究性的职业还应当是首选。

陈：谢谢杨伯伯。您今天讲的这么多内容，对我有很大的教益，我回去之后还要慢慢地领会和消化。

读“大文科”，培养知识分子情怀
——秦晖、金雁教授访谈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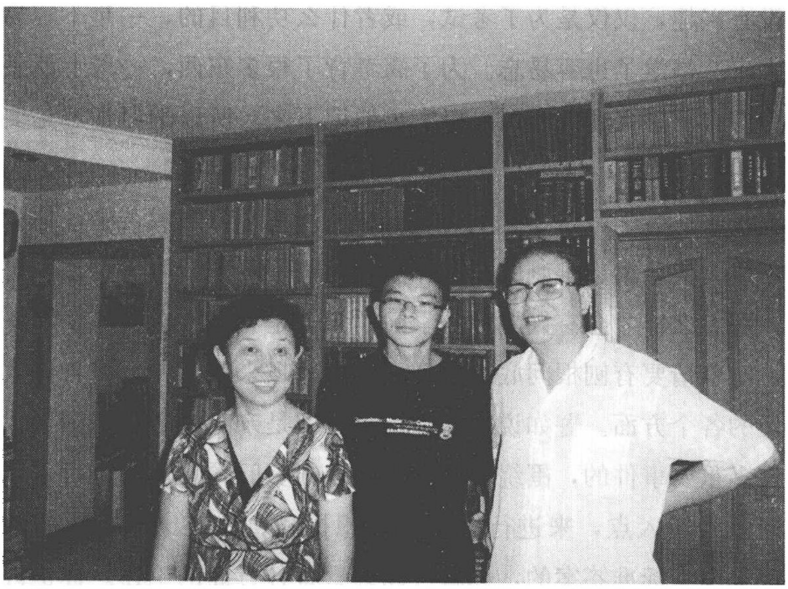
秦　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经济史、农民史、农民战争史。90年代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包括狭义农民学（对农民、农业与农村社区的研究）与广义农民学（农民国家、农业文明与传统社会及其演进、改革与现代化的研究）。他主持了一系列乡村调查，并出版多本相关论著。

金　雁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曾任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研究院苏联东欧处处长、俄罗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现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特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苏俄史、东欧史，对十月革命、俄罗斯与东欧国家的改革等问题有独到的研究与见解。

她的专业研究始终以中国问题的思考为坐标，使得她成为大陆少有的女性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被访者：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金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访谈时间： 2010 年 7 月 11 日

访谈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蓝旗营秦晖、金雁教授寓所

陈： 秦叔叔，我今天想先和您聊一聊，您对于我们高中生现阶段的学习有什么好的建议？

秦： 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当务之急是先考上一个好学校。毋庸讳言，以后的就业和发展道路，都是很讲究资历的。但是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资历，学习的第一动力是兴趣。我是有这个体会的，如果你没有兴趣，仅仅是为了考试，或者什么功利目的，一是不容易学进去，二是学了也容易忘。为了高考背了很多东西，一考上就丢了，只有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可以牢牢地记下来。所以学习肯定是要有兴趣的。

我从来认为学习是不能刻苦的，如果你把学习当成苦事，你肯定学不成。头悬梁、锥刺股，这样能看得进书吗？学习肯定是要有兴趣，那怎么样才会有兴趣呢？学问学问，是有问才有学，要有好奇心，对事情要有刨根问底的兴趣。这个兴趣来自何方？来自你人生经历的各个方面。譬如说，你爸爸妈妈都是亲身经历过中国当代史的许多重要事件的，围绕着他们就会有很多问题，你完全可以以这些问题为切入点，来进行自己的思想探索。凡是比较重要的问题，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你就可以去看看各方面的论述。你也许看不懂，没关系，你可以倒过来补课。我们当年在农村插队，安装小水电站要懂电工学，我原来都没有学过高中数理化，看不懂什么叫功率因数 cosφ（相位差的余弦），再反过来学正弦曲线、三角函数。既然看不懂就需要去补课，这样你学习就有目的性，也会比较有兴趣。想培养自己在各方面的兴趣，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关注一些争论。有确定答案的东西，就不会有争论。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就一定会有争论。

陈：我昨天在网上搜索，还看到了您和别人的争论话题。

秦：我与文科的人争论，也跟理科的人争论，譬如说就与搞水电的人争论过。我把辩论视为一种快乐。我从来不认为我曾有过刻苦学习的经历，因为我觉得读书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当然，一个人的兴趣也与其志向有关。志向远大的人，他的兴趣就可能特别广泛。我们年轻的时候，政府天天号召青年人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很多人都怀有远大的"革命理想"。今年4月份，南方周末报系与中国平安联合主办的"知行天下——2009年度十大精英盛典"在成都举行。这个评选把十大精英的范围限定于"知识青年"，把我选上了。在颁奖典礼之后的"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主题论坛上，我有个发言。我在发言中说："今天回顾这一段生活我也仍然有自豪感，自己毕竟没有虚度光阴。从社会方面讲，我在农村还是做了些事的。而从个人方面讲，大道理不用说，即便就世俗的得失论，我过去实际上就是在'文革'前读了六年小学，'文革'中三年'革命'与内战的'初中'时代实际等于失学，而我1978年从农村直接考取了'文革'后首届招收的研究生。算起来9年的'早稻田大学'与正常的6年中学加4年本科相比，时间上也没吃什么亏。更何况我的价值观、思想、知识结构、社会关怀与人生体验都与这9年的生活有关。这是课堂里不可能有的收获。从15岁到24岁——应该说这正是人生中最宝贵的黄金时代，也就是所谓的'青春'。就我个人而言，我这青春确实没什么可后悔的。而'理想'也确实是我能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当然，只能是'之一'，我见到过太多努力者的不幸结局，如果知青运动晚结束哪怕5年，我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

陈：您当年怎么会选择历史专业的？

秦：我选历史是很偶然的。我在农村插队时，对什么都感兴趣，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发言中说："我那时读书不是为了高考

（当时也没想到会恢复高考），也不是为了职业而寻求某个专门领域的发展，就是漫无目的的‘爱智求真’：从《解析几何》到鲁迅杂文，从《电工学基础》到《1871 年公社史》，从《山垄冷烂田的改良利用》到《韩非子集释》，从《华南经济地理》到《苏联的社会化农业》，从张道真的英语语法到王力的古代汉语，从县里各部门的规划册子到文化馆油印的《北路壮剧曲谱》，凡是能到手的书我都看得很解渴。有时礼拜天走老远到公社赶集，到了不是去集市，而是一头扎进公社办公室去翻看近期积存的《参考消息》和各种部门简报，直到快散集了才去买些剩余货。但是看这些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当时的说法叫做‘为革命而学习’。而‘革命’对我而言实际上就是使无意义的生活变得似乎有意义的一种说法。”

插队九年中，我寄给父母的信，他们都保留下来了。我今天看看这些信，觉得很有意思，当时确实是对什么都感兴趣。那时候读书是没有什么明确目的性的，因为当时你除了“修理地球”，确实不知道将来还会有什么其他的职业前景，更谈不上去确定一个专业范围。知青状态就是一个最不确定的状态。

我下乡那年 15 岁，但我在下乡前就认为不能稀里糊涂下乡。我从下乡之前就开始到处找书看，当时看的书对现在都没有什么用。当时是想在农村干一番事业，所以看的很多都是与农业有关的书，现在我还可以说出一大堆书名来。这些书中，也就是关于中草药的书对我到农村后有点用处。那时的农业技术书，除了少数比较深奥，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看不懂的外，80%以上都是“大跃进”的产物，有很多都是“伪科学”，后来一到农村就明白了。譬如说，我看过一本《中国土农药志》，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搞的，装帧非常精美，而且彩图很漂亮，我从中也学到了很多植物分类的知识，但是里面那些关于土农药的说法，完全没有用。如辣椒每亩 20 斤，碾碎过滤成汁喷雾后可以防治蚜虫，实际上，你一到农村就知道这简直是一个笑话，一亩 20 斤，这要花多少钱？那个时候的洋农药

要比土农药便宜得多，“大跃进”的时候尽搞这些莫名其妙的事。那时我就看了许多这样的书，还喜欢抄卡片等。

到了农村后也是这样，我在农村学了好多东西。开始我是卫生员，所谓“赤脚医生”。最初的卫生员没有任何待遇，纯粹义务的，只受过一个多月的训练，连工分补贴都没有。那时合作医疗经费也几乎没有，只够买一个红十字医药箱，很多药都是我们自己掏钱买的，或者是家里给我们寄的。那实际上就是知青讨好老乡做的一个社交工作，完全是我们在搞慈善。当时有个说法叫“一根针，一把草”。一根针还是有点用的。那时的药价实际上很便宜，这跟土农药是一样的道理，用西药比你自己去制作草药简单得多。我们那儿漫山遍野都是百部、何首乌，但你要把野生百部、何首乌变成药材，非给你整死不可，因为制作中药材讲究“九蒸九晒”，你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啊。

我们在农村搞过很多东西，搞过小水电、飞播造林、地面测绘……我还当过大队林场场长，搞过杉木育苗，等等。当时看书也是乱看，我当时最大的兴趣还是理科。后来高考，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理科对体检要求比较高，因为我的眼睛有问题，理科肯定是无法通过。我在农村九年也曾有多次招工机会，因为视力的缘故都不行，所以后来我就放弃了理科。如果不是这样，我现在很可能是在搞理科了。

对文科感兴趣，当然与家庭也有关系。我父母上大学是学历史的，家中历史的书也比较多。在农村对有些事情耳闻目睹，无论是对现实还是对历史都有些联想，我插队的地方就是西林事件的发生地。“西林教案”，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上还有吗?

陈：没有。

秦：现在的教科书上有第二次鸦片战争吗?

陈：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秦：“西林教案”，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个起因。我们插队的地方，就是原来的西林县，是一个壮族地区，很早就有天主教传教士来到这里，还有土匪啊，这些问题我也是感兴趣的，与人一聊天就提起这些。

“文革”前，中国的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等问题争论得很厉害。这些书，我们家都有，考研究生，我就报考了熟悉的老师。我家中有赵俪生的书，我原来也看过，就想考他的研究生，就给他写过一封信，就是讲了一些读后感。当然赵先生也很热心，做了很多的工作，要不是赵先生，冲着我的体检结果，兰州大学是不想要我的。关于这方面，我在回忆赵先生的文章中写过。

我当初给两位先生写过信，一位是赵先生，另一位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李巨廉先生。我记得我给李先生写信的内容，倒是与现在有点关系，就是美元的问题。因为 1971 年发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事情，现在有些人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是美国的一个阴谋，美国想赖掉与黄金挂钩，其实谁都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使美国很不高兴，反美国的国家很高兴。当时中国的舆论狂欢啊，说是“金元帝国的崩溃”，紧接着就是石油危机，那时西方也搞得焦头烂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不能兑换黄金了，不是美国不想兑，是它没有这个能力了，撑不住了，当时我们就很欢欣鼓舞，我在信中也提到这个事，说“金元帝国崩溃”有如何如何的意义。当时我们就是这样一种思想，从来不会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是美国的阴谋，那时只说这是世界人民的胜利，美帝国主义的失败。所以我觉得今天某些人的“阴谋论”是很可笑的。我为什么会对美元问题感兴趣，因为当时的青年人都有一种理想主义，对“世界革命”都有兴趣。

我觉得任何信仰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一种超越性。所谓超越性就是和眼前的一些利益无关的，不是为了科举，考上一个官啊之类的。这种超越性要律己，要迫使你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这个

约束是对你自己的，如果是对别人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这个信仰只是约束你自己的，会使你变得更自律勤奋，这是任何一种信仰的正面作用。所以信仰也谈不上正确与错误的区别，所以我们才可以提倡信仰自由。如果信仰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就应该承认有些信仰是邪恶的，有些信仰是正确的，那就不能提倡信仰自由了。但是由信仰造成的后果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主要不是表现在信仰本身，而是表现在以信仰的名义建立的制度上。同一制度下不同信仰者的行为其实可能差不多，例如西方的基督徒和今天日本的神道教徒。但同一信仰者在不同制度下行为差别就极大，例如今天的日本人和法西斯时代的日本人。同样信社会主义，瑞典的社会党人和苏联的斯大林也判若霄壤。因为信仰本来是律己的，变成制度就涉及律人了。而一旦要去律人，就有了极大的善恶之别。你用这个信仰去约束自己可以，但你不能去约束别人，信仰产生的问题是后一做法造成的。

我既然给两位导师写了信，就说明我对两个专业方向都有兴趣。也就是说，我不是一开始就要吃农民研究这碗饭的。当然，最终走这条路，与我在农村待了这么多年也是有关系的，我对农民问题一直有浓厚的兴趣，而且有关的书家里正好都有，我很早就看过了。

陈：在我选择专业问题上，您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建议，您是否认为学历史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秦：你自己对什么比较感兴趣？

陈：我的爱好比较广泛，我喜欢历史、地理、体育，对时政也挺感兴趣的，看过的书也比较杂。

秦：你们这一代与我们这一代最大的不同是：你们是考虑选什么专业，我们当时是只要有一个专业就行。我们当时对什么专业都感兴趣，觉得对自己都很有吸引力。我觉得任何一个搞专业的人，

而且是真的搞出兴趣和名堂的人，都会觉得这个专业非常有吸引力。我觉得真是要讲选专业，第一，要考虑兴趣，第二，可能还是要考虑将来的发展前景，取决于你各方面的权衡。所谓的兴趣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纯粹的喜爱，没有其他的考虑的，就像一个人喜欢打扑克，他是没有理由的，就是喜欢，控制不住；还有一种是从志向而来的，对于国家、社会要解决的问题是有用的，作为一个有志向的人，你就不能不去关心。

搞历史当然很有意思了。如果要讲大道理，就是马克思的那句话，原话我记不清楚了，大意是说：如果人类只有一门科学，那就是历史科学，无非就是人类史和自然史而已。也的确是这样，你无论研究什么，你的研究对象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所谓历史无非就是研究过程的。我们中国讲的历史与国外讲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一讲历史就是很遥远的事，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历史比较悠久，你看看其他国家的历史，美国、俄国……他们的历史学主要是研究近现代史的，都是厚今薄古的，而且研究历史与研究现实是紧挨着的。在美国研究历史的人，有几个人去研究印第安人啊？研究的历史也就是两百多年的建国史。美国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研究的是二战以后的历史，那与研究现实有什么区别呢？所谓研究历史，定义就是研究已经发生过的一切，包括你研究你爸爸，就是研究历史。研究历史的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你发现了现实中的某种问题，要去追根寻源，那你就要去请教历史了。不论是民主问题、法治问题，还是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如果你对历史的来龙去脉比较了解，你就会觉得那些不懂历史、只谈现实的人是很肤浅的。你马上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自信，认为你可以驳倒他们，比他们都能解释得更清晰。比如现在“三农”问题的争论，很多人都讲，土地如果实行私有化，就要发生土地兼并问题，爆发农民战争，天下大乱。赞成土地私有化的人则说，土地兼并不是坏事，没什么可怕的，它可以促进规模经营，可以什么什么的。土地私有制，真能带

来土地兼并吗？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你仅仅从逻辑上分析，肯定是不行的，你首先必须了解历史，不光是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而且要了解世界上的土地制度的历史。有的人动不动就是拉美啊，印度啊，其实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不了解历史的人在那里谈论现实和未来，非常可笑。

金：秦晖讲了这么多，我补充一点，供你参考。如果你选择将来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你首先要对自己有一个定位。唐太宗说了："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就是用科举考试把读书人都引向做官这条路。西方因为有宗教，而且宗教和政府权力是剥离的，所以国外有许多知识分子，宁愿一辈子都是政府的反对派，永远都怀抱传教士情结。

这就决定了你在大学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是一个最大的前提。如果你的志向是将来要走向政坛，那么你需要的是一种经世之学；如果你的志向是探索真相与真理，就是要从精神上有所追求，那么你有可能一辈子都是一个悲剧人物。不同追求、不同志向的人，对于人生道路的设计是不一样的。欧洲有很多人一开始就设定，我要做圣徒，我对于世俗的成功毫不在意。像150多年前到秦晖插队的西林县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就是这样的一种人。这种人事先就对于自己可能遭遇的苦难包括被杀戮的命运有所准备，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情结。越是具有悲剧意味，就越能体现他的深刻性。其实他就是把自己的一生赌在了他的使命感上。

如果你作出了上面所说的选择，我认为在大文科里选什么具体专业并不重要。人大张鸣教授的女儿是个很成功的女孩，我与她聊过。她说："我在大学选的所有课都是我不喜欢的，听的所有课都是我不选的。"为什么要这样岔开呢？她把不喜欢的课选了，很容易就把学分拿到手，然后她就去听她自己喜欢的课。她听的课没有一门是她选的课，她坐在第一排，不停地向老师提问，这样的话，虽然她拿到的是单学士学位，但实际具有双学士的学识。她说，她



判断能够拿到学分的课，听一两节课就把它给 pass 掉，然后花很大的精力去旁听，中文也听，哲学也听，宗教也听。我觉得这就是具有了大文科的背景。

大文科的背景根本没有专业的界限。现在学科分类这么细，你只要进入一个学科，对于另一个学科就是一个白丁。必须跳出这种状态，才有可能培养出大师级的人物。学界有一些人批评秦晖，说秦晖现在哪是在做史学，他尽作一些跨界的研究，应该把他踢出史学界。但是也有更多的人支持秦晖。在我看来，中国不缺饾饤之学的人，这样的人遍地都是，谁要在一个专业里泡上一辈子，他都能成为专家；中国缺的就是能够触类旁通，能够跳出框框的人。从张鸣女儿的选择来看，我就觉得小姑娘很有眼光。你不可能先学四年哲学，再学四年历史，再学四年宗教，再学四年地理，再学四年社会学。

刚才秦晖说，学历史出身，眼光就和别人不一样。这里所说的历史眼光，是一种大历史的视野，有了深厚的积累，一站出来就是大历史。一辈子只搞明史或者清史的，他不可能有这种看法。正是因为秦晖在自学的过程中，没有专业的界限，没有为用而学的束缚，他才能具有大历史观。中国五千年，世界七大洲，不能说都很精通，但他有一个大致的把握。任何一个问题拿过来，他都能跳出问题的本身，看到这种问题在历史上多次出现过，每次出现时各国又是怎样对待的，在中国历史上又有什么相似度。这样的学问不光要有历史知识，也要有政治眼光，还要有个人经历积累起来的一种直觉。

所以我觉得，对于你来说，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具体选哪一个专业。不管你考上什么专业，只要你有刚才说的知识分子情怀的话，你都可以向你爸爸妈妈的这些同事和朋友请教，指导你看各种各样的书。自己看书比听好的老师讲课更重要。我们都有这种感觉，有个问题不清楚，找一本书看，还有一个问题不清楚，再找一

本书看，最后桌上的书摞这么高，你走了一大圈，已经脱离原来的情节了，然后再拽回来。由此可见，你想认认真真思考一个问题，写一篇言前人所未言的文章，太费劲了，太不容易了，在别人看来也可能太不值了。但是每一门学科的进步，都是建立在这种自己发现问题，自己看书寻觅思想资源，自己理清逻辑关系的艰辛努力的基础上。古人讲"为己之学"，这东西你不能用世俗的价值来衡量，只有你自己才能明白在思想丛林中探索的价值与乐趣。

我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书，政法是文科中比较偏重经世之学的，有的学生会问我，你能教给我什么有用的知识？我说："我教的学科没有任何实用的东西，你不能拿它去换取什么，我只是教你们一种方法，教你们应当有一种什么样的追求，如此而已。你要是觉得不实用，你可以不学。"我向来就跟学生们说，一个人、两个人，我都会认真教，只要这一两个人认真学。我在政法大学才上了几年课，一开始听课就比较认真的人，现在都是硕士、博士了。方法非常重要。我们经常与新华社的人一块儿开会，他们的资料比我们丰富得多，但他们只是就事论事，而我们一两句话就点到了要害。真懂历史的人，能够融会贯通，能够举一反三，能够顺藤摸瓜，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秦：还有一个关键点，你的兴趣是在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这两者也有很大的区别。人文学科是带有价值关怀的，要解决有价值色彩的一些问题。譬如历史，以前都讲是描述事实的，而现在很多人都在讲，学历史是为了古为今用，是要通过历史得到一些教益，得到一些未来的启示。如果按照原意，社会科学比较强调的是科学。所谓科学强调的是什么？它会要求你价值中立，你最好把你自己的倾向性抛开。社会科学也需要使用一些理性的方法和工具——数学手段啊、图表啊，诸如此类的。它标榜自己的手段和结论都是中立的，没有偏向性的，不讲"应该"怎样，而只讲"是"怎样。这是两种很不相同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两种方法相互渗透得也

很厉害。

我们现在讲社会学科，讲得最多的就是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两门学科也是西方发展得最科学化和技术化的，大量使用各种各样的公式、模型。但即使是在西方，社会学也是带有很强的价值关怀，没有谁能做到真正的价值中立；而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我觉得中国的社会学甚至比人文学科更人文，我们的一些搞社会学的朋友，如孙立平，他的人文关怀比我们一般搞史学的人的人文关怀还要多。反过来讲也是一样。一般讲人文学科，讲得最多的是文、史、哲，我对历史学的情况比较了解。真要讲历史的教益和未来的启示，基础还是你对历史真实情况的认识。你不能不讲事实，不讲逻辑，在可能的情况下，你也不能不讲计量分析。这两者也是互相搭配的。

从高考的角度来讲，社会科学对于理科知识，特别是数学知识要求当然比较高。如果你的数学比较好，这是你选择经济学专业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如果你的数学基础不好，即使你对经济问题有浓厚的兴趣，我劝你也还是不要选择经济学专业，尤其是重点大学的经济学专业，他们是很重视数学成绩的。社会学也是一样，对于数学也有比较高的要求。中国的社会学现在这一点好像还不是太突出，但是西方的社会学就非常讲究数字的统计分析，比如回归啊什么的。西方的社会学好多都采用民意调查的方法，这里面又涉及抽样、统计。

搞文科与搞理科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你一定要关心社会。一个对社会完全不关注的人，你的研究必然会有一些局限性，成不了好的人文学者或社会科学家。当然，如果你搞古文字学，可能不太需要对于社会的关怀。

金：我有两点建议：一个是要熟练掌握电脑，一个是外语千万不要放弃。我们这一代学人与新生代学人的一个最大差距就是，我们的外语不好，被十年“文革”耽误了。现在秦晖看外文书没问

题，但开不了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缺陷，本来是应当直接交流的，现在中间有一个翻译，交流就有障碍了。

另外，你在大学里面一定要参加社团。别的目的都是次要的，主要是锻炼两个能力：一是组织能力，一是口才。组织能力必须在实践中学习，书本上是学不会的。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表达能力，有不少人有深厚的知识功底，但他们表达不出来。对于我们这一代，包括我们的上一代，口才还不是特别重要，因为大家都认文章。但到了你们这一代，生活方式不一样了，什么东西都要上电视，像马英九竞选辩论、曾荫权竞选辩论，人们都要看电视直播。人的口才的好坏，表达能力的好坏，都是一目了然的。我们这一代很多人只是通过文章识人，而现在人们既要看你的文章，也要直接了解你这个人。哪怕是做议员呢，给你 3 分钟时间，你要 5 分钟才能把话说明白，那就不行。

陈：金阿姨，请谈谈您当初是怎样选专业的？

金：我自己的选择很简单。我父亲是搞中共党史的，这些书家里都有，我当时又是学俄语的。我自己本来不太愿意学史学，想学文学。可是 1978 年跟苏联有关的只有史学专业招生。我父亲说了一句话，文史不分家，学史学也不会耽误你什么。就像刚才我说的，你喜欢哪个，不一定就要选哪个。我当时好大不情愿。我与秦晖最大的不同就是，我的形象思维能力强，苏俄的小说如数家珍。

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因为是"黑五类"子女不能上高中，我就有高玉宝"我要读书"的感觉。抄家的时候，我们家大部分书都抄走了，只剩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之类"政治正确"的书。我父亲说，你要把这两套书学下来，就几个大学都有了。我就先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时，我觉得背景知识差得比较多，挺难的，我又转而读《列宁全集》。看《列宁全集》也需要有背景知识，当时我们家正好有一套安菲莫

夫的《苏联近现代史》，共四册，是苏联八、九年级学生（相当于我们的初二、初三）的教科书。我一边读这套苏联历史，一边读《列宁全集》。我可以这么说，考研的所有试题，都没超过安菲莫夫这套书的内容。我们的大师兄是 1958 届大学毕业生，还有 1963 届大学毕业生，我与秦晖一样，是 1969 届初中毕业生，小学毕业后，初中的课程几乎没怎么学，基础知识也就刚刚是小学程度，剩下的都是自己瞎学的，我与这些师兄相比，差距是非常大的。你想，我在甘肃那些偏僻地方待了 15 年，复试的时候又面临这些竞争对手，可以说非常紧张。但我抽到复试题的时候，一看，没有超出安菲莫夫这四本书的范围，就放松了。我觉得冥冥中是上帝在帮我，我自学的第一套书，在考研究生的时候竟然全用上了。

从文到史，对于我来说确实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过程。我们一进去，就要做论文。史学的这种论文，是要看大量资料的，我觉得好费劲啊。后来慢慢适应了，可以说秦晖对我的影响很大，他说："实际上我是你的导师。"当我走上研究史学的道路后，觉得自己以前学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都有用。我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我们那个年代，只要是有学可上就很不错了，基本上没有挑选余地。实际上我觉得学什么专业都不重要，选了史学，我也就是把它作为一种入门的基础。如果你让我选哲学，我也会喜欢的；你让我选宗教，我也会喜欢的。我也是机缘巧合，到了苏联史学这个专业，一边做这个，一边再去读思想史、宗教、文化等。同样是做俄国史的人，有的人就盯住俄国史很短的一段；我不仅做俄国史，还做东欧史，不仅做近代史，还做现当代史。再加上受秦晖庞杂之学的影响，基本上没有不涉猎的学科。

陈：*在高考的时候，历来有这种说法，"是选学校还是选专业"？*

金：面对高考，我认为还是以考上好学校为主，专业不是关键，以后的学习则要盯老师。好的学校不但师资比较好，而且，在好的学校里，你还可以跨专业见识各方面的知识，同时还有一帮高智商的同学。现在一些大学的 EMBA，学什么已经是很次要的了，主要是为了编织一个关系网，画一个座山雕的联络图，这是很功利的目的。在大学四年，同学之间没有太多的功利性，这个友谊是会维持一辈子的，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之一。如果你能进入一个好的学校，更有机会结交到一辈子的好朋友，我觉得这是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陈：请两位老师介绍一下，文科毕业生与理科毕业生的出路有什么不同？

金：现在实际上都是自己找工作，而找到的工作与大学所学的专业实际上差别很大。我弟弟的孩子是学理科的，而且学的是很专的专业——材料物理，他告诉我，他们同学中有一半没有在做专业；女生没有一个在从事专业工作，全都选择了人力资源等一些其他的工作；他们认为找到工作是第一位的。

秦：清华的学生现在也热衷于当官，理工科学生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也很多。这说明理工科的就业出路也不是很好；即使出路还可以，那些学生也认为还不如当官的好处更大。

有的宣传说，什么什么专业分配前景很好，其实过了几年都很难说。以前很热门的专业，包括经济、法律专业，现在找工作都非常困难。

金：你如果希望在高校从事教师职业，那就一定要读到博士，而且还要出去读，土博士已经不吃香了。我们现在招人，一定要查三代，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哪儿上的。走这条路，读出来快 30 岁了，你愿意不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付出自己的整个青春年华？我不建议所有的人都去走这条路，读书读到 30 岁还没有与社会的

深入接触，也有可能把人读傻了。如果你是一个有远见而不是随波逐流的人，是准备本科毕业后工作，还是硕士毕业后工作，还是博士毕业后工作，你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就应当提前考虑好了。

如果你想要进高校，你就要把这条路设计好，这条路是很漫长的。不打算进高校，那就需要有另外的一些考虑了。譬如说做媒体，“笔杆子”——写作能力就是最重要的，学历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秦：而且性格也很重要，做媒体就要活泼，就要有交往能力。如果在书斋中，对这些要求就不是很高。

金：每个人的路径依赖也是很强的，哪个方面长就会越来越长，哪个方面短就会越来越短。

陈：文科毕业生的出路，主要是哪几种职业？

秦：不论多少种职业，归根结底都是两条路，这在理工科也是一样的，或者你到市场去打拼，或者是到政府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去做事。简单点说，就是吃“皇粮”与否的问题。

金：现在读文科的人，毕业以后吃“皇粮”的还比较多，像当公务员、在大学教书、社科院搞研究、做官方媒体等等。

到你工作的时候，可能到处都是各种类型的工作室，电视台、报纸、出版社的实际工作都会包给这些工作室来干。

面临各种就业机会，首先是找一个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实在不行，就找一个稍微轻松点的工作，然后腾出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就是一个“饭碗”，你不能毕业后还叫父母养着吧？这是安身立命最主要的一步。这步有了，如果能与爱好结合起来，那就求之不得了。又能挣钱，又能有名，又能与你的爱好结合，这样的事太少了。倘能结合起来，你的成功感就会更强。

陈：在高三阶段，除了要应付考试外，还需要为以后上大学做

哪些准备？

金：我觉得任何准备你都不需要做，高三要全力以赴拼一个好大学。拼到手后，高中的很多东西就可以扔了，应试教育的东西，大部分是无用的，就是敲门砖。我觉得你高三的时候，什么都别想，集中精力砸一个中国最高的门，砸开了，剩下的咱们再说。

秦：中学时代教的许多文史知识进了大学后都要扔掉。但你必须先过高考这一关。这是现行教育体制所决定的。

陈：我个人的情况，性格比较偏内向，不太善于言辞，但爱好比较广泛，什么都愿意涉猎，我这种性格对于选专业有什么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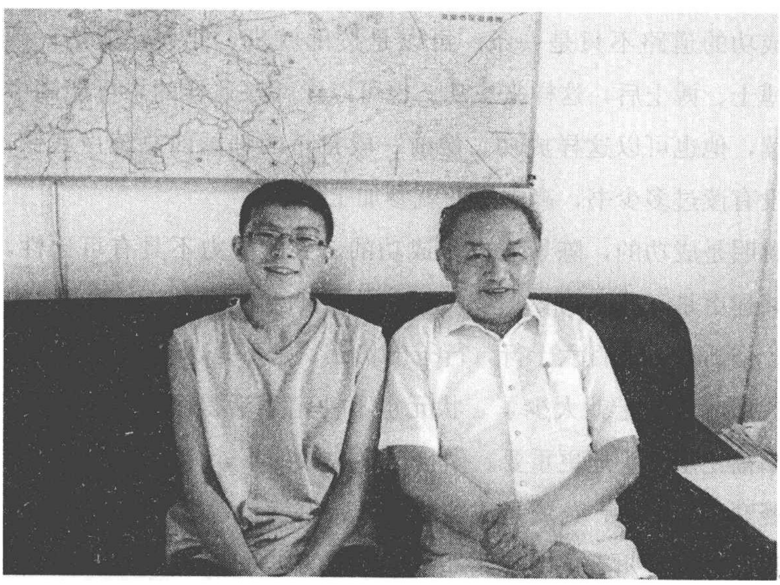
金：我觉得，你与秦晖有点像，没有他不爱好的，除了体育。性格内向是可以锻炼的，以前秦晖比你还内向，现在话头打不断，让他讲一个半小时，他能讲三小时。现在这个社会与过去不一样了，你做不了陈寅恪了。陈寅恪的做学问方式，今天也没有太大的市场了。你不仅要有学问，还要善于表达和交流。这个是可以锻炼的，也必须锻炼出来。

陈：谢谢两位老师。听了您二位的一席话，我感到收获很大，对于明年怎么报专业，心里也更有底了。

专业兴趣与专业素质的测定
——谢小庆教授访谈录

谢小庆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所长。主持开发了用于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的《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用于企业人事管理的《企业管理能力倾向测验》和《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MHK)》等。



被访者： 谢小庆，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访谈时间： 2009 年 8 月 11 日

访谈地点： 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办公室

成功与幸福

陈： 我们在学校接受的教育，是要我们天天向上，追求成功。选择正确的职业，对于今后的成功是不是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谢： 首先我们要问：什么是成功？大家对于成功的概念理解也是不一样的。著名演员章子怡最近说：她嫂子就是一个很成功的女人。她只是一个家庭妇女，支持丈夫，教育子女。……是不是章子怡就一定比她嫂子成功？我觉得章子怡这话讲得很出彩。

成功的道路不只是一条。可以是按部就班，北大、清华，硕士、博士、博士后，这样来成功。也可以像韩寒这样的，可能高中都没读，他也可以这样成功。像前一段自杀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他也没有读过多少书，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

姚明是成功的，陈景润也是成功的。人的能力不具有可比性，人的兴趣更是五花八门。每个人应当根据自己的能力、兴趣来追求成功。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是不是非要中状元才算成功？那成功人士就太少了。状元也不一定生活得很幸福。我看，生活幸福比出人头地更重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做适合自己做的事，既顺心又顺手，这就是成功的选择，也就是幸福的源泉。最近我在网上看到常州重点中学北郊中学高一的优秀学生杨昕涵跳楼自杀的消息。他才 17 岁。他的博客现在还在网上。他说，“我只想开一间不怎么挣钱的咖啡屋”，但他的爸爸妈妈总是让他拼命读书，考清华、北大，最后他解脱了。他无数次想过用跳楼来摆脱上清华、北大这样一种模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就必然会有这样的悲剧。

另外，在当今这个复杂的世界，人的兴趣是会变的。我所在的这个专业领域中有一个人，一位美国的年轻学者，他做得非常棒，

自己开发了一套非常领先的程序，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程序。他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可以说是这个领域中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但他读完博士后就放弃了，他很年轻就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因为他关心环保事业，改做环保志愿者去了。这种人在西方现在是非常普遍的，一点都不稀奇。

陈：一个人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确定自己的职业方向？

谢：这要因人而异。有的人很小的时候就明确了自己的职业方向，蔡志忠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画画，在没上小学的时候就明确自己要画画；但有的人甚至四五十岁都不明确自己的方向，这也是常有的事情。蔡志忠已经是非常知名的画家了，但现在他转向物理学研究了。他说：将来能留下的不是我的画，而是我的物理学成果。

在国外，通常是上大学之后再定专业方向，很多人在本科毕业后再重新选专业方向。咱们国内，复旦和上海交大已经开始实行，刚上大学不分科，进行一般的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到二年级再分科，再选专业。实际上要想了解自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所以，既不是“一考定终身”，也不是“一选定终身”。高考时可以选择，考研、读博时可以再选择，就业以后还可以选择。但是，不论你在何时何地进行选择，首先都要了解自己和了解社会，才能找到二者之间最合适的搭配，找到你自己的成功之路。

了解你自己，就是要知道你自己的职业能力、职业兴趣和性格特征。

能力与职业能力

陈：请您解释一下“能力”这个概念。一个人高考成绩的高低与其能力的大小，是否是一回事？

谢：能力是顺利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需的，并且直接影响活动效率的个性心理特征。能力不同于知识、技能。有的人知识掌握得不少，但未形成能力，即所谓的“书呆子”、“字纸篓”。有的熟练工人对于某一种技术动作非常灵巧，但是换一种工作，掌握起来就非常吃力。

能力是人的相对稳定的、需要较长时间才会发生变化的心理特点，而知识技能水平则是比较容易改变的。既可以通过强化训练和突击背诵而获得，也可能因为遗忘而丧失。能力水平是一种慢变量，知识水平则是一种快变量。能力是一种潜力、一种可能性，而不一定是一种已经表现出来的水平和一种现实，知识则是指一个人现有的认知水平。现在的高考成绩只能表明一个人的知识掌握程度，还不能表明一个人的能力水平。当然，在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陈：“职业能力”这个概念，是否意味着不同的职业需要不同的能力？

谢：陈景润和聂卫平，谁更聪明？名教授与名厨师，谁的能力更强？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人的能力有高低”，我们只能说“人在某一方面的能力有高低”。

在20世纪初，英国著名心理学家斯皮尔曼曾主张存在着一种“一般能力”，即智力。他认为，每一种活动的顺利完成都受到这种“一般能力”的影响。不久，另一位英国著名心理学家汤姆逊提出异议，他认为有多种相互独立的能力因素。到1927年，斯皮尔曼也承认了多因素的作用。随后，“七因素说”、“九因素说”、“一百二十因素说”、“一百五十因素说”等纷纷涌现。

以后更精致的研究发现，在儿童时期，“一般能力”的影响较大，各种能力因素的相关性较高。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相关性就逐渐降低，不同的人显示出不同的能力倾向。

也就是说，早期，人们关心反映人的“一般能力”的智商(IQ)；今天，人们更关心反映人的各种能力之所长和所短的“剖析图”，而不仅是一般的智商分数。具有相同智商的人可能表现出非常不同的能力特点（如物理学家与文学家），可能具有非常不同的剖析图。心理学家研究发现，每一种职业，都有与其相应的多因素能力“剖析图”。

职业核心能力

陈：您刚才说有150种能力因素，那么每种职业的能力“剖析图”岂不是太复杂了吗？除了专家，一般人还有没有可能了解呢？

谢：影响一个人职业成功的因素很多。例如，口头表达、阅读理解、书面表达、公文写作、反应速度、逻辑推理能力、判断能力、信息加工能力、数字运算、资料检索能力、知识面、问题解决能力、归纳总结、革新创新、说服他人、计划制订、应变能力、危机处理能力、决策能力、立体思维能力、管理技能、计算机操作、办公自动化软件使用、外语、与人合作、团结同志、调查研究能力、组织能力、宣传能力、谈判能力、自我提高和完善、安全生产意识、全球化视野、环境保护意识、成本意识、守法意识、时间观念……在各种各样、各个方面的能力因素中，是否有一些基本的能力因素呢？心理学界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借鉴国外经验，进行有关职业核心能力的研究。经过研究，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决定人的工作绩效和事业发展的能力结构有着鲜明的层次性特征。呈现在外表的，可以让人们直观感受和直接学习掌握的，是职业特定技能；在更深层次上，是通行于一定领域的行业通用技能；在最深的层次上，则是决定人的终生成就和终生发展的核心技

能。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 2003 年确认了 1838 种职业特定技能，约 300 种行业通用技能，以及最深层次上的 8 种职业核心技能。

这 8 种核心能力是：交流表达、数字运算、革新创新、自我提高、与人合作、解决问题、信息处理、外语应用。这 8 种能力，是劳动者面对产业变革和职业变革，应对市场竞争和社会挑战，实现个人职业生涯的成功所必备的最基本的能力。

上述研究结果，基本上是模仿英国的一个研究。英国得诺贝尔奖的人非常多，可是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的经济发展与日本没法比，于是英国学者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关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英国教育有问题，而改革教育的关键是要培养国民 6 种核心能力——交流表达、数字运算、自我提高、与人合作、解决问题和信息处理能力。劳动部在这 6 种核心能力上加了两种——革新创新和外语能力。现在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英国人没有外语能力也无所谓。革新创新的问题则非常复杂，朱永新在一次会议上问我："对于创新能力测量你有什么看法?"我说："我个人认为创新能力测量是 22 世纪的课题。"

陈：在 8 种职业核心能力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能力呢?

谢：在劳动部提出的 8 种核心技能中，交流表达能力居于首位。他们是在对数以千计的职业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到这样的结论。

语言是思维的形式，是交际的工具。语言能力是一个人胜任职业工作的核心能力。语言能力是各行各业选人用人时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许多单位在选人用人时越来越看重人的语言交际能力，许多单位在招聘员工时希望选用一些"文字能力"强的人。

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数学家苏步青先生从自己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也得到了与劳动部的研究同样的结论。苏先生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说："如果允许复旦单独招生，我的意思是第一堂先考语文，

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课目就不用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

无独有偶，毕生从事英语翻译工作、曾担任中国外文局局长的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会长林戊荪先生近年来却在不同场合多次呼吁“学好中文”，并建议全国翻译资格（水平）证书考试要加考中文。林先生认为，将外语翻译成汉语，要求翻译者必须具备很好的中文表达能力；而将汉语翻译成外语，翻译者就必须具备很强的中文理解能力。

在美国影响最大的考试是相当于我国高考的“学术评价考试(SAT)”。几十年中，SAT包括“言语”和“数量”两个部分。从2006年起，负责编制SAT的美国教育测验服务中心在原有两个部分之外增加“写作”部分，原来的“言语”部分更名为“理解性阅读”。美国另一个影响较大的考试是相当于我国研究生考试的“研究生水平考试（GRE)”，也是由美国教育测验服务中心负责编制的。2002年以前，GRE曾包括言语、数量和分析三个部分。从2002年起，取消了GRE中的“分析”部分，增加了包括两篇作文的“写作”部分。

2000年以前，由人事部、中组部组织的中央机关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的公共科目笔试包括“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公共基础知识”两部分。2000年开始，增加了以写作方式进行的“申论”考试。2002年，取消了“公共基础知识”考试。今天的公共科目笔试包括“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两部分。言语理解和表达能力也是“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最重要的考查内容。

以往，在对医务人员的资格要求中，语言能力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在近年多家国际医学教育机构所颁布的对医生的最低能力要求中，都将“交流沟通能力”放到了重要的位置。在国际医学教育组织、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认证委员会、美国医学院协会、加拿大医学会、英国医学委员会等机构近年颁布的医生最低要求中，都将

“交流表达能力”放到了重要位置。以前的医学叫生物学模式，现在叫社会心理生物学模式，这种模式的转变，是最近刚刚提出来的，对于医生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母语能力是最重要的职业核心能力，现在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共识。

陈：高考语文考试能否检验一个人的语言能力？

谢：高考语文考试旨在测量考生的语文知识水平。能力的形成固然离不开知识的积累，一个人的汉语能力肯定反映他的知识积累。但是，语文知识并不完全等同于语言能力，知识的积累也不是必然形成能力。在实际生活中不难发现，一些持有大学中文系文凭的人，实际的汉语运用能力并不理想，口头和书面的表达能力都难以满足职业工作的需要。如果考查他们的语法知识和文学知识，可能成绩很不错。对于知识与能力的区别，中国的古人早就做出了非常清楚的回答：“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鱼，就是知识；渔，就是能力。

从关于语文知识和语言能力的测试题目中，也可以折射出语文知识和语言能力的不同。通常，测试语文知识的考试可能包含对字词知识、语法知识、作家知识、作品知识等的考查。测试语言能力的考试则主要考查那些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在语文知识考试中，一般需要考生记忆一些知识内容，对考生的记忆力有较高的要求。在语言能力考试中，对记忆力的要求较低，考查的重点侧重于理解能力、判断能力、推理能力、表达能力等。

职业能力的测量

陈：那么，心理学家怎样来测量职业能力呢？

谢：国外有很多这方面的测量方法。例如美国“教育与工业测

验服务中心”编制的《职业能力安置量表》，美国心理公司编制的《特殊能力倾向测验》，美国劳工部就业保险局编制的《一般能力倾向成套测验》，等等。

对于职业能力的测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一般能力倾向测验”，是个人希望对于自己的能力倾向有所了解，以便于自己选择职业和专业，到专业心理测量机构进行的测验。一类是“专业职业能力测验”，是雇人单位或某个行业为了选用具有特定职业能力的工作人员，而委托专业心理测量机构进行的测验。

为了给职业选择提供合理的参考依据，不仅需要通过职业能力倾向测验了解择业者的能力特点，而且需要在人的不同能力特点与各种不同职业成就之间建立联系。为此，心理学家进行了实验研究和调查研究。

在实验研究方面进行了两方面的研究。一是将测验施测于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比较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之间的能力差异；二是将测验施测于同一职业中不同成就水平的人（以收入水平、职称、职位等作为不同水平的标准），比较那些较成功的人与那些较不成功的人之间的差异。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就在职业能力倾向测验成绩与各种不同职业的成就水平之间建立了联系。不同的职业对各种不同能力倾向的要求是不同的。例如，从事科学理论研究需要有较强的推理能力，从事科学实验研究需要有较强的计算能力，从事工程设计工作需要有较强的空间关系想象能力，从事文秘工作需要有较高的知觉速度和手指灵活性，等等。

在调查研究方面，主要是对各种职业活动进行工作分析。这种工作分析调查是以问卷方式向那些从事某一种职业时间年限较长的人进行的。请他们对这种职业所需要的能力要素进行评定，利用他们在多年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来确定各种职业对人的能力要素的需求。

在这些实验研究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可以对各个分测验的

成绩以不同权重进行组合，得到对应于不同职业的加权方程式。根据这些加权方程式，我们可以从一个人在各个分测验中的成绩推算出他在各种职业上的成功概率，作为职业选择的一个参考。

我们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创办北京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中心开发了《BEC职业能力测验》的系列量表和软件，就属于“一般能力倾向测验”。譬如说，《BEC职业能力测验（II型）》是参考美国心理公司的《特殊能力倾向测验》编制的，分为言语推理、运算能力、抽象推理、文书速度与准确性、机械推理、空间关系、词汇测验、言语运用8个分测验。其中60％的测试题来自《特殊能力倾向测验》，40％的测试题是我们根据中国国情编制的。

当时，我们已经通过实验研究和调查研究，建立了60种职业的60个加权方程式。受测者的原始得分根据常模转换成标准分数，这样就得到了8个一组的测试数据。将这组数据代入60个方程式分别计算，向受测者报告得分最高（能力潜力最高）的6种职业，3个是“最具有潜力”的，3个是“比较有潜力的”。

1988—1989年，为了适应我国公务员制度建立的需要，北京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受人事部委托，开发了《行政职业能力考试》，这是“专业职业能力测验”的一个例子。该考试包括言语运用、知觉速度、逻辑推理、计算速度、资料分析五个部分，在考察这些方面的基本能力之外，还考察从事智力活动的持久性和耐变力。国务院几十个部委和若干省政府将其用于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考试录用。

职业分类

陈： 您刚才说，在进行职业规划时，首先要了解自己的职业能力，其次是要了解自己的职业兴趣。妈妈说，我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曾经有过将来要当司机的想法；可是我上中学以后，反而没有

了一个明确的兴趣方向。我们班上的同学，除了个别人，大部分人也说不出自己有什么样的职业兴趣。为什么会这样呢？

谢：在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职业越来越多。一个人小的时候，只知道司机、警察、教师、医生等少数几种职业，所以他可以说想当司机或者警察。长大了以后，他已经搞不清楚有多少种社会职业了，而警察、教师、医生这些职业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所以反而变得迷茫了。

我国最早公布《职业分类标准》，是在 1982 年，供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使用的。将全国范围内的职业分为 8 个大类，64 个中类，301 个小类。8 个大类的排列顺序是：1.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3.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4. 商业工作人员，5. 服务业工作人员，6. 农林牧渔劳动者，7. 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8. 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以后，一直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负责职业分类的工作，2003 年公布了 1838 种职业名称，现在大概已经到 2000 多种了，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公布 10 种新的职业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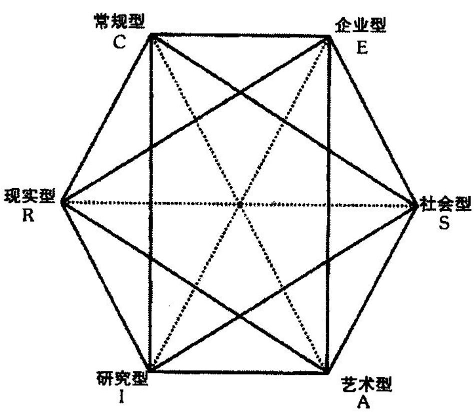
在美国，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简略的职业分类，就是划分白领工作人员和蓝领工作人员，前者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后者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白领包括：1. 各种专业技术人员，2. 农场以外的经理和行政管理人员，3. 销售人员，4. 办公室工作人员。蓝领包括：1. 手工艺工匠及类似工人，2. 非运输装置技工，3. 运输装置技工，4. 农场以外的普通工人，5. 服务性行业工人，6. 农场工人。

学校里应当开设专门课程，比较详细地向学生介绍各类职业。我在这里主要介绍心理学家按心理的个别差异进行的职业分类。在这个领域中最有名的是美国霍普斯金大学荣誉退休教授霍兰德的六角形模型和按照该理论编制的《关于教育与就业的自我指导》测验（SDS）。教育部考试中心做就业指导，就用了他的理论模型，他们的原始资料还是托我在美国买的。美国还是讲究职业道德的，不是

给钱就卖，而是要求买的人要受过专业训练，要有相应的专业资格。我当时正在美国教育测验服务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所以能够买到。

陈：请您较为详细地介绍一下霍兰德六角形。

谢：霍兰德理论包括 4 个基本假设：1. 大多数人的人格特质可以归纳为 6 种类型；2. 工作环境也有 6 种类型，其名称及性质与人格类型的分类一致；3. 人们都尽量寻找那些能运用自己的技术、体现自己的价值和能在其中扮演令自己愉快的角色的职业，即某种人格类型的人会尽力去寻找相匹配的职业类型；4. 一个人的行为表现是职业环境类型和人格类型相互作用的结果，二者匹配或者不匹配，会严重影响到他的职业前程。



霍兰德所划分的 6 种类型是：

现实型（R）：具有运动或机械活动倾向，喜欢需要动手使用工具或机器来完成任务的工作。要求明确的、具体的体力任务和操作技能；需要立即行动和获得强化；较低的人际关系要求；喜欢户外的活动。

研究型（I）：具有技术倾向，逻辑、系统，并喜欢科学地解决抽象问题。具备思考和创造能力；社交要求不高；思考任务定向；

要求实验室设备但不需要强体力劳动。

艺术型（A）：具有敏感、情感化、直觉和想象倾向，注重美感，喜欢通过各种媒体表达自己，具有持续的创造动机。倾向于通过语言、动作、色彩和形体表达审美原则；喜好单独工作；对友谊有特殊标准；长时间埋头苦干。

社会型（S）：具有理想化、乐于助人、善解人意和乐于支持的倾向，喜欢教课、培训、发展他人，致力于提高他人的生活质量。解释和修正人类行为；要求高水平的沟通技能；热情助人；延迟强化；强调威望。

企业型（E）：具有雄心、鼓动性、有活力的倾向，喜欢竞争性和有影响的活动，有实现组织目标或经济目的的强烈动机。有说服他人的能力；需要管理行为；完成督察性角色；需要作言语反应。

常规型（C）：具有有规则、有效率、尽职的、坚持的、有系统的倾向，喜欢已经界定好的口头和数字任务，坚持按照程序和步骤进行活动。要求系统的、常规的行为；人际技能要求低；规章制度明确。

在霍兰德六边形模型中，每种职业人格类型与其邻近的两种类型属于相近关系，与其处于次对角线上的两种类型属于中性关系，与其处于主对角线上的职业人格类型属于相斥关系。职业选择时应遵循几个原则：1. 适宜原则，即每种职业人格类型的人适宜从事同种类型的职业。如：E 型人格类型的人从事 E 型职业。2. 相近原则，即每种职业人格类型的人选择从事与人格类型相近类型的职业，比较容易适应。如：S 型人格类型的人从事与其相邻的 E 型或 A 型职业。3. 中性原则。即人们选择从事与人格类型成中性关系类型的职业，经过艰苦努力，也能够适应。如：S 型人格类型的人从事与其相隔一个类型的 C 型或 I 型职业。4. 相斥原则，即人们如果选择与人格类型相斥关系类型的职业，则很难适应。如：S 型人格类型的人从事与其相对立的 R 型职业。

职业兴趣的测量

谢：霍兰德的SDS包括一个测验问卷和一本《就业指南》小册子。通过回答问卷可以得到受测者的个性类型模式；对照《就业指南》，就可以得到一组最适合自己的个性类型模式的职业。

霍兰德认为个人的职业兴趣往往是多方面的，因此通常用得分最高的前3个字母的代码来标示一个人的职业兴趣。这个代码就称为“霍兰德代码”。三个字母之间的顺序表示了不同类型兴趣强弱程度。如：SEC代码表示社会型（S）得分最高，然后是企业型（E）、常规型（C）。

《就业指南》中列出了414种不同的职业，并列出了从事这些职业的人的典型个性类型模式以及一般的受教育水平。例如，一个人的测验结果表明他的个性类型模式是CIS，对照《就业指南》，可以得到下列一组职业：公共事业会计（大学学历），时间研究专家（大学学历），电子打字机操作员（高中学历），统计员（初中学历），高速印刷机操作员（初中学历）。

在国外，职业能力和兴趣测验已经相当普遍，因此心理学家也是一个很热门的职业。据调查，每年在美国施测的职业兴趣测验在350万份以上。在我国，职业兴趣测验尚未形成气候。1989年，北京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和北京人才交流中心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一起办公，我们开发了《BEC职业兴趣测验（I型）》和《BEC职业兴趣测验（II型）》，来测试的人已经有一定的规模。可惜，由于某种极为特殊的原因，北京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夭折了。

《BEC职业兴趣测验（I型）》是一个包括168道题的问卷。问卷题目是一些关于各种活动的陈述。受测者将判断自己是否愿意从事这些活动，在“非常喜欢”、“比较喜欢”、“不太喜欢”、“很不喜欢”四者之间作出选择。在这些题目中，与下面将要介绍的14大

类职业相对应的题目各有12题，这些题目交叉混合排列在一起。施测时，要求受测者凭借感觉迅速地逐题回答，不必深思熟虑。经过计分和统计，每位受测者可以得到14个分数，这些分数将根据与人口常模的比较被换算成标准分数。这些标准分数反映出，与人们的一般职业兴趣爱好状况相比较，受测者对哪些职业领域的兴趣爱好更强烈一些。

《BEC职业兴趣测验（I型)》确定的14大类的职业是：

1. 科学理论研究与组织。可以担负一定的责任，可以利用自己的系统知识来从事于物理、数学、化学、生物科学或经济学的某一分支的研究，例如：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经济分析专家、统计学家、系统论专家等。

2. 科学实验研究。可以从事于对事实的观察和分类，在实验室中进行具体操作，并从事于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的某一分支的研究，例如：化验员、实验员、医士、技师、指纹分析专家、质量检验员等。

3. 工程设计。可以在工业、建筑、运输等行业中从事工程设计，例如：建筑工程师、电器工程师、机械设计师、广播电视技术工程师、矿山设计工程师、环境保护工程师等。

4. 熟练技术工作。可以从事动手较多的技术工作，可以在建筑、运输、机器制造等行业中从事熟练技术工作，例如：修理工、装配工、油漆工、钳工、锻工、建筑工人、电工等。

5. 服务行业。可以从事于饮食、服装、美容等方向的服务行业工作，例如：厨师、美容师、时装设计师、缝纫等工作。

6. 野外工作。善于从事那些户外或野外工作，例如：种植农作物、放牧、管理森林公园、渔猎、勘探、远洋考察等。

7. 企事业管理工作。可以在政府部门、工厂、公司、银行等企事业组织中担任较高职务，善于推进管理工作，可担任经理、财务经理、业务经理、人事经理等。

8. 商业性经营工作。可以从事与推销、采购等有关的工作，如推销员、采购员、经济师、会计等。

9. 文秘工作。可以从事记录、档案文件管理、资料分类等方面工作，善于集中精力，迅速、准确、有条理地处理好各项办公室工作，可任秘书、出纳、信件分拣员等。

10. 新闻传播。可以从事社会传播和社会宣传工作，可以书面或口头传播信息、交流思想，例如记者、编辑、作家、文艺批评家等。

11. 艺术创造。可以从事那些需要直觉、灵感、创造性个性的艺术工作，可以在音乐、美术、表演艺术的某一方面表现较高才能，如音乐家、画家、演员等。

12. 工艺美术。可以从事一般性工艺美术工作，如陶瓷描图、刺绣、广告装饰等。

13. 行政管理。可担任对社会影响较大的工作，可致力于社会的公正与进步，例如：政府官员、学校校长、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警官、军官等。

14. 行政或公益事务。可从事与社会服务有关的具体性事务工作，如护士、邮递员、电梯值班员、门卫、导游、警察等。

个性测量

陈： 除了职业能力测量与职业兴趣测量，还有没有其他的心理测量可以作为职业选择的参考？

谢： 在职业选择和专业定向的过程中，个人的性格特点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人的性格有的活泼，有的文静；有的内向，有的外向；有的勇猛，有的谨慎。倘若一个人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不喜欢过多地与人交往，就应当避免从事推销产品、开展公关一类

工作。如果一个人性格活泼好动，性情急躁，就应避免从事文字校对、病人看护一类的工作。一些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在某些职业（如经理、教师、飞行员等）上获得成功的人具有相似的性格特点，但另一些心理学家的研究却未能得到相同的结论，对此尚存较大争议。所以，可以把个性测量作为职业选择的一个比较弱的参考项。

人的心理特点分为两大块：认知特点与个性特点。就职业成功而言，一般认为，对于认知水平达到平均程度以上的人，非智力因素的个性特点至关重要。很多成功的人，如张朝阳、马云等等，他们不一定智商有多高，但他们的情商都很高。有些编制测验的心理学家建立了不同的“职业常模”——预测一个人职业成功的参照系。例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卡特尔编制了《16 种个性因素问卷》，施测于 50 多种从事不同职业的人群，发现了从事相同职业的人的相同性格因素和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之间的性格差异。在此基础上，建立了 50 多种不同职业中容易获得成功者的性格特点。台湾的刘永和等人已经修订出《16 种个性因素问卷》中文版。

我建议你做一个伯乐乐测量。《伯乐乐个人心理倾向量表》是北京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参考《爱德华个性偏好量表（EPPS）》的思路编制的。伯乐乐从 EPPS 中删除了 5 个量表，还删除了一些与中国文化背景相差较远的题目。它包括 10 个量表，共 100 道题，其编制逻辑是，将反映 10 种主要需要的陈述进行比较，从中看出受测者在 10 种需要上的相对强烈程度。这些需要是：

1. 成就：欲获得成功，欲成为大家所公认的权威；干事尽力而为，努力去完成某些需要技术和毅力的任务，努力去做某些有意义的工作；总是力图在各方面超过别人，总是努力去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难题；想创作出伟大的小说或戏剧。

2. 秩序：书写整齐而有组织，在进行困难的工作前详加计划，使事物井然有序；旅行前做缜密的筹划，将工作细部组织化，依一定的系统或方式整理信件和资料；定时定量地进食，将事物安排得

很顺利正常而少有变更。

3. 表现欲：喜悦富有机智的话语，好说些有趣的故事或笑话；愿讲述个人的冒险和经历，以引起别人对自己的重视和赞美；说一些话仅仅是为了看此话对别人有何效果；谈论自己的成就是为了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喜欢用一些别人不懂的字眼，问一些他人无法回答的问题。

4. 自主性：随心所欲地来去，好发表意见；自己做决定，做自己要做的事，做一些不同于习俗的事；避免必须遵从他人的情境，做事时不管别人怎么想；好批评并攻击权威，常避开责任和义务。

5. 亲近性：愿对朋友忠诚，愿参加友善的团体，为朋友做些事情；喜欢结识新朋友，尽量多交朋友，与朋友分享快乐；愿与朋友一起做事，而不喜欢单独行动；常写信给朋友，并保持密切的接触。

6. 探究欲：愿意分析自己的动机和感受，也愿意观察别人，了解别人对事物的感受；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判断人时注重别人为什么做，而不管他们做什么；喜欢分析别人的行为和动机，好预言别人将如何行动。

7. 慈善：乐于帮助困境中的朋友，乐于协助不幸的人；能以仁慈和同情待人，能宽恕旁人；好施小惠于人；对旁人十分慷慨，特别同情那些受伤和有病的人；愿意对旁人付出很多感情，希望旁人信任自己。

8. 变异：喜欢从事新而难的工作，喜欢旅行和遇到新的朋友，喜欢经历日常生活中的新奇和变化，喜欢到异地走动或生活，喜欢追求新的时尚。

9. 坚毅：坚持致力于一项工作直到完成为止，努力完成任何正在着手进行的工作，对于指定的任务能全力以赴；执著地对付难题或困惑，直到解决后方肯罢手；为做完一件事能工作到很晚，能

长时间而不分心地从事工作，对于看起来并无进展的问题仍能孜孜以求；避免在工作时间内受到打扰。

10. 攻击性：好攻击相反的意见，好公开批评别人，开别人的玩笑；自己若与别人不一致时好斥责别人；欲因受辱对人施加报复；容易发怒，事情出差错时好指责别人。

我们把个性测量命名为“伯乐乐”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辨才识才是“伯乐”——各级领导的事情，家长也可以视为是孩子的领导。心理测量学家的责任是为“伯乐”们提供服务。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今天，“伯乐”可以不必自己去测量了，他们会乐于把这种任务交给专业的心理测量工作者去做。

在这里我还要重复一下，个性因素对于职业成功的影响是相对较弱的。有些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克服个性上的弱点。例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性格比较内向，还有点口吃，但他立志从政后，矫正了口吃的毛病，成为一名成功的政治家。然而，个性因素总归还是有一定影响的，1960 年他在与性格外向的肯尼迪竞选总统时，就在电视辩论中吃了亏，最后在竞选中以微弱票数输给了肯尼迪。

人才的需求与供给

陈：职业规划中的了解社会，主要是要了解什么？

谢：美国《国家职业发展指导方针》将每一年龄段人员的职业指导分解为自我认识、探索教育与职业的关系、职业规划三大环节。了解社会，就是要尽可能地了解当下社会对于某一职业的需求程度以及教育部门对于该职业人力资源的供给情况。

在职业选择中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是社会需求。这是一种功利的、现实的考虑。你将来的发展空间有多大？你面对的竞争的激烈程度有多大？为了获得职业上的成功，应尽量争取避开最

激烈的竞争，这就需要对社会需求进行预测。对社会需求的预测（即人才预测）需要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合作，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这方面需要做很多实证性的研究，包括未来产业结构变化的预测、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研究……国外这方面做得很多，国内做得还很不够。可能是受到事事都要保密这种观念的束缚。

除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因素，还要考虑教育部门的人才供给因素。二者之间常常有一个时间滞后问题。2002－2003 年，我们学校对外汉语专业的毕业生是很走俏的，因此有很多人都报这个专业。学了四年后，现在这个专业找工作又变得很难了。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外国留学生急剧增长时，有许多非专业的人进入了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特别是学英语的、学小语种的人都转过来教汉语，抢占了就业岗位；另外，许多学校纷纷开办对外汉语专业，人才供给十几倍地增长。法律专业、会计专业，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赶潮流的人常常会发现自己老也赶不上。所以我觉得，人还是不能太功利了。我很欣赏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的人生态度："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八个字对我的人生影响也很大。在就业的问题上，不要去与别人争，去抢热门，要独辟蹊径，走自己的路。还是要重点考虑自己的能力与兴趣。人尽其才，为所欲为（做我想做的事情）。

选择是一生的事

陈：在我的同龄人中，有人对于高中文理分科、高考选专业报志愿有一种恐惧感，认为万一选择错了，这辈子就完了。您怎么看？

谢：不要过于重视高考的选择。我在 15 岁的时候，1966 年下

半年，学校因为“文革”而停课了，当时我多数的时间都在北图看书，我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的一本书，其中有一句话对我影响很深——“人们总是认为在人生的道路上可以做理性的选择，实际上根本是不可能的，你未来所面临的很多事情是无法预测的，面临的环境也是无法预测的”。

我经常对学生讲，所谓潇洒人生，就是不要对每个选择都看得太认真，你觉得你是做了一个理性的选择，实际上，对于未来你根本无法把握。倒退 10 年，人们不会想到有一个讲《三国》的（易中天）成明星，也没有想到有一个讲《论语》的（于丹）成明星。学历史、学中文，当时来说都是很没前途的专业。人自己可以把握的，就是“道德文章”这四个字。你能做的就是提高自己的能力，提高自己的道德，就好像是增加一个物理学上的势能。只要你有很高的势能，即使这个机会错过了，还会有别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虽然前途难以预测，你还是可以把握自己命运的。选择不是只有一次机会，人生的道路是崎岖的，经常会碰到岔口，选择是一生一世的事。

在职业选择问题上，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每个人都可能在任何工作上获得成功，每种工作都可能由任何人做好。这种观点是站不住的。很显然，一个有色盲症的人就不能胜任从画家到化验员的许多种工作，许多人由于自身生理、心理特点的局限不能成为一名高速战斗机的驾驶员。另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存在着一种最佳职业，对于每一种工作来说，都存在着一类最佳人选。这种观点也是站不住的。事实上，对于具有某种生理、心理特点的人来说，他可能在若干职业上都能获得成功。这些职业对人的生理、心理特点有相似的要求。例如，对于一个思维敏捷、长于言谈、性格外向、喜好与人交往、有感染力的人来说，他既可能在政治领域中获得成功，成为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也可能在经济领域中获得成功，成为一位有名的企业家。对于

某一种特定职业来说，也可能由具有非常不同的生理、心理特点的人来完成。例如，一个成功的军事家，既可能像苏沃洛夫那样具有暴躁、外向的性格，也可能像库图佐夫那样具有稳重、内向的性格。只有很少的人可以在几乎一切工作上都能得到满足和获得职业上的成功，只有很少的工作是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胜任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总有一些工作更适合他的特点，对于大多数工作来说，也总有一些更适于承担之人。因此，正确的选择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心理学家可以为职业选择提供一些帮助，但也不要对这种帮助估计过高。由于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较高级的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这些现象远比物理现象和生命现象复杂，因此，心理学的研究也比物理学和生物学研究更为困难。我们可以凭借现有的计算机来预测太阳系全部行星 100 年以后的准确位置，但是，即使我们具有运算速度快一万倍的超级计算机，也很难预测一个人一个月以后的行为。即使我们考虑了能力、兴趣、性格、社会需求等所有因素，人的职业成就还受到信念、意志、机遇等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今天在职业选择科学化方面的种种努力不过是一种尝试和探索，还存在着大量技术的和哲学的难题。当然，也正因其扑朔迷离，才让这一领域的探索者乐此不疲。

最后，我告诉你一种高考报志愿的具体方法，用排除法。从招生目录中，先把自己考试成绩达不到的专业排除，再把与自己的能力特征不符合的专业排除，再把与自己的职业兴趣不符合的专业排除，最后剩下几种，这是选择最困惑、最举棋不定的时候，干脆就抓阄，闭着眼睛听天由命。反正以后还有改变的机会。

陈：谢谢您，谢伯伯，我今天学到了许多新知识，也从您所说的“道德文章”四个字中，对于人生有了新的感悟。

为 己 之 学

基础类文科

哲学是干什么的？
——吴国盛教授访谈录

吴国盛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1996年以来，研习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哲学，关注环境问题，关注科学的未来和人类的命运，开展对现实中种种现代性"现象"的反思，形成了新的学术思路和写作意向。



被访者：吴国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访谈时间：2010 年 4 月 30 日

访谈地点：北京大学承泽园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办公室

陈：吴叔叔，我今天来向您请教，是想要初步了解哲学这门学科。我们高中政治课中也讲一些哲学，与您研究的哲学有什么不同？请您先简单介绍一下，哲学究竟是研究什么的？

吴：咱们现在高中教的东西，根本算不上是哲学，与哲学基本没有关系。我在给大学生开课的时候说，我的任务是要将他们学过的所谓“哲学”进行清洗，然后重新再来。

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与之相对应的东西是“经学”。读经是我们的传统，经是文、史、哲不分，都搞在一起的。哲学是一种来自西方的传统，在西方处于一个基础学科的地位，是万学之主，所有的学问都是从哲学出来的。各学科分出来后，要寻找自己的根，又要返回到哲学中去，这就导致西学总是不能离开哲学。西方的科学也是与哲学搅在一起，科学也是从哲学出来的。从西方的历史看，科学家与哲学家老是搅在一起，越往前越是两种身份合一，既是科学家也是哲学家，比较近的像莱布尼兹，再远就更不用说了。中国没有这种情况。我们的四大发明都属于技术的范畴，搞技术的人都是工匠，不是学问中人，与哲学没有关系，与经学也没有关系。哲学本质上还是西方的。现代中国因为是走西方式的道路，所以继承了西方的一套学科体系。现在北大文科有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等，都不能直接衔接中国的经学传统，但可以从中找出只言片语，作为思想资源的一部分。

陈：在思想领域中，哲学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

吴：刚才我们讲了，哲学是万学之主，是一切学科的基础。说得细一点，当某一门学科的基础理论需要变革的时候，就需要向哲

学求助，比如科学里面的爱因斯坦，在要发生物理学革命的时候，要追索时间、空间的本质的时候，就需要进入哲学领域。平时科学家不需要讨论时间是什么、空间是什么，到了科学革命时期就要讨论了。当某一种学科要变革的时候，就需要哲学思维。再说法律领域，要立法的时候，立法的依据是什么？就牵扯了很多法哲学的问题。所以说哲学是一个非常基础性的东西，讨论非常根本性的问题。它在思想领域中是一个核心学科，一个永远离不了的学科。而且这个学科与其他学科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它不是提供知识性的东西，它提供对于人类基础问题的永无止境的批判，它总是对各学科的基础部分提出怀疑，提出批判，具有理性思维。理性思维就是要把理讲通。为了要讲清这个理，需要各个方面进行诘问与批判，批判的结果是使理性更加活跃，而不是僵死。

为什么说你在中学政治课学的不是哲学呢？它是让你记住条条框框——这就是对的，必须背下来。哲学的意义是凡事都要经过反思和批判，你为什么这么斩钉截铁地宣布——这是物质的，这是精神的？什么是物质的？什么是世界？这么说对不对？关于世界，关于物质可以说一大堆东西，哲学是从这说起，而不是让你记住一些教条。学哲学应当引起你的好奇心，什么是世界啊？什么是物质啊？什么是客观存在啊？哲学的特点是批判性的、启发性的，而且它对知识领域的扩展，不是以实证的方式，而是以反思的方式。我们脑子里的很多东西、很多知识的结构，我们并不知道。打个比方，人们讲话的时候，会想下一句说什么，一般来说，我们不用想下一句该讲什么，开口就来。你能开口就来，这说明你的头脑中有许多现成的东西（成见）支持着你，你讲话的时候是不考虑平常积累起来的那些成见的，但哲学是专门反省、反思各种各样的成见的，追查、探索水面下面隐藏着的东西。爱因斯坦就是从反思“时间”、“空间”这些最不经意地使用的概念入手，开创了相对论。

陈：我们高中学的哲学，与大学的哲学完全不能衔接吗？

吴： 应该这么说，不是要划分高中哲学和大学哲学，而是要划分真的哲学和假的哲学。有的大学里的哲学教学和研究也是跟高中差不多的，都是披着"哲学"外衣的假哲学和反哲学。

如果说大学与高中有区别的话，就是大学哲学更加专业化。按道理哲学不应该是一个专业化的学科，哲学作为基础学科，是万学之主，它是一，而不是二，不是多，是个总的东西。但是西方在工业革命后，有学科分化的趋势，分成一个一个的学科，哲学也从万学之主，变成了一种学科。哲学作为一种学科，里面又有进一步的细分，比如，你做康德哲学还是做先秦哲学，分得很细。中国在这方面就做得更过分。

中国的哲学分了8个二级学科，而这8个二级学科的分法是很奇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美学、伦理学、宗教学、科技哲学。这个分类法是不合逻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学派、一家之言，在这里变成了一个分支、一个学科。按道理，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可以看各个学科，而不能是一个单独的学科。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是按地域分，还可以，按地域分就分完了，最多还有一个印度哲学。可是它又分了逻辑学出来，按道理有印度逻辑学、西方逻辑学还有中国逻辑学，它单独列一个逻辑学，与印度哲学、西方哲学等平起平坐。美学单列一个，伦理学也单列一个。宗教学本来不是哲学，它是研究宗教的，与哲学没有关系，在我们这儿没地方放，不能突出宗教的地位，所以就放在哲学门类里面。科学哲学也很怪，它或者属于中国哲学，或者属于西方哲学，当然也分马克思主义学派和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8个二级学科的划分，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人讲究因人设庙，有一个大人物，就要给他设一个学科。

陈： 您不赞成8个二级学科的划分，那么您觉得应该怎样分？

吴： 哲学应该从大的方面分。哲学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这

样分是可以的。由于长期的历史隔绝，中国与西方是两套系统，各自发展，是很不一样的，你可以分为这样两个，最多分两个就不能再分了，什么都不分是最好的。做哲学就是做哲学的，他研究基本问题——什么是世界？世界与人是什么关系？什么是人？就是研究这些问题。研究问题的时候，他可以援引各种资源，中国的资源和世界的资源，但是你的问题是一个。现在中国的哲学学科分得这么细，就没有办法出哲学家，最多就是哲学史家或研究哲学家的专家。比如说问你是做什么的？答曰：我做笛卡尔的，我这一辈子就研究笛卡尔的书。但有些天才出众的人，在研究笛卡尔之后，他的所思、所想、所写，也有笛卡尔的味道，围绕笛卡尔再做一些研究。譬如周国平，以前做尼采，他尼采做得有些意思了，后来他研究别的，也有些尼采的味道。当然这样还是有欠缺的，大哲学家做到这一步还是不够的，他应该直接面对和思考最基本的问题。

陈：请问哲学教育在中国教育中的地位？

吴：在中国高教领域中，还是比较重视哲学的，至少在口头上是重视的。现代的学术发展离不开批判性思维，创新和批判性思维的动力来源于哲学。人们常要问，你为什么要创新？创新的依据是什么？依据、根据、理据往往是从哲学中去寻找的，所以很少有人会出来否定哲学的重要性。

中国当代的哲学是一个并存的局面：一方面，主流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说的新生力量，最近一二十年从欧美留学归来的人，带回了西方哲学新的思潮和作风。现在中国与西方哲学界的交往还是很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学哲学也是有很多出国交流、进修的机会的。

总的来说，哲学在中国的地位还不怎么明确，只是隐隐约约觉得它重要，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从传统上就一直认为是最重要的。从专业角度看，哲学确有很多东西值得一学。现在哲学门类下面是

1 个一级学科、8 个二级学科，这么多大学都在办哲学系，这么多教授在讲哲学。你可以在中国大学里学哲学，也可以到西方去学。但整个社会来讲，哲学有什么用，还是搞不清楚的。西方各学科的重大变动和创新，都要依靠哲学。如美国要立什么法，或者提出宪法修正案，都会引发哲学界做很多讨论。美国有个哲学家叫罗尔斯，写了一本书《正义论》，研究什么是正义的问题，很厚的一本书，在中国就会被认为是书呆子行为；在美国就不一样，美国人认为这关乎日常生活，他的日常生活最后都要诉诸哲学的根据。比如宗教自由到什么地步？个人的权利到什么地步？国家的权利到什么地步？一系列的规定，这些规定背后都是有哲学来支撑的。所以任何一点规定的改变，都要诉诸严密的哲学论证。西方的哲学地位比中国突出多了，中国搞一套理论出来，对老百姓生活没有影响，对政府的立法也没有影响，或者说暂时没有影响，影响比较间接。

这种间接影响就是，通过我们的学生起作用。我们北大哲学系是向全校各个系开哲学课，不是只训练本系的学生。哲学成为全校的课之后，无形中培养了青年一代的批判意识，将来这一代学生成长起来，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后，这种批判意识就会起作用。他们就会提出质疑，大胆的质疑，比如说对现在各种网络问题的质疑。这里面或多或少地都来自于哲学里面的理论根据。现在中国处于转型时期，制度、文化、价值都在转型，价值、理论的重要性越到后面越明显。哲学系学生问，我们学哲学干什么啊？我们告诉他，从短期看没什么用，我们学哲学的人将来可以教哲学，此外没什么别的用处；但哲学又是无用之大用，中国现在处于转型期，文化转型，文化重建，任务很艰巨，应该说有大用。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陈：请问在中国近现代是什么时候有哲学这门学科的？

吴：中国的哲学学科可以说诞生于北京大学。北大哲学系 1914

年正式招生，是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哲学系。创建之初称为文科“哲学门”，也称“中国哲学门”，1919 年更名为“哲学系”。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 年回国后在北大任教授，他在 1919 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首次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从此名声大噪。冯友兰 1915 年人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 年赴美留学，1924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回国后，分别于 1931 年、1934 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胡适曾说，他在北大的学生们比他自己更饱读经书，更了解中国传统学术。冯友兰与胡适一样，尝试用西方的概念、范畴和方法论，把中国古代的经典重新整理了一遍，他比胡适做得更精细和专业；胡适后来涉猎太多，不够专心，始终没有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卷。可以说是在冯友兰这一辈人的手中，才建立了像模像样的中国的哲学学科。

中国古代思想家都是通人，他们不是以哲学家的身份出现的，他们是以儒家、理学家、心学家的身份出现的，当时他们每个人涉及的面都是非常广的。现在哲学在中国尴尬的地位和它的“被专业化”也有关系。冯友兰先生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1949 年以前他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力，对政府也有相当的话语权；1949 年后被长期边缘化，他已经被剥夺了成为社会思想资源的角色，成了某种专业人士。

陈：那就是说哲学在 1949 年以后的发展是很不顺利的？

吴：那是肯定的。我有一次开“哲学导论”课，我一开始就说，哲学被剥夺了在教育中的地位，这样整个民族就不再思考。当思维失去活力的时候，你们学习的哲学就是一些教条主义的垃圾。连哲学系搞马哲的人都说，这样的哲学教育怎么能行呢。他们说，自己所教的哲学与高中教的哲学不是一回事，我们研究马克思本人

的哲学文献，而不是苏联红色教授学院炮制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这说明至少在观念层面上，他们已经扭转过来了，已经把马哲作为一种学术而不是教条来看待。如果有一批优秀的青年，真正有志于哲学、献身于哲学，这是国家的幸运，是中国哲学的幸运；如果都认为哲学没什么好学的，那国家只能在缺乏大脑思考的情况下随波逐流，走到哪儿算哪儿。

陈：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与改革开放前的30年相比，哲学的命运是否要好一些？

吴：那是当然的。哲学就是要批判，不断地自我批判，老是怀疑自己思想中那些未经论证的前提；在一个不让怀疑，提倡当“驯服工具”的社会，当然就是没有哲学了。在毛泽东时代，号称“人人都要当哲学家”，但是只许批判领袖圈定的批判对象，“痛打落水狗”。改革开放之后，“舆论一律”开始被打破，世界上的各种哲学流派都引进来了，这是一个进步。但是上面讲“不争论”，这对哲学仍然有妨碍，哲学是在争论中发展起来的，“不争论”，哲学就没有活力，都各说各的，那还有什么意思。当年的马克思、列宁，都是喜欢争论的人。

陈：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哲学专业占多大比例？

吴：北京大学每年招3000名本科生，哲学系也就是三四十名，大约占1%。学科门类一共有12个，哲学是其中之一。理学门下设11个一级学科，农学门是8个一级学科，医学门也是8个一级学科，工学门最多，有31个一级学科。理、工、农、医都是大门，哲学门门脸挺大，下面就光杆一个哲学一级学科。前些日子研究学科调整时还有人说：“什么哲学门、历史门、文学门，并成人文门算了，这些门底下拢共没有多少一级学科嘛。”但有时候历史的惯性很难改。哲学的名头大，与意识形态也有关系，与搞马哲的这些人的地位有关系。民间现在一般说“人文社会科学”，或者说“人

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官方的称谓是“哲学社会科学”，把哲学放在社会科学的前面。这样无形中给人一种印象，哲学很牛，地位很高，它是第一个门类、第一个一级学科。哲学在一级学科名录中是“0101”，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二级学科名录中是“010101”。所以我看哲学门很难撤销。

陈：北大哲学专业有本硕连读吗？

吴：有的。本科进去后，在三年级会筛选出一部分直博生。进入直博生，你将来就不用考研了，直接读硕士、博士。到三年级的时候，如果是哲学系学生想继续读硕，比如说想进入技术哲学学科，技术哲学的老师就要对你进行考察，也有考试环节，但不像国家统考那样僵化，先看你平时的学科成绩。总是排前三名，上课你脑子很灵，发言很积极，解决问题的能力强，那老师就会对你有印象，甚至可能老师都会说：“你别直博了，到国外去读书吧。”因为我们现在国际交流很多，优秀的学生，我们都把他们定点地投到国外去，学成后，还希望他回来到我们系来。北大读直博的很少，我们现在有点不太愿意安排直博，因为万一你看错了，又需要给他转成硕士等等，很麻烦。我们现在更倾向于逐级免试，先免试上硕士，硕士后再办免试读博。走着看，万一不行便于调整。

报考北大哲学系还有一个好处。我是参加北大本科生招生工作的。在第一志愿没有招满的情况下，如果你铁心报北大哲学系，第一志愿第一专业报北大哲学系的，可以低于分数线录取。

陈：请您介绍一下北大现在的自主招生是怎么一回事？

吴：北大的自主招生，已经办了好几年。参加自主招生，就要接受北大特别安排的一批专家教授的笔试和面试。通过笔试而没有通过面试的学生，可以在高考时获得北大加 5 分提档的优惠；笔试和面试都通过的同学，可以在高考时获得北大加 30 分提档的优惠。如果专家觉得你这个孩子特别不错，还可以加分更多。

自主招生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是报名。比较好一点的学校，都有校荐名额；没有校荐名额的学校，也可以由校长出面向北大招生组力荐。没有得到学校推荐的人，也可以自己推荐自己。每年有上万学生报名，由招生组对他们进行初审，淘汰一批，剩下的通知他们来参加笔试。

第二步是笔试。考五门，文科考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上午考语、数、英，下午考政、史，一天考完。内容比高考少，范围比高考宽，由北大老师自己命题。按分数高低，再淘汰一批。

第三步是面试。过去面试的比重很高，现在已经降到了10%。关键是面试有主观随意性，有考官打分的不一致性。第二个还是防止“走后门”，北大面对全国这么多家长，是非常谨慎的。实行面试一票淘汰，肯定行不通。笔试分高的学生，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面试只要不太紧张就行，不用答得特别出彩，自然得体就可以了。面试主要针对两种人，针对那些只会考试的和有特殊专长的。防止有的学生只会背书、考试，连一般生活和社会政治常识也没有掌握，待人处事、人际交往也上不了台面。有些有特殊专长的学生，笔试成绩可能略差，让他参加面试，实际上是给他一个提上来的机会。

陈：除了北京大学，还有哪些大学的哲学系比较好？

吴：学哲学和学其他学科不一样。你如果学工科、农科、医科乃至文科的经济管理和历史等等，不管上什么大学都能学到一些真东西。但是学哲学就必须上好大学，在哲学教学和研究上有根底的大学。你如果随随便便上一个大学，可能学的不是哲学而是“反哲学”。

学哲学最好还是能够上北大。从这几年的发展来看，北大哲学系或许没有了绝对优势，但还是领先的。北大哲学系在8个二级学

科上都有博士点，都有学科带头人。除了北大，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系也比较强，北京师范大学比它们弱一点，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也都很不错。

陈：哲学本科生毕业后的出路怎样？

吴：北大哲学系的本科生比较少，每届毕业生，一般是 30 人，最多的时候 40 人。按 30 人算，读研、出国就走了一大堆，有 20 人吧。哲学本科生就业没有什么特定方向，找工作五花八门，考公务员的比较多一点。现在就业市场比较紧，本科生就业比较难，当然，北大的毕业生会好点。你想找到一个理想的位置，一般都要是硕士、博士。如果你不准备当大学老师，读到硕士就可以了。报考哲学研究生的，不仅有哲学本科生，还有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历史学的，也有学理科的。我有个学生进北大的时候是西语系，后来转到物理系去了，后来又转到我们系来了，研究生考过来的。

北大有个好处，你进来后就可以转系，不用到考研时再转。我们每年转进转出基本上持平，有四五个，没有那么大规模。一般的孩子都比较老实，来了之后都懒得动。爱动的学生也许是蓄谋已久的、有计划的，拿哲学系当个跳板。一般中国学生家长还是主张学一行爱一行专一行，除非你实在不行，学不下去了。我管哲学系教学的时候，转进来的学生，理科、文科都有，有的理科学生觉得没意思，转过来学科学哲学。

陈：请您介绍一下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

吴：北大现在有一个元培学院，开始的时候叫元培计划。元培学院是按照美国的通识教育来做的，前两年不分专业，三年级开始分专业，在第四个学期末确定分到什么专业。这个是比较好的，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孩子开始并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专业。这也是我们希望推广的一种模式，现在复旦大学已经推广这种模式了，而且已

经全校推广了。在这点上，北大是落伍了。北大这方面阻力很大，要推行通识教育很困难，北大的强项还是专业教育，一说就是我们中文系怎样怎样，我们历史系怎样怎样。

元培学院在试点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新老体制交替的时候，新的通常会吃亏。元培学院开课，自己没老师，理论上应该是全校的老师都是元培学院的老师，可是在旧的体制没变的情况下，原来各院系的老师不愿给你上课。比如我在哲学系上课，我记工分，给你们上课，工分谁出啊？也不是完全没有，就是学校的政策没到位。元培学院的几届学生还是有怨言，觉得没有归属感，分了专业才踏实，前两年都是悬着的。所以改革还是没有到位，干脆一步到位，像复旦这样可能更省事。

陈：那么，什么样的学生适合学哲学？

吴：学哲学，首先需要兴趣。你如果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些哲学问题的思考中去，觉得有无穷的乐趣，是一种至上的天职，你就是学哲学的材料。当然，要真正领略哲学的乐趣，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熏陶。有的孩子的感觉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颇有一些毕业生觉得，我在北大哲学系学了四年，好像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也有一些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认为，他们在本科阶段没多大收获，自己的哲学都是读研以后才学到的。所以也有不少人主张，哲学系不要办本科了，培养研究生就行了。真正想搞哲学的人，先在大学里杂七杂八地学几年，然后再学哲学，可能更有优势。

我基本上同意这种观点。哲学系应当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要给全校讲大课，一是要带研究生。当然哈佛大学也有哲学本科，人很少，比北大还少，只有一二十人。在美国，真正对于哲学着了迷的、敲定一辈子干这个的才会学。像我们招 30 人都多了。我们这 30 人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辅修二学位，其中大部分人选择林毅夫（现在是周其仁）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他们那儿很热，将

来就业也容易。现在北大的这种配置对哲学系是很不利的，我们特别希望改革。第一专业报哲学系的学生不多，最多占三分之一，甚至只有四分之一。学哲学的学生有怨气，老师也不满意。所以招生人数不妨减少一些，只让那些真正对哲学有兴趣的人来学。这样，学的人高兴，教的人也舒服。

我们哲学系的侧重点要放到提升整个北大学生的哲学素质方面来。减少政治思想课中的水货，加大真正的哲学教学与训练。北大哲学系还是强势的，北大的金字招牌有很大部分是哲学系贡献的。哲学系过去出了很多大师，现在也有很多有真才实学的教师。校领导们至少在口头上很重视，党委书记闵维方说，别的学校都不办哲学系了，北大也要办。

陈： 作为一个高中生，不论他以后是否学哲学，应该知道哪几个著名的哲学家？

吴： 现在高中生都挺累的，不要知道这么多了。你要有兴趣可以读读《苏菲的世界》，没事的时候随便翻翻，它是一个通俗版的西方哲学史。《苏菲的世界》被公认是中学生最好的哲学读物。以前周国平他们出过一套《画说哲学》，一本本很小的册子，你也可以找来看看，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的。高考现在还是一个指挥棒，你必须把这关过了再让思想自由驰骋。

你要是铁了心学哲学，又有余力，现在就可以看一些书了。现在哲学书出得比较多了，包括大陆人最近编的一些哲学概论也不错，比如说张世英先生编的《哲学导论》，复旦大学也有一个年轻人编了一本哲学导论或哲学概论。不要看 10 年、20 年前出的，如果一翻开目录，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之类的，就不要看了。我在北大主要开科学史，科学哲学也开过三次。哲学导论课程，我还没开过。

陈： 您是研究科学技术哲学的，您认为应当如何看待科学和人

文这两种文化？

吴：科学与人文这种两分法，是西方的观点，中国古代谈不上，儒家、道家等等，都是通人之学，谈不上这种分别。最早出现的是科学与哲学的两分，科学家从哲学家中分离出来。科学最初的意思是分科之学，哲学则是综合之学。19世纪工业革命后，专业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学科越分越细，每人只能专学一门。然后出现的是理科与文科的两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两分，哲学本身也由包罗万象的学问变成了一个专门学科。学理的看不起学文的，学文的也看不起学理的，这个问题后来也传染到中国来了。

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这个问题是要解决的。人是一个整体，不能说左手行右手不行，也不能说我脑子行身体不行。现在的教育就是要在学科分化的过程中，挽回人的整体。为什么我们要在本科教育中向美国学习啊？美国的通识教育也是面对越来越强的分化时的一种应对之策。西方国家的大学中，对于人性的培养比我们要强得多。强调人性与人文，本来也是中国教育的一种传统，但是向苏联学习，在教育上搞"全盘苏化"后，目中无"人"，把人当工具来培养，培养目标是工业化进程中的"螺丝钉"。这种模式使专业化走到了一个没边的地方，中国大学中专业划分之细，现在已经是世界之冠。

对于科学与人文分裂所造成的弊端，西方人已经意识到了，他们已经在高等教育中有意识地来控制这些事情。他们的大学生进来后，第一年、第二年不分专业，专业化教育不许在本科进行。在美国，管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都是不招本科生的。比如哈佛大学的这几个学院是很牛的，学费也贵，报的人也多，但没有也不许有本科生。学医、学管理、学法律，都是研究生的事儿，他们在本科阶段上的是文理学院，学什么的都有，学历史的、学哲学的，学理科的也有，到了研究生阶段，才进入专业学院学习。这种模式正是要纠正科学与人文分裂的问题。

这个病根是在西方，但是传染到我们中国后，症状却愈发严重了。举个例子来说，中国的医科大学生，在高中就是理科班的，在大学也没有机会接触人文训练。这样从大学毕业后，他们对于人性的漠视，是太明显了。医生整体是非人性化的，来了就检查，全是机器，冷冰冰的。这样培养出来的是人医还是兽医啊？现在医学教育界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反思了。我们北大医科出身的韩启德副委员长说了，他一直在讲这个事，但是具体改起来很困难，体制问题理不顺。现在正在探索医学预科的模式，预科到北大本部来上，相当于先做两年通识教育，再回去学医，这个模式不错。但是北大总务部门说了，宿舍不够用，不如你学一年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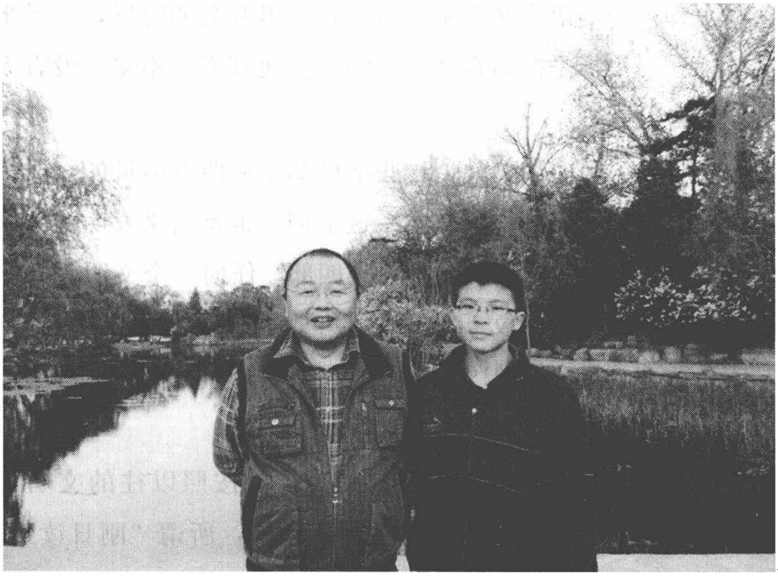
建分校也是有问题的，校园文化七零八落的，我去南京看，东南大学的老师都不住在校园里，老师与学生是分开的。几个脱节：老师与学生脱节，宿舍区与教学区脱节，文科与理科又不在一起，那就没有统一的校园文化。西方大学里，老师与新生吃住在一起。像哈佛大学，新生去了，不是按专业分班，而是按宿舍分楼。在那个楼里，老师是与你住在一起的，随时负责你的活动，这是大学里的一个规矩。住在一个楼里的，有各个学科的学生。你的舍友既有文科的，又有理科的，有利于同学之间的跨学科交流。我们以后也要往这个方向改。

陈： 谢谢吴叔叔，谢谢您在周末还专门到学校跑了一趟，为我启蒙解惑。

文学关乎中国人的生活品质
——刘东教授访谈录

刘　东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其教学和指导方向为"比较美学"与"国际汉学"。除了大学教育和个人写作之外，刘教授更倾全力组织中国的民间学术活动，其中主要包括主持杂志、丛书和讲坛。



被访者：刘东，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教授

访谈时间：2010 年 5 月 2 日

访谈地点：清华大学立斋国学研究院会议室

陈： 刘叔叔，今天我想向您请教一些文学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现在大学里的所谓文学学科，都包括哪些分支、哪些具体内容？

刘： 现在所谓的文学门类，包括四个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但目前大学里的中文系，实际上却是中国语言文学系，所以到系里开会的时候，一大半是搞文学的，一小半是搞语言文字学的，沟通其实并不多，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

文、史、哲，政、经、社，这些学科都是从西方引进的，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所以“中国文学”这个词，也是后来发明的。中国的学问，过去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任何一个文明都有一个主干，“经”就是中国文明的一个主干，像小说这一类的东西，过去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现在的中文系，却主要就是研究这类东西。

另外，所谓经、史、子、集这样的分类，按照以往的文明规则，对于一般的读书人来说，是四部都要涉猎，所谓“刚日读经，柔日读史”，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各读一偏。

陈： 国外大学的文学教育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刘： 在国外的文理学院，十分注重通识教育。美国的世家子弟，在本科阶段是不上大学即 university 的，他们什么时候上呢？是到读研究院的时候才上。哈佛、耶鲁是研究型大学，他们的教授要拼命地去争取学术成果，在教学上更多地依赖于助教。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怎样来保证教学质量？所以，他们还有一些

作为补充的，如爱默思学院、威廉姆斯学院、史密斯学院等等，希拉里等等都是从这些学院出来的。这个地方不许带研究生，老师也不大需要写作，就是带学生。美国这种文理学院的教育，我们把它叫做博雅教育、通识教育，或者叫自由教育。它不强调分科，分科是你从大学到研究院过渡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高的知识起点以后的事了。

美国希望给它的学生——从高中生到大学本科生——打下一个很厚实的知识基础，这样以后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要等你的知识达到了一定的阶段，这时候你自己才能够挑选专业方向。选择专业，一方面你要透彻地了解自己的性情，自己究竟喜欢什么、适合什么；另一方面，你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准，能够跟踪到当代知识和产业的发展。否则，选专业都是盲目的，就跟父母包办婚姻一样，只有揭开盖头的时候，才知道对方是谁，后悔也来不及了。

像你这么早就认真考虑分科问题的孩子，是很罕见的。一般都是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看着哪个专业比较顺眼，父母就给孩子写上了；还有一种是找老师参考一下，这个专业热，那个专业冷，大家就都去报考热门专业。我和你爸爸上大学的时候，文科都想考中文系，当时也不知道别的系；理科都想考数学系，是因为一篇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弄的，后来就逐渐变了。

陈：中国文学教育的百年发展历程，是否有过顺利与不顺利的时候？

刘：百年来的中国文学教育实际上是很不顺利的。我们以前没有一个所谓“文学”的教育，“文学”是从日语过来的，英语的“Literature”，这个词早先的意思应当翻译为“文献”，后来英语中这个词就有了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文学”，指的小说、诗歌、戏剧等等。正好这时候中西碰撞了，先来到

日本，他们就用两个汉字拼起来，然后我们再把它从日本拿过来。这样我们就有了“文学”的教育，靠这个来收纳各种古代知识，调整它们的顺序。中国以前没有小说，好不容易有一个像西方长篇小说的东西，地位自然要提高，连曹雪芹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红楼梦》是这么了不起；还有一个人是刘勰（南北朝的人），他写过一部《文心雕龙》，到这时候也比划着西方的文艺理论，地位大大上升。我们不断从中国文学传统资源中去寻找一些类似西方文学的东西出来，重新把它组织起来，就变成我们文学系所教的东西了。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要如何调整——提高哪个，压低哪个？王国维有一句话，一代人有一代的文学，实际上他说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体。比如说，先秦诗经、楚辞，后来汉代的乐府，唐代的诗，宋代的词，元代的散曲，明清的小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这么一说，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于艺术而言，这种单线的进化论，实际上非常宿命论。王国维自己也写作《人间词》。要真是不能在空间上并列，你写词干什么呢？按照进化论的说法，词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文学了。

中国的文化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最注重的是文章。古人所讲的“道德文章”，就是现在所说的德育智育。科举，你没有文章行吗？曹雪芹被拔高后，唐宋八大家的地位，比起曹雪芹来，真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了。总而言之，在西方的压力和影响下，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作了一次剪裁重组，改造了古代的传统，把它原来的内部次序颠倒了一下。虽然保留了一部分中国文化传统，但这个文化传统已经不是原来的传统了，是一个再发明、再创造的传统。是在什么模板上再发明、再创造呢？是在西方文化的模板上。

接下来，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20 世纪初，中西文化是碰撞了一下，于是我们就规定，要把“Literature”翻译成“文学”。可

是西方文化是一条河流，它不是与你撞一下就完了，它也继续在走。你现在到西方大学去，“Literature”又没什么大用了，他们现在都在搞文学评论，从“新批评派”走向了“新历史主义”，从“结构主义”走向了“解构主义”。原来意义上的“文学”就没有了。在西方很少见到去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论著了。从西方的整个知识学科来说，文、史、哲原是三个基本的分野，可是现在文学系名存实亡了，或者彻底变味了。

艺术有八个门类：建筑、舞蹈、戏剧、诗歌、音乐、雕塑、绘画、电影。这八个门类中，何以非要把文学放到历史、哲学中一块讲，而把其他都放逐到音乐学院和美术学院呢？这在西方本身就是说不清的。在中国古代，“琴棋书画”是不可分的，都是文人的素养。现在我们在综合大学的学生，就知道一些文字类的东西，剩下的统统不懂。大学一直都在西方的压力下，没有获得自主的生存。现在西方走偏了，我们跟着也走偏。

清华国学院倒是按照书院的模板办的，但它只存在了 4 年。可关闭清华国学院的主事人当时不可能想到，国学院总共只收了 71 个学生，而且只有一年学制，结果呢，不说这四大导师是中国上个世纪最大的学者，就是在 71 个学生中，也出现了 40 多位很有成就的学者，其命中率之高，就连哈佛、耶鲁也比不了。为什么他们才教了一年，就把学生教成这样了呢？就因为用了最符合中国的文化教育方法来教。为什么跟了梁启超就不一样了？他让学生如坐春风之中，他是倾囊以授，他与你不是竞争关系，而是父子关系，而且，你在这儿学了多少东西不重要，你慢慢学会了这种生活的态度、治学的态度，作为此后毕生的操守。在这个意义上，你这辈子都是梁启超的学生，不知不觉也就成了一个大师。

陈：我们在中小学就一直有语文课，这与大学的文学有什么

区别？

刘：现在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太强调规则的语言。我有一个女儿比你大点，她当时的语文作业连我这个北大中文系的教授都挠头，就是让划出主语、谓语、宾语等等。最可笑的是，我们有一哥们儿，自己的著作被选进去了，他的孩子让他指导作答，结果老师一判全是叉子。这种方法，等于整天在岸上教你学游泳，就是不下水。在旧中国，高中生已经很了不起了；可是让现在的高中生写封信，那真是骆驼穿过针眼。

当然，应试教育体制虽不是最好的体制，却也不是最坏的体制，最坏的是“文革”后期实行的推荐制，那就全要靠家庭出身和打通关节了。所以，同学们从感情上不要太过抗拒，先竭尽全力闯过高考这一关。越是穷人家的孩子，越要好好走这条路。权且把这一关当做一个智力游戏，给它对付过去。敲门砖用过了，得到了在高等学校中的发展自由，就要用足这种自由，只有带着这样一种心态，你才能成功。我高考时成绩当然也是不错的，不然“狗崽子”怎么能考上南大呢。但有一条，我从来也没把这当回事。到大学后一看，我们班同学里有的人太会背了，我就不和他比背功了，没必要在分数上和他较劲儿，顶多差个一分两分的，没什么了不起。

陈：大学的文学专业是热门专业吗？

刘：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是，现在不是了。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件绝对的坏事，但这是新兴市场国家中的一种暂时现象。如果你将来有幸去哈佛读书，就可以看到，那里有一个哈佛园（Harvard Yard），文、史、哲这些系都在院子里，它们是唱主角的，而中国人感兴趣的哈佛商学院，就只能远远地到查尔斯河对面去。

MBA太多了，也会不值钱的。我在湘西的一个地方听他们说，

这个地方盛产土匪。但这么多的土匪，到底抢什么啊，进屋里连个凳子都没有。MBA太多了，都憋着去赚别人的钱，也没有地方安置。反而是文科教授，现在待遇也很不错的。文科与理科比，也有它独特的优势。理科的很多老师，他的辉煌在前面，到了50岁以后，他的创造力完全没有了。而文科则不一样，那时候才是学力勃发的时候，活得更加充实，可以一直活跃到八九十岁。

冯友兰当年考北大，分特别高，他报中国哲学史，当时叫中国哲学门。导师就说，你的分这么高，可以报法科，将来可以当大官，因为当年的教师工资有一搭没一搭的，比当官差远了。但冯友兰没理这个，他就是喜欢这个学问。那么，跟冯友兰同年的法科同学，就算后来当了官，后来又有几个人知道？可冯友兰虽然逝世好多年了，大家还是记着他的学术贡献。

我在北大教书，由于过早地文理分科，好男生往往都分流到理科，结果我招的都是女孩，她们往往找了学理工的男朋友。久而久之，我也发现了一些奥秘。理工科的虽然高分上来，但如果你让他改行，去干个俄国小说里的九等文官，他们非常乐意，毫不留恋。可我这边的女孩，你别看她挣不到什么大钱，但要让她改行，就跟要她的命似的。所以说，学文科那是真有意思。此外，我发现，有些学理工科的人真是不会生活。人的幸福是建立在他的几大感性上，你没有充分发展的感性，就不会有幸福。歌剧听不了，京剧听不了，顶多弄点好莱坞大片，生活对他就是这么简单。不是他们天生没有品位，而是他们缺乏一种文化的熏陶，没有这个眼界和能力。所以文科的繁荣与衰败，关乎中国人未来的生活品质。

你去看看哈佛、耶鲁，会觉得人家还有点重文轻理。你再看看台湾，看看连战，看看宋楚瑜，看看马英九，他们都是哪个学科毕业的？只要这些社会明星人物的出身变了，社会风气也会随之转过来。你不能只看到过去的和眼下的潮流，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

一点。

还有一个，要尊重和坚持自己的独立选择，不要跟着同学圈子中的小文化跑。譬如说你这么高的分，为什么不学工商管理啊？为什么不出国啊？好像吃亏了似的。这里头没有什么吃亏不吃亏的问题，只有一种最简单的检测：哪个地方你干活不觉得累，越干越来劲儿，这个地方就是最能发挥你的潜能、最能干出成绩的地方。你要是老听别人的，一辈子为别人活，那你就完了。将来干起工作来，老像被判有期徒刑 8 小时似的，那就不会有干劲。

陈：大学文科毕业生的去向都是哪些？

刘：这个话问得大了。文科教育有各种各样，大学中的文科是这样分的，一个是社会科学，一个是人文学科。人文学科就是文、史、哲，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经济学。毕业后的去向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学了以后做你的本专业，那你就非常容易预测。如果你是学文学的，你将来或者在高等学校教书，或者在研究所里当研究员。另一种是你走运或者说不走运，你当官了，或者下海了，总之是和本专业告别了。

陈：我的兴趣比较广泛，在确定了专业之后，应当如何摆正专业知识与专业外知识的关系？

刘：即使念了文科，你还是可以接着看科学方面的书籍。学文科的人，对自然科学也要保持一个旺盛的兴趣，保持旺盛的求知欲。当然，由于不是你的专业，能做到“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就不错了。譬如说，火箭、飞船的原理是什么，我就不知道那么细，没有一个人能全知道。但如果知识面真的很宽广，知道那么多的“其然”，将来就有可能触类旁通。不论学什么专业，都要关注专业周边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保持对于课外书

籍的兴趣。我当年创造出“丑学”来，不是在哲学系的课堂上，而是在外语系的课堂上。而我现在的美学新见解，也不是萌生在中文系的讲台上，而是萌生在人类学的书籍中，这就是知识的触类旁通。

陈：谢谢刘叔叔。今天您的这番话给了我非常多的启发。

史学永不衰竭
——牛大勇教授访谈录

牛大勇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政治史，中国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关系史。代表作有《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等。



被访者：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访谈时间： 2010 年 6 月 15 日

访谈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万圣书园

陈：牛叔叔，我今天向您请教一些有关历史学科的问题。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历史学是怎样的一门学科？历史学研究目前的热点是什么？

牛：历史学是关于怎样总结和吸取前人经验的一种学问。吸取前人的智慧，在前人开创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问题，这样的一门学科就是史学。前人的经验和智慧，可以从非常远古的时候开始总结，如夏、商、周以降的人和事。总之，后人要不断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从中获得人生智慧、政治智慧。什么是热点？很难说，热点随时会转移。很多热点是受现实因素的影响。现在人们关心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会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比如现在大家关心如何实现一个环保的社会，就可以在历史中寻找各种各样与之相关的事例和政策等等，分析它们的原因和结果。如果大家关心如何重新评价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话，那大家就会重新聚焦，这就成了一个热点。

我觉得热点不太重要。你要挑选专业，我的建议是你要不断地问自己：你究竟喜欢什么？你对什么感兴趣？是对化学有兴趣，还是对物理有兴趣？是对历史有兴趣，还是对文学有兴趣？或者是对语言，那么是对哪种语言有兴趣？你不要考虑什么学科好。学科的好坏，有各种不同的标准。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选择专业，实际上是在选择自己未来的一种生活方式。你将来想怎样生活？你要先想好这个，再选专业。我们选择了历史专业，就意味着我们选择读书、思考和写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将来就要钻到故纸堆，对外面的事情可以不闻不问，每天看书，看得津津有味，觉得里面有许多乐趣。我们可以同过去的人

和事去交流、对话、质询。古人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会这样说，他们可不可以那样做、那样说，这里面有什么因果关系或者偶然性？当我们沉浸其中的时候，知道与不知道现实发生的事都无所谓了。如果你的兴趣不是与过去的人和事打交道，而是想要解决一些其他的问题，就去学其他的学科。你喜欢实验室，去发明从来没有过的新东西，你就应当搞实验科学。这是个人兴趣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对未来生活方式的选择。

陈：关于选择生活方式的问题，您能否再展开一下？

牛：生活方式有许多种。有一种生活方式是整天忙忙碌碌的，管理着一群人，可以调配很多资源。也就是成为一个领导人，经常发号施令，大家都听从你，你带着大家去创造一个事情。这可能是大公司的一个管理人员，也可能是行政机关的一个管理人员。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追求权力，以获得权力为快，利用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功名成就。如果你选择走这条路，也可能会有很多挫折感，你可能得不到你想要的。如果你整天被人压着、指挥着干这干那，你也会很痛苦。但是你一旦进入管理序列，你一方面指挥他人，一方面又被人指挥，这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你成为最高领导人。从政和做生意都要进入管理序列。从政的管理序列很长，你从副科长做上去，一辈子都要服从指挥、往上爬，很辛苦。做生意、办公司则可大可小，小的就管几个人，大的可以管几十万人，可以有一定的随意性。

另一种生活方式是比较自由自在的，平时在家里看书，每周讲几节课，过段时间到外面参加个学术会议什么的，和同行们交流切磋一番，附带着考察历史遗址，发思古之幽情，赏自然之造化。大体上，我自己就喜欢做一个学者，享有精神上的自由，可以不管领导怎样说，那是他们的事。我可以不听别人的，就钻研自己的学问，看我喜欢的书，写我想写的书。当然我也可能不可避免地在某

种场合应付说几句场面上的话，但不高兴也可以不讲，什么领导也拿我没脾气。哪一种生活方式更适合你？你应当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就想明白。

陈：*历史学在中国的发展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牛：这个问题很大。中华民族的传统是很重视历史的，中华文化和史学绵延不断地发展，与别的国家不一样，不是中断了，从某个时期再开始，而是基本上没有中断过，从远古延续下来，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一直到近现代。中国传统思想在很早的时候就确定了一种思维模式，要向古来贤者学习他们为后人创造出来的一些知识，不要让这些知识断了线，不要让一代一代的人从头摸索，我们要充分利用前人已经摸索出来的东西。按照儒家思想，以前的世界和思想是最好的世界和思想，现在可能越弄越糟了，所以我们要恢复周礼那套制度和秩序，如果那个制度已经被修改和遗忘，我们就要去发现它、挖掘它、重建它，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当然也有人是主张向前看的，认为人类社会是越来越好的。每一代的风气和古今观并不一样。我自己也不认为要恢复过去的那套才好。

热爱历史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这在毛泽东时代也没有变。新中国成立时期的那批元老，他们不仅自己喜欢历史，也喜欢把子女往历史系送。在我们北大历史学系读过书的，就有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罗荣桓的女儿罗宁，贺龙的女儿贺捷生，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女儿薄小莹，李雪峰的女儿李晓林，等等。当然也有一些领导人的孩子去学理工、学军工等等。但学历史的就这么多。

史学的地位，从民间和官方来说都是持久不断地发展延续的，史学是永不衰竭的一个学科。现在有这么多历史的通俗读物与电视节目，三国啊、孔子啊、百家讲坛啊、《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现代史、当代史的著作，都在社会上持续运作，只要学术环境一宽松，马上就会热起来的。像“大跃进”啊、“文革”啊、政治运动史啊。有些时候气氛宽松了一下，马上就成为热点。像蒋介石研究啊，民国史事与人物的研究啊等等，也都正在热起来。

陈： 历史学在“文革”期间受到的破坏大不大？

牛： 这是一件相当诡异的事。按理说，史学像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在“文革”中受到很大的摧残；但是由于毛泽东的个人偏好，“文革”又像是一个全民学史的运动。比方说，我的很多历史知识还是在“文革”当中学的。“文革”中先是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写的历史，你就要知道这些历史。你要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就要先知道海瑞是个什么人？他错在哪儿？什么“三家村”、《燕山夜话》，很多都是借古喻今的东西，这样我们反而知道了许多历史上的事。林立果的小舰队搞《517 工程纪要》，就讲了许多历史上的事，要批《517 工程纪要》，你也要知道许多历史上的事。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学了很多历史。那时要与传统彻底决裂，搞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这一批，儒家、法家就大大普及了，很多人就知道了孔子、孟子、荀子啊，商鞅、李斯啊，知道了他们之间有些什么区别。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出了一批这样的书，是发的“批判材料”，还有许多林彪抄孔子的语录等等。文革很怪，毛是要你与传统决裂，“批四旧”，“立四新”，“灭资兴无”什么的，可是反而诱导一批年轻人高度地关注历史。毛泽东自己喜欢引用历史典故，一会儿让人读《史记》、《汉书》，一会儿让人读古诗词，动不动就说点古书中的词儿。什么“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什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些古话一出来，大家就要知道这典出何处？是什么意思？什么背景下讲的？这样反而学了很多历史。

陈：“文革”后的历史学状况有什么不一样？

牛：“文革”后的历史学，经历了好几个阶段，从注重现实政治功利慢慢变得去现实主义了。

“文革”刚结束，人们还是围绕着批判“四人帮”，从史学的角度做文章。“批林批孔”怎么胡批？吕后怎么坏？武则天怎么样？宋江到底是不是“投降派”？这些都是直接为政治斗争、党内斗争服务的。过了这个阶段，觉得没意思了，就是把“四人帮”批一个底朝天又怎么样？于是慢慢又转回来，还是做学问，学问是个根，这个根是不受政治干扰的。

进入80年代，人们开始脱离“路线斗争”，但还是避免不了现实关怀。当时的一些成名作，像金观涛、陈平等人对中国历史长周期率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充满着对中国现实的关怀。中国社会的现实结构是什么？其历史来源是什么？发展脉络是什么？他们要拿一个模式来解释这些问题。为什么大家都急于“解释”中国？因为当时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发现自己落后了。当时不论是文、史、哲，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都在寻求解释大框架。中国一百多年来屈辱挨打，并不都是别人的问题，我们自己也有问题。我们自己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文明有问题？

到80年代后期，历史学的各个学科都有很大的发展，不论是中国史，还是外国史；不论是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很多过去不能研究的课题都可以研究了。像研究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陈独秀、张国焘、王明、博古、张闻天、彭德怀、刘少奇，研究“统购统销”、“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史、“知青”史，都打破了禁区，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陈：历史学科分为几个二级学科？

牛：当前对于学科的划分，你不用太在意，它不是很科学的。

现在的分法是这样的：历史学是 1 个一级学科，下面有 8 个二级学科。

如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他们认为这些非常重要，其实很少有人去脱离实际的历史问题去研究理论和学术史，因为比较空洞。北大一直搞不成这么个教研室。确实有人研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但还搞不成个规模。目前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成什么规模。这要求研究者本身要有问题意识，要有实际上的批判对象。就像其他学科一样，一旦理论与实际脱离开，光是讲理论，空对空，这个理论往往讲不好。研究历史，若不具体研究周秦至唐宋以至现代的任何实际史实，你能说清历史应该有一个什么理论？纯粹是历史哲学，没有办法验证，也不太容易有创新的思想。史学史也是这样，你不研究德国史，不研究英国史，也不研究中国史任何时代的具体问题，只是研究史学史，那德国的史学史是怎么回事？中国近代的史学史的发展有什么价值？你很难说清楚，很难说得深刻。他们写了些什么？其实就等于开了个目录。研究不是光开个目录就行了，要说他研究得怎样？高低深浅？有什么高见？如果本人不了解那段历史，就说不出来为什么这个学派比那个学派高出一筹。这个学科，现在比较衰落。

第二个二级学科是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如说雍州，就要说在汉代指的是什么地方，三国时指的是什么地方，唐朝时指的是什么地方，这是不断变化的。我们说一个概念，必须要说得很准确，比如说碎叶，碎叶有什么重要意义？在唐代的时候指的是哪个地方？历史地理就是研究这一类的问题。还有地理变迁，州县是怎样划的？行政管理制度是怎么建立的？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制度、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地方对中央的义务，这些制度怎么完善起来的？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显学。当然边疆的变化更重要。但这方面的研究条件很艰苦，人数很少。

历史文献学，需要吃透许多古代语言文献。二级学科还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外国史（现称为“世界史”，似乎以上列出的中国史等各学科都不属于“世界史”，很荒谬）。如研究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从古到今的，从中国到外国的，这些都属于专门史范围。还有考古学，现在加上博物馆学，一共是8个二级学科。作为本科生，你学的就是历史学或外国史，不需要你在8个二级学科中做选择。一般你只需要做出“二选一”的选择。上重点大学的历史学系，本科一、二年级不分专业，三年级要分，或者选择中国史方向，或者选择外国史方向。两个方向对语言的要求不一样。你要学外国史，就需要外语比较好，如英语、法语、日语等；你要学中国史，就对你的古汉语甚至民族语言文字有要求。三年级以后看的书就比较专一点。如果你对于古希腊、古罗马等有兴趣，你还要学习古希腊语或拉丁语，如果今后准备研究这些，就要做长期的打算，从本科开始学习相关的语言。如果你将来不准备从事历史研究，准备转行，做一个文学家或者编辑，历史系本科的这些课程大概就可以了。因为历史上有非常好的思想，有许多哲人，将来不管干什么，你所学的这些知识对于你肯定都是有用的。史学对于多数人来说，就是培养一种人文素养，一种历史感。

陈：您对高中的历史课程怎样看？

牛：对于眼下高中教的历史，我不是太了解。我觉得，人之所以为人，历史感是很重要的。小孩是不懂历史的，没有历史的概念，他长到七八岁的时候，只知道五六岁的一些事情，他长到十七八岁，就会记得成长过程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了，并知道自己以外的很多事情的发展轨迹。一个人，越成熟，对历史就会越了解，会从过去经验中吸取很多教训。你越能够从个人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就说明你越成熟。都是30岁的人，有的显得比较老练，老练的人就是对过去的事情吸取得比较多，所谓老于世故就是将这些事情化

为自己的经验了；有的人就比较幼稚。你要是不记得和不理解过去的事，你就永远处于一个小孩子的心理水平。一个个人可以是“老天真”，永远长不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能老是遗忘历史，忘记前人的经验教训。

陈：历史系本科生的就业去向如何？

牛：好的大学的历史系本科生，就业面还是比较广的，我觉得干什么都可以。我们北大历史学系本科每年招 40 人，毕业时，有一半考取硕士与博士研究生。三四人出国，剩下一些人从事与历史有关的专业工作，一些人转到别的专业工作。读研究生的人中，有继续读历史的，也有不再读历史的，但是都是读文科的，如国际关系等。十多人就业工作，不是集中到某个领域，但是到媒体的还是多一些。历史学还是比较训练文笔的，训练人找资料，要能找到可靠和有说服力的资料，要用真凭实据去论证一件事，要学会实证的方法。怎样证明这个事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张三说得有理还是李四说得有理？研究历史就像一个法官在审判过去发生的事情。怎么知道这是不是冤案？怎么知道这个事的是非？你必须有这个本事。有这个本事的人，可干的事就多了。史学毕业生干文字性工作的比较多，除了纸面媒体，还有电台、电视台，还有图书馆、档案馆，干什么的都有。

陈：在高考的时候，怎样才能在历史部分考出好成绩？

牛：从应对高考的角度来说，历史科目的考试是比较容易的。只要你把课本上的东西背下来就行。因为题出得很死，一般都是要在你的教材范围内出。如果是要应对考试的话，不论是高考、平时的考试，还是上大学以后的考试，你就抓住五个 W——When，Where，Who，What，Why。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什么人？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事怎么发生的？有什么意义？你扣住这几点，哪怕是其中有一点两点不知道，总能答得八九不离十。再有点细节，

老师就能加分。历史在我看来是最好考的。

陈：历史系的研究生都是从历史学本科生升上来的吗？

牛：多数是这样，但是也有一些人本科是读其他学科的，像管理学、计算机、化学等等。有些孩子自己是喜欢学习历史的，但是家长、同学、老师都认为你成绩这么好，报历史专业不是亏了吗？结果不让报历史，报了他们认为应该报的专业，还考上了。进了北大，学了一两年，心里还是喜欢历史，那时家长对他的控制已经弱了，自主性比较大了，所以就转系转过来了。我们系年年都有从理科过来的，每年一两个人。我们认为，这些孩子是真喜欢历史，人也聪明，有闯劲儿，虽然时间晚点，拉下一些课，但能够追上。事实证明，这些转过来的孩子学得还不错。

在我们老师里面，也有转行过来的。很多历史学科的老师是学外语出身，或者学中文出身，这算是靠得近的。还有以前是学化学的、学经济学的，拿了博士，还是喜欢历史，又去读了一个史学博士，找工作找到我们这儿。所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你最终选定专业的时候，你一定要确定自己喜欢的究竟是什么？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是什么？

陈：您认为在历史学的各个分支中，哪一块比较弱一点，需要新人去攻关？

牛：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我们觉得我国最缺的是思想，但是现在大学里并没有一个思想系。思想史在我们系有，在哲学系也有，各做各的，不太一样。我们做思想史是从社会出发来做，这种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是什么？我们关心的是这个思想是怎样演变、生成并与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互动的。哲学系的思想史研究更抽象，侧重从思想体系的内部来考察某种思想的渊源和与其他思想的互动。我们系不大有做思想史的传统，但罗志田、陈苏镇、桥本秀美、欧阳哲生等教授在研究。原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葛兆光

教授也在这个领域做研究。我们系一直偏重政治史和制度史，觉得这些是历史的主流，决定一切。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常态，有了制度，就可以规范这个社会，八九不离十。

政治史往往是吸引人的，跌宕起伏，回肠荡气；经济史乍一看比较枯燥，还要学习很多数学知识，要做数理模式。在我看来，完全文科出身的人是研究不了经济史的，必须学经济学，学数学。不懂经济和数学的人，大概只能搞经济政策史，或者是经济思想史。如果懂经济学和数理模式，就可以做得更深一些。但是学经济的人，做着做着就会追求功利、现实的东西。因为那是比较容易出成果的，也比较容易获利。应用性的、对策性的东西，比基础理论容易搞。你也不知道这个原理最后能起什么作用，也没人直接为研究原理去投资。所以懂经济学的人肯做经济史的也不多，现在的经济问题还研究不过来呢，研究过去的经济有什么用？更没人肯投资了。那真是要有兴趣的人才会去搞。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环境史等和科学有关的史学领域。真正学过地理学的人，才能做好环境史。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教师，搞中国史的人比较多。最早，像康宝忠、朱希祖，都是研究中国史的。后来担任史学系主任的陈受颐是研究外国史的，开过“西洋中古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欧洲十七世纪史”、“中欧文化接触史”等课程。傅斯年没有正式担任过系主任，但他对北大史学系有很大的影响。姚从吾担任过系主任，是宋辽金元史的开拓者之一。接着是清史专家郑天挺先生，他后来调到南开大学。接替郑先生担任系主任的是翦伯赞先生，研究中国社会史。“文革”和“军管”期间，系里谁当家我就不清楚了。“文革”以后的系主任最早是周一良，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和日本史，后来是邓广铭任系主任，邓下来又是周一良。邓先生对历史系的贡献很大，他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宋史。接下来是田余庆先生担任系主任，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田下来交给马克垚，是研究中世纪英国的封建土地制度的。接替马先生的是何芳川，他

原来是教非洲史，后来转而研究亚太区域史。何下来是王天有当系主任，他研究明史。我接的天有的班。我的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主要研究中外关系史，现在把自己放在专门史。历史学下面是8个二级学科，我们就尽量把8个学科弄齐。现在北大这8个学科都有了学科带头人，在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带头人是辛德勇。

陈：全国各大学的历史学系排名，大概是怎么一个情况？

牛：按教育部的评估结果，北大第一，南开第二，复旦、人大第三，再下面就是几个大学互有波动起伏，各有各的特点。

北大历史学系的学科体系最完整，实力强大而且均衡。我们的中国史从古到今各个断代（从先秦到近现代），都有全国名列前茅的学科带头人，你要说得出全国每个断代的前三名，这里面必定有北大的，很多甚至第一名就是北大的，还有前两名都是北大的。外国史，像美国史，目前全国最好的前三名都在北大。美国史原来最好的是在外校，后来转到北大来了。我们又从国外引进了美国史专家。其他英国史、法国史、德国史、日本古代史，我们也都是最好的。

南开大学的外国史比较好，八九年前与北大差不多，现在有点差距。这些年，他们的老人退了，中年的带头人走了几个。他们比较强的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经济史、美国史、拉丁美洲史、日本史，但欧洲史不行，非洲史也没有。

复旦大学的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在思想文化史方面，比较强。经济史有一个人做得不错，叫朱荫贵，是我的同学。古代史一直是他们的弱点，外国史也是他们的弱点，他们的古典学、古希腊罗马史很不错，其他的世界大国史都不太行。他们对于中国现状这块的研究还可以，那就不属于历史的范围了。

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古代史力量也比较弱。在清史研究方面有一大批人，这些人里也是做晚清史的比较多。在我看来，晚清做到

现在这个程度，也就没什么好做的了。中国近现代史有点人，外国史力量比较薄弱。

南京大学在传统上历史学科比较强。外国史原来做得还不错，特别是英国史和国际关系史。现在英国史的带头人钱乘旦教授到北大来了。中国古代史的刘迎胜教授到清华去了。他们的中国近现代史重点是民国史，南京保存着国民政府的一批档案嘛。

武汉大学的历史系也是传统的强系。世界史和中国史还算平衡，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外国史，都有些力量，但现在都不太突出。只是欧洲中世纪晚期有比较突出的。原来他们比较强的是魏晋南北朝，现在在全国也是数得着的。中国近现代史越来越没有特色了。

中山大学原来隋唐史很强，现在是清代以来的这段历史比较强，他们把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大量引进田野调查什么的，比如宗祠啊、寺庙啊，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历史，比较好。研究这些的人在历史学系，不是在人类学系。中美关系史方面还有几个人。中国近现代史也可以。

四川大学的中国古代史原来是不错的，近现代史也还不错，现在也有点衰落。

东北师范大学的古典学是全国第一，日本史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要研究日本史，东北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都是可以考虑去报考的。

历史地理学要数复旦大学强，但是葛剑雄、周振鹤都已成老教授了。现在的新生代是辛德勇教授他们这些人，属于“60后”。史念海是陕西师范大学的，是辛德勇的老师。如果老师强，就能带出一堆弟子。

北京师范大学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以及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有几位做得不错。外国史不太强。首都师范大学的强项是世界史和敦煌学。华东师范大学强项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和冷战国际史、

中苏关系史。华中师范大学的中国近现代史比较强，研究商会有特色。

现在中国大学的历史系相当多，几乎每个大学都有历史系。2007 年申报重点学科，一般其他学科就十几个，历史学科一下子报上来 37 个二级学科，都认为自己够重点学科，最后评上了十几个。

陈：这么多历史系，师资来源怎么解决的呢？

牛：可以说是参差不齐，鱼龙混杂。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来说，不论国内国外的还是我们自己培养的，应届博士毕业生一律都不留，先出去历练。现在我们引进的，一般都是已经有显著成就者，包括 5 位外国学者。

陈：从我现在的成绩来看，再努一把力，是有可能考上北大的。即便我的成绩能够上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法学院，您是否也认为在本科阶段，上历史系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牛：史学有一个好处，是知识的综合，智慧的结晶，适应性比较广。世上万事万物都有它的历史。既可以有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又可以有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甚至有自然科学史、化学史、医学史。疾病史、精神病史、科技史、消费史，都可以成为研究的对象。哪个学科都有史，无非就是那个学科过去是怎样发展的。有兴趣，你可以研究计算机的历史、互联网的历史、网站的历史、推特的历史。还有一大领域是人物传记，古今中外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人物。

在本科阶段，我通常建议选基础学科去学，最好是在文、史、哲、数、理、化这几个学科中选择，这样将来发展的余地比较大。如你学数学，那你将来去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都行，底子都很好。如果你报了一个计算机专业，除了计算机，你别的都搞不了。

从文、史、哲这三门中选择，你要考虑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如果你的特长是比较善于思考，特别是抽象的思考，总喜欢从事物中想出一些道理来，你可以考虑哲学。如果你的特长是比较善于形象思维，能构想很多的人和事，想象出种种并无记载的情节与故事，那么你就选择文学，搞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都可以。如果你比较善于逻辑推理，发现一个事与一个事之间的联系，有根有据地推断出各种人与事的关系，寻找其存在或者不存在的证据，那么你就可以考虑选择史学。史学不欺负人，真下了功夫却一无所获的人，是没有的。你花多少力气，会得多少回报。有的学科，不怎么花力气，取巧也是可以的，但历史学科不太容易取巧，不下功夫找资料、读史料，就出不了成果。有的学科，人精明和不精明是很不一样的，譬如文学就是这样，没有点天分不行，但历史学不是这样。你人精明，又肯用功，你就会写出很多精彩的论著，如阎步克的论著就包含着很多文化的、思想的火花；你不算精明，但下了笨功夫，把这个事的来龙去脉给说清楚了，也能出成果。你既不精明又不用功，别人看到的材料你没看到，就在那儿瞎说八道，那是很容易被别人揭穿和推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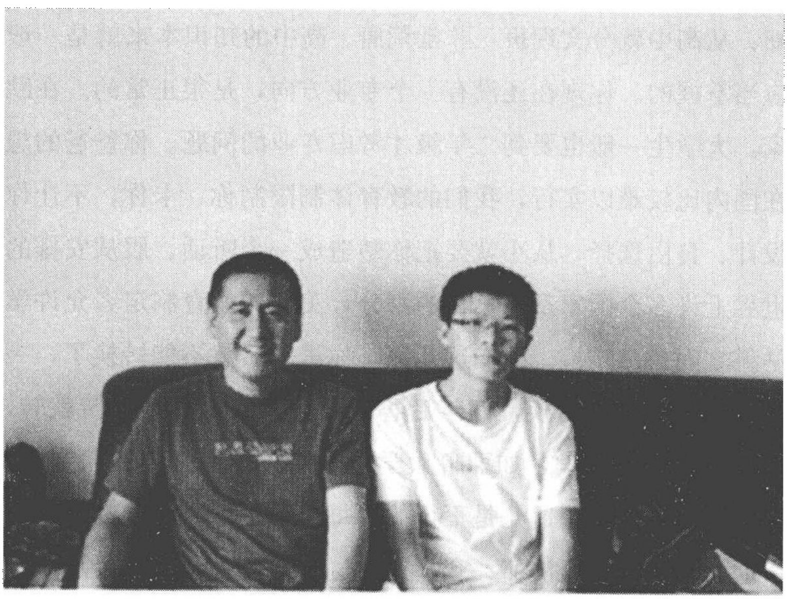
你在选择历史学科之前，要问问自己，对于历史上韩信、张良、关羽、岳飞这些人，是不是感兴趣？对于外国的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俾斯麦这些伟人，是不是想有一些深入的了解？别人讲的“大跃进”、大饥荒等等，你是不是竖着耳朵听？历史学家就像一个检察官，通过撒网侦察，比对证据，找出线索。胡适说，史学的基本方法是“拿证据来”。你不用讲得那么悬，口吐莲花，你只要拿出证据来。哲学比较形而上一点，需要有点天马行空，抽象构想，史学就比较实在一点，大胆想象之后，还要小心求证。本科学文、史、哲，将来如果改了主意，比较容易转学政治、法律、行政管理等其他学科，或者一些热门学科。

陈： 谢谢牛叔叔，我听了您的话，收获非常大。

学习社会学有什么用处?
——郑也夫教授访谈录

郑也夫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作为专业社会学家，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建立在自己真实的生活观察中,对社会发展持冷静和批判的态度。他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观察和分析中国当下处境中的真实问题，从体育比赛到汽车文化，从城市发展到道德建设。其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寻找社会发展的平衡点,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与利益。



被访者：郑也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访谈时间：2009 年 8 月 7 日

访谈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郑也夫教授寓所

陈：郑伯伯，您好。我开学就要上高二了，面临着一个上文科班还是上理科班的问题。我爸爸想让我大学读理科，研究生再读文科；我的老师主张现在就上文科班，这样更有机会考进名牌大学。我现在对于未来学什么专业还没有一个明晰的想法。您认为我应当上什么班?

郑：从高中就分文理班，非常荒唐。高中的知识本来就是一般人都应当掌握的。你现在还没有一个专业方向，是很正常的。在欧美国家，大学生一般也要到二年级才考虑专业的问题。你爸爸的想法，在国内比较难以实行，我们的教育体制限制你、卡你，不让你自我设计、自由选择，从小就要把你塑造成一个听话、服从安排的人。世界上许多个国家都有学科的划分，美国的教育制定者允许学生在学科之间自由转换。我们这儿呢，你进来后就不能转换了，一个猛子就是四年，要转换，四年后再说吧。人家那儿，说转就转，你只要考进了这个大学，如耶鲁大学，随便转个系是不受限制的，随时可以转；但在咱们这儿是不行的，每个系、每个专业都有人数限制，这完全是计划经济那一套，其实这个专业多几个人，那个专业少几个人，有什么关系啊!

不论你现在上什么班，将来总还是有办法弥补的。学科的划分不是天经地义的，是一种人为的划分，人为的划分肯定有许多主观的、勉强的地方，是差强人意的。其实越是大师，就越不管这些，很多大师都是跨学科的，对许多学科都是很通的，没说我是这个家、那个家。他的思考，面对社会，面对问题。马克思自白：“人类的一切我都要懂。”他确实是懂得很多很多的。学科是要划分的，

不划分怎样来教学生？怎样来分门别类地积累和传承知识？但这种划分千万不要把当事者（老师、学生）搞糊涂了。事实上很多人就是被这种学科划分搞糊涂了，觉得进了这个门，就是卖给这儿了，我就是专注这一块儿，别的东西都不需要看，不需要过问了。其实，你要面对现实中的真问题，需要有多个学科的知识、工具来帮助你解决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公正问题、医疗保障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多个学科知识的，如社会学、经济学、医学政治学等等。你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很难说这个问题究竟属于哪个学科，这些活生生的现实问题与学科不是对应的。大师不受这些约束，大一点的学者也不受这些约束，越是教师中比较平庸的人，越受这种学科的约束。中学生年纪轻，很容易被大人制定的这个学科、那个学科给搞糊涂了。

陈：我明白了。每个现实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各学科的会战；每个学科的人，也都需要了解其他学科的知识，以便融会贯通。但首先还是要对每一门学科是干什么的有一个大略的了解，先解决从哪儿入门的问题。我想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社会学，以及它的发展现状。

郑：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当然包括你们高中生，对于社会学是干什么的，都不很清楚。目前社会学系的学生，很多是捡来的。考生报其他学科，其他学科满了，转到这儿来的。别的学科内容很清楚，比如：经济学是学什么的，中文是学什么的，历史是学什么的，等等，考生都清楚；将来前途是什么，人家都明白。对于有的学科，可能不喜欢，但绝对不会糊涂。但对于社会学来说，学生自己不知道，家长不知道，中学老师还是不知道，所以我们这个学科报的同学不多，多数都是转来的。

我曾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与北京大学教书，我们这个学科招收分数也不是很高的。就人大来说，有新闻学院，这个学院的分数是

很高的，写东西写得好的人，就去报新闻，那儿录取不了，就给你调到社会学系了。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报得都很多，这些地方一般都是第一志愿，我们这儿一般都不是第一志愿，原因就是大家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我们也有责任来做这项工作，向大家讲明白，这个学科是干什么的。我们的学生，进了大学基本上要一年后才搞明白这个学科是干什么的。社会学这个学科比较庞杂，什么都研究，这个学科坐着一屋子人，一个人与一个人的差距很大，比如说我与潘绥铭虽然是好朋友，但兴趣和研究方向差距大了去了。有人研究社会阶层，有人研究家庭婚姻；这个研究老年问题，那个研究少数民族，差距特别大。

陈：为什么会出现社会学不被人了解的状况呢？

郑：社会学这个学科之所以比较庞杂，让人一头雾水，其原因要从它的历史讲起。社会科学这个概念源于19世纪初，起初是个大概念，是与自然科学相对而言的，几乎是无所不包，后来被一块块地切下来。有一种说法，一个学科比较清晰了，它就把一些问题带走了。社会中的经济问题比较清晰，就带走了，这就是经济学；社会中的政治问题比较清晰，政治学就独立出去；社会学就像是一个废品回收站，还没有被其他学科拎走的，就在这里了。另外像人口学、民族学……凡是成熟一点的，就另立门户了。所以可以说，现在社会学研究的，都是相对来说还比较不成熟和比较新鲜的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厄运。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的社会学还是比较兴旺的，出了一大批人才，最有名气的是费孝通。1952年“院系调整”，社会学被认定为“资产阶级伪科学”，整个儿被取缔了，原有的社会学人才也都改行了。一直到80年代初才恢复这个学科，招本科生的时间更晚。因此不像中文、历史、经济、法律那些学科历史比较久远，社会学再

生之后，让人们知道也就是十几年、二十几年。

社会学是什么？凭感觉去把握容易，从理性上去回答不容易。我们可以从三个路子去认识社会学是什么。

一、社会学的古典大师怎么说的。杜尔凯姆强调，整体不是部分的相加，他重视对社会性的认识。他说：“社会事实有多少种，社会科学就有多少项目，社会学就有多少分支。”韦伯说：社会学“是力图理解和解释社会性行动的一门科学，目的是对社会性行为的过程和后果做出说明原因的解释。”

二、社会学教科书是怎么说的。我们从其目录可以形成一个基本的判断。《社会学》教材版本不计其数，但其章节目录大同小异，大致包括：社会学是什么，社会学研究方法，文化，社会与社会结构，社会互动与社会网络，社会化，群体与组织，越轨、犯罪和社会控制，社会分层，阶级与贫困问题，种族，性别、年龄与健康，家庭，教育，宗教，权力、政治和政府，人口，城市化，社会变迁。

三、看看当代社会学家在做什么，也就是看他们的作品。当然，中学生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以后你如果有时间慢慢涉猎一些，就找到感觉了。通过接触，对社会学是什么的把握，要比我刚才给你做出的干巴巴的概括对你自己更有意义。所以我不能不给你做点概括，但不是很愿意做。

陈：请您谈一谈，学习社会学的用处有哪些？

郑：我把你的问题转化成两个问题来回答：一个是社会学对社会有什么用处；另一个是学习社会学对于学生的就业，有什么具体的帮助。

学习社会学首先是学习一种思考方式、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一位大社会学家曼海姆说过：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确信——准确地说，传统社会的精神领域里的特征是确信；近现代社会的基本特

征是怀疑精神，而且这个基本特征越来越突出。为什么传统社会发育出了这样一种特征？因为那个社会是个静态的社会，变迁很小。在一个变迁很小的社会里面，父辈的经验大致上说可以指导你的生活，因为你所生活的社会和你的父辈生活的社会相比没什么大的变化，没什么大的差别。经济学家爱说："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这句话放在传统社会里面正确的程度更大一些，放在近现代社会里面，就不再是这么回事了。"阳光底下有新鲜事。"我们越来越多地遭遇到一些新鲜事，真的是太新鲜了。比如说同性恋可以结婚。同性恋也不是什么阳光底下的新鲜事，以前就有。有人说这是一种生理现象，但是过去没有同性恋可以结婚的吧？可能再过不久就克隆出我们的兄弟姐妹来了。这是新鲜事吧？绝对是。剧变的社会导致人们的思想方式、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社会学捕捉和认识这种变化，强化了一个概念，叫反思。反思是现代社会的特征。

社会学是一门帮助我们解释周围的事情的学问。人要是对周围的事情丝毫不作出解释，会精神分裂的。你绝对要求很多解释，这些解释能够使外部社会在你的脑子里有了秩序，不再是混沌。人类有这样一种内在的需求。我们说，有一种需求就会有一种供应。关于社会问题要讨得解释，谁是供应者啊？我们就是干这个专业的。与江湖术士不同，他们只有三言两语。社会学这儿可以是从根到梢、从头到尾地来给你解释。我们是学院派，我们跟他们的差别是我们不光要给说法，而且说法要有更多的根据，我们要提供一些更扎实的、更有根据的"理论"。

社会学是一门视野比较开阔的学科。近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分工越来越细致，到了画地为牢、老死不相往来的程度。它给我们带来的收获是很大的。亚当·斯密说要做一根针有多种分工，自然提高了效率，可是最终造成人们眼界的狭小，这个弊病也是很大的。而我们这个学科，遭遇到这种病

症的几率比较低。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当中，差异像社会学这么大的，可能就是心理学了。差异这么大，姑且可以说这个学科不成熟。但我同时也觉得，差异大对于学科中人来说，不失为一种好处，没有很大的约束。如果走到经济学的程度，不上数学公式就别想评教授，否则根本就进入不了经济学的核心刊物。而我们学科的专业化没这么强，门槛没那么高。社会学给我们的自由度非常大，给我们思想的自由度非常大，给我们作为一个思想家的自由度非常大。置身这样的学科，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可以视为一种福音。

曼海姆说，多数人一生当中，总有一个时段，其精神处于悬置状态。哪个时段呢？青春期。那时其精神处于狂执期，他不愿意领受父辈告诉他的很多道理。他要去发问：这事情怎么这样啊？怎么如此不公道？如此荒诞？这和他的前途可能有关系也可能没关系。但是这些疑问使少年的内心变得很不安定，他怀疑父辈对他的很多教导，他要重新审视。曼海姆说，这是人生一个阶段的特征。当青春期度过以后，当他们找到了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以后，他们就走出了那个悬置的状态。他可能成了一个体面的白领，过循规蹈矩的生活，思想不再像以前那么疯狂，那么好怀疑。那一段岁月对他们有什么用呢？那段精神狂执期，拓宽了他们认知的视野。尽管以后循规蹈矩，但那段精神上不安分的岁月，帮助他们吸收了很多异质性的知识营养，对他们一生好处莫大。多数人一生只悬置这一段时间；只有少数人，很稀少的人，终生精神上处于悬置状态，不太是滋味，但没办法。这一小撮人是怪物，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这些人很难踏实地依附在某个观念之上，和它结成一体，虔诚地笃信某种观念，终生不渝。相对于经济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是离“知识分子”最近的一群人。

对于今后不做社会学专业研究的大学生来说，学习社会学有什么用处呢？这个学科还教你做一些社会调查，这是看家的本领。这

个本领今后可以服务于多种工作，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对社会调查的需求越来越大，原因还是前面说的，社会处于剧变中。所以，整个社会有一种旺盛的需求，就是搞明白我们社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商家要搞明白就要做商情调查，商家对社会调查不是特别在行。统计学是一门学问，而统计学必须跟对社会有深刻理解的人结合，如果对社会没有很深刻的理解，运用统计学时连需要调查的条款都不知道。商家有这样的需求，政府有这样的需求，公民、媒体都有这样的需求。我们的媒体做的工作差得远，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大批的学过社会学的人才进入媒体，把社会调查搞得更像样。所以说，日后你不做社会学的专业研究的话，也还有这样的用处。

再从就业这个层面上看。根据我个人了解的情况，优秀院校的社会学学生毕业以后的出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大概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留下做社会学教师，搞社会学研究，读博、出国深造。现在没有博士学位的人，已经不可能在高校担任教职了。我的一个博士毕业的学生，找到工运学院当教师。这个学校今年招了三个老师，都是博士，好学校的学生能进入这样的学校都认为是阿弥陀佛了。另外一部分人是做公务员，大概比历史等专业的人比例上要多一些。还有一部分人做新闻媒体，现在新闻媒体不是特别愿意要学新闻的，而是希望一些非新闻专业的人加入，综合性媒体里面也有一些专业分工，这个人负责社会问题、那个人负责经济问题……所以也要选一些新闻媒体专业外的人。当然还有相当数量的学生下海，进入商业。

陈：我看大学里除了社会学专业，还有社会工作专业，它们是什么关系？

郑：好一点的大学，社会学系下面通常有社会学、社会工作、人类学三块。凡是有社会学专业的，一定有社会工作专业；有些大学只设了社会工作专业，还没有能力开设社会学专业。所以社会工

作专业的毕业生要比社会学专业的毕业生人数更多。在国外，需要大量的社区工作者、民间社团工作者、社会福利和慈善工作者、基金会的管理人员等等。在中国大陆，公民社会、民间社会这一块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所以需求量远不如国外。但发展这一块是一个方向，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所以这一块是有很大发展潜力的。

陈：请您介绍一下中国社会学的前沿分支和热点问题。

郑：应用社会学，有这样几个热门分支。一个是教育社会学。教育的问题太大了，透视教育，不是光靠教育学家就能解决问题的，需要有多学科的参与，社会学家关心教育问题，就是教育社会学。教育社会学把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系统，纳入到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目前的研究重点是教育机会均等和社会公平问题，教育的社会流动性（包括纵向与横向的社会流动）问题，学校教育的扩张及全球化问题。现在教育资源争夺惨烈啊，毫无公正可言。我在全国各地跑，发现有些县长一级的干部把孩子送到主要的大城市去上学，基本都在北京、天津等城市参加高考，县里有人专门负责公关，因为各地录取学生的分数差距很大。由此可见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像刚才提到的现在社会学系本科生的毕业出路问题以及社会学教育的未来发展走向问题，本身就是社会学家的研究课题。我曾向我的学生提过，但至今还没有人去做。现在搞这一块的社会学家还很少，像我们系，30 名教师中搞教育社会学只有 1 个人。

再一个是医疗社会学。医疗也是大的社会问题，解决起来也是很复杂、很综合的问题，社会学家在里面要起到作用。在发达国家，这个学科都是比较繁荣的。现在发达国家的问题，不是吃饭的问题，多年前李强去英国后就说，英国的医疗问题是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社会学的许多专家教授都参加了关于医疗资源的分布和医

疗资源的公正合理利用这个研究。一个社会在解决了吃饭问题后，医疗问题就突出起来，就变成了社会的焦点问题，现在在中国也变得越来越突出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医疗维权和医患关系的问题，这既是一个社会实践的问题，也是一个研究的课题。

我是搞理论社会学的，我现在正在教一门课，叫做“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启示”。我自己酷爱生物学，读了一百几十本生物学著作，开了这门新课。国外有爱德华·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国内有人把我的研究称为“生物社会学”。我在2004年出了一本《阅读生物学札记》，现在补充了五个章节，包括狭义利他的生物学基础，交换的进化，美感，沉溺快乐与追求伟大，感官、情绪、理性，书名改为《神似祖先》，最近就要出版了。建议你看一看这本书，很有意思的。对比和寻找参照，是认识任何一个事物的便利甚至必要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的行为的。能够给我们最大借鉴的不仅是其他种族的行为，还有动物的行为。动物的行为方式不计其数，对我们的借鉴意义无与伦比。譬如权利的进化，这是从动物中进化来的，开始的时候是抢，后来共享，慢慢进化过来，这是一个进化的过程。生物学在基础理论提升中对于社会学有很大帮助。黑猩猩中的勾结行为，跟《三国演义》中一样。老三与谁最有可能勾结？老三与老大不可能勾结，老三最有可能与老二勾结，从而打败老大。为什么？因为老三与老二合作，利益上四六开；但如果与老大合作可能就是一九开或二八开，因为老大不认为老三对他有多么大的帮助。博弈完全是从黑猩猩那儿开始的。

除了生物学，还有心理学和博弈论，这三个学科对于社会学理论的更新发展贡献比较大。所以说，一开始学什么专业并不是最关键的。即使你在本科读生物学、心理学或者数学，只要你喜欢社会学，都可以转到社会学理论研究上来，而且有可能比本科读社会学的人作出更大的贡献。

陈：高中生如果准备报考社会学，应当做一些什么准备？高中生应该知道哪些中外社会学的大师？

郑：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就像我们刚进来的大学生，问问他们是否知道社会学的大师，都不知道。本来，高中是应该设一门"社会"课程的，国外的中学生都要学这门课。在这门课中会谈到社会的收入问题、分配问题，谈到的时候就会介绍一些政治、思想、社会的知识，也会介绍一些著名的社会学家以及他们怎样看待收入、分配等问题。国内现在这些知识没有下放到中学，中学生对于这些知识就无从接触。现在"科举"太残酷，造成了学生全都埋头在考试中，除了课本，其他东西都不关心。中华民族最大的损失，就是学生在中学六年中不走入社会，不走入生活，不看闲书；不进入，就不会有很多的感触。如是，这些学生对于书上的东西也是不能真正理解，书中的东西是要涉及人生、涉及社会，这些孩子没有进入社会、进入生活，对于许多东西不理解，只能是硬背下来。教育的问题太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让中学生从课外知道社会学的大师就太苛刻了，要想知道就需要中学生自己花费很大的精力。只知道几个人名——马克思、韦伯、费孝通，光知道这几个人也没有什么意义，需要把这些知识通俗化，变成一些教材。如果让中学生读原著，是比较苛刻的。还是要把他们的主要观点写进教科书，这样，中学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有些书，像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本身就很通俗，中学生也可以读懂。我从来就认为，我们老是小看中学生，实际上很多科学的原理，中学生可以读懂绝大部分，只是那些数学公式比较多的可能看不懂。除此之外，都可以讲清楚，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我们总是认为这些太深太深，胡扯。

在给中学生编的"社会"课中，应当讲社会基础分工、家庭、

性别、阶级、阶层、种族、民族、社会化，可以将这些理论通俗化地介绍给学生，里程碑式的人物做一些介绍。除此之外，还可以给中学生编一个读物，选《共产党宣言》的一些章节、韦伯《城市论》的一些章节、《乡土中国》的一些章节，等等。在30年代有《中学生文库》，给中学生读的书相当多，而现在竟然没有这样的丛书，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呢？

现在中学既然没有“社会”课，也就谈不上需要做什么特别的准备。但是你们学生应当对自己做一个评估，对于社会学是不是有兴趣，真正有兴趣的人才能学好这门专业。你要问问自己，对于社会问题有没有好奇心？或者说，你是否关心社会热点问题？要有认知意义上的关心，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正义感。如贫富差距怎么这么大啊？可以是一种愤慨；但是还要关心其由来和解决的办法，为什么中国大陆两极分化这么迅速，基尼系数超过了新加坡等其他华人地区？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对于社会问题，有的同学经常可以成为同学聊天中的“侃爷”，消息灵通，分析有条理，这个同学就适合学社会学。

陈：我看到过您写的足球评论文章，作为一位社会学教授，您为什么又写了那么多的体育评论呢？

郑：这不矛盾。体育是多数男性的兴趣，我中学、大学的同学中都有一帮人酷爱体育，而且终身酷爱。直到现在，这些同学还组织球队进行比赛。我曾经冬泳，也结识了一批冬泳的朋友。当然，爱好体育包括参加体育运动、观赏体育运动和评论体育运动。我的朋友大多不写评论文章，在文化学者中写这种文章的人也是极少的。爱好体育不一定要写体育评论，口头评论则是必不可少的。我写评论也是机缘巧合，但我要继续坚持写下去，做一个“全栖”的业余体育爱好者。我写体育，很多时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完全是借体育谈社会呢。中国体育中的问题，是地道的社会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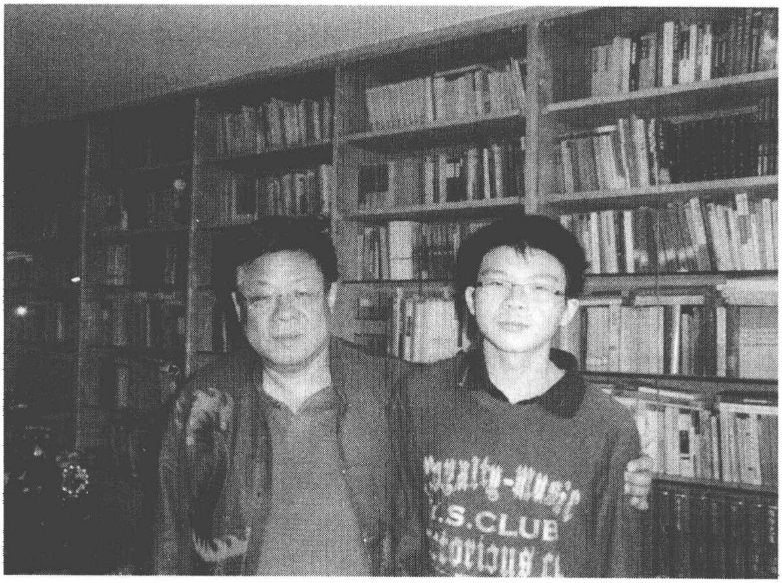
体制问题。听说你乒乓球打得不错，这很好，青年人不仅要勤奋读书，也要勤奋锻炼，要发展出一个强项，终身保持下去，它可以帮助你调节身心。当然最要紧的是，体育本身包含极大的乐趣。

陈：今天您谈的内容对我很有启发。感谢您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为我解惑答疑。再次向您表示感谢。

“以学术为志业”，政治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张鸣教授访谈录

张　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关于历史观察与时评多有论著，总能把历史堆里那些已经被遗忘的事件诙谐地表达出来，原汁原味地端到读者桌上。他的随笔集都是以讲故事为主，文字浅如白话，幽默有趣，然而尖锐。说古是为了讲今，历史只是材料，当下才是真正的落脚点。



被访者：张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访谈时间：2010 年 1 月 28 日

访谈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张鸣教授寓所

陈： 张叔叔，请您先谈一下，大学中的政治学专业与我们在高中学的政治课有什么不同？

张： 政治学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分支，有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高中的政治课则是一个大杂烩，既有政治学的一些知识，也有哲学与经济学的一些知识。

在教育部规定的学科体系中，政治学属于法学门类下面的一级学科。政治学所包括的二级学科是：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原来还有一个行政学，现在调至管理学门类了。这种分类是很不科学的，也是一个大杂烩。在国外，政治学通常包括政治学理论、本国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制度、国际政治、行政学、市政学等。

陈： 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张： 对于政治的研究起源很早。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管子、老子、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都有一些关于政治、统治、治理的言论。在古希腊，政治学的创始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古埃及、古印度轴心时代的哲人对于政治的思考，也都有文献流传下来。

近代的政治学理论，通常都会从马基雅维利和布丹说起。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树立了现代政治学的研究重点——针对政治机构和政治参与者做直接的观察，他的著作《君主论》，被认为是

政治学从基督教思想体系中完全分离的一个里程碑。法国的让·布丹则对主权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他在《共和六书》中所阐释的主权理论，促进了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在他们之后的政治思想家可谓群星荟萃：有英国的霍布斯、洛克、约翰·穆勒，法国的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德国的孔德、马克思，美国的杰斐逊、麦迪逊等。

政治学进入大学，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和系所，是以 19 世纪 80 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政治研究院为标志的。因倡导国际联盟获 1919 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威尔逊总统，就曾是最早的专业政治学者。他于 1886 年获得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与政治科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国会政体：对美国政治的研究》。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欧美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政治学专业已经建立了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完整序列。1919 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创立"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关系学院"，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政治系。

陈：政治学科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大学的？

张：1902 年清廷制定《钦定大学堂章程》的时候，将大学教育分为七科：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其中，"政治科第一"，"政治科之目二：一曰政治学，二曰法律学"。也就是说，当中国刚刚引进大学教育体制的时候，政治学的地位是很高的。梁启超在 20 世纪 20 年代曾说："当民国成立前后几年间，法政总算是最时髦的学问。除国立各校外，私立的法政专门大学等等，差不多有十几家，学生也是爱学法政的人占大多数。那动机也无庸为讳，恐怕有一半是出于想做官的心理。如今是学生的自觉心大发现了，不惟人人知道官没什么做头，而且都觉得做官是一件极可耻的事，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进化勇决的表征。但反动的结果，便不知不觉连法政这一科学问，也渐渐轻蔑起来，厌恶起来。

社会上因为政客成了坏名词，便相戒不谈政治，学生因为知道想做官是可耻，便迟疑不肯学法政。这不能不说是近两三年来一种社会病态。”

国民党上台后，实行“以党治国”、“党在国上”，党人垄断政权，也不鼓励青年人学法政。国民政府曾公布“确定教育实施趋向办法”，规定“大学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为原则”，招收新生时，各大学文法学院或学系等“不得超过理、农、工、医等学院或学系等所招学生的平均数”。这样，学习法政的大学生就日益减少了。

陈：中国政治学在1949年前后是怎样的一个命运？

张：1949年以前，政治学虽然有衰落的趋势，但还是有生机的，主要的大学里都有政治学系，政治学教授也还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到1948年为止，在全国一百余所大学中，有四十几所设立了政治学系。在其中教书的著名教授有：张慰慈、高一涵、陶希圣、钱端升、张忠绂、浦薛风、张奚若、张汇文、萧公权、蒋延黻、周鲠生、李亚农、萨孟武、邓初民、楼邦彦、吴恩裕、王铁崖等人。

1949年以后，局面就有了一些变化，当时要求教政治学的教授们接受思想改造，“洗澡”、“割尾巴”。到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政治学就成了一个“反动学科”、“资产阶级伪科学”。苏联当时没有政治学系，只是在法律系开设“国家与法的理论”、“国家与法的历史”等课程，所以中国就紧跟苏联“老大哥”，取消了几十所大学中的政治学系科。

一直到1960年，毛泽东决心与赫鲁晓夫分道扬镳后，教育部门才在若干大学中恢复政治学系。到1964年，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决定，确定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三个国际政治系。但接着就是“文化大革

命”，所以1949年以后的30年，政治学基本上没有获得生存的空间。

陈：1978年以后，中国政治学是否重新恢复了生机？

张：1978年以后，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恢复了，政治学当然也要恢复，但是它的命运却是最坎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社会学所，是由费孝通担任所长，因为他是国际知名的社会学家。在80年代，政治学所还是挺有气象的，但在1989年后，政治学科又差点被取消。当时社科院有这个动议，后来是各个大学搞政治学的人力争，所以现在有的学者说，这个学科是我们保下来的。每次政治学会开会都有人这样说，我的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陈：现在的政治学，主要研究一些什么问题呢？

张：现在政治学比较时髦的是“维稳”。严格上讲，“维稳”就不是一个学术研究，而是一个政治研究，或者说是政府对策研究。这种研究学术上的意义就不是很大。还有一种研究，看上去好像很专业，其实是一种“伪专业研究”。有个著名的学者研究两个村子，一个有宗族，一个没有宗族，最后的结论是：有宗族的可以提供公共产品。你研究半天，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宗族就是为了向族人提供公共产品的，否则要它干什么？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常识性的问题。还有许多关于村民委员会选举的研究，你不做这种研究，这些结论我们也是知道的。你的研究不能给人们带来新的启示，徒有一个专业研究的外表，有什么意义呢？

像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这些都属于政治学的边缘学科。在政治学科整体倒退的情况下，思想史、制度史方面也倒退了，现在看不到像样的论文、像样的专著。现在的文章和著作，在整体水平上还不如几十年前萧公权、陶希圣、钱端升等人的水平。我最近清理私人藏书，淘汰的书里面就有一些这方

面的书籍，比如美国的研究、美国政治的研究、中东政策研究等等，一点意思都没有。

政治学的核心部分是对于本国政治制度的研究，在美国就是美国政治制度研究，在中国就是中国政治制度研究。制度是指实际上行之有效的行为规则，而不是纸面上的规定。当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与纸面上的东西风马牛不相及的时候，仅仅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条文来研究中国政治，又有什么意义呢？西方政治学的一个热点是选举研究，现在我们连竞争性的直接选举都没有，怎么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村民委员会根本就不是一级政府，而是所谓“自治组织”，村民选举村委会主任就好比小学生选班长，以此作为当下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岂不是荒唐？

现在作为一个政治学者，如果老老实实做学问，你就肯定会被边缘化。现在是只看数量，不看质量。你不迎合潮流、迎合主旋律，什么核心期刊的文章，重点项目的负责人，都没有你的事。总体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整个学科处于严重萎缩的状态，如果没有一个大的转型，就看不到光明的前景。

如果你有决心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以学术为志业”，政治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正因为中国政治学还是一张白纸，所以比其他学科更有机会作出学术上的较大贡献。

陈：在您说的这种现实情况下，如果我真有心读政治学，应当怎么做呢？

张：在本科阶段，选好的专业不如选好的大学。上大学，无论读什么专业首先都要选择好学校；而要上好的学校，就不能太强调专业了。比如说北京大学的传媒专业，就很一般，但进了北大你就可以学自己想学的东西。关键是北大的氛围在那儿，学校的图书馆好，总有一些好老师可以碰到的，你在别的地方就没有这种机会。

我对大学是这样划分的：一流学校有一批好老师，二流学校有个把好老师，三流学校一个好老师都没有。我的观点是，不管学什么专业，一定要上一流学校。为什么高考这么重要？你考进好学校，四年的大学生活就会很愉快、很充实，学点真东西；进不了好学校，这四年就像受刑一样，苦哈哈地受煎熬，就为了混一个就业的资格。

真正想搞政治学研究的人，不一定在本科就要上政治学系。在本科阶段，不妨先从文史哲入手。特别是好学校，在文史哲上有些老底子，再找上几个好老师，你可以个别地跟着老师来学，跟住导师。文科主要是靠自己看书，以自学为主，有个好老师可以点拨你一下。整体上说，现在要依靠学校的课程体系来掌握政治学这门学科，你是指望不上的。

最近有个新闻，曾经在人大学过金融的一个学生，事业有成后给耶鲁大学捐了一大笔钱。他为什么给耶鲁捐钱，而不给人大捐钱？他认为他是在耶鲁学到了真东西，而在人大没学到什么东西。这两个学校教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反差很大。所以你如果真的想在政治学领域深造，恐怕还是要到国外去读博士。

陈：最近有几位叔叔阿姨对我妈妈说："为什么不把你儿子送到国外读大学，还参加什么高考？"是不是越早出去留学就越好呢？

张：那倒不一定。从历史上来看，第一批最早留美，去美国读大学的，到后来成为大师的人并不多；第二批出去的人，像萧公权这样的，在国内读大学，就很厉害，他们在国外也是相当厉害的人，萧公权的著作在国外就是经典。为什么这些人比较厉害？他们在中国受教育扎实，学明白了再去美国，这样他们到美国有两种优势，第一是中国文化的优势，英语练得也不错，这样就可以看清楚两边的事。后来有些人出去，读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都很用功，就是出不了大师，中国文化的底子薄，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现

在的大学生与我们不一样，英语的环境也好，学生也重视，所以他们的英语一般不会太差，所以把中国文化的底子打好，就显得更加重要了。不要这边不扎实，一出去就忘了，那边又学不明白，变成两头落空。要把母语和本土文化资源视为一种财富、一种资源，至少不要成为一种包袱、一种负担。

陈：如果我准备报考政治学，需要做些什么准备？

张：真要学，要准备的东西还是很多的。自己在课外要争取多看一些东西，要知道政治学是怎么回事，要了解政治、国家、民主、自由这样一些基础性的名称与概念，要看一些西方政治学的元典。

陈：高中生能读懂西方政治学的元典吗？

张：可以读懂原著，没有问题，越早的政治学著作越容易读懂。早期的著述都是不分学科的，而且道理都很浅显，不分学术语言与普通语言。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东西，反而好看懂。汉密尔顿、麦迪逊写《联邦党人文集》，托克维尔写《论美国的民主》的时候，大学里还没有开设政治学，他们的语言都非常通俗易懂。后来的政治学教授，喜欢用复杂的学术语言，把原创作家的东西分为原理、命题、推论等等，就越来越复杂了。

在托克维尔的时代，世界上只有美国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他去美国转了一圈，写了一个考察报告。他也没有问卷，也没有调查统计、回归分析等，也没有公式、框图等，什么都没有，就是转了一圈，跟玩似的，就说清楚了美国的政治制度，而且到现在也不过时。这就是魅力，真正的学者的智慧。像本尼迪克特写的《菊与刀》，他连日本都没去过，找了些人访谈，就写出了一本研究日本的名著。社会科学走到后来，有过度专业化之嫌，非得有许多公式、数据才行。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现象的，人类现象有时又是无

法测量和数据化的，所以出现了问题。过分强调原理、公式、数据化这一套，反而弱化了学者的敏锐观察和真知灼见。

还要看一些中国的元典，如四书五经之类的。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都是知识青年，他们从北京带来了一些书，像楚辞汉赋等等，还有一点史书，我都看了，当时看得有点累，但是也能看懂。研究中国政治，一定要了解中国历史，不仅要了解近代史、现代史，也要了解古代史。中国的二十四史，前四史是最好的，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既可以当史学著作来读，也可以当文学著作来读，文笔也好，立意也高。

我后来发现，不论搞文科哪个学科，都要有扎实的历史学功底。你了解了中国的先秦和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以后各学科的发展，你才能搞清头绪。打好历史基础，有助于摆脱教科书体系对于高中生的思想束缚。我们的教科书不好，太概念化，它是一种标准答案式的教育，让你脑子里只记着标准答案。多读元典和史书，你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在大学里，你应当自觉地去学习，自己去探索自己的答案。这是文科的正途，这样你就上道了。如果到大学后还是去迎合应试教育，光会背书，考试你能拿高分，但实际上你脑子里没有东西，脑子完全被僵化了，那你就废了。我女儿的大学同学，进大学几年了，还是高中生的学习方法，那怎么行。进了大学就要多读书，先让自己的思想充分地发散开来。国外要求大学生读的参考书特别多，国内有的大学生死啃一本讲义就能拿学分，这样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素质怎么会一样呢?

实际上高中的教育就应当向大学靠拢，但现在是反其道而行之。复旦大学有一个生物老师说，中国学生，理科很好的学生，就会做题，对于基本原理不屑理解，在我的课堂就打不了好分。我这儿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个人都习惯找标准答案，还像中学生，这怎

么行呢！

陈：高中与大学的教学方法，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张：高中教学是讲面，要给你们许多个知识点，强调你要牢固地掌握这些个点所组成的知识面。而大学是要形成一条线，要你选择一个方向深入下去，到做博士论文的时候，能由自己来开创一个新的知识点。从本质上讲，大学是要靠自己学的，怎样找参考书，怎样比较不同观点，怎样给出自己的答案。但现在的老师为了省事，给你找出重点，归纳一、二、三，让你背，进展非常快，你也不用动一点脑子。最好的方式，是能点拨你自己去读书，引导你自己去找答案；而不是我告诉你，就这样，你记住就行了。进了大学以后，你要通过自己读书，把教科书灌输的一些东西去掉，重新建立自己的一套东西。

陈：现在大学本科学政治学的人，毕业后的就业状况怎样？

张：中下，不算最坏的。他是“万金油”，好的学校还行，差的学校就不好说了。考公务员也没有优势，其他的就是进入新闻、出版行业，等等。干本专业的少，学政治学的谈不上什么本专业。

陈：您对于学文科的高中生有什么建议？

张：对于高中生来说，不要有什么框框，文科生或者理科生；高中生就是高中生，高中生是打基础的，什么都要学点，什么都要懂点。你要是爱好文科，你可以考文科，但理科也不能太差。你不要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境地——我的知识有残缺，数理化生实在不行了，只能考文科了。高中不要偏科，凡是高中生该学就都要学。我什么都能做，但是我有自己的爱好，所以才选择文科。

选择了文科，一定要学会自主学习，学会看书，学会做笔记，学会总结归纳。要把读书作为自己的兴奋点，读书时能够忘掉一切，读书有收获时会有发自内心的愉悦。一定要多看书，读书无禁

区、无界限，没有什么不能看的，也没有什么不该看的。一定要变成一个“万金油”，先打好一个宽泛的基础，这样以后才能深入下去，不断往前走。做学问好比挖坑，坑挖得越大，才能挖得越深，一个狭窄的井筒子是挖不深的。不管干什么，我首先是读书人，我经商也是儒商。读书带给我的愉悦，是金钱、地位、名誉等等都替代不了的。这样你就进入了一个真正的读书人的境界。

陈：谢谢张叔叔的教诲。我想，自己将来不论做什么，首先都要能够享受读书的乐趣，并从中领会做人、做事的道理。

第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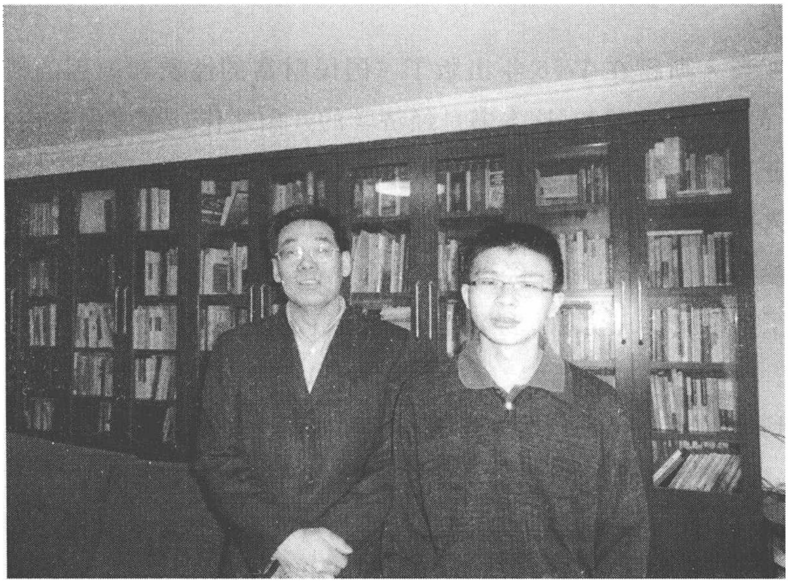
经 世 之 学

应用类文科

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关系
——朱善利教授访谈录

朱善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微观经济学、价格与资源配置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管理经济学、企业融资与治理制度经济学。因其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取得的突出成果，朱教授获得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颁发的“第四届高校青年教师奖”一等奖，入选教育部首批“跨世纪优秀人才”，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被访者： 朱善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访谈时间： 2010 年 3 月 7 日

访谈地点： 北京市昌平区陈鸣悦家中

陈： 朱叔叔，请您介绍一下经济学这个学科。

朱： 经济学的产生，公认是与市场经济相关的。现在讲经济学，通常是从亚当·斯密开始讲。在亚当·斯密之前也有人涉及经济现象，但并不构成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所以我们就说现代经济学起源于亚当·斯密。如果研究经济思想史，就要讲到亚当·斯密以前的人。

亚当·斯密在 1776 年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这本书是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论证了市场是如何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他从经济分工入手来探索市场的奥秘。早期的农业生产没有什么分工，一个人要参与生产的全过程。经过工业革命，分工就比较发达了，从而促进了市场交换和贸易。经济学是洲际贸易以及西方工业革命的产儿。

到 1890 年，英国剑桥大学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写了一本书叫《经济学原理》。这本书奠定了现代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果说《国富论》是经济学的起源，《经济学原理》就是经济学的基石。马歇尔是局部均衡分析的创始者，他研究单个市场的行为而不考虑市场与市场之间的影响。他用上升的供给曲线和下降的需求曲线分析收入、成本的变化对价格的影响——供给量随价格上升而增加，随价格下降而减小；需求量随价格下降而增加，随价格上升而减小。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建立了弹性的概念和计算弹性的公式。他得出结论，在短期里，需求是影响价格的决定性因素；而在长期里，供给或生产成本是影响价格的决定因素。

在数学里，通常是把自变量画在横坐标上，应变量画在纵坐标

上。在经济学里，价格是自变量，需求和供给的数量是因变量，按理说，价格应当是横坐标，有的经济学家如瓦尔拉斯就是这么画的。马歇尔当时却把数量画在横坐标上，价格画在纵坐标上，以后就一直这样沿用下来了。只要数量与价格是单调的、一对一的关系，其实画在什么坐标上是无所谓的。这说明现代经济学确实是继承了马歇尔的传统。从他开始，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学原理体系。

如果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开创了微观经济学，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则开创了宏观经济学。所以凯恩斯对经济学有很大的贡献，被称为“凯恩斯革命”。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只有微观经济学，没有宏观经济学。前者是从个人、厂商的角度研究经济决策以及既定数量的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和报酬理论。后者是以国民经济总过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使用国民收入、经济整体的投资和消费等总体性的统计概念来分析经济运行规律的一个经济学领域。在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是就业理论，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宏观经济学因为主要考察就业总水平、国民总收入等经济总量，所以也被称作“就业理论”或“收入理论”。

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家都信奉市场会自动调节，不需要政府干预，政府只要当好“守夜人”就行了。凯恩斯经济学认为，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需要政府来干预和调节，增加有效需求。这样，就需要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世界经济危机以后，美国的罗斯福总统是信奉凯恩斯经济学的，他的“新政”就包括通过兴建很多公共工程来增加就业。宏观经济学主要是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一些理论基础。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经济周期波动、失业、通货膨胀、国家财政、国际贸易等方面；涉及国民收入及全社会消费、储蓄、投资及国民收入的比率、货币流通量和流通速度、物价水平、利息率、人口数量及增长率、就业人数和失业率、

国家预算和赤字、出入口贸易和国际收入差额等。宏观经济学大大扩充了经济研究的领域。

每当经济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候，就会有新的经济思想产生。渡过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虽然仍有一定的发展，但变化不是太大。经济学再有发展，就要等到70年代以后了。在这时候，二战以后确立的国际货币体系濒临崩溃。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国际货币体系以金本位制为主，也有少数国家譬如中国实行银本位制，但也在向金本位制靠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金本位制就实行不下去了，这是导致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原因。1944年7月，44个国家派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开会，商讨战后的世界贸易格局和国际货币体系问题，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1945年12月，22国代表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上签字，正式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1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可以兑换黄金和各国实行可调节的钉住汇率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维持这一体系正常运转的中心机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确实带来了国际贸易空前发展和全球经济越来越相互依存的时代。但它存在一个先天的缺陷：它以一国货币（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只有靠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才能使美元流散到世界各地，使其他国家获得美元供应。但这样一来，必然会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引起美元危机。而美国如果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就会断绝国际储备的供应，引起国际清偿能力的不足。当美国的工业生产占世界五分之三的时候，美国即使有一些贸易逆差，它还承担得起，国际社会也对它抱有信任感。欧洲复兴、日本崛起之后，尤其是美国陷入越战陷阱后，出现了全球性“美元过剩”情况，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

金，美国黄金开始大量外流。到了 1971 年，美国再也撑不住了，尼克松政府被迫于这年 8 月宣布放弃按 35 美元 1 盎司的官价兑换黄金的美元“金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这样崩溃了。

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些年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很多都是源于 70 年代的研究。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国际金融学，成为近年来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许多新的理论产生于七八十年代，后来就有些停滞了，只有一些小修小补。眼下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理论出来。由于经济全球化，中国已经融入到世界的经济体系中。过去外国发生经济危机，中国不会受到影响，现在外国发生经济危机，就会对中国有影响，这是一个大的变化。还有一个就是信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业革命造就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信息革命也应当孕育经济学的新革命，现在看来还没有出现这样的突破，学术还没有跟上现实生活。一方面，经济发展催生、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学有一种使命，就是要研究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维持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相对其他学科来说，经济学现在是一门显学，它要寻找一条不断增加国民财富的道路，要帮助解决经济增长问题、扩大就业问题、价格稳定问题……

陈：请您再谈一谈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朱：中国的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国家，也落后于东方的一些国家，如日本——从地理概念上说，日本是在亚洲、东方，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说，通常把日本划分到西方，譬如说它是西方七国集团的一员。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达，经济学也发达。现在世界的经济学，不论是思想方面还是主要的理论，都产生于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经济学，现在基本上还处于学习和传播西方经

济学的阶段，还没有充分展现出理论创新的能力。

北京大学的老校长马寅初，是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他 1906 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4 年回国。马寅初在 1919 年就是北大第一任教务长，后来担任过许多教育行政与政府立法和行政方面的职务，在经济学研究与教学领域建树不太多。广为人知的是他因为发表《新人口论》而受到批判，被迫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新人口论》现在应当算是社会学分支人口学领域的研究成果。

我们北大经济系的老主任陈岱孙，是中国第二代经济学家，他一直活到 97 岁，1997 年才逝世，我们对他都很熟悉。陈岱孙于 1926 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7 年回国任清华学校大学部经济系教授。他从 1928 年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和系主任，次年起又兼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1952 年院系调整后，他从清华转到北大。陈岱孙说过一句话："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他从事经济学教育 70 年，可以说是"桃李遍天下"。但是他有关中国经济也没有多少理论性的著述，我看过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财政问题。

要到中国第三代经济学家，像张培刚、蒋硕杰、费景汉，40 年代和 50 年代初在英美获得博士学位的，才开始了建构经济学理论的工作。

现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的名誉院长张培刚，1941 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在哈佛期间，师从熊彼特、张伯伦、布莱克、汉森、厄谢尔、哈伯勒等大师，1943 年获硕士学位，1945 年获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 1946—1947 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大卫·威尔士奖"，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以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为主题的专著，后来被收入《哈佛经济丛书》。几十年后，他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但在他的盛年，却没能进一步展开他的研究。张培刚 1946 年和

1949 年两度回国，担任母校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 年“院系调整”后，却被调到华中工学院任基建办公室主任。“文革”后，张培刚重新回到老本行，但一直到 1998 年，华中理工大学经济系的博士点被批准下来，85 岁的张老才有机会成为博士生导师，带发展经济学的博士生。

在张培刚盖房子的时候，威廉·阿瑟·刘易斯后来居上，于 1954 年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他指出：传统部门劳动力无限供给构成了二元经济的内在特征，二元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取得资本的积累，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充分的转移，诱发产业结构的演变，使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最后经济由二元变成一元。由于这一理论建树，刘易斯获得了 1979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60 年代初，费景汉和拉尼斯在运用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与刘易斯模型相比，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强调，工业化过程中必须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对避免经济增长趋于停滞是很重要的。经济学家必须要提出一套理论体系，建构一套模型，才会有追随者，才会传承下去。

1947 年，张培刚博士论文获奖的时候，费景汉刚刚负笈美国，入华盛顿大学深造，于 1948 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随即转入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于 1952 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费景汉是幸运的，他后来不仅担任过美国多所大学的教授，而且有机会以自己的经济学知识为台湾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余英时 1999 年的一篇文章说：“台湾经济之有今日，当时（二十年前）都说‘六院士’，即刘大中、蒋硕杰、邢慕寰、邹至庄、顾应昌、费景汉等六人建言有功。”上述六人都是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会

组的经济学院士。

陈：大陆在 1949—1978 年期间，经济学的发展是不是基本上停滞了？

朱：1952 年“院系调整”以后，亚当·斯密、马歇尔、凯恩斯这些传统的经济学，被称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遭到取缔。在经济工作中全盘引进苏联的计划经济体系，在大学教育中也全盘引进了苏联的经济学说。当时，中国引进了大批的苏联教授和苏联教材。中国留学生也是派送到苏联及东欧国家，包括后来在中国经济学界有些影响的人，如董辅礽、刘国光等。他们都没有读博士，读的是副博士，相当于硕士。留苏出身的这些人，他们早期都是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文革”以后，他们开始打破禁锢，其中有些人为经济改革作出过贡献。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理论并不是要研究经济怎样增长的学说，他不是要建设一个社会，而是要破坏一个社会，他要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内在地孕育了导致自身覆灭的社会力量。这种学说的自我使命感，是要为推翻旧的制度奠定一个理论基础。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关于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学说，《资本论》的基本逻辑线索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商品的价值是劳动者创造的，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是分配的基础。但劳动者从他们创造的价值中只获得很少部分，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被地主、资本家等剥夺了，所以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要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剥夺者必须被剥夺。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基本的结论。这与马克思同时期以及此后占据西方经济学主流的学说不同，主流学说认为价值是三种要素创造的，资本、劳动、土地都参加了创造价值，它们都应该参加分配。

陈：1978 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学发展情况如何？

朱：1978 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学发展，还要划分为两个阶段：

1992年以前和1992年以后。

在前一阶段，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的东西，从国家领导人到研究生、大学生，都到这里面去汲取营养。过去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吃香了，教西方经济学的成了大热门。像陈岱孙、厉以宁老师都是教西方经济学的。80年代的经济学研究生很容易出成果，只要你引进一个西方经济学概念应用于中国实际，就可以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这种文章，教政治经济学的老师写不出来。80年代中期出了一个“马丁事件”，就是个别老经济学家与意识形态领导人联手，想要遏制这个势头，但是根本遏制不住。

1992年以后，过去所谓的“西方经济学”，重新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正宗。此后经济学的热点，是所谓“转型经济学”。苏联与中国过去的那一套经济体制，是彻底的失败了。这些国家应当怎样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转型？是“休克疗法”，还是渐进改革，哪种方法更有效？转型涉及经济的各个领域，像所有制改革问题啊、金融改革啊、“入关”“入世”啊，等等。在转型期，中国的经济环境变化太大，经济结构变化太大，因此很难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个系统、定型的理论。从国外来看，也要等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有亚当·斯密那样比较成型的经济学说出现。在此之前，还有一些经济学者，像重商主义者，对于斯密曾经有过一些影响，我们现在就不谈他了。中国转型经济学，现在也就是处于类似重商主义这样的阶段，还没有出现中国的亚当·斯密。

一直到上一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1997年、1998年，除了少数情况外，中国大学教科书的主流倾向是照搬西方经济学者的各种理论。对西方的东西还是比较崇拜的。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学家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中国的经济现实，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个很大的差距，不仅是数量、质量的差距，还有时间的差距。忽视这个差距，照搬发达国家现有的理论和现行的政策，可能行不通。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发达国家遇到经济危机，通常是采取货币政策，银行降息，这样人们就买东西，不存钱了，买东西就把消费刺激起来了。消费增加就会刺激生产，降息后贷款投资的成本就低了，人们就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所以银行降息既可以刺激消费，又可以刺激投资。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银行连续七次降息，最后开征了利息税，但是银行里的存款还是大幅度增加，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与国外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应当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我是这样解释的：因为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还没有解决。中国老百姓为什么要大量存钱，英国、美国的老百姓为什么不存钱？因为他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比我们好。了解一下这些国家的财政收支结构，绝大部分是用于保障的，养老、医疗等等。现在中国和美国都在改革医疗体制，但针对性不一样。奥巴马政府要解决的问题，是一部分中间层次的人的医疗保险，不是最穷的人的医疗保险。美国的弱势群体，像老人、穷人，现在就有医疗保障。在美国，他不会因为你穷，把你赶出医院，不给你动手术。

中国人存钱不消费，一个是要防病养老，还有一个是供孩子上学。在发达国家也不存在后一个问题。在美国好多州，不仅中小学是义务教育，而且有些学校还供应一顿午餐，还有校车免费接送。孩子要进大学，好了，他不会因为家里的贫困不能读大学，他有多种方式，除了奖学金以外，还有教育贷款等等，大学毕业后你再还。再有一个，大学生还可以到餐馆打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在法律上是允许的。相对而言，美国的社会保障在发达国家还是比较落后的，英国、北欧国家的社会保障更多一些。而且，它是非常平等的，在英国，部长与老百姓享受的基本公费医疗是一样的，很公平。都是纳税人的钱，我们享受的是平等的权利，你没有比别人特殊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国家七次降息，都不能起到作用？就因为没有考虑中国国情。老百姓的习惯与国情有关系，过去利息高的时候，我少

存些钱，生活就有保障了，现在你把利息降低了，就要多存钱，才有保障，所以你利息降得越多，我存钱就要越多，这与国外不一样。中国人说，你能解决我的社会保障问题，我就能消费。我们学院里有个老师在研究这个问题，通过研究你就会发现，有医疗保障的人和没有医疗保障的人，他的储蓄率是不一样的，储蓄倾向是有差别的，这就是中国国情啊。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迟迟建立不起来？这不仅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且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所以中国经济学家尤其是转型经济学家不能不考虑政治问题。

陈：目前经济学教育在大学处于怎样的一个位置？

朱：2009年，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639.5万人，在校生2144.7万人，毕业生531.1万人。其中经济类、管理类学生人数是比较多的，精确的数据是多少？我还真是认真地想了想，也在电脑上查了查，但是查不到，大概估计，应当占到总数的四分之一强，现在每年招生人数在160万人以上。经济类、管理类的学生，文理不好分，像我们光华管理学院，既有文也有理，是文理兼收的。

陈：我想在这里插一句，文科和理科的学生入学后，在学习上会有差距吗？

朱：那倒看不出有显著的差距。在我们这儿主要是需要数学基础，没有物理、化学、生物，高中文科班的学生，高考也是要考数学的，所以这个差别不是太大。不过，有个别的文科学生到金融班会感到吃力。我们学院曾经有一个北京文科状元，在金融班不太适应，后来转到法学院了，主要是数学有点跟不上。另外状元都有优越感，到了金融班后，优越感没有了，最多的一次，全国各省的26个状元都在金融班里，他的优越感就没有了，这可能也是其要求转专业的一个原因，到其他专业竞争压力没有那么大。

陈：那么，状元与非状元，进入大学后有区别吗？

朱：状元与非状元，进入大学后是看不出差别的。本来相差也不大，可能就差几分。有些状元也是偶然的，本来可能一直排在四五位、七八位，最后高考的时候临场发挥好一点，就成了状元。进入大学后的成绩排名与高考时的排名，没有很大的关系。高考排在最前面的，入学后的成绩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关键是有没有学习兴趣，兴趣培养出来了，自己能够刻苦钻研，他就会走在前头。

陈：大学中现在都有哪些经济学专业？

朱：从大的分类来说，以前只有经济学门类，后来增加了管理学门类。这里说的门类，包括哲学、历史学、文学、法学、教育学、理学、工学等，一共有 12 个门类。门类下面再划分一级学科、二级学科。

经济学门类下面有 2 个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下面有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6 个二级学科。应用经济学下面有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国防经济 10 个二级学科。原来经济学门类下面还有一个企业经济学，现在划到管理学门类了。

以前的管理专业都是放在各个门类下面，如工商管理放在经济学门类，政府管理放在政治学下面。后来教育部又专门划分了一个管理学门类，下面包括 5 个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和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以前我们北大的工商管理研究生授的是经济学硕士、经济学博士，现在不是了，现在授的是管理学硕士、管理学博士。

原来北大只有一个经济系，现在分成了两大学院——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本来是想把经济学教育和管理学教育分开，但实际上分不开。两个学院刚刚分开的时候，学科还没有分开，授的都

是经济学学位，后来经济学院一直授经济学学位，我们光华管理学院既授经济学学位，也授管理学学位。现在金融很热门，大家都不愿放，所以现在两个学院都有金融专业。

陈：两个金融专业，哪一个更好一点？

朱：双方各有特色。从这几年的情况看，光华管理学院这边的力量更强些，我们从海外回来的教师多，录取分数也比经济学院高。以前我们的金融实验班招了很多状元，进来后是全英文授课，现在不许办实验班了，都是学院统一招生，到二年级再分专业。现在比较灵活了，比较好，而且从转系来说，北大相对也比较好，允许转系。但也有的系不愿意学生转入（包括光华管理学院）。

陈：北大的保险专业是在哪个学院？

朱：保险专业在经济学院。在国外是没有保险专业的。国外的经济学系，是不分什么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你就选几个很基础的课，再选一个方向性的课，好了，学校就授予你经济学的学位了。我们国家在经济系里面分得太细了，太窄了，什么金融专业、财政专业、贸易专业、风险投资专业……国外的金融是大金融概念，分为三个层次：国际金融，包括外汇、汇率等；公共财政，讲政府怎样融资、投资的问题；还有就是公司金融，公司金融是商学院中很重要的一块。银行、保险公司都属于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也是一种企业，它与其他企业的区别在于，它是经营货币的。上面讲的三级金融，银行机构都要介入。与之相联系的是金融市场，如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政府可以把债券拿到金融市场上交易，公司也可以把股票拿到金融市场上去交易。

保险涉及经济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我们生活中会遇到各种风险，如人的健康问题，要买医疗保险；像我们出去以后，乘交通工具有风险，要买意外保险……关键是保险公司怎样计算这个风险，按多大的概率来理赔，如果我算得不对，我不是赔海了，关键是计

算的问题。人寿保险也是这样，涉及人的期望寿命等，现在期望寿命越来越长了，就要调整。还有财产保险、火灾保险、海事保险，都需要计算，然后有一个收费率的确定。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对于交易双方，信息是不对称的，一方掌握信息多，一方掌握信息少。比如国外旧车市场很盛行，国内就比较差，卖车的人知道好坏，但买车的人不知道，信息不对称。还有买保险，如健康保险，我了解我的健康状况，但保险公司不知道，虽然保险公司可以检查身体，但有些病是检查不出来的，这都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时候，交易可能就不会发生了。比如说，年轻人买保险比较容易，因为有平均健康水平；但老年人就不是这样了，老年人自己知道自己的健康水平，但保险公司不知道，有的老年人身体特别好，凡是健康状况好的，他通常是不买保险的，最后就是健康状况最糟糕的人才去买保险，这样保险公司就没法办了。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失灵了，老年人的健康保险就需要政府出面进行保障了。这就从商业保险进入到社会保险的领域了。

保险在经济学理论上并不复杂，复杂的是风险的确定与计算，国内过去在这方面落后，主要是数学的技术跟不上，这种技术现在叫做“精算”。精算在我们北大是划在数学学院的统计系，光华管理学院也有统计系，叫商务统计系，但精算是在数学学院。这个专业需要数学基础非常好。北大本科的数学课程分为三档。数学系开设的数学课最深，精算专业学的是数学系的课程；我们的金融专业的数学课程也是由数学系开设的，虽然深度不及精算专业的课程，但是超过其他院系开设的数学课；大多数院系开设的数学课深度排在第三档，所学的是公共数学课程。

北京大学现在向国外学习，实行宽口径，按学院招生，一开始不划分专业，到二年级后才开始分专业。但还可以更进一步，国外好多大学的学籍管理是全校性的，不用将档案转到学院去。我愿意学你的课，你到时授予我学位就行了。北大也在向着这个方向走。

如果你明年能够进北大，可以选读第二学位。元培学院也是一种过渡形态，它本身没有专业，没有什么可授予的学位，只有一个文科班和一个理科班。入学后，你可以在元培学院学一些基础课，也可以到其他学院选课，两年后才需要决定转入某一个学院，譬如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法学院等，一般情况下，学生的选择都会被选定的学院接受。

陈：经济学本科生主要学习哪些课程？

朱：先不说那些公共基础课，一个数学，一个统计学，是经济学学生必须打好基础的课程。本科阶段主要学习一些经济学基本原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就是那么几门课，一定要学扎实。将来再读研究生的时候，专业就分得比较细了。如公司金融中更细的有公司并购，还有研究固定收益证券的，专门研究期权市场定价的，等等。博士生的论文，题目越细、越具体，才能越有新意，笼而统之地谈一些大问题，答辩就不容易通过。

陈：请您点评一下，哪些大学的经济学比较好？

朱：实事求是地说，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是比较好的，这有很多年的历史了。过去像陈岱孙这样最早从国外回来的、受过西方经济学传统熏陶的人，基本上都在北大；现在的“海归”，也是首选北大。

中国人民大学有它的优势，它的经济学专业比较多，学科分类是最细的，工业经济里面可以再分，农业经济里面也可以再分，像过去计划经济时期那样划分得特别细。1952 年院系调整的时候，人大的分工主要是搞马克思主义的文科教育，尤其是与计划经济体系相适应的经济学，请了许多苏联的经济学教授来讲课，一下子把人大推上了经济学第一把交椅。这种状况延续下来，人大仍然是经济类专业最多的学校。

专业多，人就多，教授就多，每年毕业的学生多，授予的博士

多，发表的论文多，现在的大学排名就看这些。但多不一定就好。譬如说，浙江某个大学，一个教授能带几十个博士，而我们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每年一个教授平均只允许带一个博士，30 个教授只能带 30 个博士。这样一来，你的博士数量就少了，发表论文的数量也就少了。在国外，我们都知道，博士毕业后三年能发一篇文章就是好的，这篇文章不是发表后自己看，而是按别人引用的情况（引用率）来评价。我们国内的文章只问是不是发表了，而不管别人看不看、有没有影响力。所以在北大，是不太看重院校排名这些东西的，每个学校的评价标准不一样嘛。我们的教授在国际和国内都是有影响的，有些在国外都是教授了。

清华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现在也不错，你别看它经济学在国内的排名不靠前。我们知道，清华引进了一批知名的“海归”教授，例如钱颖一、李稻葵、白重恩等，这些人也是在海外获得终身教职后回来的。人大现在也开始注意引进人才了，但比北大、清华晚了一步。

上海财经大学现在也不错，他们也很注重挖人才。经济学人才向北京和上海汇聚，与中国这两大都市的吸引力有很大关系，其他城市难以与之竞争。在北京和上海，收入也高一些，信息也多一些，研究条件好一些。像深圳虽然收入也不错，但信息条件比不上北京和上海。

邹恒甫离开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后，到中央财经大学办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及中国高等研究院，他挖了一批人过去，这两年搞得还可以。这个人确实很有才。学校的好坏，师资很重要，学生与谁接触？不就是老师嘛。有好的老师就能把学生带出来。理工科还需要有好的实验室，文科主要是靠好的老师。

陈：经济学有没有实验室？

朱：经济学实验室是近年来才发展起来的。我们光华管理学院

已经有了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大楼刚刚盖起来，设有数据挖掘实验室、管理行为实验室、金融实验室、决策模拟与经济建模实验室、企业绩效管理与物流管理实验室、商务英语语言实验室、IT服务中心等。人大、南开大学、上海财大、上海交大、暨南大学、西南交大、东北财经大学等也在建立经济学实验室。

在国际上，实验经济学的开拓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实验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已被经济学界广为接受和采用。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授予实验经济学开创人史密斯与卡尼曼，标志着实验经济学已经发展成熟。实验经济学与心理学有交叉，所以北大还有一个神经经济学实验室，是由心理学家主持的，用神经科学、脑科学的技术方法研究经济和社会的决策行为。

实验经济学是一个科学工具，正如任何学科的实验部分一样，其方法论是研究在受控条件下各个因素、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譬如说消费者、投资者在市场中的心理与行为，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经济人是理性的人，实际上经济人则常常有不理性的表现：在景气的时候过度投资和过度消费；在不景气的时候不知所措。实验经济学就是要揭示人在各种条件下的实际经济行为，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做出修正。人是在理性有限条件下做决策，因此，即使是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某些时候的行为也是不合理的，如一个地方的汽油价格低，一个地方的汽油价格高，为了便宜将车开过去加油，结果算上跑路所消耗的汽油，实际价格反而更高。这种情况在生活中很多，理性计算是受到各种限制的，不理性的决策也是经常发生的。

陈：请问在大学教育中，经济学与管理学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朱：管理与经济不一样，经济的东西比较理论些、抽象些，管理比较具体些、实用些。在国外学科分类是这样的，经济叫系，管理叫学院；中国是管理也叫学院，经济也叫学院。美国凡是叫系的教的都是基础理论，如物理系、数学系；中国现在都是学院。美国

的商学院与管理学院是一回事，有的大学叫商学院，如哈佛大学叫商学院；有的大学叫管理学院，如斯坦福大学就叫管理学院。叫的不一样，实质上是一样的。即使是叫管理学院的，也不把公共管理放在里面，哈佛还另有政府学院。好的大学，工商管理和政府管理都不放在一起；中等的大学，这两种管理有放在同一个管理学院的。

经济系、物理系、数学系都是搞基础理论研究的，侧重于理论方法的训练；管理学院、医学院、法学院等等，是进行专业教育的，还包括一些职业训练。国内正在转型时期，如果你光搞理论的东西，穷得很，在国内很难静下心来做这些事情。理论的东西搞一点，实际的东西也搞一点，一窝蜂都成了学院。将来这些是会改的，真正搞理论研究的人，是要靠国家财政拨款的，香港就是这样的。为什么香港科技大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搞上去了？政府有足够的钱拿出来。香港的文科教授、理科教授、商科教授，工资待遇差得不多，因为都是“吃皇粮”；国内的教授工资待遇的差距就大了，主要取决于学院创收的多少。美国教授的收入差距比香港大，一个刚来的金融教授可能比一个其他系的老教授的工资都高，因为美国的人才流动性大，如果院长不给他高工资，别的学院就把他挖走了。

陈：工商管理的课程与经济系究竟有什么不同?

朱：想要了解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关系，算你找对人了。我参加过学科调整、学科划分问题的专门会议，对这方面还是比较了解的，有的老师只管教自己的课程，并不十分了解整个学科的事。

工商管理，属于应用学科，它所用到的基础理论来自三块，经济学是主要的一块，心理学是一块，社会学是一块。我们学院的教授，以前或者是经济学背景，或者是心理学、社会学背景。管理学院需要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我们学院一个副院长，搞战略的，还兼

着战略系的系主任，以前是搞经济学的。组织系的系主任，是搞人力资源管理的，他是工业经济背景的，是人大毕业的。一位副院长，前金融系的系主任，是英国回来的，他以前是北大地球物理系的，出去拿了一个金融学学位，现在回来搞金融。

从工商管理的主要课程来看：战略学最厉害的是哈佛大学的波特，他是经济学出身的。搞营销最大牌的是西北大学的科特勒，已经去世了，他的背景也是搞经济学的；但营销除了需要经济学背景还需要心理学背景。企业组织课程，与社会学有密切的关联，必然要涉及组织关系、组织行为等等。人力资源管理，离不开心理学、行为学，什么 X 理论、Y 理论。另一块是财务管理，这是最经典的，搞管理就要懂财务，就是公司金融。国外有些书所说的公司金融理论，实际上就是公司财务理论。一个学工商管理的人，对于公司的人、财、物都要有研究。

我上面所讲，主要涉及的是经济学，如果你想更深入地了解管理学，我还可以推荐几位管理学院的院长。像人大的徐二民教授，以前是商学院院长，现在是研究生院副院长。南开的李维安，管理学出身，是南开大学商学院的院长，现在搞公司金融。清华的赵纯均是搞工程出身的，这是老院长；现在的新院长钱颖一，我也与他熟悉，也是经济学出身的，与我一样。

陈：经济学（包括工商管理）本科生毕业后的出路和前景如何？

朱：现在经济学毕业生在总体上是过剩的，尤其是会计专业，因为这几年招生太猛了。但不同的学校，情况是不同的。北大的毕业生，是用不着为就业发愁的。我们之前的实验班，全英文的训练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这些人多数到跨国公司工作。当时本科毕业生的平均年薪是几万元人民币，他们班刚毕业的学生，平均年薪是 17 万，最高的 90 多万。基本上好的学校找工作没问题，差的学校

还是不行。

前几年好像国际贸易很红火，过几年就不行了。国际贸易是一个操作性的专业，理论的东西并不多。国际经济学下面有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一般学经济学的都会学这两门课。金融专业现在也有点过剩，这是说差的学校，好学校还没有问题，好学校出来的，都可以进到金融机构，像投行、基金、证券公司，到大公司里做金融也是可以的。现在大的公司里就有财务公司，专门负责资本运作。

按照他们本国的惯例，国外公司还是喜欢从好的学校中招本科生，苗子好，基础好。现在实习也很重要，需要有实习的机会，有实践的经验。好学校的学生就容易联系到好的实习单位，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机会。

我们学院的本科生，好一点的都有出国交流的机会，一般是半年时间，到国外上一个学期课。前提是英语要好。在我们这儿现在有机会出国交流的占到一半，将来要达到每一个本科生，只要你想出去，英语达到要求，都可以出去。

陈：什么样的高中生适合读经济学？

朱：想要学习经济学尤其是学习金融学，数学基础一定要好，将来很多东西是需要数量分析的。我有一个朋友叫居雄伟，刚刚从美国回来，他曾经是美国华人里做对冲基金做得最好的人之一。他前一段跟我说，他需要招的人招不到，钱不会有问题，最低可以给十几万，做得好可以给几十万，他需要的人，一要懂金融，二要懂统计，但这种人很难找，要不然懂金融不懂统计，要不然懂统计不懂金融。我说："你哪天到我们学院来讲一次，我们学院既有金融系也有统计系，但学生不知道往你想要的这个方向去选课，如果你与学生讲，有这么好的前景，学生为什么不往这方面去做呢。"这种综合就是比较高级的综合。

需要什么人才，人们都笼统一说，这样就造成了人才的过剩。

比如会计，这种人才是很好培养、训练的，所以就过剩了。真正做得比较好的会计，做到高级会计师，他一定要懂金融。金融和会计走到高端的时候，是相通的，你不能光去记账，你要会资本运作，企业是要做融资和投资的研究，这与金融是有关系的。社会需要复合型的人才，现在大学培养不了这样的人。如果大学教育与市场需要结合得好，让学生多选一些统计方面的课也是没有问题的。学生不知道这个，一般都是要靠老师指方向的，但是现在的教学体制僵化，老师也做不了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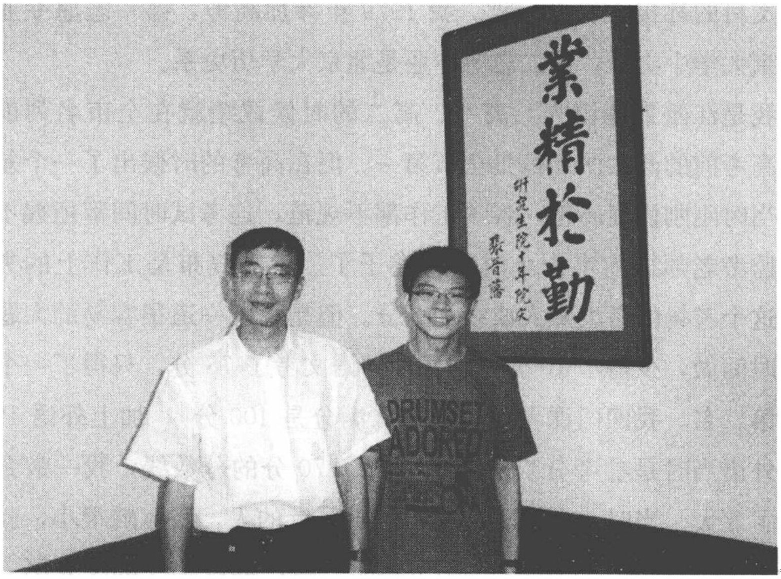
不仅仅是经济学，今后不论搞哪个学科都需要打好数学基础。搞社会科学，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和政治心理学，现在都需要数学，如研究选举，就要民意测验，就需要各种数学的工具。你搞人文学科，除了文学，包括哲学和史学，都离不开数学。哲学做深了要懂数理逻辑，史学现在也有计量史学，国外就有一个计量经济史，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的主要代表作是《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经济计量学史论文集》。

陈：我明白了。虽然我现在是在高中文科班，但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能放松学习与掌握数学这门课程。再次感谢您今天花费了这么多的宝贵时间，为我上了重要的一课。

法律人要把“道术”融合在一起
——李曙光教授访谈录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在中国加强立法建设中，李教授为破产法与国有资产的立法作出了巨大贡献。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企业破产与兼并问题，是该领域国内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新《破产法》和《国有资产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



被访者：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访谈时间：2010 年 7 月 10 日

访谈地点：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办公室

陈：李叔叔，今天我想向您了解大学法学学科的一些情况。首先，您能不能谈一谈您在高考时为什么选择了法律专业？

李：我是阴差阳错地学了法律。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是最适合学法律的，但当初我的志愿并不是法律。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喜欢理科的都报数、理、化，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喜欢文科的都报文、史、哲。我 1979 年参加高考，第一志愿专业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专业是北京大学历史系。

我是江西景德镇人，高一、高二的时候成绩就在全市名列前茅，高考前的两次测评都是全市第一。但在高考的时候出了一个差错，当时刚刚恢复高考，各项工作都不规范，连考试时间都把握不准，监考老师提前半个小时就收卷子了。后来宣布是工作上的失误，这个考场的考生每人成绩加 5 分。但是我有一道很容易的大题没有时间做，少得了 10 分，结果我的语文考了 78 分，只得了一个全市第二名。我四门课考了 357 分（满分是 400 分），加上外语 19 分（外语当时是参考分），达到了北大 370 分的分数线，我一鼓劲就报了北大。当时北大录了一批年龄比较大的人，我年龄很小，就落选了。1977 年、1978 年、1979 年那三届，重点院校都没有第二志愿录取的，重点院校落选后，马上就调到普通院校。我普通院校的第一志愿，报的是华东政法大学，结果我被该校法律专业录取了。当时大学生还是很少的，读大学和现在读博士差不多，按理说是很自豪的事情，但我当时羞于戴华东政法大学的校徽，我觉得自己应该上北大的。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立志要考研究生。我在上海读大学四年，基本上是足不出户。我们的校园很漂亮，原来是美国的一个教

会大学——圣约翰大学，校园全是法式的，哥特式的建筑。宋氏五兄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宋子良都在圣约翰读过书，从那儿走向美国。校园里有座韬奋楼，著名新闻记者邹韬奋在那里读过书。我原来在一个较偏僻的中小城市，进了这样一个大学，就像到了一个知识的海洋，当时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汲取知识营养上了，根本没有在意上海的花花世界。说实在的，当时没有什么法律书可读，宪法才 10 页纸，法学理论叫国家与法的理论，基本上是马克思列宁说的那些，还让我们背《资本论》。我是剑走偏锋，走的是文史与法的结合，就是法制史。当时的法律系教授与我们现在的教授不一样，他们“文革”的时候都给打发到农村或者城里的中学当老师去了，已经中断了 10 年的法学教育，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也没有很丰厚的法学知识底蕴，只有过去学苏联的一些东西，但他们有很好的文史功底，这样就与我的需求结合在一起了。到了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就考虑到与文史比较近的法制史。而且华东政法大学最有名的教授王召棠就是搞法制史的，所以我就开始盯着王召棠来考。我考王召棠教授的研究生，考了第一名，他当时每年只带一个研究生，他想录取第二名，后来扩招一个，招了两个。

当时正赶上中国政法大学成立。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是北京政法学院，北京政法学院的前身是北京大学的法律系、清华大学的政治系、辅仁大学的法律系和朝阳大学的政治系。1952 年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和朝阳大学被撤销，北大的法律系和清华的政治系也被撤销，两个法律系和两个政治系一起并入了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北大法律系的前身则是京师大学堂的法政学堂。现在我们图书馆的书很多都是北大图书馆的章，打倒“四人帮”后，北京政法学院重新恢复，它的图书馆没动。也就是说，北大法律系的老底子，是在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现在的法律系，是后来重建的。因为很多老师都到这边来了，但是“文革”中北大先恢复教学，大约是 1972 年、1973 年的时候，所以有少数老师回到了北大。当时有两个大

学有法律系，一个是北京大学，一个是吉林大学。1974 年、1975 年的时候虽然已经有法律系学生，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法学教育，要到 1977 届也就是李克强那一届，才有真正的法学教育。那时的北大法律系教授还没有多少人，主要是肖蔚云、龚祥瑞几位老先生；还有搞国际法的，像赵理海、王铁崖、芮沐这几个老先生，搞法理的当时是陈守一先生。他们中很多人没有离开北大，后来转到国政系或其他系去了，但是主要的法律系教授 1952 年就到北京政法学院这边来了。包括雷洁琼教授、曾秉钧先生、杜汝辑教授都是北大过来的；像陈志平老师，以前是清华大学政治系的。

1983 年，就是我考研究生的那年，遇上一件对我来说比较幸运的事情，上面决定撤销北京政法学院，成立中国政法大学，搞“一校三院”制。一校就是中国政法大学，三院是：本科生院（以原来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为主）、研究生院（当时新成立的）、进修生院（过去的政法干部管理学校，原来在木樨地，培养政法系统高级管理干部——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的）。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成立的时候，是当时全国所有大学中的第一个研究生院。当时成立中国政法大学是邓小平亲自批示的，政治局开会，彭真提的建议，要建世界上最大的政法大学。最大的政法大学，就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学生规模，第二，校园规模。1979 年北京政法学院恢复的时候，是五家文化团体占着这 200 亩的地方。1983 年成立中国政法大学，要选一个更大的地方，当时就选在昌平，所以我们学校到今天是一校两址：市区是研究生院，昌平是本科生院。

当时建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培养高层次的学术人才，第一届要招 100 个研究生。而当时北京政法学院的研究生只有二三十人，所以要到全国各地去补招，把当年考研的优秀生，都集中选拔到这里来。当时法大有一位沈老师到华东政法大学找到我，说北京有这个机会，你是否愿意到北京来读书？每一个考试分数比较好的人，他都去问。我没什么犹豫，就决定来北京了。第一，北京原来

就是我向往的地方；第二，当时是靠教材吃饭，很少有专著和著作，教材都是最权威的人写的，教材的主编就是全国第一，法制史的全国教材就是张晋藩主编的，张先生当时担任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所以我当时就盯着他，要读他的研究生；第三，多多少少，华东政法学院王老师不是特别欣赏我。这样，我就来北京了。

那一年中国政法大学招了 8 个法制史研究生，有来自北大的，来自北京政法、西南政法、西北政法的，其中只有两个人可以跟张晋藩。张先生选了我和来自北大的刘广安，我们俩一直读他的研究生，先读硕士生，又读博士生。1986 年，那时博士生还很少，全国的法学博士生就是十二三个，我是当时全国第一批、第二批博士生中最年轻的。

我博士生毕业后就转向搞经济改革。在读博士的时候，我对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都感兴趣，那时参与了很多活动，在《世界经济导报》和《经济学周报》上都发表过文章。到 90 年代，我的主要精力就转到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法治改革上。1993 年朱镕基在研究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又把我和曹思源找过去，我参与了新破产法等的立法起草。所以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是经济法、公司法、破产法和法经济学。

陈：我妈妈说，您早就建议让我读法律，今天一见面，您又让我高考报法大。您是否可以给出几个理由？

李：好的，我给你讲三个理由。

第一，法律专业比较适合男性，它要求沉静与理性。从世俗的角度来说，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工作在华尔街，最优秀的人才、最聪明的头脑都在那里。那地方有大量的证券交易，金融衍生品交易，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日新月异的金融新发明。在华尔街工作的有两类人，一类是经济学家，一类是法学家。说经济学家不准确，经

济学家在华尔街被认为是做学问的，不是做实务的，在华尔街做实务的是金融、财务专家和一些金融产品的设计者。一些美国顶尖的法学院鼓励他们的学生，毕业后一定要去华尔街当律师，最聪明的大脑都在那儿。金融财务专家设计这些产品，一定要有律师或者说职业法律人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认为律师比金融家更聪明，为什么呢？金融家遇到难题或者麻烦了，他自己没有办法了，他才要去找律师。帮助聪明人解决难题的大脑，当然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了。哈佛法学院的好学生，大多数去了华尔街各著名的律师行，也有一些进入到了投行，成为公司内部的法律顾问。在这两部分人中，90％以上是男性，华尔街最著名、最赚钱的，前十位的律师基本都是男性，所以说，法律职业是男性的职业，是最聪明的男性的职业。

陈：国内现在学法律的人，女生的比重是多少？

李：在研究生阶段，学法律的女生接近60％；在本科阶段，也是女生多一些；但到了博士，女生就很少了。像我带的学生，90％以上是男生，也有个别的女生。中国学法律的女生多，与我们的教育体制还有考试内容有很大关系。我们现在就是考书本知识，女孩子比较安静，善于背书，男孩子生性好动，对于背东西就不擅长、没兴趣，在考试的时候就竞争不过女生。

做一个职业法律人，需要一个理性的头脑，一种理性的思维。要求你特别冷静，特别有条理，特别善于逻辑的推演；还要求大脑有很大的空间，有很高的容纳度，能装下海量的背景知识。由于生理方面的一些特点，女孩子在这些方面是比较弱的，在毕业后的职业竞争中，她们的弱点会逐渐显现出来。这不是歧视女孩子，女孩子中当然也有强人，但从统计上说，女孩子要差一些。举个例子来说，我在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时了解到，华尔街经常都是通宵工作的，女性根本吃不消，女性在华尔街通常就是工作一到两年，把读

学位的钱赚回来就走了，然后找一个比较安稳的工作。华尔街的最短工作时间是一周 70 小时，这就意味着没有周六和周日，每天还要工作 10 个小时，如果歇一个周末，那他的工作日就要长达 14 个小时。这样子工作，一般人是受不了的。

美国的法学院人数还是比较少的，它完全是一个精英教育，对于学生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现在中国的法律教育是大众教育，有些精英进来了，很多不是精英的人也进来了。近年来很多学校又都在扩招，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扩招到法律专业来了。法律专业不需要实验室和设备，对于教师资格又没有明确的限制标准，就成了地方二、三流大学扩招的一个重点。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趋势。

我一直对我的学生说，学法律你要比一般的人聪明得多才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你才能学法律的那些“术”的东西——说话的技巧、论辩的技巧、发现问题的技巧、分析问题的技巧、解决问题的技巧。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道术”，在“术”之上还有价值观、道德的东西。作为一个法律人，你要由什么价值观，什么信念，什么样的观念去主导你的行为？既要有“术”，又要有“道”，要把二者融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学家。

第二，我认为，每一位父亲都希望儿子跟着自己走，这不一定是说学他的专业。在你爸爸那一代人里，有许多出色与优秀的人，你爸爸是最优秀者之一。他优秀在什么地方？他是最具理性和沉着镇静品质的，这恰恰是法律人应当具有的品质。在我们国家，有这种气质的人不多。我始终认为，一个社会应该有一批这样的人，这样国家社会才比较稳定，沿着既定的方向持续前进。这样的人是社会的主心骨，是《西游记》里所说的“定海神针”。在美国四十几任总统里，有三十几任是律师出身，这些人既是社会的稳定力量，很多人又是社会前进的推动力量。你爸爸没有选择专业的余地，所以没有学法律，但从他内心的气场来看，我认为他应该是一个最好的学法律的人才，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个继承下来，当然，这最终还

要取决于你个人的兴趣与爱好，不能强求。

第三，从中国未来发展需要的角度来说。中国的未来，只能走法治国家、宪政国家的道路，不能走其他的道路。从我们这一代，到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学生已经带学生了，大家的愿望都是一致的：中国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要有规则，要有程序，要有公平，要有正义，只能是法治社会。民主是与法治是相互配合的，“文革”中的所谓“大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我们追求的是一个真正民主和法治的社会。这个社会就需要大量法律人才，特别需要非常棒的、顶尖的法律人才。

我把中国的法律职业人分为两类：狭义的是指法院和检察院工作人员，每年的需求是 2 万人；广义的职业人就多了去了。政府机构需要大量的经过法律训练的人去执法，去担任公务员；大量的职业律师，包括律师事务所人员，也包括金融机构、大型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内部聘用的法律顾问；大量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这个协会，那个协会等等，也是需要法律人才的。现在的社会发展都与法律相关，每个新生事物都会涉及一系列新的权利、义务关系；每一个成年人的一举一动，都涉及与其他人的法律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大量的广义的法律职业人。不过我们现在的法律教育还达不到这个标准。还有，我们的政治体制和法律教育体制还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现在全国有 635 个法学院、法政学院、人文社科学院下面的法律系，40 万在读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我认为，这里面有很多根本不符合标准，甚至是没有读过法律的人在教法律。这些法律系我认为要砍掉 300 个不合格的。我已经在研究生院待了 9 年了，对于法学教育还是有些了解的。

法律系每年毕业十几万人，法院、检察院的需求量是 2 万人。对于法律专业毕业生来说，还有一个坏消息。现在进入法院、检察院的，不都是专业人士，还有大量走关系的人、复员转业军人等

等，这样一来，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就没有完全对接上。现在法律专业毕业的人找工作非常困难，竞争非常激烈，根据去年的数据，法律专业的就业率在全国是倒数第一。

当然也有好的消息。老牌的法学院，就业基本上没有问题。像我们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就业率 95.7%，研究生就业率 97.6%，差不多是 100%。像我的学生，多数人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大型国有企业就职，少数人当律师。现在出国的概念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学校在推动公派留学生项目，读博士生三年，就送出去一年。我们每年招 180 名博士生，每年派出去 50 名。有些国外大学希望我们派得越多越好，我们现在都派不出去，或者外语不行，或者他自己不愿意出去。博士生出去的机会非常多，硕士生的机会少一点。我们研究生每年也有 100 个左右派出去，但是研究生招得多，每年 2000 多名。

陈：性格内向，对于当律师是否有影响?

李：职业法律人的工作也是方方面面的，有 in-house，也有 out-house；有做诉讼的，也有做非诉讼的，你可以选择适合你做的工作。另外，对于学生的性格，法学院也是有专门课程进行训练，就是对你的口才与演讲进行训练。老师教给你方法，帮助你做准备，你必须上去说。我们从本科就开始讲了，到了研究生更不得了。我们学校也有平时特别安静的学生，但到这个课程上就不一样了，不光能讲了，而且讲得很好。

陈：将来要做职业法律人，是不是有两条途径，一是本科就学法律，到研究生还学法律；二是本科先学别的，到研究生再学法律?

李：在美国，读法学院的都是你说的第二条途径；在中国，第二条途径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读“法硕”——法律硕士，一类是读“法学”——法学硕士。现在教育部希望更多地培养“法硕”；但从

法学界内部看来，学“法学”的更出彩一些，他各方面的能力更强一些。一进大学就学习一堆刑法、民法、权利与义务等，就是学这种理性分析的方式，你学其他的，比如读外国文学，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界内看来，学“法硕”要差一点，毕竟他前四年没有接触过法律，学“法学”才是正宗。从别的专业转过来的人，大多数读“法硕”，也有读“法学”的，但总体上还是少的。读“法学”的研究生中，大约有 10%～20%本科是学非法律专业的，他们与 80%～90%法律专业出身的同学相处的时候，一般会感到压抑，竞争上有难度。

陈：主要是哪几个非法律专业的本科生会报考“法学”或“法硕”研究生？

李：学外语、经济、管理的多，主要是学文科的；也有学理科的，比如学计算机、医学的，基本上是到“法硕”去了。

我们法律系本科生就一个法学专业；但到了研究生就分成两种，一种是学术性的学位，叫法学专业，一种是应用型的学位，叫法律专业。这是我们人为划分的，并不是说搞学术的不能搞应用，学术性的法学专业，一方面是培养学术人才，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培养应用型人才。这种设计从一开始就有问题，因为“法学”与“法硕”出身的人大部分都是搞应用的，结果好像后者就成了次一等的人才。

陈：从学科体系的角度来说，在法学一级学科下面，又分成多少个专业？

李：法学一级学科下面，按照教育部的分类，一共有 10 个二级学科：法学理论、法制史、宪法与行政法、刑法、民商法、诉讼法、经济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国际法、军事法。我们学校自己分了 15 个二级学科，除了上面的 10 个学科，还有法经济学、知识产权法、证据科学、比较法学、人权法。中国政法大学是二级学科

最全的，教育部给了一些学校自设二级学科的权力，人大可能给了经济学等其他一级学科，我们学校全都给了法学一级学科，因为我们是专门做这个的嘛，所以我们的学科最齐全。

“法学”研究生进来是要选学科专业的，要从15个二级学科中确定一个。我实际上跨着学科带学生，带经济法研究生与法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法硕”研究生进来就是法学专业，是没有什么二级学科可以选择的。非法学的本科生都可以报“法硕”，理、工、医、农、军、文、史、哲、社、政、经都可以，但是学法学的本科生不可以报“法硕”。“法硕”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可以任选一个二级学科写论文，可以是调查报告，也可以是案例分析，对他的论文要求比较低。“法学”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必须3万字以上。从去年开始，教育部又搞了一个面向法学本科生的两年制“法硕”研究生，要增加应用型人才的比例，把法律教育体系搞得更乱了。现在外面的人更搞不懂了，又是“法学”研究生，又是“法硕”研究生；后者又分三年制和两年制，非法学出身的“法硕”是三年制，法学出身的“法硕”是两年制。其实具体部门并不喜欢不分专业的“法硕”，比方说一些政府部门，如发改委，更愿意要学经济法的研究生。

陈：如果要搞法制史，本科学历史，研究生读法学，是否比一气读法学下来更好呢？

李：你说的情况也是有的。现在学法制史的人少，因为面临就业问题。我们现在正在鼓励跨学科和交叉学科，但是在现实的竞争中面临一些实际困难。那些出题的老师都是学法学的，别的学科他也不懂，所以出题就有局限性，这样学法学出身的考试就比较容易得高分。学了经济学、金融学再学法学，这是最好的，我们学校虽然鼓励，但实际上做不到。我们专门搞了一个“法经济学”专业，面向两个学科招生，你本科是学经济学的，过来读法学；本科是学

法学的，过来要补经济学知识。但是在实际竞争中，还是传统的力量占上风，本科学法学考上的占了90%。

陈：法学下面的二级学科中，现在哪些专业最热门?

李：最火的是民商法、经济法。今年招生分数排第一的是经济法，这个专业也较容易找工作；但是报考最多的是民商法。刑法也还可以，但是出口比较小，社会需求量有限。

还有一些新兴学科很受欢迎。

法与经济学，我们简称为“法经济学”，这个学科点是我建议创立的，第一个博士生也是我带的。哈佛有一个法律与经济专业，我从哈佛回来后，就设立了法经济学专业。现在我们学校这个学科的带头人是席涛。

证据科学，原来设在刑事诉讼法里面。证据科学学科的内容，要有一些医学、法医学，譬如DNA鉴定，还有刑侦、物理学的知识，还有一些心理学的知识。这个专业我们学校应该是最强的，有一个教育部的重点实验室。

我们学校还有一个人权与人道主义法学科。我们的前任校长徐显明是搞人权研究的，现在调到山东大学当校长了。

中国政法大学下面一共设了7个法学院。第一个就叫“法学院”，有宪法、行政法、法理、法制史、法经济学等学科。第二个叫“民商法学院”，包括民商法、经济法、知识产权法、环境保护法四个学科。第三个叫“刑事司法学院”，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证据科学等学科。第四个叫“国际法学院”，有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学科。第五个叫“比较法学研究院”，是在原来的比较法研究所、中德法学院和中美法学院三个单位整合基础上成立的，是目前全国高校中唯一的以比较法学为中心的专门教学科研机构。第六个叫“法律硕士学院”，专门培养“法硕”的。第七个叫“中欧法学院”，是我们与欧盟合作建立的，现在是中国最前沿、

最高端的法学院。

中欧法学院是我们的王牌。欧盟与中国政府合作，5 年拨款近 2000 万欧元，有 14 个欧洲学校参与。我们这边的合作团队有 4 所高校，法大牵头，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参与，地点设在我们学校，名字叫做“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欧方派出一名院长，中方派出一名院长，叫联席院长。毕业的学生拿两个学位，中国的和欧洲的，中国是政法大学的学位，欧洲是汉堡大学的学位。欧盟主席巴罗佐讲，这个学院要进入世界前十名的法学院。这是中外法律交流的最大一个平台，每年招 100 人。这里上课是全英语，学生不一定是法学最出色的，但英语比较好的学生都集中在这里了，本科学外语过来的比较多。

到了你这个年龄，选大学与专业，应当有一个方向性了，一旦选择了就不要后悔，这个很重要。你最近见了这么多的专家教授，可能一听头都大了。你要跟着自己内心的信念走。一个是你要果断地剔除一些东西，做出自己的选择；一个是一旦做了这个选择后，就要按着这个路子走，不反悔，不后退。人生有很多偶然，也许你今天听到我的这番话，就选择了法学。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学法学的人，要“静若处子，动若脱兔”。需要安静的时候，他非常非常安静，连一粒尘埃掉到地上都能听见；到了需要爆发的时候，就像狮子、豹子一样迅猛。法学是训练聪明人的，是训练有道义担当的人的。

陈：请您再简单介绍一下法学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情况？

李：最早开展法学教育的学校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最早的大学只有三个学科：第一个学科是神学，精神之学，治愈人的灵魂；第二个学科是医学，治愈人的身体疾患；第三个学科就是法学，是治愈社会问题的。在博洛尼亚大学之前，东罗马帝国时期就有法学教育。从事这种教育活动的人叫法律家，以带徒弟的方式传

授一些法律知识和技巧，类似于中国的私塾。

台湾有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写过一本书，里面提到法律与医学同出一源。古希腊的医生在给病人治病之前，先要发表一个誓言，叫做“希波克拉底誓言”。誓言中说：“我愿在我的判断力所及的范围内，尽我的能力，遵守为病人谋利益的道德原则，并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行为。我不得将有害的药品给予他人，也不指导他人服用有害药品，更不答应他人使用有害药物的请求。……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也无论需诊治的病人是男是女、是自由民是奴婢，对他们我一视同仁，为他们谋幸福是我唯一的目的。我要检点自己的行为举止，不做各种害人的劣行……我遵守以上誓言，目的在于让医神阿波罗·阿斯克勒庇俄斯及天地诸神赐给我生命与医术上的无上光荣；一旦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请求天地诸神给我最严厉的惩罚!”医生有自己的规则，法律家也是如此。在古罗马的时候，当人们以民主的方式讨论和制定一个规则的时候，这些人就是法律家了。制定大家都要遵从的规则，投票表决通过，一人一票，这些都是法律公正和平等的源头。苏格拉底、柏拉图，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他们在开讲坛的时候，不论叫政治学也好，叫什么也好，我认为都含有大量法律教育的内容。

从博洛尼亚大学开始发展到今天，世界上有多少法学院，我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现在法律教育最发达的是美国，那里的法律职业最发达，法治社会最完善，其宪法、宪政被认为是全世界的楷模。美国现在有 200 多所法学院，数量并不多，每所法学院的人数都在几百人。好的法学院，一般人数都很少，耶鲁和斯坦福一般都在 180 人左右，全世界那么多的人要去那里读，有很好的成绩，愿意支付高额的学费，它们也只要 180 名。哈佛法学院比较大，每年招生人数是 550 名，有无数人想去哈佛，可是它也一个不多招。

美国的法律教育是职业教育，是没有本科的。你必须是读完一个计算机、数学、东方文学、历史本科，再来读法律。有一个

LSAT 的入门考试，然后读三年法律，出来就是 JD（法学博士）。美国的法律教育是与其职业直接联系的，法学院 80％的毕业生可以当 lawyer，然后从 lawyer 出来当法官、从 lawyer 出来当政治家、从 lawyer 出来当议员。法学院毕业生出来是不能直接当法官、检察官的，他只能当法官、检察官的助手，这些人也叫 lawyer，但他们不是真正的律师，我们可以翻译成"法律职业人"。真正的律师是在华尔街等地的律师事务所和大公司工作的，这些人一般都要考一个律师执照（bar license）。这个执照美国都是在各个州里考，纽约州考纽约州的，加州就考加州的。学生从法学院毕业，毕业的假期里就考一个执照，然后就进入到律师事务所。有的人没有考取律师执照，就到非政府机构工作，或者当联邦和地方的公务员。

陈：法学院毕业生能考上这个执照的百分比是多少？

李：那要看是什么法学院。哈佛这种学校基本上是 90％以上，只有极个别的不行。排名在一百位的法学院，通过率大概只有 50％左右，所以大家都要上好的法学院。2000 年我在哈佛的时候，法学院出来的人，在纽约年薪 14 万，在波士顿 12 万，现在应该涨到 18 万到 20 万了。这个职业应该是美国最好的，但是它的人数不多，每年培养的法律职业人大概在五六万。

美国也有法律硕士，美国叫 LLM，中国人戏称为"老流氓"，学制一年，主要供外国人到美国学习法律的，这是对正宗法律教育的一种补充，增加一点国际化。大概只有哈佛、斯坦福、耶鲁这三家的法律硕士可以考 BAR，其他学校的法律硕士都不允许考 BAR。在美国没有读 JD 的法学院学生就没有竞争力。美国学位分两种，一种是学术学位（ph. D），一种是专业学位，JD 属于专业学位。LLM 出来可以读法律科学博士（J. S. D 或 S. J. D，美国这两种叫法都有），也是以外国人为主。先读一年法律硕士，再读三四年，写一篇论文，可以获得法律科学博士。



美国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都是JD出身。有少数J.S.D，想要在大学求职，就再读J.S.D，发表论文。在美国大学就职，一定要发表论文。想当教授的人，多数是在获得JD后，就一边做实务，一边写文章，然后再进入大学。我看哈佛的好多教授都是从华尔街过来的，也有的是先到最高法院或上诉法院当法官助手，然后回到大学来当教授。哈佛法学院最大牌的教授叫Laurence Tribe，他是教宪法的，别人一生中在最高法院打过一次官司就可以了，他打过30次，戈尔与布什的官司就是他打的，他是戈尔的首席律师。

中国古代没有法学，只有律学，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什么的。到晚清的时候，中国被迫打开大门，发现外面确实有许多好东西，法学是在这个时候才传入中国的。20世纪初取消科举制后，需要有新的教育来填补，新的教育包括理、工、农、医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法政。当时中国兴起了很多的法政学堂，像1905年创办的广东法政学堂（后来是中山大学的法律系）、1906年创办的天津北洋法政学堂，等等。这样经过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合并成立了五大政法学院：首都的北京政法学院、上海的华东政法学院、武汉的中南政法学院、重庆的西南政法学院、西安的西北政法学院。“文革”中又把这五大政法院校都撤销了，1978年恢复了西南政法学院，1979年恢复了另外四家。简单地说，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陈：中国大学法学院和法律系的“大爆炸”是什么时间开始的？

李：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是第一次，到1983年已经有几十家了，大致维持了10年。1993—1995年，扩张到100－300家。2000年以后，学生人数急剧增加。三年前，我们学校每年才招不到1000名研究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现在已经超过2000名了，去年招了2400名。我们学校原来招1000名研究生的时候，有一年报名

13000 人，13 个人里面选 1 个；这两年报名都维持在 12000 人左右，但现在招生量上来了，大约是 8 个人里面选 1 个。每年研究生有 10000 人以上报名，以前北京有五六所学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加上北航、法大；去年我们排在第六。法大一个专科的学校，能达到一万多人报考研究生，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我再补充一句，我们的法学学科实力应该是全国第一，我们每年的招生人数多，法学教授的数量也最多，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学科专业分得很细，一个罗马法就有数个教授在研究，其他学校不可能养这么多法学教授。法学有一级重点学科的只有三所学校——人大、北大和法大这三家。所以我还是要说，欢迎你报考我们的学校。

陈： 到底报考哪个大学、哪个专业，我还要认真考虑。再次感谢您今天的介绍，特别是您说的，不管选择了什么专业，都不要朝三暮四，而要坚持走自己的路。

心理学在中国
——车宏生教授访谈录

车宏生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心理统计、心理测量、组织行为学、经济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等。曾为人事部及中国电信、中国人寿等大型企业集团建立了人才选拔体系并主持了选拔工作，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及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



被访者： 车宏生，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访谈时间： 2010 年 2 月 13 日

访谈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车宏生教授寓所

陈：车伯伯，今天想请您介绍一下心理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状况。首先想请教您心理学的学科性质。我从资料上看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下面的心理学专业是“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而发展心理研究所又被评定为“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多数大学的心理学专业是理科招生，也有一些师范院校是文科招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车：对于心理学这个学科，很多人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心理学是一个最典型的文理交叉学科。有的国家把心理学放在文科，有的国家则把它放在理科。在中国的国家标准中，心理学放在生物学下面，就是说属于理科；在教育部的学科分类中，心理学放在教育学下面，就是说属于文科。连国家权威部门都没有统一起来，一般人搞不清楚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为什么是这样呢？这要从它的研究对象说起。现在通常是这样讲的，人的心理，主要是脑的功能。人的大脑是一个物质基础，人有这么一个发达的头脑，才会有复杂的心理活动，比如情感，然后就有了思想、观念。大脑进化是人的进化的最高阶段。大脑就像是一块软豆腐，它和五官与四肢不同，说不好有哪一项具体功能，它不能干活，但它负责对于整个机体的协调，从生理到心理的各个方面，都是由大脑来支配。如天气冷了，机体要促进生物能量的转化；热了，就要通过排汗功能来降温，这些活动都受大脑的支配。哭和笑、生气和烦恼，也都受大脑的支配。

心理既然是脑的功能，它就有自然科学的一面。比如说，如果大脑的某个地方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某一部分的心理功能。最早

发现的是失语症，外伤也好，肿瘤也好，这是最容易对脑子产生伤害的。心理学家发现，大脑某个部位受到伤害，就会出现失语症。失语症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有的是吐字不清，语言功能下降；有的是心里头清清楚楚，也能阅读，但就是不能说话；还有的是能看，一个字一个字看，但连不成意思了。所以最早有个说法，大脑是分区的，一个区域管一个功能，这儿管运动，这儿管感觉，这儿管语言，这儿管情绪……有一段时间是这么看，但是后来又发现这种理论有些僵化，区域也不是分得这么清楚，有些综合的。你比如说阅读、思维、情感不是一个地方管，而是和好多地方都有关系，现在还是说不太清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是理科性质的研究。心理研究所从 1951 年建立的时候起，就属于中国科学院，是中科院比较早的一个所。中科院只有 20 多个所的时候就有心理所了，算是生物学部的一个所。

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心理现象，只能达到感觉、知觉这样的层次，还远远达不到思想观念的层次，连梦的解析都达不到。对于复杂的心理现象，目前只能采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比如社会心理学研究“从众现象”，领头的一跑，就跟着跑，抢购事件也是一种从众。为什么会有“从众现象”？就要从情绪、动机、社会对人的影响这些方面来分析。这些都是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定义的，用社会调查的方法来研究的，还无法还原为大脑中的结构与功能。一个人，一个活人，他是生理的人还是社会的人？生理的一面，人与黑猩猩，总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虽然有些地方黑猩猩不如人，但是有接壤的地方；社会的一面，这点也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心理学既有自然科学的一面，也有社会科学的一面。

陈：从世界范围来说，心理学是什么时候诞生的？

车：心理学问题有点像哲学问题，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比

如人为什么会做梦？梦里的事情与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哪些东西是前世的反映？哪些东西是未来的预兆？古人一直在试图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心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出现，是有一个公认的确定时间的。我是在1978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的，第二年就参加了一个庆典活动，纪念心理学诞生100周年。187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成立了第一个心理实验室，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叫冯特实验室。为什么说它是划时代的呢，威廉·冯特开创了实验心理学，把科学心理学从哲学、从思辨中脱离出来。

从冯特实验室开始，他说，咱们别研究那些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了，一是一、二是二，咱们从人的感觉知觉开始，从能做实验做出来东西的开始。文科与理科有一个大区别，文科不大讲证明，它就是思辨，构造一个理论体系，但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明。自然科学就不仅要提出假设，还要有证明，这个定理才成立，物理、化学、数学都是这样的。冯特实验室在方法上有一次革命，做实验，测试砝码放在手上，加多少分量人就能感觉到这个砝码与那个砝码的重量不一样，一个人一个人地测试，他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来研究心理学，这是一个突破。

冯特以后的心理学，一直有两派并存。一派还是思辨的——弗洛伊德，这是一个大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开创者，他基本还是思辨的，自我、本我、力比多、性对人的影响，等等。像弗洛姆的新弗洛伊德主义、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也属于这一派。另一派是实验派，用自然科学证明的方法才算数。脑子里的东西看不见，发展到今天有认知神经科学。最近十几、二十几年发展了很多脑成像技术，过去X光可以透视，随后有CT了。X光是一个平面的，把不同层面的东西都重叠在一起形成相片，CT可以把它一片一片切开。我的身体这么一个厚度，哪个部位有毛病，切片后就可以看到具体的位置。现在还有一些其他技术，如核磁共振，还有

一个叫PET，就是给人的血管里注入有放射性的药水，随后脑子哪块儿活动得厉害，哪块儿就发光发得厉害。你在看两个字的时候，如“车”、“陈”，看你脑子里哪儿有反应。反应的强度，可以成像，成像后就是证据。一个刺激，让你见到“车”就能念出来，音、形、意不同，脑中部位就有不同的反应，就知道音是哪儿起作用，形是哪儿起作用。有时看到“车”，你就会联想汽车、火车，让你联想的时候，又是通过脑子哪儿的活动，这些活动都可以通过很多的成像技术反映出来。它可以把你脑子里的东西，时间、空间都分辨出来，这一派就走这种实证的，也叫实验的道路，后来就有了实验心理学。

陈：在世界心理学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哪些学派和大师？

车：心理学的早期发展主要是在德国。在冯特之后，20世纪初出现了一个“格式塔学派”，是心理学重要流派之一，由韦特海默、苛勒和考夫卡三位德国心理学家所创立。“格式塔”是德文音译，意即“模式、形状、形式”等，又称为“完形心理学”。“格式塔学派”主张人脑的运作原理是整体的，例如，我们对一朵花的感知，并非单单从对花的形状、颜色、大小等感官资讯而来，还包括我们对花过去的经验和印象，加起来才是我们对一朵花的感知。他们认为人的思维特点，要构造成一个完全的体系，体系中有某个缺口的，就要尽量弥补上。

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上台后，迫害犹太人，世界心理学的研究中心就从德国向美国转移了，当时像核物理学等许多学科，也出现了类似的转移。这时候开始流行的一个心理学派，叫行为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是美国心理学家华生。行为主义学派认为，既然心理像个黑箱里的东西说不清，那就不说这些说不清的东西，就说行为。有个典型的想法，就是通过惩罚与奖励能纠正人的行为，我们不要说人脑子是怎样想的，这都没有用，也说不清，行为主义就研

究人的心理所导致的结果——人的行为。华生说，给我几个孩子，从小就交给我，我就能把他培养成各种人才，总统、医生、律师、流氓、罪犯。你想要什么，我都能培养出来，主要通过惩罚与奖励。什么行为我给你奖励，这个行为就会受到鼓励；什么行为我给你惩罚，这个行为就被抑制住了。华生的观点有其偏激性和片面性，心理学界一开始也不接受他的观点，但后来也承认了他的学术贡献。

还有人本主义学派，心理学上的流派很多，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对心理现象进行研究的。各个学派谁也没有能把谁打败，只是在某个阶段某一学派比较盛行而已。大家都觉得这派有道理，就风行一时；过一段时间又发现它有很多缺点，另一派就起来了。最近二三十年，认知学派比较时兴，但是认知心理学现在也到了一个瓶颈处，继续发展也遇到了障碍，提出质疑和批评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与心理现象比较复杂有关，心理学到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些比较固化的理论体系，还是在各讲各的道理。冯特在感知这方面已经比较清晰了，但仍然没有完全弄清楚，比如物理反应与心理反应之间到底有什么函数关系，是对数函数还是幂函数？肯定不是直线关系，那么究竟是什么曲线关系？人们一直都还没弄清楚。在心理学中，只有艾宾浩斯记忆曲线是研究得最透彻的，大家公认颠扑不破。像这么清晰的东西不多。

举一个例子，人的心理有毛病怎样治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有一套方法，到今天仍有其门徒用这套方法来解决问题。行为主义学派则有一套“脱敏疗法”。我不管你什么精神分析、催眠疗法，你怕蛇，我就慢慢地给你脱敏。先是把蛇关在封闭的笼子里，四面都是玻璃，你当然不害怕；然后把玻璃改成小窟窿眼，跟纱窗似的；而且让你和蛇的距离越来越靠近，网眼则越来越大，以至于蛇能探出半个头来，这样慢慢来克服对蛇的恐惧；一

直可以训练到蛇缠在身上都不怕了。这就叫“脱敏疗法”或叫“行为疗法”。这有效吗？有效；精神分析有效吗？也有效。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效，某种程度上又都无效。现在就处于这种发展阶段，都不是非常成熟。心理学不像“牛顿三定律”这样板上钉钉，放在哪儿都适用，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正因为还不成熟，还没有一种确定性，心理学才让人感到更有兴趣，更有发展的机会与可能性。

陈：中国的心理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展的呢？

车：1879 年心理学在德国诞生，逐渐传播到全世界，欧洲、北美、日本，大约 20 年后便来到中国，是从德国先到日本，再从日本传到中国。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时期，开办了京师大学堂。1902 年京师大学堂恢复的时候，有两个馆——仕学馆和师范馆，仕学馆是北大的前身，师范馆就是北师大的前身。1902 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学生通习的科目（相当于现在的公共必修课）即设有心理学。1903 年《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讲教育原理，当讲明心理学之大要；《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各类科一概通习第一年心理学，第二年应用心理学，每周 2 时刻。最早在中国讲授心理学课程的是日本的服部宇之吉，他在 1902—1909 年担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正教习。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学教学是现代科学心理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传播的开端，他的讲义依心理活动的认识、感情和意志三部分论述，反映了当时西方心理学的最新内容，是从日文教科书翻译过来的。

除了北大、北师大，还有一些教会学校，如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也都陆续开设了心理学课程，这样就培养了一代中国心理学家。另外，早期还有一些出国留洋学心理学的，蔡元培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冯特实验室学过心理学，上过 8 门心

理学课，是冯特本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中国学生，我在那里拍过照，还拍了蔡元培当时的成绩单。蔡元培对推动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建立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于1917年支持陈大齐在哲学系创建我国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后又成立心理学系；二是在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于1929年倡导创建我国第一个心理研究所。这样，既有培养心理学人才的教学机构，又有专门研究心理的科研机构，为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建立奠定了人才与组织基础。我以前对陈大齐不太了解，看了你的提问单后，还专门找人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

陈：陈大齐是我曾祖父的哥哥，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专攻心理学，于1912年毕业回国，任浙江高等学校校长，1914年起任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我从网络资料上看到，他在北大哲学系筹建了一个仅有一间房子的心理实验室，开设实验心理学课程，这个实验室虽然简陋，却是中国第一个心理实验室。1918—1919年，他采用问卷法进行“北京高小女生道德意识之调查”，是国内较早的心理研究报告。1918年，他所著的《心理学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中国人自编的第一本大学心理学教科书。陈大齐1922年任北大哲学系主任，1927年任北大教务长，1929年9月至1931年1月任北大代校长。

车：陈大齐的经历与我们现在干的事很像，从心理学到人力资源、人才考试与测评。我们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就是延续了他们在民国的事业。对于这个历史还真应当好好弄弄。国民党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孙中山非常重视公务员考试，将考试院与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放在同样的高度。

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心理学的兴盛时期。美国行为主义学派崛起的时候，我们这里也有该学派的大家，在国际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中国参加国际心理学会的时候，只有二十几个会员

国家。今天中国心理学在国际上的声誉，还没达到当时的程度。此后中国内战、外战连绵不断，心理学的发展就停滞了，近年来刚刚有所恢复，先后有三位中国心理学家担任了国际心联副主席，第一位是曾任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的荆其诚老师，第二位是北师大的张厚粲老师，现在又有了第三位，现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张侃。

陈：1949 年以后，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顺利吗？

车：很不顺利。有几个原因：第一，心理学是在外面发展起来的，中国有一段时间排外；第二，就是学苏联。苏联心理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段是与西方学术体系对立的，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只有苏联承认的东西才是好的，只要是苏联反对的，一概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在 1957 年"反右派"和 1959 年"反右倾"之间的 1958 年，有一个专门针对心理学的"大批判"，这是特别独特的一次运动。批判话题是"人的感知觉有没有阶级性"。那时"左"的思潮泛滥，什么都讲阶级性。大粪是什么味？批判者说，资产阶级闻着是臭的，农民闻着就是香的，气味是因阶级而异的，没有什么人类共同的感知觉。连实验心理学的问题都这样胡搅蛮缠，更不要说社会心理学的问题了。有个老心理学家陈立，当年是杭州大学的校长，曾经与姚文元有一次争论。那时姚文元用"葛铭人（革命人）"为笔名，批判陈立的心理学观点，陈立就和他争论。他们打笔战，这是心理学界的一个著名事件。

在政治干扰下，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是非常不顺利的。1949—1978 年，心理学和政治学、社会学一样，被当做"资产阶级伪科学"，比其他学科的发展更为坎坷。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只有四个学校有心理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杭州大学（现在并入了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叫"老四系"，比 30 年代的心理学系还要少，现在估计有 200 多个学校有心理系；当时一年的心理学毕

业生大概只有100人，现在每年的毕业生有上万人。所以说，改革开放30年来，心理学的发展比较顺利，虽然也有一些小的波折。人们对于心理学的需求和认识，肯定都在增加。我们学心理学的时候，人们根本不知道心理学是什么，对于心理学有许多误解。比如说，心理学就是要知道别人心里都在想什么，这是一个最常见的误解。又比如说，把心理学与算命联系在一起。当时都是这样的一个认识水平。现在人们的认识进步了，但是仍然有人对于心理学缺乏认识，比如，我们去注册一个心理学测量的公司，工商局的人说不行，只有搞医学的才可以注册心理学的公司，才可以加“心理”二字，你们搞测评的不可以注册心理学的公司。

在“老四系”中，北大、北师大是资格最老的。燕京大学的心理系后来并入了北大；辅仁大学的心理系则并入了北师大，前面讲的荆其诚、张厚粲老师都是辅仁出身的。为什么杭州大学会有一个心理系呢？因为陈立在那里当校长。陈立1930年留学英国，是伦敦大学著名心理学家斯皮尔曼的学生，他生前是中国心理学会的理事长，2004年102岁才逝世的。杭州大学心理学系的历史可追溯到20年代末老浙江大学的心理学系。华东师范大学的心理系则是“老四系”中资历最浅的一个。

陈：我国的心理学在大学里的院系学科设置是怎样的？

车：中国的心理系大多设在师范院校，在200多个心理系中，有多一半是在师范院校，凡是有点名气的师范院校，都设了心理系。综合大学设心理系还没有普及，比如南京大学就没有心理系。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刚刚成立心理系，招了20个本科生。清华大学的心理系是2008年恢复的，还不到10个老师。南开大学原来在社会学系下面设有社会心理专业，现在升格为社会心理系了，是文科招生。

我们北师大心理学院下面有三个专业——基础心理学、发展与

教育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现在设在师范院校的心理系，大部分是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的，这块儿的毕业生占到心理系毕业生的三分之二强。中国的应用心理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综合大学新设立的心理学系，就比较注重应用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

陈：心理学主要包括哪些分支?

车：心理学的范围非常广，它的应用面也是很宽的，什么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工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还有社会心理学、政治心理学、经济心理学、艺术心理学……几乎每个学科与心理学嫁接，都可以形成一个心理学分支。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就有两个人是研究经济心理的。1978年，赫伯特·西蒙因为“对经济组织内的决策程序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而获奖。他先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行政学与心理学教授，后来是计算机科学与心理学教授。西蒙认为，现实生活中作为管理者或决策者的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管理人”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往往是多元的，不仅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而且处于变动乃至彼此矛盾状态；“管理人”的知识、信息、经验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也不企望达到绝对的最优解，而只以找到满意解为满足。在实际决策中，“有限理性”表现为：决策者无法寻找到全部备选方案，也无法完全预测全部备选方案的后果，还不具有一套明确的、完全一致的偏好体系，以使它能在多种多样的决策环境中选择最优的决策方案。追求最优没错，但是追求最优要满足很多条件，知道很多参数。比如，你要报考大学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的录取分数，你要一一搞清楚，今年有多少人要报这个学校和专业也要一清二楚，还要能够准确把握自己的考试分数，这样你才有可能作出最优决策；但实际上你得不到这些参数，连一个准确的参数都得不到，你只能得到

去年的相关数据，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争取一个相对满意的而不是最优的结果。

2002年，丹尼尔·卡纳曼因为“把心理学成果与经济学研究有效结合，从而解释了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作出判断”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和公共事务教授，兼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理性研究中心研究员。在他之前，经济学和心理学在研究人类决策行为上有着极大的区别：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外在的激励形成人们的行为，而心理学恰恰相反，认为内在的激励才是决定行为的因素。卡纳曼在不断修正“经济人”假设的过程中，看到了经济理性这一前提的缺陷，也就发现了单纯的外在因素不能解释复杂的决策行为，由此正式将心理学的内在观点和研究方法引进了经济学。他论证了在不确定情形下，人们的判断会因为依照“倾向于观测小样本”形成的小数法则行事，或因为对于容易接触到的信息的熟悉和对主观概率准确性的盲目偏信，而导致决策行为系统性地偏离了基本的概率论原理。卡纳曼的研究领域之一是享乐心理学，也可以定义为对快乐与痛苦、幸福与悲惨的研究，二者均为当期所体验并且在未来被记忆的感受。他一直试图复活边沁的效用观念，即快乐与痛苦的享用体验统治我们的生活，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实际上做什么。

现在中央财经大学有个经济心理系，有一部分人在研究经济心理学，如消费心理、金融心理等，但是还比较弱。

陈：应用心理学主要有哪些发展方向?

车：工业心理学、人力资源、心理咨询，是应用心理学的三个重要方向，发达国家的心理学毕业生，从事这几个方面工作的人很多，我们国家这些方面的毕业生还不多。

先说工业心理学、工程心理学。前面说的陈立老师就是搞工业心理学的，现任心理学会会长张侃也是搞工业心理学的。工业心理

学主要涉及“人一机关系”，也称为人因学（人类工效学，Ergonomics）。

最早的“人一机关系”，比如说桌椅板凳的设计，你要做多高、多宽，这跟人体有关，与心理学的关系还不大。但是设计一个仪表，是扇形的好还是横的好？仪表的信息人怎样接收起来最方便、最舒服？这就开始与心理学的感知觉联系到一起了。汽车里有三五块仪表，还比较简单；飞机上的仪表有一百多块，信息量太大了，你可能就顾不周全了，这就是工业心理学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有软件心理学，好的计算机软件除了要解决运算、存储的问题，还有输入输出的问题，也就是怎么让人用起来顺手。比尔·盖茨设计的windows，就比较好地解决了“人一机”界面的问题。我们以前使用计算机要使用一套程序语言，你要按照这个语言的规则去操作，它才给你做事；现在好了，这些事都由软件代劳了，你只需要用鼠标点点就可以了，操作大大方便了。我有一个同事的孩子，才两岁，还不太会说话，就会使用计算机。这里面有一个人怎样适应机器，机器怎样适应人的问题。

工业心理学的问题，是要通过实验来解决的，不是冥思苦想、理论抽象就能解决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引进彩电，最初彩电中人的肤色与我们白天日光下和晚上灯光下看到的肤色的物理属性是完全一样的，有多少红、多少黄、多少蓝，物理上的测试并不难，但这种肤色，在电视上看就让人感到很不舒服，这是一种心理感受。只是测试光学上的数据，红度是多少，黄度是多少……然后就搬到屏幕上，很难看。当时就是用两个主持人，一男一女做实验，很多人看，脸色调成什么样，你们看着最舒服，这样就定下了彩电中人的肤色标准。这种标准是心理标准，你照着美国、英国的标准做，不一定适合中国人的心理，要确定一种主观的、心理的标准，怎么办，只能靠实验的方法。

工业心理学在国外非常发达，学工业心理学的是心理学家中收入最好的一个群体。在中国这方面哪儿做得最好？我原来是中科院心理所的，心理所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以前的杭大，现在的浙大，陈立和他的学生。我的导师最初研究水电站的仪表配置——水电站的仪表太多了，操作工怎么能不失误？危险信号来了怎么能最快发现？美国三哩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的事件，就与这个有点关系。发生核泄漏了，首先，仪表是否有反应？其次，操作人员能否在众多仪表中立刻发现异常？第三，发现异常了能否在第一时间作出正确的操作？开关按钮的设计也是有讲究的，按下面是闭合，按上面是断路，如果是标准的设计，人们可以不经思索就下意识地关掉闸门。比如说家里的电视冒烟了，我一个开关就能将它关掉，危险就排除了，但是有时怎么是开，怎么是关，你不能马上确定，一迟疑就会造成危害。据说，三哩岛核电站在这方面就有设计上的缺陷。早年我在心理所搞飞行员夜航的仪表光照亮度问题，这也是一个麻烦事。人的眼睛有一个特点，如果你在暗的时候适应了，看亮的就太刺眼；如果你看亮的惯了，看暗的就什么都看不见。要么叫“明适应”，要么叫“暗适应”。在飞机中如果仪表很清楚很亮，那么你看外面的时候就会一片黑，如果你看外面习惯了，你看仪表就刺眼，这个就是工业心理学的问题。

国外有一种说法，心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从装饰品到必需品的过程。最初是这么一种学问，糊里糊涂不问，没它日子也照样过，可有可无，所以有人说，它是花瓶，摆不摆都行。慢慢地变成了调味品，就像是胡椒面，有了它味道好多了。最后才变成了生活必需品，没有它就不行，就会出大麻烦。最初是装饰品，然后叫调味品，最后叫必需品。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要经过这么三个阶段。

陈：请您再介绍一下人力资源专业，我有一些同学很想上这个

专业，可是又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车：人力资源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中是管理学下面的二级学科，但是与心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北师大心理学院还没有招人力资源专业的本科生，但设有心理测量与评价研究所、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心理研究所，我带的博士生、硕士生就是人力资源专业的。

人力资源工作包括以下几部分：选拔——选什么样的人进来；培训——招进来的人，如果有些方面不能满足工作需要，就要进行岗前培训，以后还要不断充电，就是要在工作中继续培训；考核——工作表现，什么叫合格，什么叫不合格，首先要确定标准，然后要考察员工是否合乎标准，是及格还是优秀；激励、薪酬、福利、安全以及劳资关系等等。心理学与人力资源关系最密切的有两块，一是选拔，科学的选拔就要通过测量和考试的方法，而且要具有信度与效度；二是激励，人力资源要讲究激励，怎样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与心理学的层次论、动机等有关。员工需要什么，你给他就是激励。当然大家都喜欢多挣钱，薪酬是一种激励，但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年轻人到一个单位，都希望能够发展，钱不少，但发展不了，做重复性劳动，过三五年，我到社会上就什么能力都没有了，压榨光了，所以他也不一定愿做。需求、动机、激励是联系在一起的。

人力资源是管理中的一部分工作，那么它应该算什么学科呢？它既与管理学有关，又与心理学有关，是一个交叉学科。人想事情的时候，不能不分门别类，否则想不深入，但分类后一定不能割裂来看。我学了管理后，有人说人力资源是管理中最重要的，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比如一个人，心脏不跳了，人就没了，肺出问题，人也就没了。皮肤烧伤了都能死人，哪个器官最重要？这些器官都重要，它们是互相配合的。现在分类只是一种人为的分类，一个问题

来了，既有心理学问题，又有社会学问题，等等，需要各种学问的综合运用。我的人力资源的博士学位，是应用心理学的博士；我在心理所上硕士，是理科硕士；我在师大上本科，拿的是教育学学士。一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学习和工作，不要被学科和专业限制住。

人力资源的基础是心理测量，我是中国心理学会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主任，对此比较熟悉。这里面有个故事。1936 年，苏联有一批心理学家搞测验，测量一些小孩的智商，他们得出的结论有一些偏颇，因为心理学的测量工具是受文化影响的，与受教育程度也有一定关系，在测试中忽略这些因素有时会造成偏差。他们发现工人的孩子智商得分比较低，知识分子的孩子智商得分比较高，这个结论出来后，被认为是污蔑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孩子怎么会智商低呢？这里面的具体操作有一些技术问题没有处理好，可以说他们的结论不一定都对，应该检讨，在学术上允许有争议。然而，当时由苏共中央做了一个正式的决议，宣布心理学是一门“伪科学”，苏联从 1936 年到 1949 年一直不许研究心理测量。心理研究的一大领域成了禁区。所以 1949 年以后，中国虽然允许心理学的存在，但不可以讲心理测量，在这块儿是零。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有些心理学家才出来说，心理测量不是伪科学，还是有道理的，考试应怎样考，怎么能够有信度与效度，怎么能把人的情绪、人格等用特定的方式把握，把它测定出来，还是一门非常有用的学问，这样才一点点恢复起来。

陈：心理咨询方面，现在是怎么一个情况？

车：现在社会上对于心理咨询的需求很大。教育部要求，中小学要配心理学老师，大学要设立心理咨询中心。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人们的心理压力很大，很多人都寻求心理咨询。但是我们目前就没有几个人能胜任这个工作，全国算起来，往大了说，也就是几

百人。13亿人的国家，只有几百人能做心理咨询，可见这个发展空间有多么大。这种人的培养，目前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模式，所以社会上比较混乱。现在大学里还没有这个本科专业。心理咨询师应当是在大学中培养，还是到社会上再培养？应当上哪些基础课，哪些专业课？还没有一个通盘规划。

陈：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一条2002年的消息，说是到2004年，北师大心理学院的心理咨询和辅导专业将招生70—80人。

车：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北师大现在还没有设立心理咨询和辅导专业。心理学家在人的心理健康方面所提供的服务，实际上应当分为三部分——辅导、咨询和治疗。

第一部分是心理辅导，对正常人的心理辅导。如高中生报志愿，一般的家长和孩子都不知道要报什么志愿，没有这个能力，也不知道有关的信息。我作为一个心理学家，问你20个问题，我就知道你是偏文还是偏理，理科是偏化学还是偏物理。首先是了解你的爱好与兴趣，再看看你的能力禀赋，再看看你的学习成绩，然后给你提出建议，会比你爸爸妈妈和你自己更有效、更有针对性，这叫辅导。你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正常人，只不过在报志愿这个问题上需要帮助，你自己解决起来有困难。又比如说婚姻问题，有的人也需要辅导，他不知道什么类型的配偶最适合自己，需要有人来点拨一下。

陈：现在有您说的这种帮助高中生报志愿的机构吗？

车：有，我刚刚知道在文联下面就办了一个，专门辅导学生报考专业的，但水平还不够高，也还没有打开知名度。在升学就业指导这一块，其实是很有市场的。根据我的经验，绝大多数的家长和孩子都没有这种能力应付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哪行热、哪行挣钱多就报哪个，这绝对是错误的。我觉得在职业、专业问题上，第一是

要强调爱好，除非你是连饭都吃不上了，必须先解决温饱，否则兴趣爱好就是首先要考虑的；第二，你是否有擅长做这种事的能力。这两个明确了，再看你的考试成绩是多少，能上哪个档次的学校。兴趣爱好最重要，这比什么都重要，一个人做喜欢做的事，就有无穷的动力，喜欢做就是一种享受，他就不会觉得苦和累。比如说我喜欢洗照片，以前住小平房，大夏天，热得很，一熬就是一夜，不知道苦也不知道累，换来的是第二天别人的一句评价——“车老师的照片洗得真好”，这就够了。

第二部分是心理咨询。譬如说夫妻矛盾、升职障碍、子女代沟、家庭不和等，在国外这类问题都属于心理咨询问题。稍微有点严重的问题，但又没到心理混乱、错乱的程度，像喝酒成瘾、网络成瘾，这些都需要咨询。你要增强自己的意志，戒除网瘾，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需要一步一步地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要说服你戒烟，就让你看肺癌病人的肺部标本，再一步步地讲道理。还有就是强迫症、恐高症、对于某种特殊东西的恐惧，这通常跟早期一些特殊的经历有关。有一个人说特别怕虫子，心理学家发现，他在婴幼儿时期，睡的床旁边都是养蚕的笸箩，一不小心，摔到笸箩里将蚕都压死了，压得乱七八糟，他一看就哭了，长大以后，一见到这种虫子和黏糊糊的东西就恐惧，先把这个病因弄清楚，才能解决问题——可以脱敏，也可以是精神分析。

第三部分是心理治疗。人的心理从非常健康到非常不健康，是一个连续体，非常不健康的就是精神分裂症，疯了、逻辑等都乱了。对于精神疾病的治疗，是属于医学的范畴。医学界有一个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他们的成员大部分是在医院从事医疗工作的，理事长是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的主任医师。根据现在的规定，三级甲医院必须有心理咨询医生，还有专门的精神科和精神病医院。国家职业资格心理咨询师的培训点也是设在医学院校。中国心理学会下面

设有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他们的成员大部分是大学心理系的教师，主任委员钱铭怡是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她也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两个专业委员会的沟通是否顺畅，是否在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和精神病治疗之间有了一个明确的划分与规划，我不是很了解。北京大学的心理咨询和临床心理学这一块是比较强的。

陈：在心理学方面，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大不大？

车：不同领域、不同专业，差距水平也不一样。在心理测量工具方面，国外有上万种，我们常用的也就一两千种。1978 年的时候差距是非常大的，人家很多的东西，我们好多年都不讲了，人家在干什么，在研究什么，我们都不知道。30 年来发展比较顺利，差距在逐步缩小，但是总的来说，在研究水平、人数、规模这些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比如美国心理学会大概有 15 万人，分成 54 个专业分会，每个分会都很大，在美国心理学工作者的比例和人数远比我们多。又比如说，在人工智能方面，美国能用两台最高级的计算机研究下棋，中国不可能拿出这么好的机器、花这么大的成本来研究这个。美国大一点的企业都聘用工业心理学家参与产品设计，我们的许多大企业还认识不到心理学的这种功能。

陈：您对中国心理学发展的现状是否满意？

车：这个问题挺难答。从无到有，当然是一个进步。让心理学家参与公务员考试，也是一个进步，或者说是对于民国时期做法的一种回归。但从教学、科研、应用各方面来看，许多应该做、能够做的事情，实际上还没做，我又是不满意的。也许我的这种看法有些太急，事情的发展总是需要慢慢来的，发展总有个过程。

社会上对于心理学了解、认识不够，主要是因为领导干部缺乏认识。政治局听各方面专家的课听了几十次，至今还没有请过心理学家。过去有二十多个省根据心理学界的意见在高考中推行标准分，前两年只剩下一个广东省，现在已经归零了，统统取消了。标准分就是用一种比较科学的方法将考试的分数转为一种有利于进行比较的分数，世界上的大部分考试都是用标准分，美国的托福考试、SAT 考试都是实行标准分。比如你考了一个 82 分，回家跟父母说，我考了 82 分，父母说，不错；跟着问，你们班最高分是多少，150 分，那你这个 82 分就比较低了。关键的是你这 82 分在序列里排在什么位置，绝对分数没多大意义，你 82 分，平均分是 85 分，你在平均分数之下一点。标准分给出的是你在考试中的大概位置，但又不是大排名中的具体名次。还有在人事测量这方面，有时官员说一些话，这些话不一定很科学，但作为执行部门来说，他要按领导的意志来办，他不能听专家的。

陈：对于想要报考心理学专业的高中生来说，应当做哪些准备？

车：心理学需要文理兼备，不能偏科；数学统计、科学实验，这些都很重要；另一方面，心理学不像其他理科，它的研究对象——人是复杂的，文、史、哲方面的底蕴对于学心理学也是非常重要的。既要有科学的素养，要学会推理、证明；又要有人文的素养，广博的知识，发散的思维。文理比较平衡的学生，适合学心理学。要有怀疑精神，不要先入为主，不要盲目地欣赏某一个流派，要保持一种比较冷静的理智。我举个例子，现在非常强调脑成像、认知科学。脑成像非常重要，但现在一窝蜂，认为只有这个是重要的、是科学的，这就是很大的问题，是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器物崇拜。脑成像虽然进步很大，但也很难弄清楚你从你和我的这次谈话中受到了什么启发和提高。要到那个程度，还早着呢。你与我们

一二十个各学科教授谈话以后，你的脑子里有了哪些变化，谁能说清楚？但实际上你肯定会有一个大的提高。很少有高中生会有你这种体验。

陈：谢谢车伯伯，今天您给我介绍了这么多心理学学科的情况，令我受益匪浅。

中国传媒，需要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展江教授访谈录

展　江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新闻媒介运作机制和战时新闻传播事业。他所推崇的好新闻的标准是“在纷纭世事中厘清复杂关系，摆脱流行偏见，表现职业勇气，揭示事实真相，揭露谎言谬论”。他认为“当今社会科技发达，人类文明发展很快，但任何社会都不能避免天灾人祸，如果一味排斥负面的东西，媒体就是失职”。



被访者： 展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访谈时间： 2010 年 7 月 7 日

访谈地点：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办公室

陈：展叔叔，您好。今天想请您介绍一下大学文科以及其中的新闻传播学专业。

展：大学文科，实际上包括两个部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前者主要包括宗教学、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等，还有外国语；后者主要包括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中国不想突出宗教，就把宗教研究放在了哲学里面。新闻传媒作为一级学科，是放在文学里面的。但这种分类搞得也很乱，譬如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得到的学位就是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

现在的新闻传媒专业和外国语专业，女生比较扎堆儿。一个班二十多人，可能就几个男生。我的孩子上大学也是英语专业的，他们全班就他一个男生。男孩子处于这样的环境中，也不是很舒服自在。

我们这里（北京外国语大学）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扩招。在北京，部属高校比较多。属于一本招生的、重点的、听起来名气大一点的，一般都是部属大学，不属于北京市。北外过去属于外交部，现在属于教育部。像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还有一些理工科的名校——北航、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还有对外经贸大学等等，都是部属大学。叫北京××大学的，它往往是面向全国的部属大学；叫首都××大学的，则是市属大学，如首都经贸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也有一些过去的部属大学，后来与北京市联合办学，联合后北京市给你资源——地和钱，但是作为交换，你要招北京学生。这样的大学就可以扩招了，但生源的质量也随之下降；生源质量下降后，学校的风气等就会差点。我们这里没有大规模扩招，生源质量就比较好，学校风气也比较好。

陈： 在现在的大学里面，哪几个学校的新闻传播专业历史最悠久？

展： 最悠久的应当是复旦大学，它的新闻系 20 世纪 20 年代就有了。然后是中国人民大学和广州的暨南大学。北大与人大有一个互相并来并去的关系，同时存在的只有一个新闻系，最初是燕京大学新闻系，司徒雷登办的，1949 年后并到人大，后来又到北大，再回到人大。当时的新闻专业布局，大概是南方一个（复旦），北方一个（人大）。北方这个老的新闻专业现在是在人大，北大现在的新闻专业是后来新组建的。

北京的大学数量最多，名头也最多，什么“985 工程”学校、“211 工程”学校。“985”是名头最高的，大概是 1998 年 5 月弄的，有 30 多所，北京最多，如北大、清华、人大、师大、北航、民族大学等都是，我们北外不是。北外属于“211”（21 世纪 100 所大学），那些更牛的学校既是“985”，又是“211”。我原来所在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既不是“985”，又不是“211”，因为它是团中央的学校。还有像外交部下属的外交学院、安全部下属的国际关系学院，这些特殊高校被列入了提前招生的行列，在一本（重点本科）之前提前招生和录取，理论上增加了一次机会。受官本位的影响，有些人以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是培养官员的学校，都是家长给填报志愿，孩子也搞不清楚。它在北京招生分比较低，在外地分比较高。有的地方分数高得不得了，能上北大、清华的分，报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如果在文科考生中能够排北京市前几百位，当然应当报北大、清华、复旦、人大这些综合性的名牌学校。

陈： 您刚才说，过去全国只有两所大学有新闻专业，现在大概有多少所大学有新闻传媒专业？

展： 现在几乎可以这么说，只要是个叫大学的学校就有新闻传媒专业。在北京，有这个专业的学校不下 20 个，只要是综合一点



的学校就有，北航这样纯粹专业的除外。

在“文革”前，北京除了人大有新闻专业，还有一个北京广播学院，现在叫中国传媒大学。传媒大学和北外一样，不是“985”，只是“211”。传媒大学过去偏重广播电视，现在动漫等等都有，影视这块也还好，按学校规模来说，是最大的，它还有点工科，搞通讯技术、光缆之类的。北大和清华都是2000年以后办新闻传媒专业的，质量还可以，而且各种机会多，比如出国。北师大叫艺术与传媒学院，就是于丹所在的学院，过去是艺术系，以电影、电视为主，本科还可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工商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二本）都有新闻传媒专业，但是差距非常大。

陈：在北大、清华、人大这三所名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中，应当选哪一个？

展：这要看你是选大学还是选专业。如果是选大学，当然是北大、清华；如果是选专业，我看还是人大的这个专业最强。尽管北大、清华的分比人大高，但就这个专业的本科生培养来说，北大、清华不如人大。

陈：在新闻传媒这个一级学科里面，又分了哪些专业？

展：这个专业在本科层次一般设四个专业：①新闻学（传统的，以平面为主，以报纸为主）；②广播电视新闻学；③编辑出版，为出版社培养人的；④广告。少数学校还增加了一些与艺术沾边的，广播电视编导、主持人等；少数学校还有传播学专业。过去最多的是新闻学专业，现在数量最多的好像是广告专业，广播电视新闻学也比较多。但是我认为，这种学科划分弄得有点乱。新闻学还应培养学生一些正确的价值观，广告那些赚钱的专业放在这里面，就互相打架了。广告专业可能放在商学院里面更好，现在广告与传媒结合得紧，就放在这里面了。还有就是公共关系专业，本科的少

见，主要是研究生专业。

现在各地方比较乱，自行其是，你教育部规定四个专业，我不理你。有的甚至把电教也放进来了。如果仅以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编辑出版和广告这四个专业为准，全国加起来大概有接近900个专业点（并不是900个学校）。像武汉大学有6个点，有主持人，还有网络，这两个点就是900个之外的了。北师大自己设了一个影视学，目录上没有。有的学校只有一个专业，也有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的，有五六个专业的学校，必然是在四个以外自设了专业的。

陈：那么究竟有多少个学校有新闻传播专业呢？

展：上面所说的900个专业点，设在大约500多个学校里。凡是综合性大学，像什么河北大学、山西大学、河南大学、郑州大学、南昌大学、山东大学，必有新闻传媒专业，最后填补空白的是中山大学，2003年办了传播与设计学院。还有各地的师范大学，像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也都设有新闻传媒专业。有一些过去听都没有听过的学校，也设有这个专业。前两年统计，这个专业全国在校本科生人数有13万多，现在估计还要多一点，大概是15万。

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师，多数是从中文专业改过来的。起步早点还好，如果起步晚了，现在中文与新闻隔着就有点远了，新闻专业现在还含有一些专业技术，有时更接近社会科学，更强调实证和经验研究，它与文学除了文字上相近外，其他还是有点远的。

陈：新闻传播学的历史发展是怎样的？

展：新闻学发展的时间不长，比社会学短。孔德是1838年提出“社会学”（Sociologie）这个词的，那时还没有新闻学。新闻学与其他学科不同，它不是从学术界萌生的，而是从媒体的行里出来的。大部分国家都是这样，首先是媒体人出来做新闻教育。一般来

说，还是英国、美国，尤其是美国的报业比较发达。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好多报社主要招的是高中生。一直到20世纪初，记者的主要来源都是高中毕业生。直到现在，英国、美国的报社也并没有学历限制，人们经常说，从职业化这个标准来看，这个职业与医生、律师等相比，职业化程度始终是比较低的，入行门槛是比较低的。现在国外一般的实际做法是，记者通常都具有大学学历，但是并没有一种硬性的规定，你一定要有这个文凭或者执照。100年前就有人说了，连兽医都要有执照，可是记者不需要执照，所以这个行业受到一些质疑；行业受质疑，那么学科也受到质疑。

在19世纪50年代，英国的大学里就有了与新闻有关的课程。美国南北战争中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后来担任华盛顿·李大学的校长，这个学校是美国最早开设新闻学课程的。美国最早的新闻学院是1908年成立的。新闻学在美国发展快还是一些报人推动的，报业大王后来都捐钱给新闻学院。

第一个学院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密苏里是一个中部的州，在100年前很落后，但新闻学院办得早，而且很有名，是那个学校最知名的学院。东西部的好多富家子弟都上这个大学，就奔着这个学院去的。像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的美国记者斯诺，像中国的著名报人、后来是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董显光，都在那儿上过学。“文革”前自杀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副主任蒋荫恩，也是那个学校毕业的。我的朋友彭增军，是大陆第一个密苏里新闻专业毕业的博士。现在美国传播学博士特别多，新闻学博士不多。

美国的高校有一个变化，过去讲新闻学就是纸媒，20世纪以后变了，大部分学校从新闻学改为新闻与大众传播学，后来把新闻去掉，就变成大众传播学或传播学。（大众）传播学更注重学理性，有的是与语言学靠得比较近，有的与社会学靠得比较近。从密苏里新闻学院开始，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大概就是100年左右。现在美国大概有700多个学校设有新闻系或者学院。美国这个专业很厉

害，但是也是受到质疑的。这个专业学历有多少含金量？这个专业为什么老是请老报人来当教授？别的专业都要博士出身，你为什么特殊？你特殊，这是否就意味这个专业没必要在大学里待着？现在还有一部分《纽约时报》的高级编辑在新闻学院当教授，但这种情况在减少，因为他们没有学历嘛。你在大学不能光教书，还要做研究，别人都要过博士这个门槛，你没有，你的研究就不容易被承认。现在年轻人就相对好办了，一般都是先读书，至少先拿一个硕士，然后工作几年，再读一个博士，那就没有什么特殊性了。

陈：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展起来的？

展：1929 年，复旦大学创立新闻系，燕京大学也差不多同时创立。此前，北京大学在 1920 年就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教会大学像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等都设立过新闻系，燕京算比较好的，当时是美国的教师给上课，斯诺就在燕京任过教。前年去世的人大老教授张隆栋，92 岁，他 1948 年曾任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代主任。顾执中 1928 年冬在上海创办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培养了一批记者，这个学校也是很有名的。

陈：1949 年以后这些新闻系发生了什么情况？

展：在 1952 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教会大学被取缔了，新闻学也被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来批判，燕京大学新闻学系被并入北大新闻专业。1955 年，北大新闻专业又被并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新成立的新闻学系。人大那时候都是苏联教授讲课，当时是“全盘苏化”，什么都是学“苏联老大哥”。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教授，是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他对这一段历史最熟。

原来北大、燕京新闻专业的人都并入了人大，所以人大的新闻专业就成为最强的了。人大这个学校很怪，外界认为这个学校应当行的专业，它不一定行，像中文、外语都不行；有些专业外面认为不行吧，却比较强，比如它的新闻系。据说人大的中文系是从新闻

系分出去的，而其他学校的新闻系大多是从中文系分出去的。人大新闻系还是出了一些人才的，像胡舒立就是人大新闻系的，她是1978级的。北大中文系的名人钱理群也是人大新闻系毕业的。

陈：“文革”对新闻传播学有什么影响？

展：那时候还没有“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传播学专业是90年代以后才进入中国大学的。“文革”的时候，毛泽东说“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所以清华、北大侥幸被保留下来，人大是纯粹的文科大学，就被扫地出门了。人大新闻系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陈：1978年以后呢？

展：1978年以后，新闻学界有个说法，叫做“南复旦，北人大”。人大因为靠近政治中心，可能比复旦的发展有优势。过去人们都认为人大在政治上“跟风”，但是80年代的人大，内部还是有一点学术自由的空气的。80年代政治气候比较好的时候，人大舆论研究所就做了不少舆论调查，做政治性的舆论调查。1992年之后就变成搞市场化的调查了。

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与人民日报社合办了一个新闻系，一度招生很多，培养了很多研究生。当时人大新闻系每年只招五六个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与人民日报社合办的那个新闻系最多时招七八十个研究生。是温济泽先生当研究生院院长时弄的，主要是为《人民日报》培养编辑、记者。80年代末以前加起来还不到十几个新闻系。那些人好像发展得还不错，薄熙来就是那里的研究生，现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也是。

陈：现在的中文专业和新闻专业，招生的时候哪个分数高？

展：新闻专业的分数更高。现在的人都是很实际的，中文毕业到哪儿工作啊？说不清楚。新闻媒体多风光啊，高分学生都被新闻系忽悠来了。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都是一样

的，有些状元报中文专业是例外的情况。现在家长在报专业的时候都很重视就业，四年后孩子干什么啊？所谓媒体的概念是跟电视走的，过去不叫媒体，就叫新闻。一说媒体就指电视，就想到主持人什么的。家长认为，女孩子当个主持人，轻轻松松的，又很体面。学外语的、学传媒专业的女生特别多。

陈：如果将来要成为一名媒体工作者，在大学本科学中文或者学新闻，有没有很大的差别？

展：那就要看学校了。学校差，可能学中文好些；学校好，还是学新闻好一点。胡舒立最近担任了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确定了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按照传统美式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和教学方法去做，还有一个就是新媒体。新媒体这块一般只有新闻传媒专业有，中文专业哪有机会摸机器？一般学校都重视技术，都愿意上设备，但是它的理念不行，技术与理念结合不好肯定是不行的，这容易让学生产生工具化的倾向，让学生就是为了挣点小钱，没有什么想法。胡舒立与他们不一样，还是很有想法的。但是中文专业根本就没有设备、没有技术。光有理念没有技术肯定也是不行的。技术日新月异，所以中文专业的人搞传媒，可能会跟不上形势。有人说，传媒这块，技术上讲是文科中的理科。技术所占的比例，不好说。各个学校的条件不一样，师资、设备，还有招生规模也不一样。规模太大了，实验室里装不下，没法弄。现在有的学校过于商业化，一个学院，20 多个老师，却招了 1000 多个学生。意识形态化和商业化，对于教育都是有冲击和损害的。我承认技术的重要性，但把传播和设计放在一起是否合适，还值得研究。设计的技术性、商业性太强了。而文科生掌握一些技术，主要还是要为传媒服务的。

陈：新闻传播学本科生的就业前景好不好？

展：也要看学校。像北外的新闻传播学本科生，既沾点专业，

又沾点外语，就业前景肯定好。总体来说，比其他专业不差。好的学校，大约30%～40%进入媒体，有出国的、有升学的、当公务员的、去企业的、去街道办事处的，还有当城管的。地方上的学校就比较乱，南京艺术学院过去不错，后来也是跟风扩招，设了一个主持人专业，招本科生，一年招150人。后来听说，有一届学生毕业后，150人中只有2个人进电视台，还不是当记者。与其他专业相比，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就业的问题并不是特别突出的。招生过热、过滥，说了10年了，但招生人数还在继续增长，特别是民办大学。我想，这个专业，如果学校底子薄，你不妨就把它看成是文秘专业，将来总可以做文秘工作。

陈： 媒体本身的发展这几年是怎样的？

展： 近年来媒体的发展是比较快的，每年都有增量。传统媒体对毕业生的需求主要是人事的自然更新，就业增量并不多。媒体的就业增量，主要是靠新媒体的成长，也就是互联网的各种网站和增值服务对人力资源的需要。

新闻专业有为网站开设的课程。现在说的是融合，全媒体——文字的、视频的、摄像的，一个人要什么都会做。新闻系有些理念还是比较好的，独立啊、监督政府啊、法治啊，这都是不错的。这方面比以前也有了进步。比如让我开一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课，我就讲马克思、恩格斯，不讲斯大林。马恩也讲新闻自由嘛。

陈： 如果要从事新闻工作，是在大学本科读新闻专业好，还是研究生读新闻专业好？

展： 都可以。香港好像没有本科新闻专业。中山大学的传播与设计学院，以后也会侧重研究生教育，减少本科招生。但是本科读经济学的人，回过头来读新闻研究生的非常少，因为经济学专业的人收入一般都比做传媒的人要高。

陈： 那么财经类传媒的人是从哪儿来的？

展：哪来的都有，他们在录用的时候没有专业上的限制。现在媒体人员的构成是相当多元的。学新闻学的也有，学语言文学的也有，学经济学的也有，学社会学、心理学的也有。

新闻传播系的学生兼学别的，我也支持。我在中青院有一个本科生，江苏无锡人，聪明得不得了，一天到晚抱着经济学的书看，我觉得很好，建议他转到经济学系，他说新闻系也不错，不妨碍他发展。现在正在名校读经济学博士。每个学校的做法不一样，很多学校都有双学位，我过去在中青院时，不设双学位，但我们经济学的课开得比较多。

陈：刚才您说，中山大学要减少本科招生，增加研究生，这种研究生出来是到传媒工作，还是搞研究的？

展：有两种研究生，职业型和研究型的。职业型的学两年左右，研究型的需要读三年。香港比我们分得清，它的职业型研究生只需要读一年。

陈：因为我从小就喜欢体育，我妈妈曾一度建议我上北京体育大学的体育新闻专业。您怎么看？

展：即使你将来真的要当体育记者，也要上一个综合性大学的新闻系。像北京体育大学的新闻系，是这几年刚刚开办的，底子比较薄。

另外，从记者这个行业的历史传统来说，有两种记者属于低端：一个是跑体育场馆的记者；一个是跑公安局的记者，专门采访杀人、放火、强奸、抢劫之类的社会新闻，也就是街头上的一些事。这两种记者是不需要多少技术含量的，主要是报道一个结果，不需要做深入的分析。通常是在刚入行的时候干上两年，然后转向做财经新闻、法律新闻等等。做法律新闻的人，对于法律、规章等要比较熟，不能讲外行话；对于一些有争议的事情，要有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半法治国家，不断出现一些

新的东西，新闻记者不光是报道现实，而且能够影响改革进程，甚至影响到未来的立法。一般做体育新闻的就起不到这种作用。当然，如果你确实喜欢体育，当个体育记者也是不错的选择。有很多机会出国，与各国的体育记者和体育迷交流，等等。

陈：从事新闻事业需要有什么样的素质？做编辑和记者，是否有不同的素质要求？

展：思路敏捷、反应快、文笔快、节奏快。这个行业的人有一个缺点，生活不规律；还有一个：高离婚率，这种外向型与人打交道的职业，就是这样的。太内向的人，不适合从事这个职业。

在西方，编辑也是从记者做起，没有一进去就当编辑的。当然，在中国也不是绝对的，以前李银河在《光明日报》的时候，一进去就是编辑，不是从记者过来的。英美没有这种情况。编辑是比记者要求高的职业，编辑相当于一个小的主编，至少是一个组长，他要派活，对组员做一些安排。现在传统报业不行了，但是传统的理念还在。

有教养，家境既不是很穷也不是很富，有点对底层的关怀，也没有富人的习气，做记者最合适。过去人大新闻系的学生好打架，平时有点懒散，但干活的时候就显露出来了，出活！学新闻的人心里没有权威，他是反权威的，蔑视权贵，什么都看不上，这是比较好的理念。现在有好多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敢挑战现有秩序，这是不行的。中国的媒体，要成为有公信力的媒体，需要一批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陈：如果我大学读了新闻传播学专业，您建议我将来去新媒体，还是去传统媒体呢？

展：你肯定要接触新媒体。以后没有绝对的传统媒体了，传统媒体将来肯定都要视频化、网络化。传统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等，前两种又叫印刷媒体，后三种又叫电子媒

体。新媒体就是基于IT技术的，比如网络、手机等。

现在除了传统媒体要发展网站，比如说人民日报社办人民网，新华社办新华网；还有一种全新的网络媒体，比如说新浪网、搜狐网这一类的门户网站。门户网站除了美国只有中国有，欧洲都没有这个东西。第一，因为欧洲传统媒体强大，新闻自由有保障；第二，严格的版权法限制了这些国家网络媒体的发展，什么东西都要有协议，才能转让、购买。而中国是山寨世界，新浪网的新闻都是免费的，因为其他媒体想通过它扩大影响，都是免费提供新闻的。门户网站不是官办的，是商业化的，甚至是外资入股的，因此门户网站的自我约束少（当然近期官方的管束多了），比官网（包括政府网站和官方媒体的网站）更受欢迎。网络媒体现在有多少人就业，我说不清楚，根本来不及统计，因为变化太大、太快。

陈：谢谢展叔叔。听了您的话，我对于新闻传播学以及传媒业总算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人性需要打磨，艺术的训练必不可少
——崔卫平教授访谈录

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教授，著名翻译家和文化批评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文艺理论和当代中国先锋文学。近年来同时从事思想文化评论写作，并译有当代中东欧思想及文学，早年曾活跃在先锋诗歌圈子里。



被访者：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教授

访谈时间： 2010年9月18日

访谈地点： 北京市顺义区崔卫平教授寓所

陈： 崔阿姨，请您首先介绍一下大学艺术教育的概况。

崔： 艺术这个学科，特别是大学里面的艺术门类，它不叫艺术学。不像物理学、化学，或者说哲学、医学，在大学里是一个系别的学科，一个知识的体系，它首先是一个艺术的操作，不是一个研究的学问，严格意义上应该说是一个艺术实践，所以我们只说艺术门类。艺术门类是很具体的，比如说，电影、戏剧、戏曲、美术、舞蹈、音乐。实际上任何一个艺术门类当中，也有具体的分工，比如说我们电影学院有编剧专业、导演专业、摄影专业、录音专业、动画专业、表演专业等等。音乐也是这样，比如有小提琴、大提琴、长笛、钢琴、声乐，专业区分得非常清楚，相对于学术的门类是很不一样的。

学艺术的学生，首先是要掌握这门艺术实践，而不是把主要的时间用于研究有关这门艺术的学问。当然在艺术门类中也有研究学问的专业，但是很少。像我们电影学院还有一个电影学系，电影学系主要是做一些电影理论和电影史的研究。又比如说我们文学系的本科有两个专业：一个是编剧专业，一个是所谓理论专业，后者主要涉及电影的理论与评论。其他艺术院校的情况也类似。

陈： 在传统教育中，艺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崔：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人讲琴、棋、书、画，讲六艺，其中也包括音乐，包括艺术。在任何一个文明的人文教育里面，艺术总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在西方，很长时间里，从古希腊悲剧开始，一直到法国古典主义戏剧，戏剧一向是公民教育的课堂。假如我们认为人性是不完善的，人性是需要打磨的，理性需要

更加清晰，感性需要更加敏锐，那么艺术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现在的教育是把艺术变成一个专业门类了，学哲学、学历史的人，更不用说学理工的人，认为学习艺术不是一门必修课。这其实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陈：在现在的教育体系中，艺术是什么时候成为一个专业门类的？

崔：中国从有现代教育起就有艺术教育了。这里面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学科中的艺术教育，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专业的艺术教育。如果你想报考艺术类专业的话，这基本上就是你今后吃饭的手艺了，我们需要一些专门的艺术人才。如果你是学其他学科的话，同样也非常需要接受艺术的教育，艺术的熏陶。

陈：是不是有一个时期，艺术专业教育属于专科教育，不属于大学本科教育？

崔：实际上过去的人并不像现在的人这样重视文凭。我们现在不论做什么都要本科毕业，而以前进入艺术专科学校，也就相当于艺术的高等教育了。譬如说在历史上名气很大的美专，就是一个美术的专科学校。我们传统的戏曲学习，都是徒弟跟着师傅学，不用上艺术院校，也不需要拿一个高等教育的文凭。后来都被格式化了，纳入一个文凭的制度了。戏班子里面就是师傅带徒弟，一出戏一出戏地学，现在把它提炼出来，有一些基本动作，或者是基本的唱腔，或者是基本的旋律等，把传统的东西总结、提升了。

今天，即使是在艺术院校里面，比如说像音乐学院，或者戏曲学院，也包括美院，基本上还是保持着师傅带徒弟这么一种基本状况。音乐学院里老师教你拉小提琴，就是这个音拉得准不准，这个曲子是怎样处理的。这个学生到什么程度，拉什么曲子，可能与别的同学不一样，那是非常具体的指导。最有效的学习方式，就是一个人的上课方式，就是你拉给老师听，老师听了给你纠正，这就是

师傅手把手地教徒弟。其实包括我们电影学院，在扩招之前，也是小班制教学。从前我们电影学院任何一个班都不准超过 12 人，而且不是每年招生的。譬如说导演系，1978 年是陈凯歌、田壮壮这些人，接着就是 1985 届，王小帅、娄烨这批人，这中间就没有招本科生，只有一些进修班、专科班等等。招的少、小班制，这实际上都是一个思路，就是师傅带徒弟的思路，也就是手把手的教学思路。

编剧专业也是小班制。不论看小品、看剧本，老师都要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一段一段地看，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地看，就剧本的上下文，提出非常具体的意见，不能笼统地说说而已。学生最后拿出来的不论是剧本，还是摄影的作品，那都是手上的功夫。手上的功夫就要手把手地、非常具体地指导，那种上大课的方式，根本就是不到位的。现在扩招后，一个班是 20 个人，每个学生被关注的程度就小了，如果扩招一倍，那么每个学生得到老师的关注就少了一半，教学质量肯定要下降。

一般学校的中文系会招 40—50 人，可能也没什么；我们这里 20 个人一个班，已经人满为患了。比如电影欣赏这个课，对于每个细节的讨论，比如导演和演员的处理是否合适，每个场面的灯光是否合适，场景的处理是否合适，都是非常细致具体的。20 个人就了不得了，你弄了 40 个人甚至更多，就没有办法讨论了。

陈：看片子是多少年都看一样的片子吗？

崔：不是，主要看老师。什么样的老师，会选什么样的片子。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影片欣赏课，但是各个老师会根据自己的教学需要、教学目的、教学大纲，以及那堂课所要完成的具体任务，安排一些有针对性的片子来放映。

陈：现在国外的艺术教育与中国的艺术教育有什么区别？

崔：这个问题是蛮大的，我想还是谈一些具体的方法问题。我

先生曾在美国旧金山艺术学院学习，此前他也在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过。他在那边学电影，和这边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他们有一门课是这样上的，要让你学习拍一个东西，拍什么随你的便，老师也不会教。那么我不会使用机器怎么办？没关系，你自己去找管机器的老师。设备科的老师会将基本的操作告诉你，还会把说明书交给你，你自己看说明书就会了。当你有拍摄的动力和压力时，看说明书就很容易，并不需要老师将机器怎样使用讲得很细，你自己摸索一下就会用了。如果老师不告诉你拍什么，你可能很苦恼。老师说，你来干什么的？你不就是想学习创作的，那么你不是拥有创作冲动吗？你想表达什么东西，只有你自己知道。到上课的时候，同学与老师谈自己的拍摄计划，老师给你参考意见，没有学生也没关系，老师就坐在那儿等着。如果你不来，老师怎么教你？如果你没有问题，老师怎么帮助你解决问题？所以主动性在学生那里，动力、起点都是你自己的。这是很大的不同。学校领导也不会关心，你班里的学生走了没有？学生干什么去了？我就是在这儿给学生答疑的。这样学生是一个主体，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学生找到自己的起点，找到自己思想感情的出发点。还有一门课是这样上的。他们一个班有十一二人，在场地的中央，请一个学生将一个绳子的结解开，其他的学生来拍摄这个过程。大家的角度不一样，拍出来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然后大家来分析，我为什么这么拍，你为什么那样拍。这个分析不是说哪个同学拍得对，哪个同学拍得错，而是说他这么拍有他自己看待事物的眼光，有他的敏感点，他的发现角度是不一样的。

老师要想尽办法，从实际出发，寻找到每个同学的起点和动力。那边的老师不是将统一的问题强加给学生，而是我有我的问题、你有你的问题，作为老师是来帮助你解决你自己的问题的，不是说我把我心目中的问题带给你，把你讲得一头雾水。这种教育就是帮助学生建立他的主体性，找到他创作的出发点，让学生能够通

过了解他自己来了解世界。我们国家的教育，长期以来，使得学生在寻找自己的起点、创作灵感等等方面都比较弱。西方的艺术教育反倒像孔子所说，因人而异，一个学生一个风格，一个学生一个节奏，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最不能干的老师，就是将统一的标准强加给所有学生。大班教学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

一个艺术家是不能被教育出来的。只能说是在已有的基础上，对他的天赋、他的灵感、他的原动力加以培育。所有的潜质和能量，都已经在学生身上具备了，只是加以适当的点拨。老师要特别平等地对待学生，不能居高临下。老师有很多创造成果，学生将来可能比你更有成果。所以老师与学生要像朋友一样彼此相待，而不是高高在上、咄咄逼人，不要老是对学生说这儿错了，那儿错了。一个老是被人说“错了”的人，怎么能够确立自己的艺术个性呢？不用怕学生出错，他能在纠正自己错误的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现在中国的艺术教育，乃至整个的中国教育，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陈：中国艺术教育未来发展是怎样一个趋势？

崔：你问的都是挺大的问题，不好回答。我看这种趋势要从自己的经验中去总结吸取，而不是简单地引进一种外国技术或外国模型。要谈论未来发展的话，就要看自己现在已经干得怎样了。我们的艺术院校不尊重学生的个性，缺乏人文教育。一个学艺术的人，你不能仅仅学会一些技能。艺术有一个与人交流的问题，还有自身涵养的问题。你与人交流，有涵养才能与人交流。不要以为你的观众没有像你一样学艺术、学技术，他就什么都不懂。观众是有涵养的，观众里有像你爸爸和我这样的，我们学过哲学、历史、社会科学，我们积累了那么多的人生经验，我们要求作品能够满足自己多方面的要求，包括在伦理上。这就要求艺术家要有艺术史的造诣，还要有哲学史、文学史、历史、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准备。搞纪录片的同学，就要对人类学、社会学足够敏感；文学系的

同学，就要对戏剧文学敏感；导演系也一样，对戏剧文学要清楚，你都要做一个更深入的准备。

尤其现在都是艺术类的本科，不是专科。本科是什么？它不是培养专业人才，是培养艺术家的。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艺术院校目前在人文教育这一块，是很薄弱的，非常有缺陷的。我们电影学院到现在还没有人文学院，据说中央美术学院早就已经设立了一个人文学院。我们整个电影学院差不多就两个文学老师，实际上就一个半，其中一个老师还要上艺术概论的课。听说那个教文学的老师的课时量还不饱和，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文学课。当然，有的老师会针对自己学生的情况来补一点点，很多专业是没有文学课程的。以前我们电影学院是很重视文学课程的，还有一个专门研究《红楼梦》的老师，很重视文化品质。

我曾经听学摄影的同学说过，真正的专业课他们一年就学完了。不要把上大学狭义地理解为上课，实践也是很重要的。你拍东西，回来后让老师点评、指导，这也很重要。在课堂上的课实际上只占一部分时间。当然各个专业是不一样的，比如你学小提琴，哪怕你上了音乐附中后再上大学，也还有个专业课的逐渐深入。应该说，传统的门类技术含量要求可能会更高一点。像电影学院摄影系，要想学得好也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大量的实践，但上摄影系的门槛比拉小提琴、弹钢琴要低多了。小提琴从六岁就开始学，学摄影就不需要从六岁学。有一些现在很流行的、很商业化的东西，对于基础性的训练，要求就不一定那么严格。不过大家认可的人，还是过了传统的铁门槛的那些人。

陈： 现在的学生与十几年前的学生有什么差别？比如说在艺术素养、学习热情、学习方法等方面。

崔： 这不能一概而论，只能做一个大概的比较。二十几年前的学生与现在的学生差别还是很大的。十几年前的学生，比如 1993

年的学生，与现在的学生差别很大。当时人心浮躁，大家都在做生意，大学生整天也是想着生意，除非你给他 100 块钱，否则他就没有理由坐着听课。我们的国家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后来就有点回归了，现在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常态的情况。我就把现在的常态与 80 年代的常态（如 1985 年、1986 年、1987 年、1988 年）来比较，我觉得现在的学生相对来说个性比较弱，主动性比较弱，在艺术上想法比较少。80 年代的学生，都是自己主动去找什么东西，自己确定一个艺术上的目标。要达到自己确定的艺术目标，需要做些什么准备，要看哪些书，要看哪些片子，自己就一定要想办法找到。现在的学生是无可无不可，不如以前的学生有个性、有动力。

陈：现在的艺术门类本科生，毕业后都是从事艺术工作吗？

崔：这个就很难说了。一般来说，你的训练时间越长，专业技术越牢固，例如音乐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做艺术工作的还是比较多的。电影学院出来的人，真正做电影的可能就少一点。现在电影市场还是比较小的。就拿你本人来说，你一年到电影院看几部电影啊？学电影的人那么多，而每年放映的国产电影的数量，或者说我们国家进电影院的观众数量还是非常有限的。没有那么多的电影可拍，就拍电视剧，或者从事广告行业，这些还是与影像有关系的行业，就算不错了。我不知道 20 个学电影的学生能进入电影界的是否能有 2 个。如果有，就相当不错了。而如果 20 个学生里有 10 个做电视剧的，也相当不错了。

陈：看来电影学院的毕业生还是有相当大的就业压力。

崔：现在的就业出路，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各种各样的去处。比如我的研究生，分配到中国科技馆，设计活动的画面，他也去了。也有的去了大学做老师，这是比较好的了。也有的在电视频道，都算相当不错的了。也有一些到了各种公司里面工作。

陈：我看郑也夫教授的书上讲，将要来临一个“游戏的时代”，

从事狭义“生产”的人的比重会越来越小，更多的人应该是搞艺术和游戏什么的，这会导致艺术院校在规模上的不断扩大吗？

崔：郑也夫是在预言一个新的乌托邦啊，这可能是比较遥远的事了。或者社会富裕了，有一部分人不是为就业而上大学，就是训练一种素养。比如在美国，我先生曾就学的旧金山艺术学院的老师就跟他们说，你们来这儿不是为了就业，很难说你将来会从事你们所学的专业，但是学校可以给你一个起点，你将来如果有可能要从事艺术，你就可以从这里开始。

陈：艺术院校现在还会进一步扩招吗？

崔：我认为，如果不增加投入、改善教学条件，就不能再扩招了。你扩招了一倍，老师并不增加，这只意味着对学生关心少了、照顾少了、促进少了。

陈：难道就没有增加一些老师的考虑吗？

崔：我不了解是否有这个考虑，因为至少目前我没有看到。做教育，多安排一门课，少安排一门课，表面上是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的。但只给老师身上加课时、加任务，不注重对教师自身素质的培养和提升，最终也会影响到教学质量。

陈：像我这样的人，没有从小就接受艺术训练，有没有可能报考艺术院校呢？

崔：非常难。如果你完全没有受过训练，就不可能考上艺术院校。报考艺术院校的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小就接受相关的训练，自己也非常喜欢这门艺术。譬如说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他就是对画画感兴趣，也有一点基础，最后他说服了家长，来考艺术院校。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孩子上高中以后，文化课不太好，估计考不上本科院校了，怎么办呢？家长就让他从高二开始，学绘画或者学点音乐，考动漫或者录音系。如果说，你既没有从小练习也没

有经过一两年的专门训练，没掌握任何一门技能就直接报考艺术门类，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包括导演系，他也需要一些基本的艺术的训练，光背背艺术史、谁创作了什么作品，这是不行的。艺术本质上是一个动手的熟练工种，专业必须有所积累。有些学科，像物理学，到大学才能积累，艺术是需要提前积累的，一点基础都没有的人，我认为要搞艺术是不可能的。比如舞蹈，你不可能 18 岁才开始练，韧带已经拉不开了。

陈：像舞蹈、音乐这样的专业肯定是不行的，但艺术门类里是否有个别专业可以为中途想进入的人提供机会？导演专业为什么也不行呢？它都考些什么？

崔：导演专业招生的时候，要考对影片的分析课。你没有拍过电影，但起码要有看电影的训练，看得多了才能看出一些门道。对电影中出现的灯光、音响、剧情，你要显露一点专业背景，我们改卷的老师就会注意到，分析挺到位的，确实有一些专业素养。我个人认为导演系也不一定在各个方面已经积累起来很多，但如果你有积累的话，在考试的时候会比较有利。

陈：这么看来，临时抱佛脚是不可能上艺术院校了。谢谢崔阿姨，通过今天与您的谈话，我对大学的艺术门类总算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附录：文科主要学科介绍

本部分内容以我国现行学科划分中的“学科门类”中的文科类别和个别的一级学科作为对象进行介绍，但在介绍过程中并不局限在一级、二级等既有狭窄学科分类中，而是力图从整体上对各学科和其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予以概要介绍。

经济学 Economics[1]

自文科扩招以来，经济学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极其热门的专业，这也是拜当下仍处于变革进程当中的中国经济发展所赐。不过很多高中毕业生在真正进入大学以前，恐怕并不明白经济学究竟是怎样的一门学问？很多中学生大概是把经济学与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乃至于管理学学科中的工商管理、财务管理等都视为经济学——经济学就是一门教人如何做生意和赚钱的学科。由于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影响，也会有小部分中学生将教条化以后的“政治经济学”视作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学，这也与现在高校经济学主要课程设置不相符。因此笔者在此对经济学的缘起和发展作个简单的介绍。

---

〔1〕选取自吴敖祺《大学文科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作者在写作中参考并引用了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 1923－1953》，任金帅《清末经济学高等教育的初步发展》，田正平，商丽浩《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制度变迁、财政运作与教师流动》，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等多本多篇研究著作和论文。因本文非学术论文，故没有一一予以标明。重要引用的“文字段落”，笔者皆以引号标注。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更侧重于理论探讨和社会政策研究的层面。这一学科的着眼点并不是具体的实务和应用型教育。而是通过教育让学生掌握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思维分析方法和各种计量工具，并能够将其运用于分析各种经济现象——从家庭理财、企业运作到政府实施的各种社会政策等等。美国经济学者格里高利·曼昆（N. Gregory Mankiw）提出“经济学十大原理”用以概括经济学分析：

人们如何作出决策

1. 人们面临权衡取舍
2. 某些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
3. 理性人考虑边际量
4. 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

人们如何相互交易

5. 贸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
6. 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
7. 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

整体经济如何运行

8. 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
9. 当政府发行了过多货币时，物价上升
10. 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

（一）学科历史渊源

我们现在所谈到的经济学，在通常意义下都是指的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从西方思想学术脉络中诞生的。在西方，对经济现象的研究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有成文探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古希腊学者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而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理想国》及其学生亚里士多德的多本著作中也涉及对经济现象的讨论，包括从伦理学的角度作出评判。

在过去，经济学曾被视作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学之父”

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曾经担任过道德哲学教授，著有《道德情操论》。而他最为人所称道的著作《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被视作是现代经济学真正意义上的起源之作，在著作中他提出了经济学中最有名的理论“看不见的手”——大意为“正常情况下，市场会以它内在的机制维持其健康的运行。其中主要依据的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人理性原则，以及由经济人理性原则支配下的理性选择。这些选择逐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这些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之中支配着每个人，自觉地按照市场规律运行”。之后，两位英国学者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在斯密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学的理论范畴，彻底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也使得经济学逐渐脱离政治经济学范畴而成为一门独立建制的学科。

而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全球化贸易的扩张，西方社会贫富悬殊加大、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比比皆是，周期性经济危机若隐若现。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剩余价值”等理论，树立了左翼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传统。而在20世纪初世界经济危机“大萧条”的进一步刺激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开创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传统。他主张“国家应在宏观上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使用调节利率、税率以及增加政府开支等方法平衡供需结构”。

（二）中国历程

由于“富国强民”的政治需要，西方经济学在清末就开始传入中国。最早的经济学高等教育可以追溯到京师同文馆。1876年京师同文馆所公布的八年课程表中的第八年习“富国策”，就是以Henry Fawcett所著的*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

济学指南》）为教材，而他却不是一个受过现代经济学专业训练的学者。值得一提的是由福州船政学堂派往英国学习海军军事的严复，在1902年就翻译出了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当时译名为《原富》），被认为是“经济科学之最先输入我国者……使国人获见经济科学之全貌”。

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行全国，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分为八科：经学、政法、文学、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商科。当时经济学附设于政法科之下，其相关课程主要由政治学门与法律学门开设。1910年学部奏改法政学堂章程，于正科中另专立“经济”一门，自此经济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此项变革对于中国近现代经济学教育发展历程中的意义可谓重大。有研究者评论这段时期的经济学教育：“清末经过学制大变革，经济学教育已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从大学堂到高等学堂，甚至中学堂都有经济学相关课程的开设。这一教育体系后来由‘中华民国’政府承袭，略加改造，成为了民国时期经济学教育体系的基础。”如1912年11月2日，民国成立后第一年教育部公布法政专门学校规程令，规定“法政专门学校分为三科：一、法律科、二、政治科、三、经济科，前项政治、经济二科不分设者，得别设政治经济科”。

到了“中华民国”时期，1913年1月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中将系科设置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和工科等七科，其中法科分为法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三门，而商科中的银行学、保险学、外国贸易学和税关仓库学其实也与经济学息息相关。当时全国各高等学校都开始纷纷开设经济学和商科专业。以北京大学为例，“1913年暑假后，北京大学新招分科学生入学，法科招法律、政治、经济各一班。当时北大是全国唯一的国立大学，北大新招一班经济专业学生，恐怕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经济专业学生。1915年留美学者马寅初任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教授。1919年北大废门改系，有了经济系的设置。1917年10月，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研究所成立”。

20世纪初叶庞大的中国留学日本学生群体中，法政科的学生大都学习过经济学课程。“经济学”学科译名就是来自于日本。而在这之后，留学欧美学习经济学的中国留学生日益增多，英国学者罗素曾在著作中指出：“1916年中国202名学生在英国学习，学习人数比较多的科目有：医学50人；法律和经济47人；工程技术42人；矿业22人；自然科学19人。”有研究数据表明，“在整个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1921—1925年这5年的留欧学生，学习法政经济科目的人数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位居第一，超过其他各科人数总和。在所有16个科目中（除去未详），也位居第二，仅次于学习工科者。如果将学习法政经济科与商科相加，总人数达285人，高居各科之首。”留美学生群体中，学习经济学的人数更是名列前茅，研究数据表明：“1909—1929年清华留美学生共1289人，选学人数最多的前5个专业是：经济125名、政治74名、土木工程73名、化学72名、机械工程69名。学习经济专业的人数在72个具体专业中高居第一名，远远高于二、三名。另外，选学商科（包含4个专业）的人数也高达142人，仅次于选学工程的学生人数。把学商科和经济学专业的人数相加，共达267人，占总数的20.71%，这还不包括大量学经济的清华特别生、津贴生，如马寅初、刘大钧、宋子文、杨杏佛等。”

北京大学老校长马寅初就是当年留学欧美研习经济学专业的佼佼者。他1906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一年级本科生的教科书。其他还有陈锦涛、何廉、陈岱孙、赵迺传等经济学者的理论水平，已经接近或达到当时国际经济学界的先进水平。

1923年11月，留美归国的经济学者刘大钧、陈长蘅、陈达等人与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戴乐仁等人在北京创立中国经济学社。1924年马寅初等人也加入其中。该学社吸纳了当时绝大部分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人才，以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影响政策导向为己任。宋

子文、孔祥熙、胡适和王云五等政界和文化界要人都曾参与学社活动。由此可见，当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传播者在中国高等教育界都是位居主流。

1949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建立，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主导思想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特别是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亚当·斯密、马歇尔、凯恩斯这些传统意义上的西方经济学，一律被称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遭到取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如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在中国大学得以确立为指导思想。对西方经济学只在很小范围内保持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介绍，更多都是对所谓"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判。

直到改革开放，经济学学科高等教育才再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回归。经济学界逐渐由"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范式"转向"市场经济范式"，西方经济学专业在大学里得以重新开设。从学科发展来讲，经济学毫无疑问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科学"重建"进程中的最大受益者，由于中国改革对经济学理论的倚重——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工业化、城市化、新农村建设、区域协调发展、资源与环境、医疗保障、教育、通货膨胀、人口问题等诸多社会问题都需要经济学作出其理论政策贡献。"中国与世界接轨"所带来的中国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国际化"和"规范化"，大量西方经济学教材在中国得以出版，经济学类别的新兴学科也不断得到引入。时至今日，西方经济学的各个分支（新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等等）和理论流派（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等等）都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得以介绍体现。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国内院系与欧美院校的交流日益普遍。同时，中国经济学课程设置逐渐开始与西方接轨，各种经济研究中心和金融研究中心以及商学院也都纷纷设立。中国经济学界的理论研究水平以及教学水平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里面应该算是最具有"国际水准"的学科了。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经济学者林毅夫在2008年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这不仅象征着中国国家实力在全球空间范围内的上升，也象征着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水平逐渐得到外界认可。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属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海归”学者，其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曾被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他还曾应邀担任久负盛名的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MARSHALL LECTURES）主讲人，这是登上该讲堂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笔者在此引用林毅夫先生的一句话给有志于在未来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中学学子借鉴——“研究中国的经济现实，进行理论创新，不仅能够使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贡献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有可能迎来一个经济学大师辈出的时代。”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2007—2009年经济学学科排名[1]

理论经济学

排名	学校代码及名称	整体水平得分
1	10002　中国人民大学	85
2	10001　北京大学	82
	10055　南开大学	
4	10246　复旦大学	81
5	10284　南京大学	79
6	10486　武汉大学	77
7	10558　中山大学	76
8	10384　厦门大学	75
9	10183　吉林大学	74
10	10272　上海财经大学	73

〔1〕评估资料见：http://www.cdgdc.edu.cn/xwyyjsjyxx/pxb/xksppx/rwskl/。

应用经济学

<table>
<tr><th>排名</th><th>学校代码及名称</th><th>整体水平得分</th></tr>
<tr><td>1</td><td>10002　中国人民大学</td><td>88</td></tr>
<tr><td>2</td><td>10001　北京大学</td><td>78</td></tr>
<tr><td rowspan="3">3</td><td>10034　中央财经大学</td><td rowspan="3">75</td></tr>
<tr><td>10272　上海财经大学</td></tr>
<tr><td>10384　厦门大学</td></tr>
<tr><td>6</td><td>10173　东北财经大学</td><td>74</td></tr>
<tr><td rowspan="3">7</td><td>10055　南开大学</td><td rowspan="3">73</td></tr>
<tr><td>10486　武汉大学</td></tr>
<tr><td>10651　西南财经大学</td></tr>
<tr><td rowspan="5">10</td><td>10003　清华大学</td><td rowspan="5">72</td></tr>
<tr><td>10004　北京交通大学</td></tr>
<tr><td>1003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td></tr>
<tr><td>10246　复旦大学</td></tr>
<tr><td>10335　浙江大学</td></tr>
</table>

社会学 Sociology[1]

社会学作为一门伴随着工业文明和自然科学发展而产生的社会科学学科，其延续至今的学术积累和研究范围极为扎实和广泛。而

〔1〕作者在写作中参考并引用了陈树德《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反思》、《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韩明谟《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时限、分期及传统问题》、《也谈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与陈树德同志商榷》，周晓虹《经典社会学的历史贡献与局限》，庞树奇《社会学“中国化”的前提和使命——对社会学学科地位的再思考》，陈劲松《分歧与趋势：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三十年》和郑杭生《改革开放 30 年：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轨迹和其鲜明特色》等多篇研究论文，还引用了维基百科词条的介绍。因本文非学术论文，故没有一一予以标明。重要引用的“文字段落”，笔者皆以引号标注。

对于中国的高中生学子来说，社会学大概算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了。虽然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无时无刻不在和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打交道，但由于中学的课程设置，绝大部分中学学子对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可说是一无所知。笔者所认识的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朋友中，如果是从本科阶段就进入社会学系的，基本上都是高考志愿调配的结果，而不是来自于他们高考报名时的自愿选择。

按照我国教育部门现有的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划分，社会学作为一级学科被纳入法学这一学科门类当中。虽然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方法横跨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但毫无疑问社会学是一个有着独立学术传统和研究视角的重要社会科学学科，教育部门的这个划分可谓是完全没有道理。对于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感兴趣的年轻学生来说，笔者认为社会学是一个在理论视角和实际应用上都比较好的科系选择，因此笔者在此多费些笔墨单独对该学科做一些介绍。

笔者在此引述维基百科中文词条对于社会学的介绍：

> 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末期，是一门研究社会的学科。社会学使用各种研究方法进行实证调查和批判分析，以发展及完善一套有关人类社会结构及活动的知识体系，并会以运用这些知识去寻求或改善社会福利为目标。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了由微观层级的社会机构（agency）或人际互动，至宏观层级的社会系统或结构，因此社会学通常跟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并列于社会科学领域之下。
>
> 社会学在研究题材上或研究法则上均有相当的广泛性，其传统研究对象包括了社会分层、社会阶级、社会流动、社会宗教、社会法律、越轨行为等，而采取的模式则包括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由于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是在社会结构、个体机构的影响下塑造而成，所以随着社会发展，社会学进一步扩大其研究重点至其他相关科目，例如医疗、军事或刑事制度、互联网等，甚至是例如科学知识发展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一类的课题。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方法（social scientific methods）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20世纪中叶以来多样化的语

言、文化转变也同时产生了更多更具诠释性、哲学性的社会研究模式。然而，自 20 世纪末掀起的科技浪潮也为社会学带来了崭新的数学化计算分析技术，例如个体为本建模（ABM）和社交网络分析。

因其兴起的历史背景，社会学研究的重心很大一部分放在现代性社会中的各种生活实态，或是当代社会如何形成演进以至今日的过程，不但注重描述现况，也不忽略社会变迁。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广泛，小到几个人面对面的日常互动，大到全球化的社会趋势及潮流。家庭、各式各样的组织、企业等经济体、城市、市场、政党、国家、文化、媒体等都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而这些研究对象的共通点是一些具有社会性的社会事实。虽然“社会性”的定义在不同学派之间仍有争执，但社会事实外在于个人，且对个人的行为跟认知有影响，这一点是大致上为社会学者所共同接受的。

通过上面这段引述介绍，我们很显然可以看出，由于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科技手段的突飞猛进，已经大大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和关注范围，但是当下的社会学研究和诞生于欧洲的古典社会学，其问题意识仍然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民国时期的前辈“海归”社会学者吴景超先生曾说过：“社会学的中心问题，至今还是如孔德所指示的，便是社会组织与社会变迁。”“社会组织，至少要包括三方面的研究。第一方面是制度的研究，目的在寻求各种制度的关系，如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家庭与宗教的关系等等。第二方面是社区的研究，目的在寻求乡村与都市各种社区的性质及其相互的关系。第三方面便是阶级的研究。”“社会学者研究社会变迁，最后的目标，还是发现社会演化的阶段，以及演化的原因。”他的观点“历久弥新”，基本可以涵盖当下中国社会学界所关注和研究的主要方向。

（一）学科历史渊源

现代西方经济学起源于英国，而社会学则是起源于地处欧洲大陆的法国。刺激社会学产生的原因正是由于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

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剧变和影响。历史上最早提出社会学并为这个学科奠定基础的是法国学者孔德（Comte），他开创了社会学的实证主义传统。之后法国又产生了社会学的宗师级人物涂尔干(Durkheim)，他致力于关注西方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失范”现象，出版了大量关于教育、宗教、自杀、法律和犯罪的论文和专著，他的代表作有《社会分工论》（1893 年)、《社会学方法论》(1895 年)、《自杀论》（1897 年）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 年)，这些目前都被视为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基础著作。在涂尔干的努力下，社会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规范化的现代社会科学学科。

后来社会学传入美国，这也是因为当时美国正处于“镀金时代”的资本主义高速成长期，城市化进程及规模日益增大，但与此同时，社会失范、贫富悬殊和犯罪率上升等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也日益涌现出来，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病”诊断学科，因其“实用主义”取向而在美国受到重视，该学科在美国打上了鲜明的“应用社会学”和“政策社会学”的烙印。但也正因为如此，社会学在美国比在欧洲更早确立其独立学科的地位，并且最早进入高等教育系统。1892 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产生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学界著名的芝加哥学派。而在欧洲，1895 年涂尔干在法国波尔多大学创立了欧洲首个社会学系。进入 20 世纪以后，社会学在欧洲的学科地位才得以提升。1904 年英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创建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09 年，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和马克斯·韦伯共同成立了德国社会学协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Soziologie)，随后，韦伯又于 1919 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设立了德国首个社会学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学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美国。社会学的分科化愈发细密。大规模的科学技术手段引入到研究当

中，定量研究的重要性尤其得以突出。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是西方社会学的重要传统。他否定并批判孔德等主流社会学理论。而后社会学界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左翼批判社会学理论都受益于马克思的研究。而对于中国社会学界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的影响则更为深远。

（二）中国历程

清末西方社会学理论就已通过翻译传入中国，西方社会学的首推者是我国著名学者严复先生。早在 1898 年，严复就已在上海《国闻报》登载其翻译的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即《社会学方法论》）中的《贬愚》与《倡学》，而在此之前的 1895 年，严复发表的《原强》一文中就已经介绍了斯宾塞的社会学说。

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首先也是着眼于向西方学习“富强之道”。而到了民国时期，西方社会学在中国进入了一个在学术层面和研究层面的快速发展阶段，一方面是留学欧美学习社会学的“海归”学者们开始在中国构建西方社会学的学科传统，另一方面左翼知识分子引入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中国社会，又构建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社会学传统。中国社会学界普遍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学存在两个传统，“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传统和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的传统”。前者以引入的西方科学调查方法，进行社会调查、统计和研究，提出“改良建议”，而后者也主张进行科学的社会调查和实证研究，但基本是以全面批判为主要基调，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

西方社会学的代表有吴景超（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他是中国最早开始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主张靠发展振兴工业来救济农村，实行“工业化救国”路线。还有留学美国的李景汉先生，归国后致力于社会调查和统计，其所主持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是 20 世纪 30 年代研究中国北方农村社区的翔实材料。而

在当时社会学较为“前沿”的，如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民族社会学等领域，中国学者也是人才济济。代表人物有留学欧美的潘光旦、吴文藻和费孝通等。特别是费孝通先生，他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所完成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列为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代表则有陈翰笙先生。他虽然也是留学欧美，但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以第一手的农村调查材料论证中国农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他曾任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并主持社会学组工作。后来又创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传统则超出了学术界之外，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李立三的《中国职工运动》、萧楚女的《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彭湃的《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等革命运动材料在一定程度上都被视作社会学的原始资料文献，在其中也不自觉地体现出“社会学知识”的使用。而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领袖瞿秋白更曾亲自主持上海大学（非现在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所以“30—40年代以‘社会学’为名而实际旨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数量甚多，举其要者有：《社会学大纲》（李达）、《社会学讲话》（许德琦）、《现代社会学理论大纲》（李平心）、《社会学入门》（姜君辰）、《社会学和社会问题》（冯和法）等”。

在当时的高等教育系统里，各大学也纷纷开设社会学系。早在1910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设置的课程中即含有社会学的课程内容。1923年夏，于右任、邓中夏创办的上海大学就包含了社会学系。始建于1926年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则是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学教学和研究机构。此外，1928年成立的国立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和1930年成立的金陵大学社会学系都曾为当时中国社会学界的研究重镇。

1949年以后，在意识形态和高等教育改革上一度“以俄为师”、全面照搬。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就取消了社会学，我国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社会学也被认定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被取消。当时受苏联影响，“一是认为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学说，无产阶级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就可以取代社会学；二是认为社会问题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存在社会问题，只有光明面而没有阴暗面”。

由此中国社会学停滞近30年之久，直到“文革”结束以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才在费孝通先生等人的努力下得以恢复。到如今“后三十年”的中国一直处于制度改革和社会转型阶段，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日渐突出，而社会学作为一门分析“社会整体性失范”和进行社会数据统计，提出“技术”性改良手段的社会科学学科，开始得到政府重视。正如同当年的美国一样，“应用社会学”和“政策社会学”的需求十分突出，由此中国社会学界才真正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阶段，在学术领域与西方基本做到了同步交流。时至今日，社会学的各分支如社会分层学、教育社会学、比较社会学、社会地理学、文化社会学、艺术社会学、知识社会学、道德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组织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福利社会学、人口学、政治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等都在中国有所开展，与社会学密切相关的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开始渗透到了其他学科的研究里面。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2007—2009年社会学学科排名[1]

排　名	学校代码及名称	整体水平得分
1	10002　中国人民大学	91
2	10001　北京大学	85

〔1〕评估资料见：http://www.cdgdc.edu.cn/xwyyjsjyxx/pxb/xksppx/rwskl/。

排　名	学校代码及名称	整体水平得分
3	10055　南开大学	78
	10284　南京大学	
	10558　中山大学	
6	10003　清华大学	76
7	10246　复旦大学	74
8	10384　厦门大学	73
9	10183　吉林大学	71
10	10269　华东师范大学	70
	10294　河海大学	

政治学 Politics[1]

相信在现在的高中学子当中，有不少人对于时事政治都是非常关心的。不可忽视的是现在互联网的发达，使得年轻学子获取各种和政治相关的新闻信息相比以往更加容易。正所谓“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在当下这个互联网时代可算是真正得以实现。

但是要提到政治学这门历史最为悠久的知识门类之一，恐怕就少有学生能够了解其脉络了。大部分中学生也许会将思想政治课的内容，视作是政治学的“代表”。但实际上，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内容至多算是政治学诸多理论中的一种视角。其实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1〕作者在写作中参考并引用了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的进程——一个评论性的观察》，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陈周旺《草创政治学：从美国反思中国》，孙国东《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钟扬《从比较政治学的逻辑看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孙宏云《小野冢喜平次与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形成》，田正平，商丽浩《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制度变迁、财政运作与教师流动》和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等多本多篇研究著作和论文。还引用了维基百科词条的介绍。因本文非学术论文，故没有一一予以标明。重要引用的“文字段落”，笔者皆以引号标注。

遗产就非常丰富，在政治哲学思想的思辨层面，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在政治思想领域为后世中国留下了很多可供借鉴的璀璨成果。而在政治体系的构建方面，有不少学者都将传统中国视为一个“政治早熟”的文明，尤其是中央集权制和其支配下的庞大官僚体系，可谓是古代社会最为完善的科层官僚体制。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动”地被拖入到当时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里以后，在政治思想和政治体系构建上也进入了一个“西学东渐”的时期。如果我们按照惯常的分类将政治学分为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和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那么在如今的中国，政治科学领域的理论探讨已经基本为近现代的西方政治学理论所主导，而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回顾、反思和讨论则更多集中在政治哲学领域。

当下的中国，已经从单纯的经济改革进入到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社会问题和各种社会矛盾也频频出现，如贫富差距加大、住房问题、城乡差距、环境问题、法律不公正和社会冲突、国际争端等。相信关心中国时事政治和新闻的中学生对相关议题也并不陌生，要从容应对这些问题，加强政府治理能力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环，这也是政治学所研究和关注的范畴。正如邓小平先生昔年所言：“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中学生们如果对中国改革和解决转型期间的各种社会问题有兴趣，不管是决定考取公务员还是要进行理论研究或者进入媒体界工作，在大学里学习政治学理论无疑是一个好的选择。因此笔者在此对西方政治学理论视野下的政治学学科略作一些介绍。

（一）学科历史渊源

正如笔者前面所言——通常比较简单的划分方法，是将政治学分为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更多是关注政治领域的“价值取向”，所谓“好”的、正义的或者说理想化的政治应该是怎样的（what ought to be），其重点在于提供一种理想的政治价值观念，对现实政治予以“规范”指导和理性指引，“研究的是关于国家、政府、自由、财产、法律和执法等权威的合法性基本问题，如：这些概念是什么？为什么需要它们？什么使一个政府具有合法性？政府缘何保护何种自由和权利？政府缘何、采取何种形式？法律是什么？公民需要负起什么样的义务？何时可以合法地推翻一个政府？……”古典政治哲学思辨往往注重从形而上的角度探讨政治领域应该奉行的最高准则，如对于民主、共和、正义、自由和平等等社会价值取向的讨论，以及为了实现这些社会价值应该构建什么样的政体机制。另一方面，如今的政治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人类政治思想史的回顾和探讨，在政治哲学学者看来，既然想要弄清楚何谓“好”的政治，那自然要回溯到过去古典时代先贤们的思想。

而政治科学所关注的是政治领域实际是怎样的（what it is），“指近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门独立学科，它着重于借助科学的方法，以经验事实材料为基础探究政治发展规律，有严密的逻辑结构、独特的概念体系和学科规范。”着重以政治行为、政治制度及公共政策等作为研究对象，从中“分析特定社会的政治价值，并设计出符合某种目的的政治机构或制度”。

笔者在此引用政治学莱斯利·里普森（Leslie Lipson）在其著作《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中提出的“政治学研究的五大问题”：

一、公民资格的范围：它是排他的还是包容的？

二、国家的职能：它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三、权威的来源：它来源于人民还是政府？

四、权威的结构：权力应当集中还是分散？

五、国家的规模及其外部关系：什么样的政治单位更好？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是可取的？

国际关系一般被视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包括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国际关系“既是学术的领域，也是公共政策的领域”，从全球化问题到领土争端、核危机、民族主义冲突、经济发展、恐怖主义、人权、全球环境问题、移民问题和贸易冲突等都属于国际关系研究的范畴。在学科理论上广泛借鉴了哲学、经济、历史、法律、法学、地理、社会、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等学科。

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是从近现代才有的，但对于政治领域的研究最早开始于古希腊，当时的政治学研究范围主要包含在伦理学、哲学和历史这几门学问当中。“政治学的前身甚至能追溯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年代，尤其是在希罗多德、荷马、赫西俄德、修昔底德和欧里庇得斯等人的著作里。”后来柏拉图开始分析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以此进行政治哲学研究。而亚里士多德则在柏拉图的分析上又开展具体的比较形式的经验研究。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当时的经典之作。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方式更是对后世政治科学学科的诞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罗马主导西方世界秩序的时候，对于罗马法和罗马政治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政治研究的领域。中世纪的时候，由于基督教的主导地位，对于政治学的探讨则集中在神学和经院哲学的层面。

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转折点，政治学得以从基督教思想体系中分离，人们以理性和经验的眼光来观察和解释政治现象。意大利学者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树立了现代政治学的研究重点，针对政治机构和政治参与者做直接的观察，其代表著作为

《君主论》。之后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布丹在其著作中对于“主权”进行了探讨，对于主权问题的思考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启蒙运动时代的政治思想家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孟德斯鸠等学者的思考，促成了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分权制衡的理论化生成，自然法、自然权利、主权、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等观念也得以开始传播。这些观念也成了其后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框架。

19 世纪中期以后，政治学研究也逐渐进入“科学主义”的范畴之内，研究者更加注重通过对历史事实、经验现象等进行归纳和分析来解释政治现象，着眼于对政治体系和社会制度进行实证研究。在当时占据政治学领域主导地位的仍然是欧洲学界，而当时政治学研究的欧洲学者还是属于跨学科的研究，如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就跨越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等多个领域。

现代政治学在高等教育系统得以独立和专业化则产生于当时还在对欧洲学界进行学习的美国。19 世纪 80 年代，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政治研究院，有学者以此作为现代政治学学科独立的标志。紧接着，1903 年美国政治学会成立。至此，现代意义的政治学研究中心逐渐开始从欧洲转向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治学界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和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迅速崛起，而后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方向还有政治系统论、结构功能主义、政治沟通理论、政治文化理论、政治发展理论和利益集团研究等；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主义（分为差异性极大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在政治学领域也是影响极大。

（二）中国历程

西方政治学理论传入中国，也是和一百多年来中国争取富强、民众争取自由的历史背景所紧密结合的。赵宝煦先生在对于政治学学科的回顾文章里谈到：19 世纪中叶洋务运动兴起时，中国人通

过洋务派的鼓吹、宣传，开始对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有了一些了解。但是通过译书、著书及报刊大规模把西方的国家学说、契约论、三权分立、民主、自由、天赋人权等等理念和议会、政党等等国家制度介绍到中国来的，则是清末维新运动时的事。当时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都在这方面做过不少工作。严复因曾留学英国，故译作、著作尤多。戊戌变法虽以六君子遇难而告终，但兴学堂、开书局、办报纸的维新风气，却不可遏止。这时，政治学在西方也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以《政治学》、《政治学史》命名的著作，在欧美及日本均陆续出版。中国维新之士，也就及时地翻译过来在中国传播。据统计，从 1901 年到 1904 年间，中国翻印出版西方政治学的专著就有 66 本之多。其中，美国伯盖斯所著《政治学》就有译书汇编社（1900 年）和上海作新社（1902 年）两种中译本。

在高等教育系统里面，“1899 年，京师大学堂正式设立了仕学馆，可以说，它事实上是现在大学里政治学系或行政管理系的前身。”1904 年《奏定学堂章程》颁行全国，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分为八科，其中政法科就包括了政治学门和法律学门。1913 年 1 月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中将系科设置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和工科等七科，其中法科分为法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三门。

清末民初，留学海外学习法政曾一度成为家室殷实子弟最钟情的选择。最开始，留学日本是最受欢迎的选择。进入民国时期以后，留学欧美学习政治学逐渐成为主流。“海归”的中国政治学者们于 1932 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政治学会。并分别在 1935 年、1936 年和 1942 年召开过三届年会，至 1946 年，拥有会员 140 人。据赵宝煦先生统计，到 1948 年为止，在全国的 100 余所大学中已有 40 多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培养政治学专门人才。在这些大学政治

学系中教书的著名教授有：张慰慈、高一涵、钱端升、张忠绂、浦薛风、张奚若、张汇文、萧公权、蒋延黻、周鲠生、李亚农、萨孟武、邓初民、楼邦彦、吴恩裕、王铁崖等。这时期出版了大量政治学专著，具有代表性有“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高一涵的《政治学纲要》、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钱端升的《中国政府》、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浦薛风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潮》等等”。

赵宝煦回顾说：“当时我国几十所大学的政治系都是在 1952 年一起取消的。到了 1960 年，中苏两党的争论公之于世，中国感觉到需要大量对马列主义有较好的理解、并能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因此全国不少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在内，又重新建立了政治学系。但这时建立的政治学系，主要是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不涉及政治学广阔领域的其他方面问题。到了 1964 年春天，根据中央一个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决定，又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三个政治学系改成了三个国际政治系，任务是培养关于外国政治问题的教学和研究人才。简单说来，中国大学里的政治学系是在 1952 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时被取消了。当然，和前苏联一样，关于国家问题、中国宪法、比较宪法、西方议会政府、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以及国际法等等课程，都放在大学法律系里讲授，这些课程并没有取消。尽管如此，政治学却不再作为一门独立科学而存在了。”

1980 年 12 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政治学会成立（重建）大会，此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吉林大学等近 20 个高等院校相继建立了政治学系，培养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俞可平曾对中国政治学重建后的发展作出过以下评述：“第一，在学科设置方面，政治学作为基础性社会科学学科的地位已得到确立，各综合性大学一般都设立了独立的政治学或行政管理学的系科。第二，在机构设

置方面，从中央到地方，相继设立了许多综合性的或专门性的政治学研究机构。第三，在政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面，我国从 1981 年起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1983 年起招收硕士生，1985 年起招收博士生，至今已经形成一个由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组成的完整的政治学人才培养体系。第四，在科学化方面，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比较明确，政治学独有的概念系统和方法论系统初步形成，专业化程度明显提高。第五，在应用研究方面，政治学者开始积极地参与各级政府的对策研究，更多地承担党政职能部门委托的课题研究，成为决策咨询系统的重要成员。第六，在国际交流方面，政治学基本上已经完成从敏感学科向常规学科的转变，全方位对外开放，包括邀请国外政治学者来华讲学、国内政治学者到国外访问和参加国际会议、海内外学者合作从事中国政治研究、大量译介国外政治学著作等等。”

但总的来说，在政治科学的研究领域，一方面是理论引介和著作翻译工作成就斐然，不少学人投身其中；而另一方面，却并没有多少学人将舶来的西方理论真正运用到对中国问题的实证和经验性研究上，不管是政府的公共决策机制、社会动员体系、政治体制、政治经济周期、宪政框架，还是政党理论、官僚理论和中央地方关系及财政分权体制，真正有原创性贡献的寥寥可数，其他大多停留在应然的“比附研究”上，属于拿本土现实和西方概念盲目嫁接。而在国别政治研究领域，对于拉美威权政治转型、东南亚政治变迁和东欧剧变后的政治转轨，国内也少有拿得出手的比较研究。

对于关心中国时事政治或者是未来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中学生来说，政治学无疑仍然属于有待“拓荒”的潜力学科。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2007—2009年政治学学科排名[1]

排　名	学校代码及名称	整体水平得分
1	10001　北京大学	83
	10002　中国人民大学	
3	10246　复旦大学	78
	10511　华中师范大学	
5	10055　南开大学	77
	80000　中共中央党校	
7	10183　吉林大学	76
8	10284　南京大学	74
9	10065　天津师范大学	71
	10422　山东大学	
	10486　武汉大学	

法学 Law[2]

提到法学专业，一般的中学生头脑里首先浮现出的大概就是电视上那些威风凛凛、身穿法袍的大法官和西装革履的律师。司法体制改革进行到今天，层出不穷的法律规范已经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学学子大概也能随便说上若干法律条款。在文科学科里面，法学专业一直属于报考的热门，而法学专业的招生数量多年来也一

〔1〕评估资料见：http://www.cdgdc.edu.cn/xwyyjsjyxx/pxb/xksppx/rwskl/。

〔2〕作者在写作中参考并引用了付子堂《法理学初阶》，网文《从西南政法大学看中国法学教育的嬗变》，朱苏力《也许正在发生——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一个概览》、《什么是你的贡献?》，刘晓飞《建国以来我国法学教育的思考》，田正平，商丽浩《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制度变迁、财政运作与教师流动》和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等多本多篇研究著作和论文。还引用了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词条的介绍。因本文非学术论文，故没有一一予以标明。重要引用的"文字段落"，笔者皆以引号标注。

直是名列前茅。据2009年中国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7（2009）》透露：我国高校法学院系30年增长了100多倍。

在西方社会，专业化的法律技能和特殊的法律伦理要求，使得从事法律职业者无形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如同科学家或医生，他们受过专门的职业训练，拥有共同的知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维、共同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

（一）学科历史渊源

“法学”的拉丁文为Jurisprudentia。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便已出现这一用语。古罗马法学家曾对“法学”下过一个经典定义：“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现在教科书上对法学的常见定义为“研究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百度百科对法学研究对象的介绍如下：

> 从法的形式角度说，包括宪法、法律、法规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从法的体系角度说，包括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程序法以及其他各种部门法；
>
> 从时间角度说，包括古代法、近代法、现代法和当代法；
>
> 从空间角度说，包括本国法、外国法、本地法、外地法；
>
> 从历史类型角度说，包括奴隶制法、封建制法、资本主义法、社会主义法；
>
> 从一般分类角度说，包括国内法和国际法、根本法和普通法、一般法和特别法、实体法和程序法；
>
> 从表现形态角度说，包括动态法和静态法、具体法和抽象法、纸面法和生活中的法、理想法（如自然法）和现实法（如实际生效的法）等等。

在西方大学体系里面，法学属于最早得以建制化的学科。中世纪大学一般划分为文学、法律、医学和神学四个系科。但是法学是属于专业教育，而文学则是大学的基础学科——作为神学、法律和医院的预备教育。当时的法律教育主要分民法（罗马法）

和教会法两科。文艺复兴以后，从古典科系里面分离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阵营，法学也逐渐成为社会科学之一门。“在欧洲大陆，开展了广泛的编纂法典的活动，比较法学和行政法学随之兴起。”

而在研究方法领域，不同的历史时期也都表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自然法学派是法学理论的主流学派。19世纪中叶以后，历史法学派和实证分析方法逐渐兴起，取代了自然法学派所主张的价值分析方法。19世纪末开始，随着社会学的兴起，特别是在美国，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开始被大量引入到法学领域，形成了法社会学派。20世纪以后，法学流派日益多元化，比如说新康德主义法学、新黑格尔主义法学、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现象学法学、法律经济学以及后现代主义法学等都纷纷登台亮相。很难说谁真正占据了法学界的研究主流。

在法律教育方面，也逐渐从封闭式教育走向大众化，但大体上仍保持着“精英教育”的定位，从法学院毕业后要想获得律师资格、检察官资格和法官资格，往往还需要经过非常严苛的“司法考试”和职业培训方能通过。在社会分工愈发严密的今天，现代法律教育一般分为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培训两个基本部分。

笔者在此引用维基百科对于法学教育的介绍：

法学教育之目的系在法学范畴上的知识培育，范围包括各种法学理论及术科。有些人将法学教育分为法学本科教育和法学研究生教育，前者系指法学方面的第一学历（法学士和法律博士），后者则为供法学本科毕业后继续进修的法学教育，如法学硕士及法学博士。唯有些人则认为法律博士虽为法学方面的第一学历，但却是一个研究生学历，因此认为分类应以基础法学教育和进阶法学教育为名。

其中法律职业培训分为两大类：

资格前培训：即向未取得法律业专业资格（如律师资格、检察官资格等）

的人，为取得法律业专业资格而提供的教育，其目的是协助其取得资格及提供职业知识教育。例如香港的法律专业证书（PCLL）、英国的法律专业共同试（CPE）和法律实践课程（LPC）等。

资格后培训：即为已取得法律业专业资格者提供持续进修教育，其目的系为从业者不断更新其专业知识。例如香港的执业律师便需要按持续专业进修（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的要求定期进修。

在全球范围内，最典型和成熟化的莫过于美国法学院的职业化教育。

（二）中国历程

中华法系属于“最早产生在东亚大陆的古代法律体系”，古代中国周边的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家在政制法律体系方面都深受中华影响，形成了具有儒家特色的区域性法律系统，在宏观层面更构筑起了后人所为之惊叹的“天下体系”。“从《秦律》到《汉九章》再到《唐律疏议》和《大清律》，法律的性质、内容无重大变化。”

但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中国社会格局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动。“变法以求自强”逐渐成为主流，中国传统的法律体系基本就在这百年来的变革和变法中荡然无存。以至于当下对于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学习和研究往往只集中在中国法制史、思想史和制度史等历史类学科，属于完全脱离现实的纯学术研究。因此笔者主要是就西方法学学科在中国的传播教育略作介绍。

学者的研究指出：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最早由日本输入。日本法学家津田真道于1868年首次用来对应翻译英文Jurisprudence，Science of Law以及德文Rechtswissenschaft等词汇，并对之作了详细说明，该词于“戊戌变法”运动前后传入我国。梁启超于1898年所撰之《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一文影响甚大。

到清末法制改革时，“法学”一词已大量出现。

清末民初，留学日本学习法政之学逐渐成为热潮，而后家财丰厚的学子则更倾向于直接留学欧美学习法律。1904 年《奏定学堂章程》颁行全国，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分为 8 科：经学、政法、文学、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商科。其中政法科就包括了政治学门和法律学门。

民国时期的大学，法学院教育属于发展比较迅速的，和西方接轨的程度非常高。“国立的法学院仍以前身为京师大学堂法律学门的北京大学法律系最为著名，而私立的法学院则以东吴大学法学院和朝阳大学法学院最为著名，有‘南东吴、北朝阳’之美誉。”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 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在教授大陆法（中国属大陆法而非英美法系）之外唯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是解放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从 1930 年到 2000 年，国际法院一共有过 6 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 1997 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1949 年 2 月 22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宣布废除六法全书，摧毁旧法制。《指示》宣布：法律是统治阶级公开以武装强制执行的所谓国家意识形态；法律和国家一样，只是保护一定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指示》中所体现的法律工具论，对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根据这个《指示》的精神，从 1949 年至 1951 年开始对各大学法学院系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同年，教育部制定的《法学院法律系课程草案》明确规定：“讲授课程有法令者根据法令、无法令者根据政策，如无具体材料可参照，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原则，并以苏联法学教材及著述为讲授的主要参考资料。”

经过“院系调整”，民国时期的法学院分布被完全打破，对当时全国范围内的法学教育予以重组，成立了所谓的“五院四系”，分别为：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律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吉林大学法律系。基本都是参照苏联法学教学，如维辛斯基的《国家与法的理论问题》就在当时中国法学教育中长期被使用。

而从1957年开始，法律与司法虚无主义思潮广泛蔓延，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砸烂公检法”的口号，法学教育奄奄一息。“1966年，政法学院停止招生。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的《关于高等教育调整方案》撤销了106所高校，中国人民大学、湖北大学（前中南政法学院）及4所政法学院皆在撤销之列。综合性大学中只有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保留了法律系。”

“文革”结束以后，西南、北京、华东、西北4所政法院校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陆续都得以恢复招生，中南政法学院也得以重建。时至今日，当时的“五院”均已成为政法大学，“四系”亦已成为法学院。

资料显示：1983年以后，教育部、司法部在原有的政策基础上更加着重强调“多种层次、多种形式办学”、“全日制教育和业余教育并举”，“除了继续巩固、提高和发展大学本科外，应大力发展大专、中专这两个层次”的办学方针，“大力培训在职干部，大力发展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自学考试等多种形式办法律专业”。“到1991年底，法学院系校已达116所，本专科招生达11888人，毕业生11894人，在校生达40741人，在全国高校招生数、毕业生数、在校生数中分别占1.9%和2.0%。”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1997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提出，从宏观格局上为中国法学教育奠

定了坚实基础。短短七八年间，设立法学专业的高校达到 200 多所。1999 年大学扩招政策开始实施，法学专业因其开办成本低、社会需求热门而“一马当先”，“除综合性大学法学院系和专门的政法院校外，财经、工科、农科、医科、水利、师范等院校均办有法律系”。

调查数据表明：截至 2008 年 11 月，全国共设立法学院系 634 所，改革开放 30 年增长了 105.67 倍；法学本科在校生 30 万人左右，法学专科在校生达 22 万多人，30 年增长了 200 多倍；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达 6 万多人，30 年增长了 260 多倍。2008 年，中国法学博士毕业生人数 1700 余人，法学博士招生人数 2500 余人，法学博士在校学生人数 8500 余人；而 1983 年，中国法学博士研究生开始招生时只录取了 1 人。法学教师已达 55000 余人，改革开放 30 年增长了近 10 倍。然而，同样根据调查统计，2007 年法学学科毕业生的就业率竟列文科毕业生倒数第一。

在研究层面，法学已成为中国和西方接轨最为完善的学科之一，学科门类齐全，在这个大变革时期，基础理论和实践应用拜全球化所赐，都属于“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如果按照朱苏力教授的分类，当下的中国法学界主要有三个研究范式：政法学派、诠释法学（法条主义、规范化的概念法学）和社科学派（法律社会学的进路）。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2007—2009 年法学学科排名〔1〕

排　名	学校代码及名称	整体水平得分
1	10002　中国人民大学	90
2	10053　中国政法大学	84

〔1〕 评估资料见：http://www.cdgdc.edu.cn/xwyyjsjyxx/pxb/xkppx/rwskl/。

排　名	学校代码及名称	整体水平得分
3	10001　北京大学	79
	10486　武汉大学	
5	10183　吉林大学	73
6	10003　清华大学	72
	10276　华东政法大学	
8	10384　厦门大学	71
	1052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0	10248　上海交通大学	69
	10335　浙江大学	

文学 Literature[1]

按照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专业设置规定，文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包含中国语言文学类、外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学类和艺术学四个一级学科。

而中学生通常所提到的文学学科，一般仅止于中国语言文学和

〔1〕作者在写作中参考并引用了吴福辉，邵宁宁《现代文学：学科历史与未来走向——吴福辉先生访谈录》，吴红《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当前之隐忧》，刘介民《文学教育中知识的命运——中国语言文学课程向何处去?》，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彭吉象《关于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几点思考》，陈池瑜《中国艺术学学科特征与发展前景》，孙发成《二级学科艺术学的学科特征及研究方法》，易中天《论艺术学的学科体系》，孙慧佳《一般艺术学研究界域与研究方法综述》，刘道广《关于当前艺术学学科设置的三个思考》，黄会林《关于艺术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设置问题》，《高考重点专业详细介绍与报告指导》（第二版）和田正平，商丽浩《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制度变迁、财政运作与教师流动》和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等多本多篇研究著作和论文。还引用了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词条的介绍。因本文非学术论文，故没有一一予以标明。重要引用的"文字段落"，笔者皆以引号标注。

外国语言文学这两科，甚至于不少人直接就把中文系看成是文学的代名词。究其根本，还是因为文学学科门类的专业设置极其不合理。笔者将在下一小节单独介绍新闻传播学。本节将简单介绍一下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和艺术学。

（一）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顾名思义，包括语言和文学两个大的专业。按照教育部对学科门类的划分，它主要包括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8个二级学科，每个二级学科下面，又分若干个研究方向。当然，具体到每个学校，这8个二级学科不一定都会设置硕士点；研究方向的划分，不同院系也是根据自身的科研条件和师资力量来确立。”

一提到中国语言文学，中学学子应该都会想到中学语文课曾提及的作家们，如老舍、鲁迅等。大概最为中学生所熟悉的语言文学学科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了，不少文学爱好者也把文学系视为作家的培养摇篮，实际上这是个严重的误解。的确，我国当代不少作家有过中文系的学习经历和专业背景，但更多的作家，特别是那些最出色的作家，绝大部分都是非文学专业出身的。写作不是靠学习和训练，更多是依仗于个人的生活经历体验、思想文化素养和广泛大量的阅读。如果在文学系深造进入硕博士序列，那么培养出来的是研究文学的人才，而对于一般的文学系本科毕业生，该学科“通过教授给学生一系列语言和文学方面的基础课程，意在让学生具有扎实的语言、文学理论功底，具备良好的写作能力，毕业后能够在新闻出版、文艺宣传、教学科研等文化研究单位，从事编辑、采写、企宣、文案、教师等与专业基础尤其是文字能力密切相关的

工作”。

从历史渊源和知识体系上来讲，这其实是一门古老的学科，“自隋代科举制形成，文论便是考试的主要形式，在科举制日渐完备的唐代，诗赋甚至也成为主要内容。近代，西方的现代大学制度引入中国伊始，文学仍然是综合性大学、师范类学校最重要的专业之一”。笔者在此摘引“文学学科 30 年大事记”：

1977 年，高考恢复，中国语言文学成为当时最热门的专业之一。

1978 年，在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的倡导下，全国各高校开始设立大学语文课程。

1983 年 9 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共整理出版古籍图书逾万种，而 1978 年至今 30 年来整理的古籍，占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古籍总数的 85%。

1985 年，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的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关于“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设想，提出不再以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分野，设想厘清文学与政治的正常关系，此理念至今仍在探讨之中。

1991 年，王守常、汪晖、陈平原主编的《学人》创刊，同年 11 位学者召开关于重建中国学术史的座谈会，标志着 20 世纪 90 年代人文学科研究开始“思想淡出，学术凸显”。

1994 年，国家教委开始在各大学设立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扶持人文学科的发展。

1997 年，国家教委决定成立首批 8 个高等学校文科各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其中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档案学。

1998 年教育部颁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在中国汉语言文学类下设立“对外汉语”专业。新世纪开始，各大学中文系开始设立该专业。

随着 2004 年 11 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截至 2008 年 10 月，已

经启动建设了 292 所孔子学院（课堂），分布在 78 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对外汉语的推广，该专业成为中文学科最热门的专业。

同时，笔者特在此摘引两门和“古代”相关的中国语言文学课程的介绍以反映其“历史脉络”：

“古代汉语是我国古代汉民族使用的共同语，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和工具课，它以古代的书面语言——文言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研习现存的古代文献典籍，了解、掌握它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和一系列变化。先秦两汉时期的《论语》、《孟子》、《庄子》、《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典籍是本课程学习的重点内容。由于文言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古代汉语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变化很大，所以它和我们当今的生活、使用的现代汉语有较大的距离，学起来也有一定难度。在学习过程中，需要掌握词汇的意义和用法……

“中国古代文学史学习中国古代自先秦到清末辛亥革命前，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经典文学作品和代表作品、文学体裁、文学流派和思潮、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文学发展的走向和脉络等内容。中国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曾经出现众多的文学流派、文学代表作和代表人物。按照朝代先后顺序，中国古代文学可以大致分为先秦两汉文学、魏晋六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几个发展阶段……”

（二）外国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是“专门学习某门外国语言，以其作为工具或内容，进行应用或研究的专业。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通过学习外语，不仅可以掌握一个应用广泛的交流工具，还可以了解异国的文化与社会，开阔眼界，满足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教育部公布的专业目录有 37 个本科专业，如英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以及其他小语种等”。

和中国语言文学接近，外国语言文学同样包括语言和文学两个大的专业方向。其中“外语专业偏重于对语言文字本身（文字、语音、语法、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等）的研究；语言文学专业偏重于

对语言背后的文化（文学、史地、文化、比较语言学、跨文化交际）的研究”。

英语专业毫无疑问是当下中学学子所青睐的热门，相信不少学生家长也会认为这个专业比较“实用”，在全球化经济时代的当下，对外交流和商贸往来的增多使得对此专业人才的市场需求很大。但很多学子和家长也许忽视了或者说不了解这门学科所具有的深厚思想文化积累。此专业的全名是“外国语言文学”，除了要求学生掌握外语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还要具备相应的文学修养，对所学语种背后的文化脉络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听、说、读、写、译”可谓一样都不能少。

外语专业的学生有一个优势，本科阶段可以致力于将自己培养成“外语＋第二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凭借语言优势在本科毕业以后出国深造自己的“第二专业”。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优势更为明显，毕竟现在大部分研究领域还是在“英语霸权”的笼罩之下，国际交流大部分都是使用英语。

早在清末，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就已经引入了中国的教育体系。最初还是从语言学习开始，逐渐延伸到文学研究领域。笔者在此引用资料，以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为例：

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简称武汉大学外语学院，历史可追溯到1893年，现隶属于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部，它是中国重点综合性大学中的第一个外语学院。

1893年，自强学堂开设方言门（即外国语），1896年扩大为英、法、德、俄四门，1898年增设东文（日语），国学大师辜鸿铭曾在自强学堂教授英语多年；

1902年，自强学堂改名为方言学堂。

1913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成立后，设有英语部，知名校友有陈潭秋、章伯钧、朱光潜；1922年改设英语系；1925年，国立武昌大学将英语系

改为外国文学系，其间闻一多被聘讲授外文系的“现代英美诗”课程；1927年，国立武昌中山大学设有文科外国文学系。

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成立，文学院下设外国文学系，系主任先后为陈源、方重、朱光潜、吴宓，其他知名教授有陈登恪、袁昌英、周煦良、缪朗山、格拉塞等。

1953年，在院系调整中，武大外文系英文组并入中山大学，俄文组与南昌大学等校的俄文系合并，其他语种不复存在。1958年，增设英文专业，改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为外国语言文学系。1972年又增设法语、德语、日语等三个专业。

1990年，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正式成立。

（三）艺术学

艺术的发展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古今中外不同门类的艺术作品呈现出了丰富多元的文化特色。进入20世纪后，人类的艺术活动借助科技的进步，更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在十年“文革”之后，摆脱封闭于世界之外的状态，力求“与世界接轨”，艺术首当其冲。“在外来的艺术中，首先是音乐，从摇滚、重金属，从室内、无伴奏，到校园音乐、街舞，从高雅的歌剧到时尚的通俗歌星，互相杂陈着来到中国百姓社会生活中。至今方兴未艾。然后是美术，从装置、行为，到人体雕塑，写实、变形、写意……各种手法层出不穷”。

按照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专业设置规定，艺术学属于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其下辖的二级学科里面也存在一个“艺术学”。

0504 **一级学科：艺术学**

050401	艺术学	050402	音乐学
050403	美术学	050404	设计艺术学
050405	戏剧戏曲学	050406	电影学
050407	广播电视艺术学	050408	舞蹈学

而从世界各国学科发展来看，艺术都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因此有学者建议将艺术升格为一个学科门类，艺术学则成为艺术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因为艺术体系庞杂，一方面包含理论层面或学术层面的学科，另一方面也包含更大数量实践层面或应用层面的学科，诸如国画、油画、雕塑、声乐、器乐、舞蹈、表演艺术等等。”

总体来讲，作为理论研究的艺术学关注的是“不同门类艺术学之间共通的‘共性’部分，不同门类艺术学研究的是自身的‘个性’部分”。因此艺术学研究其实属于跨专业的研究方式，需要有对于多领域艺术的知识积累。今天方兴未艾的“文化产业”属于应用艺术学的范畴。

“文革”结束后，东南大学于 1994 年 6 月首先建立了艺术学系，这受到了北京大学、杭州大学等高校的响应，他们先后于 1997 年和 1998 年建立了艺术学系（东南大学艺术学系的表现尤为突出，1996 年东南大学艺术学系获得中国第一个硕士点授予权，1998 年又获得中国第一个艺术学博士点授予权，2003 年批准建立中国第一个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河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南京艺术学院等高校也都先后开设了艺术学系或者艺术研究所。相关数据表明，全国已经有 60 余所高等学校及研究单位获得了二级学科艺术学硕士授予权，其中 6 所具有艺术学博士学位授予权。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2007—2009 年相关学科排名

中国语言文学

排　名	学校代码及名称	整体水平得分
1	10027　北京师范大学	86
2	10001　北京大学	83

排　名	学校代码及名称	整体水平得分
3	10246　复旦大学	81
4	10284　南京大学	80
5	10610　四川大学	78
6	10055　南开大学	76
	10558　中山大学	
8	10269　华东师范大学	75
	10422　山东大学	
10	10335　浙江大学	74
	10511　华中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

排　名	学校代码及名称	整体水平得分
1	10001　北京大学	88
2	10030　北京外国语大学	86
3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80
4	10284　南京大学	79
5	10003　清华大学	74
6	10212　黑龙江大学	73
7	10184　延边大学	71
	10319　南京师范大学	
	10335　浙江大学	
	10650　四川外语学院	

艺术学

排　名	学校代码及名称	整体水平得分
1	10003　清华大学	84
2	10033　中国传媒大学	79
3	10286　东南大学	76
4	10027　北京师范大学	75
5	10284　南京大学	74
	10331　南京艺术学院	
7	10050　北京电影学院	73
8	10278　上海音乐学院	72
9	10001　北京大学	71
10	10285　苏州大学	68
	10384　厦门大学	
	10497　武汉理工大学	

新闻传播学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秩序，社会诸领域也逐渐呈现多样化的姿态。新闻媒体界也从传统意义上政

[1] 作者在写作中参考并引用了罗文辉《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对中华民国新闻教育及新闻事业的影响》，武勇《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模式》，刘海龙《“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年—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张振亭《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陈力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近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概述》，王怡红《中国传播学的历史与进步》，郑保卫《新中国60年：新闻学研究发展历程回望》，邓绍根《邵飘萍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宁树藩《从新闻学在中国演化的历史审视其与传播学的关系》，伍静《中美传播学早期的建制化历程与反思》，张骏德《试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等多篇研究论文，还引用了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词条的介绍。因本文非学术论文，故没有一一予以标明。重要引用的“文字段落”，笔者皆以引号标注。

府系统的“党报党刊”开始分化出一个市场化媒体行业。新闻媒体行业实则形成了“双轨制”：其中一端是吃政府财政饭的“纯官方媒体”——传统意义的党报党刊；另一轨就是市场化媒体，较为出名的有南方报业集团下属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和财新传媒等，在普通的二三线城市，往往也存在大量的都市娱乐报刊。即使是“党报党刊”，在广告收益的刺激下也逐渐走上市场化发展的道路，“由原来完全依靠垄断优势逐渐转变为以服务为核心、以市场为主导的经营模式”。而媒体的报道方式和言论导向也从为政府“保驾护航”、传达政府舆论导向转向对公权力部门和社会进行新闻舆论监督，反映民声民意。既然有了市场需求，那么自然就会产生大量的就业机会。目前中学生报考的热门专业里面，新闻类专业无疑是极其热门的。大概也会有不少中学学子以成为“无冕之王”作为自己未来的职业取向。

按照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专业设置规定，文学门类下设置有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分为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两个学科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但又是彼此互相独立的学科。

（一）新闻学

按照通常定义，“新闻学是研究新闻信息和新闻事业的特点和规律、新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和作用的科学。它包括了理论新闻学、实用新闻学、历史新闻学以及边缘性新闻学等”，以“培养新闻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和技能为宗旨，以新闻史、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为框架的教学和科研体系”为主。在早期，新闻学教育大都属于技术/职业模式，以培养编辑、记者所需的实用性技能为主。

展江教授指出：“在19世纪50年代英国的大学里就有了与新闻有关的课程。美国南北战争中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后来担任华盛顿学院的校长，他这个学校是美国最早开新闻学课程的。”根据学者研究，“美国的新闻学研究与学院新闻教育几乎同时浮出历

史地表。在大学开设新闻教育之前，即19世纪70年代以前，只是偶尔出现过有关报人传记、印刷史、报刊业务的零星文章和著作，新闻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问领域尚未形成”。

1879年，密苏里大学在英文系开设新闻史，1908年，密苏里州议会同意拨款在密大设立独立的新闻学院。“密大新闻学院第一任院长威廉博士对新闻教育具有崇高的理想，他把新闻事业当成一种社会服务事业，他认为新闻从业人员应该思想清晰、立论公正、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新闻教育，才能使新闻从业人员兼具专业技能及社会责任。”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也是美国较早开设新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的大学。

“在以报人普利策（Pulitzer）为代表的业界的推动下，美国的学院式新闻教育开始萌发，特别是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基本迈入了制度化的轨道。新闻学作为大学里的一个专门学科已经成形，各类新闻学专业刊物和著作大量出版。例如，著名的《新闻学季刊》（JournalismQuarterly）即是在1924年创刊的……普利策对哥伦比亚大学的高调捐款并最终促成哥大新闻学院建立。较为出名的还有成立于1927年的威斯康星大学新闻学院。”“截至20世纪40年代，职业新闻教育已经在美国的高校中扎根，有60%的美国高校设有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生教育也逐渐普及。”

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引进到中国之前，首先是“新闻”和“报业”在中国兴起。在清末民初这个大变局时代，“新闻舆论”是改良派和革命者用来抨击腐败清廷的利器。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新闻学传统则比学术新闻学要久远一些，开始于清末的戊戌维新时期，而以梁启超1896年发表的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为标志……”

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在中国得以确立。研究会以“研究新闻

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兼任会长，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徐宝璜任副会长，徐宝璜和《京报》社长邵飘萍是专任导师。徐宝璜教授被誉为“中国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鼻祖”。他 191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经济学、新闻学，1916 年回国，在北京《晨报》任编辑。这之后北京大学开设“新闻学”为政治系四年级选修课，由徐宝璜每周讲授《新闻学大意》，这也是我国新闻教育的开端。1919 年 12 月，北京大学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名义出版了徐宝璜的《新闻学》。这是我国的第一本新闻理论著作。而中国的第一部新闻业务著作则是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第一部新闻史著作则是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

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的新闻学专业尤为突出。这也与教会大学受到当时发展迅速的美国新闻学界影响有关。密苏里大学第一任院长威廉（Dr. Walter Williams）就曾来华，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由胡适先生担任翻译。1920 年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校友柏德逊（Don Patterson）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普通文科内创办“报学系”，这是中国大学正式设立新闻学系的开始，由柏德逊担任第一任系主任。他仿照密大新闻学院的课程，为圣约翰报学系设计了一套美式的新闻学。同在上海的复旦大学直到 1929 年 9 月才成立新闻学系。1924 年地处北京的燕京大学成立新闻学系，但 3 年后因为经费紧张停办。在多方奔走之下，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威廉博士的主持下决定与燕京大学合作，协助燕京大学在 1929 年恢复新闻系，课程设置基本与密大新闻教育相同，帮助燕大新闻系成为当时中国最出色的新闻学系。

到了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新闻学教育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同样被笼罩在前苏联教育模式的阴影之下。“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苏联的新闻工作者是党的干部的一部分，主要由中央和

地方党校培养。新闻学教科书的内容主要是在党的各历史时期新闻工作者怎样为完成党的中心工作而努力，不承认新闻工作有其本身的规律，实质是取消新闻学的学科独立性。”1952 年院系调整中，教会大学被取缔。如燕京大学新闻学系被并入北京大学新闻专业。1955 年北大新闻专业又被并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新成立的新闻学系。“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新闻教育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就聘请了苏联专家来帮助编写教材、培训教师。而苏联专家完全按照当时联共（布）中央党校新闻教研室所编写的教材来制订教学大纲，讲授新闻学和指导新闻学研究。因此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全国新闻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基本观点都是学习苏联的。当时有关部门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苏联新闻学著作，用以宣传和推广苏联的新闻理论与实践。这一时期派往苏联考察学习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人员回国后都整理出版了总结报告，作为学习资料。”

到了“文革”期间情况更为严重，各高校的新闻系先后遭到撤并，到 1971 年时只有复旦大学新闻系硕果仅存。尽管如此，新闻学的命运还是要好于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尽管僵化的意识形态主导了新闻系，但毕竟没有出现学科建制的断档。包括在 1956 年，复旦大学新闻系还创设了当时全国唯一的介绍外国新闻学说的半公开刊物《新闻学译丛》。

因此到了“文革”结束以后，新闻学迅速得以恢复。1977 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复旦大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广西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恢复招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很快，中国新闻学界就走出了“新闻和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意识形态阴影。到了 1997 年，我国第二次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文学门类中新增设了一个一

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下设两个二级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这也标志着新闻学教育在中国发展的兴盛。

（二）传播学

“传播学是一门以‘人类传播’或‘社会传播’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而社会传播包括了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类型。”相比于新闻学的“职业训练”特性，传播学则属于一门社会科学研究型的学科。传统的新闻系是典型的职业培训单位，以基础教学为第一要务，研究生教育和理论研究都出现得较晚。由于脱胎于英语学院，隶属于人文学科，因而采用的多半是定性的研究方法。在二战后美国大学向研究型大学转型、研究生教育逐渐受到重视的过程中，新闻院系面临着一个学科合法性的问题。于是，搭上当时显赫一时的社会科学的顺风车，就自然而然成为传统新闻系增强地位和权力的途径。

传播学产生于美国，在 20 世纪中叶形成独立学科，其产生与发展正是适应了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社会诸多领域发展的需要。“以电子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信息革命，加快并扩大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与范围。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新闻学以及数学等学科的学者们，从各自学科出发，研究信息传播的规律与传播效果，而新兴的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又为传播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正是上述多种学科的交叉与发展，导致了传播学的建立。可以说，上述这些学科都是传播学产生的背景学科，新闻学是其中重要的背景学科。而传播学的建立与发展，又反过来推动其他学科，包括新闻学的发展。例如在新闻学的教学与科研方面，增加了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的课程与传播效果、受众调查等研究课题，并引进了传播学的定量分析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传播学与新闻学都是独立的学科，它们研究的对象、重点和研究方法有所不同，提供的理论和知识也不同，

相互不可替代，但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交融与渗透的。”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是美国新闻学研究向大众传播学研究全面转型的时期。美国学者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一般被视作传播学的学科创始人，他的《大众传播学》一书被视作是传播学形成的代表著作。他于 1943 年率先在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开创传播学博士生课程，他一生游走于多所大学的传播学研究机构——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斯坦福大学传播研究所等，在学科建制上为传播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传播学正式被引进到中国是在“文革”结束以后，主要也是受到美国学界（尤其是施拉姆这一学派）的影响。“1978 年 7 月，郑北渭（1952 年从美国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学成归国的新闻学硕士。衣阿华大学正是施拉姆创立传播学的老巢，他曾在这里担任新闻学院的院长）在该系刚刚恢复的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一期（1978 年 7 月出版）上发表了译文《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同一期杂志中还刊登了陈韵昭翻译的一篇《公众传播的研究》，该文摘自埃德温·埃默里等出版于 1971 年的《公众传播概论》一书。这两篇算是最早对传播学学科知识的系统引介。”

1982 年 11 月 23—2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倡议举行了中国第一次有关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的召开标志着传播学正式引入中国并为新闻学研究界所接受。会议不仅肯定了传播学的价值，而且决定翻译一批介绍传播学的书籍，有条件的学校开设传播学课程。”198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传播学（简介）》，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等经典著作也都在中国被翻译出版。1985 年 6 月，复旦大学新闻系仿照美国东西方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的建制成立跨学科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并举行了国际“文化与传播研讨会”，在国内新闻学界首开传播学跨学科研究的先河。

1997年，传播学成为与新闻学并列的二级学科，各大学也纷纷开设传播学专业。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的传播学学科相对较为突出。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2007—2009年新闻传播学学科排名[1]

排　名	学校代码及名称	整体水平得分
1	10002　中国人民大学	85
2	10033　中国传媒大学	83
	10246　复旦大学	
4	10003　清华大学	75
	10486　武汉大学	
6	10335　浙江大学	73
7	10001　北京大学	72
	10284　南京大学	
	10487　华中科技大学	
10	10384　厦门大学	70

历史学 History[2]

历史是所有中国学生从小学开始就需要学习的课程，如果我们抛开学校这一正规的教学机构，其实对于每个孩子来说，早在牙牙

[1] 评估资料见：http://www.cdgdc.edu.cn/xwyyjsjyxx/pxb/xksppx/rwskl/。

[2] 作者在写作中参考并引用了初海龙《历史学学科领域分类考察》，桑兵《教学需求与学风转变——近代大学史学教育的社会科学化》，朱宏才《梁启超晚年对史学及史学教育的贡献》，侯云灏《20世纪中国史学的学科化进程》，田正平，商丽浩《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制度变迁、财政运作与教师流动》和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等多本多篇研究著作和论文。还引用了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词条的介绍。因本文非学术论文，故没有一一予以标明。重要引用的“文字段落”，笔者皆以引号标注。

学语的时候，大概就已经在父母所讲述的历史故事中接受启蒙了。

而对于中学生来说，笔者相信对历史有兴趣的学生肯定是大有人在。但是愿意以研究历史作为职业的人，恐怕就是少数了。理由无外乎出于实用主义的考量——觉得学历史学很难谋生、书斋生活比较清贫，或是受一些“偏见”所致——学历史和现实生活隔得太远、缺乏社会影响等等。这大概也是和中小学时期上历史课所留下的刻板印象有关。

实际上，绝大部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都对历史学有所倚重，历史学绝没有如俗见所想那么冷门和闭塞。在当代，历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其跨专业的研究特点十分突出。有时候一个历史学家可能也会同时身为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甚至生物演化学家。在笔者看来，对于有志于“以学术为志业”的中学学子，如果说并没有完全确定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喜欢或者适合于某一个学科，那么选择历史学作为自己的本科专业，不失为一个过渡阶段的好选择。在本科阶段学习历史学，可以让自己尽可能多地了解多个领域的知识、了解多个学科的研究旨趣。

笔者在此对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历史学略作介绍。

（一）历史学的渊源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史学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儒家经典中的《尚书》和《春秋》就属于历史著作。昔年有“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后有司马迁忍辱负重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这些先贤们著史的目的乃是为“寓说理于叙事之中，在叙史中褒善贬恶、体现伦理道德的范例，以历史经验警示后人”。传统中国的教育体系所谓的“四部之学”（经、史、子、集）中就包含了史学。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皆重视修史，

卷帙浩繁的《二十五史》可谓是钦命史官修的“正史”，此外的史书被视作“野史”。正史里固然多了不少“修饰”和“为尊者讳”的错误记载，但由此也可见传统社会对于史书的重视。

但我们也不难发现，传统的史学和史书与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存在着根本不同。葛剑雄教授在《历史学是什么》中谈到：“直到19世纪末，在中国的学术分类中，并没有‘历史’这么一门。今天所说的历史一般只要用一个‘史’字来表示就可以了，如史籍、史书、史表、史家、史学、史法、史才、史识、史德等。如果用现代汉语来表达，这里的‘史’都可以用‘历史’二字来代替。就像中国大多数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名词都是借鉴于日语一样，‘历史’这个名词也是来自日语，尽管这两个字本来都是中文，并且已在中国用了至少3000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大量引入西方的科学概念，首先用‘历史’来译西方概念的History，然后被早期游历日本的中国人介绍回来。”

20世纪初，梁启超先生流亡日本时的著作《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就批判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及“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提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的进化史观。他把历史学分为“通史”与“专史”两大部类，并且自信地宣称：“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论列之”。有研究者认为梁启超先生把对传统史学的批判继承和迎接西方文化思潮的挑战有机地结合起来，“分别从传统的纪传、纪事本末、典章政书、方志、断代史中获得启示，并逐步发展而来”，“将专门史分为人、事、文物、地方、断代等五大类专史”。

（二）历史学科的发展

许冠三教授认为，在西学影响下，近代中国的学术转向是一种“科学化”的进程。历史学也不能自处于这个潮流之外，民国时期历史学研究方向“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对史料进行谨慎的批判，力求写所谓的‘信史’，成为‘客观的’或‘批判的’史学；二是对历史的演变作一解释，寻求一种律性的东西”。

据相关考证研究，“京师大学堂是近代中国最早自设的大学，也是清末唯一定有史学专门的大学”。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分为七科，其中文学科之下，设有史学门目。重视高等教育的张之洞在1904年进呈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依据日本学制，为尚未筹办的文学科大学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制定了详细科目。前者的主课有：史学研究法、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各种纪事本末、中国历代地理沿革、国朝事实、中国古今外交史、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另有补助课程：四库史部提要、世界史、中外今地理、西国科学史、外国语文。后者的主课为：史学研究法、泰西各国史、亚洲各国史、西国外交史、年代学；补助课为：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国古今历代法制史、万国地理、外国语文。此外。还有所谓“随意科目”（即选修课程），如辨学、各国法制史、中国文学、人类学、公益学、教育学、金石文字学、古生物学、国家财政学、法律原理学、交涉学、外国科学史（仅万国史学门）等。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京师大学堂文科史学门一直没有开办，上述设想也就始终停留在纸面。

民国成立后，“按照1913年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文科下设历史学门，再分中国史及东洋史学、西洋史学两类，其课程为史学研究法、中国史、塞外民族史、东方各国史、南洋各岛史、西洋史概论、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年代学、经济史、法制史、外交史、宗教史、美术史、人类及人种学、西洋各国史、中国史概论等”。

与北京大学遥相呼应的南方学术重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前身）也在历史学课程设置上作出改革。“1919 年 9 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新任校长郭秉文提出‘改良课程案’，把国文部改为国文史地部，原为国文部下的史地学科，升格为史地学系。以后又改为文史部，历史系独立，所开设的课程为中国文化史、朝鲜史、日本史、印度史、亚洲文化史、史学问题、大战史、历史教学法、中国通史等。同时因为实行选科制，历史系学生要选修国文、西洋文学、地理、哲学等系的课程。其必修课即包括西洋哲学史、哲学入门、伦理学、地学通论、地质学、历史地质学。”

在这之后，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数量的增多。新增大学所开设的史学系社会科学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如“清华学校 1925 年正式成立大学部，1926 年设历史学系，并开设专修课程。其课程体现中西并重，注重西史方法的精神，有中、西通史，历史研究法，中国上古史，中国近世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化史，英、美、日、俄等国别史，欧洲近百年史，远东及太平洋沿岸史，另有外系开设的选修课如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本国文学、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等。”1931 年蒋廷黻先生在《历史学系的概况》中说：“清华历史系，除了兼重中外史以外，还有一种特别：要学生多学外国语文及其他人文学术，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

1949 年以后，历史学也承受了其他文科学科一样的压力和变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主导了历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在改革开放前 30 年，贯穿中国历史学界研究主题的主要有五个，被称作史学界的“五朵金花”：即古史分期（奴隶制与封建制衔接的问题）、农民战争、土地制度（即中国究竟以土地国有占主导抑或以土地私有占主导的问题）、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资本主义萌芽（即封建社会开始瓦解的情况）。“文革”结束以后历史学界才逐渐

恢复了“多元化”发展趋势，目前我国官方对于历史学的学科分类如下：

06　**历史学**

0601　一级学科：历史学

060101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060102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060103　历史地理学　　060104　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古文学)

060105　专门史　　060106　中国古代史

060107　中国近现代史　　060108　世界史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2007—2009 年历史学学科排名[1]

排　名	学校代码及名称	整体水平得分
1	10001　北京大学	89
2	10055　南开大学	83
3	10027　北京师范大学	82
	10246　复旦大学	
5	10002　中国人民大学	78
	10284　南京大学	
	10558　中山大学	
8	10384　厦门大学	77
9	10183　吉林大学	76
10	10003　清华大学	75
	10486　武汉大学	
	10610　四川大学	

〔1〕 评估资料见：http://www.cdgdc.edu.cn/xwyyjsjyxx/pxb/xksppx/rwskl/。

哲学 Philosophy[1]

哲学在人文学科里面大概要算是最为“小众”的一门学科了，对于大部分中学学子来说，只能在思想政治课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亲密接触。但刻板僵硬的思想政治类哲学教育是很难让学生对此产生兴趣的。相反则是让更多的学生认为所谓的“哲学”很“虚伪”、与现实生活距离遥远，甚至于“百无一用”。

对于哲学的偏见和错误理解，实在是有必要纠偏的。事实上，作为人类历史最古老的一门以追求智慧为目的的学科，哲学让人类得以了解自然界和自身社会，培养思维逻辑和总结社会规律的能力，教人洞察社会和人性，教人学会如何做人和做事。哲学虽不提供操作性的知识体系，但它却能给我们一个观察人生、社会的新视角，能够使我们不仅仅从个人或私人的角度看待问题。另外，哲学还注重培养一种缜密、发散、智慧的思维方式，通过提高认识而提升心灵的境界，使人能在更高的层面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总而言之，哲学是“大智慧”的学科，学好哲学，你将终身受益。

我国哲学专业本科招生人数极少，据相关数据，50%以上哲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会选择继续读研或者是出国深造。基本来说，可能有将近一半的哲学系学生这一辈子都将把哲学研究作为一门职

---

〔1〕 作者在写作中参考并引用杨俊峰《“以西释中”与中国哲学的学科构建》，张曙光《哲学的学科问题及其他》，蒋浩《严复思想与近代中国哲学转型》，徐英瑾《经典阅读，还是论证训练？——对中国的西方哲学教育的反思》，陈来《“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的几个基本问题》，戴光明《“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历史考察》，俞吾金，孙承叔《复旦大学哲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方案》，裴倩敏《哲学专业分析》，甘阳《记念洪谦先生与北大外哲所》，田正平，商丽浩《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制度变迁、财政运作与教师流动》和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等多本多篇研究著作和论文。还引用了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词条的介绍。因本文非学术论文，故没有一一予以标明。重要引用的“文字段落”，笔者皆以引号标注。

业。因此笔者在此引用相关资料对哲学专业略作一些介绍，希望那些对于哲学专业极感兴趣的“先知先觉”学生，能够多少增加一些了解。

（一）哲学在西方

中文的“哲学”一词属于舶来品，翻译自英文“philosophy”，而“philosophy”一词又源自希腊文。在希腊文中“philosophia”乃一组合词，前缀“philo”是爱，后缀“sophia”是智慧，哲学一词原意即“爱智慧”。根据学者研究考证：“1874年，日本启蒙家西周在《百一新论》中首先用汉文‘哲学’来翻译‘philosophy’一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并逐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引用。”

在西方学界，不管是古希腊时期的哲人，还是近现代的哲学家，不同的哲学学派都对“哲学到底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有着不同的意见分歧，用行话来说，这就是所谓的“元哲学分歧”(metaphilosophicaldisputes)。哲学在西方处于绝对意义上的“基础学科”，相当于是“万学之主”，其他学科都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如自然科学也是从哲学里面分化出来的，到后来科学成为与哲学并行的学科。

笔者在此引用维基百科的词条解释：

哲学的历史

古希腊时期的自然派哲学家被认为是西方最早的哲学家，不管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是否正确，但是他们的想法之所以有别于迷信的原因在于，这些哲学家是以理性辅佐证据的方式归纳出自然界的道理。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奠定了哲学的讨论范畴，他们提出了有关形而上学，知识论与伦理学的问题。某些现代哲学家认为，直到今日的哲学理论依旧只是在为他们三人做注脚而已，换言之，即使数千年后，我们依旧在试着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这也代表着我们依然为这些问题或是这些问题所延伸的更多问题而

感到困惑。

最早哲学的范围涵盖所有的知识层面，它一直是人类最抽象的知识研究。对“哲学”一词的介绍最初来自古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

哲学的基础

古希腊哲学家透过问问题来进行哲学实践，他们所提的问题大概可以归类为三类，这三类问题分别形成了哲学的基础学科：

形而上学　　有关世界的本质与真理的问题

知识论　　有关我们如何知道或认识真理的问题

伦理学　　有关生命的意义与道德实践的问题

必须要注意的是，这三门主要学科并非壁垒分明，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它们互相覆盖到彼此的领域，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形而上学主张不可能忽略知识论的理论基础。同样的，知识理论就是在架构主体与形而上学事实之间的关系。而道德的实践往往与道德真理的存在与否、和我们怎么去了解它息息相关。哲学的困难在于，一个完整的理论通常必须在形而上学与知识论都有良好的说服力。多数的哲学家不是只有专精一个领域，或是他在形而上学领域的主张很具说服力，知识论上却无法说服我们。只有少数具有热情与天赋的哲学家才能精通各个领域并且提出一套自己的理论。只有这样的哲学家才能名留青史，他们的理论通常非常具有说服力并且横扫历史，改变了人类对于世界的看法。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从西方学术史看，科学是哲学的衍生物。后来，科学独立为与哲学并行的学科。科学与哲学有互动关系。科学产生知识，哲学产生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现代西方哲学中有科学与哲学，是专门研究有关科学的理论。这种理论研究了科学的历史，为科学总结了许多理论模型，但这也只是解释了科学，并不是可以指导科学。哲学是人类了解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使人崇高起来的一门学问。

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不具有或很少具有“现世”用途。有人认为，离开哲学，各门学科也可以发展得很好，或者会更好。哲学并不关注各门学科中实例、概念或定理的具体内容，它所关注的，是这些具体科学的“基本常

识"，或是其中被人们惯常使用因而视作理所当然的概念、准则、定律等。这包括：

促使它们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它们在哪些范围上有效？

它们的权威是由什么来得到保证？

它们是否已经是这门具体学科中所要求的足够的基本前提？

它们对人有什么意义？等等。以及将这些疑问运用于哲学自身。

（二）哲学学科在中国

哲学作为人文学科，从本质上来讲是西方学术传统的产物，对于"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这一现代学科究竟是否只是用西方哲学观念对中国文化进行裁剪拼凑后的产物"一直有所争议，这些争议伴随着近现代中国哲学学科的诞生。

科学哲学学者吴国盛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中国古代相对的东西是经学。读经是我们的传统，经是文、史、哲不分的，都搞在一起的。哲学是一种来自西方的传统……从西方的历史看，科学家与哲学家老是搅在一起，越往前越是两种身份合一，既是科学家也是哲学家，比较近的像莱布尼兹，再远就更不用说了。中国没有这种情况。我们的四大发明都属于技术的范畴，搞技术的人都是工匠，不是学问中人，与哲学没有关系，与经学也没有关系。哲学本质上还是西方的。现代中国因为是走西方式的道路，所以继承了西方的一套学科体系。现在北大文科有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等，都不能直接衔接中国的经学传统，但可以从中找出只言片语，作为思想资源的一部分。"[1]

1914年，北京大学设立中国哲学门，这是中国大学中第一个哲学系。"陈黻宸先生承担中国哲学史的授课任务，他由此而成为讲授这门课程的第一人，在其八万余字的授课讲义中，关于中国哲

[1] 见本书访谈"哲学是干什么的？——吴国盛教授访谈录"。

学之为哲学的说明仅有只言片语”。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谢无量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成为中国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回国后在北大任教授，他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被视作中国哲学学科的诞生，“胡适完全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以西方的‘哲学’观念为唯一准绳以剔取中国哲学史料，以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对这些典籍进行梳理解读。胡适的教育背景，主要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因此他也是以实用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哲学史。当我们回头去看百年来中国人解释中国哲学史的经验，一方面，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为哲学史写作提供了一种经典范式，后来冯友兰的哲学史写作的大体范式主要还是来自胡适”。“1931年和1934年，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相继出版，以其体系之严整和叙述之清晰标志着中国哲学学科的正式形成。在书中冯友兰先生则明确指出：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成为官方指定的哲学理论，这已经脱离“纯粹的”学术，直接将其作为“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张哲学同样具有特定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则高于并要指导哲学研究，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则成为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当时最为流行的是苏联哲学著作，如列宁的名著《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就属于当时哲学系的必读书，“而且是任何科系（理工农医都在内）入学和毕业都必考的，其地位就如旧中国的四书五经”。1964年，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正式成立，这在当时属于中国唯一的外国哲学研究基地，“文革”结束以后“该所对于1980年后西方当代哲学和思想流派在中国大陆的迅速传播和研究实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学术空气逐

渐开放以后，哲学学科发展也逐渐正常化，康德哲学、尼采哲学和语言哲学先后流行一时。

在我国目前的学科分类中，哲学作为学科门类下面共有 8 个二级学科：

01　**哲学**

0101　一级学科：哲学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010102　中国哲学
010103　外国哲学	010104　逻辑学
010105　伦理学	010106　美学
010107　宗教学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这个学科分类实际上多少有些不合逻辑，“哲学二级学科的设置标准不一，如‘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是按照地域即空间划分的；‘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原来叫‘自然辩证法’）是按照论域即研究对象区分，且很不周延，也无法周延，如近些年一直受到人们关注的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政治哲学、价值哲学等就没有包括进去。所以，现在教育主管部门允许研究生招生单位自行设置若干与原有二级学科平行的学科（也有人称之为‘三级学科’），但这同时带来了哲学学科越分越细、越来越多的问题，须知，像法哲学、语言哲学、生态哲学、心灵哲学也自有其重要性，且谁也拿不准将来又会有什么新的论域出现”。

将其与西方大学的哲学教育相对比，就会发现“中国目前的哲学教育模式，和西方差别太大，彼此的课程表交集过小。众所周知，中国哲学本科生教育的课程是按照‘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中国哲学）、‘西’（西方哲学）三大模块来区分的，即以哲学学派和哲学史为分类的主要依据。但在哲学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哲学的核心课程却由以下诸模块构成：形而上学、知识论、

心灵哲学、科学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在这几大模块中，前三者都在中国的哲学分类体系中毫无对应位置。换言之，人家教材里教的东西，我们很多都不教……”

总体来讲，哲学学科作为一门“小众学科”，学习成就的高低极度依赖于导师和学习讨论群体。因此如立志学习哲学，那么就一定要争取进入好的大学。目前国家文科基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在哲学专业共设了7个点：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这几所大学的哲学系也基本代表了哲学学科在中国最高的研究水平。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2007—2009年哲学学科排名[1]

排　名	学校代码及名称	整体水平得分
1	10001　北京大学	90
2	10002　中国人民大学	89
3	10558　中山大学	84
4	10246　复旦大学	83
5	10284　南京大学	81
6	10486　武汉大学	79
7	10027　北京师范大学	77
8	10055　南开大学	76
9	10183　吉林大学	75
	10335　浙江大学	

〔1〕评估资料见：http://www.cdgdc.edu.cn/xwyyjsjyxx/pxb/xksppx/rwskl/。